

明 冤

毛文龙、袁崇焕
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

杜车别 / 著



历史如奔腾大河，跌宕故事浮动表面，无数血肉灵魂潜涌其下。作者采用大量史料，把明末历史毛袁公案中过去被刻意遮蔽的一面展现出来，其中有为被冤屈的英雄不平之呐喊，也有对明末危机独到深入的思考，有很大的启发性。兼听则明，无论读者是否同意作者的结论，阅读本书后，都可对明末这段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对文明的兴衰消长有更深刻的思考。

——张纪中 著名制片人

毛文龙、袁崇焕问题涉及明清之争，一直是史学界的热点，几百年来争论不休。本书作者通过第一手史料和丰富的论证深入探讨了毛袁问题，并对明朝灭亡原因给出了新的答案，是研读明史难得的一部佳作。

——阮景东 通俗历史作家，畅销书《万历朝鲜战争》作者

文字工拙不论，立意已存高远。烛幽探微，非为猎奇，似是对明末那一旅孤军的接应和守望。

——史航 著名编剧

上架建议：明史

ISBN 978-7-108-04417-4



定价：38.00 元

明 · 冤

毛文龙、袁崇焕
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

杜车别 / 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杜车别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6

ISBN 978-7-108-04417-4

I. ①明… II. ①杜…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清时代②毛文龙
(1576 ~ 1629)—人物研究③袁崇焕(1584 ~ 1630)—人物研究
IV. ①K248.07②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0238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封面设计 储 平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

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6

字 数 280千字

定 价 38.00元

本书人物表

毛文龙

万历四年(1576年)生,浙江钱塘人,本书主人公。三十岁赴辽东参军,历任千总、守备、练兵游击等职。天启年间以功授平辽总兵,以东江群岛为根据地,抵抗后金,功绩卓著。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被袁崇焕杀于双岛。

袁崇焕

万历十二年(1584年)生,广东东莞人。天启、崇祯年间历任辽东巡抚,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职。崇祯二年六月杀毛文龙。崇祯三年(1630年)因后金军兵临北京城下,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斩师等罪名被凌迟处死。

熊廷弼

隆庆三年(1569年)生,湖广江夏人。万历后期、天启年间数次经略辽东,提出三方布置战略。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时任辽东巡抚王化贞在后金袭击下弃广宁溃逃,熊廷弼弃守右屯,坚壁清野,携辽民散兵全线撤回山海关内,后以弃地误国罪被处死。

孙承宗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北直隶高阳人,天启帝师。在辽事上力主于关外修城、守城以图进取的战略。崇祯四年因明军大凌河之败而遭弹劾,引咎辞职。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清兵入关劫掠、攻打高阳城时,全家被害。

毛永诗

即孔有德,生年不详,原籍山东。毛文龙亲兵,屡有战功,官至参将。毛文龙被杀后调任山东孙元化麾下。崇祯四年(1631年)作乱登州,后投后金。被清封为定南王。清顺治九年(1652年)被明将李定国围于桂林,自杀而死。

毛有杰

即耿仲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生,原籍山东。毛文龙部将。毛文龙被杀后调任山东。崇祯五年(1632年)在登州之乱中呼应孔有德,后与孔有德等一起逃奔后金。被清封为靖南王。清顺治六年(1649年)因收留逃人被告发,畏罪自杀。

毛永喜

即尚可喜,万历三十二年生,辽东海州人。毛文龙部将。毛文龙被杀后于崇祯六年(1633年)十二月率部从广鹿岛出发渡海投降后金。清顺治六年受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1676年)三藩之乱时死于广州。

朱由校

天启皇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生,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登基,在位七年,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驾崩。庙号熹宗。

朱由检

崇祯皇帝,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生,天启七年八月登基,以明年为崇祯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自杀于北京煤山。庙号毅宗。

努尔哈赤

清太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起兵反明,建后金国,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病死。

皇太极

清太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努尔哈赤第四子,天启六年九月继任后金统治者。崇祯九年(1636年)将国号由金改为大清,年号崇德。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病死。

李琿

朝鲜光海君,万历三年(1575年)生,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被明朝廷封为朝鲜国王。在明金之战中持观望态度。天启三年(1623年)被朝鲜内部势力废黜。

李倧

朝鲜仁祖大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生,天启三年发动反光海君的政变,继任朝鲜国王。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正式获得明朝册封,在位二十七年。

目 录

本书人物表	1
-------	---

引子	1
----	---

第一章 努尔哈赤的憋屈	9
-------------	---

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居然会害怕木棍，哀叹“我等常养汉人，而汉人却置办棍棒不止”。又是什么原因让努尔哈赤写信怒骂自己的女婿李永芳，看不起他还心怀二心，却最终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天启初年后金对明方战争大获全胜的时候，努尔哈赤却草木皆兵，甚至抱怨后金统治区内的一些地方成了危难之地，任命的官员“皆逃避于家中”。

第二章 胜负天平的改变	47
-------------	----

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安安稳稳地在那里修宁远城，是谁给他们创造了这个条件？后金一再退缩，甚至放弃已经攻占的广宁，是害怕孙承宗么？后金真正的对手是谁？所谓打蛇打七寸，如果后金政权是条毒蛇的话，毛文龙就恰好是掐住了它的七寸，点中了它的命门。

第三章 缩回的拳头和脑后的板砖	62
-----------------	----

熊廷弼在监狱号泣“我被老孙所算”，他和孙承宗的战略分歧是

他入狱乃至被判处死刑的重要原因。天启六年初袁崇焕的宁远大捷，杀敌数百，自损数万。天启七年后金才围困锦州二十几天，袁崇焕就陷入了极度恐慌中。他逃过两劫最应该感谢的是毛文龙。可以说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推行关外修城守城战略，意图是避免野战，但在没有毛文龙的情况下却必然把明军拖入最被动形势之下进行野战的困境。毛文龙对后金的牵掣是天启年间后金无法长期围困宁远和锦州城继而攻城打援歼灭明军主力的主要原因。

第四章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103

毛文龙在给朝廷的奏疏里十四次提醒后金可能绕道喜峰口方向入侵：天启年间六次，崇祯元年崇祯二年初短短一年多更提醒了惊人的八次之多。袁崇焕在皇帝的严重提醒和警告之下，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对蒙古部落的信任上。袁崇焕两次与后金谈和被戏弄，而毛文龙却戏弄皇太极，骗杀了汉奸马秀才等人。

第五章 十恶不赦罪行逐一辩

149

毛文龙在东江独挡一面，恰恰符合孙承宗“重武吏之权”，“但得无多设文官，则武吏不轻”的想法。但在袁崇焕看来，这却成了毛文龙的最大罪状。一些人扣在毛文龙头上的通敌罪名成立吗？处在和毛文龙敌对第一线的皇太极的唯一结论就是毛文龙始终在戏弄欺骗他们。甚至在毛文龙死后，皇太极还对毛文龙诱杀后金使者的行为心有余悸：“但因前年文龙哄下金人到岛，或杀或解，故人惮去矣。”

第六章 袁崇焕杀害毛文龙的昏聩

210

袁崇焕和他的拥趸说了许多要皇帝信任边臣的道理，“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但他们忘记了毛文龙也正是“边臣”。在袁崇焕看来，这些道理都是让别人对他宽容信任，而他自己可以超脱于这些道理之上，要杀谁就杀谁，觉得谁可恶，就祭出“国人皆曰可杀”的法宝。

第七章 抹黑毛文龙之集大成者

227

民国历史学家李光涛先生对毛文龙的态度陷入了为丑化而丑化的怪圈之中,基本的逻辑一致性可以抛在一边,明显的自相矛盾可以浑若无事。明明是截然对立的论断,他都可以一本正经地长篇大论展开阐述。似乎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如何对立矛盾,只要是个人屎盆子,就设法扣在毛文龙头上。

第八章 朝鲜人对毛文龙的厌恶

254

天启七年后金入侵朝鲜,郑凤寿率领义民坚守龙骨城,后金攻城不克,死伤惨重。这样一个朝鲜民族英雄,却被朝鲜国王责怪说“郑凤寿知有毛镇,而不知有朝廷。厥罪非细”。朝鲜君臣竭力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尚的受害者,一个不忘君臣大义、华夷之辨、恪守儒家观念的理想主义者位置上;而把自己的对立面千方百计丑化成卑劣无耻之徒。作为朝鲜君臣眼前利益损害者的毛文龙,无论他的行为本身是如何效忠于明朝,但在朝鲜君臣眼中就注定只能是一个坏蛋,一个恶人。

第九章 毛文龙究竟是啥样人

288

毛文龙出生成长于江南最繁华的地区,又有官员背景的亲戚,但却偏偏请缨从军,到最艰苦的东北边疆。也许大部分人无法做到宁愿自己肝脑涂地,饱受误解谩骂,却依旧不改其志,为国效力。但这样的人却是真实存在的,毛文龙就是其中一个。他生前备尝艰辛,苦心竭力为国效忠,死后还要遭受铺天盖地的污蔑,精神上凌迟毁灭的酷刑。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在无数人须眉开动、唇齿奋扬、唾沫横飞中,毛文龙终于成了只配受到鄙夷唾弃的“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结语 毛文龙的悲剧和明朝灭亡的原因

308

明末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一个字:钱!毛文龙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在军饷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用最省钱的办法战胜后金的可能性,最后这种可能性也被袁崇焕扼杀了。毛文龙之死的直接原因固然是袁崇焕的刚愎昏聩,最根本的原因也还是一个钱字。因为钱的问题,

毛文龙在舆论中,被丑化得极度不堪。但明末缺钱的是政府,民间并不缺钱。老百姓过惯了和平舒服的生活,官员又是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代言人,税收加不上去。国家财政崩溃,无法应对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明朝只能灭亡,最终导致无数财富毁灭、无数生灵涂炭、文明倒退的历史悲剧。

附录一 对天启皇帝的评价以及对丑化明代皇帝现象的分析	327
附录二 袁崇焕大炮守城策略和中国火器发展的认识误区	342
附录三 提醒后金绕道攻关是否为先见之明问题的辨析	362
附录四 《度支奏议》和东江塘报天启七年东江军饷摘录对照	372
附录五 夏允彝对孙承宗评价的断句问题	375
附录六 对后金军队人数的考证	380
附录七 对史料的一些必要说明	390
参考书目	400
后记	406

引 子

天启七年(1627年),袁崇焕由于援朝不力,以及在锦宁战役中的一系列表现,受到督饷御史刘徽、河南道御史李应荐等人弹劾,被天启皇帝批准辞职回乡。

但随着天启帝病死,新皇帝的登基,在朝廷内一些官员的推荐下,崇祯皇帝迅速召回了袁崇焕,并委以重任。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袁被任命为蓟辽督师、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在和皇帝的会谈中,他许下了五年平辽的诺言。

从袁崇焕在天启年间的表现及后来的一系列作为来看,他实施平辽计划的实质依旧是与后金谈和,以争取时间修城守城,以守代攻,最终达到封堵消灭后金的目的。

出于种种原因,他把东江的毛文龙看成了实施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据袁崇焕后来自述,早在刚回京城时,他在与阁臣钱龙锡等人的私下谈话里就已经表露了要除掉毛文龙的意图。宁远履任后,他就开始筹划杀毛了。前奏就是切断东江经济来源,主要有两点:一是禁止商人前往东江各岛交易,二是把原先通过登莱运往东江的粮饷转为从关门起运到宁远觉华岛,登记挂号后再运往东江。总之一句话,把对毛文龙军队的物资供应完全控制在他的手中。

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把东江置于绝境,再用粮饷作饵,诱逼毛文龙进入圈套。当然还有一个附带的结果也是他乐于看见的,那就

是如果东江军民因此出现变乱,或者毛文龙本身出现过激言行,那他杀人就可以有更多借口。

应该说他的做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东江兵丁本来就因朝廷拖欠军饷处境凄惨,但还能靠赊借商人运来的粮食,再加挖点野菜勉强度日。袁崇焕的奏疏一上,商人都不准来岛,等于彻底切断东江各岛经济来源。毛文龙描绘当时岛上的惨况说“白骨盈沟,饿殍载道”,“草根树皮,淘洗净尽。荒山赤土,殍羸流离”,“降人生变,强卒喧哗”,“各岛告变”。

岛上人员听到商人被禁止来岛的消息后“哭声四起,各岛鼎沸”。官兵朝毛文龙哭诉:这等于是给他们拦喉一刀,和直接杀死还有什么区别。

一些兵民在海边抢船杀人,打算渡海降金。毛文龙软硬兼施,好说歹说,才抚平变乱,“男妇万余,跪哭震天”。

毛文龙在奏疏中表示与其因为众多官员对自己的痛恨猜疑而切断东江粮饷连累军民,还不如他亲自带着敕印到登州等候圣旨把自己逮捕进京,听凭处置。

他确实动身了,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十日到登莱附近的皇城岛,十一日到庙岛,并和时为登莱道副使、曾经到皮岛核查军队的王廷试见了面,提出两点请求,一是希望登莱把过去拖欠东江的粮饷补发一些,另外一个是自己希望能亲自进京,面见崇祯皇帝。

王廷试则说登莱也缺饷,并非有军饷而不给。至于进京见皇帝,则劝毛文龙不要这么做。万一离开之后,金人乘机来进攻怎么办?而且袁崇焕已经上疏,要和你在旅顺见面,粮饷的事情,你和他商量一下,他未必就固执己见。

毛文龙听从了王廷试的建议,开船回了皮岛。

袁崇焕果然没几天就派了徐珪去,和毛文龙约定在三岔、旅顺之间会晤。毛文龙派熊文祥和徐珪一起回宁远问行程。双方初步约定六月初在北汛口附近会面。

据袁崇焕在闰四月给皇帝的奏疏里说,他此去和毛文龙见面主要目的是两人开诚布公,解除误会。他要求户部把应该给东江的月

饷凑发十万,让他带去给毛文龙,还表示从此关宁和东江将士同心协力,甚至在奏疏中打下了这样的包票:“东西并力,则荡平之功,刻期可奏。此则皇上之威灵,微臣之至愿。”

从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汇报“臣改贡道于宁远者欲籍此为间所以图之也。自去年十二月臣计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来看,他这份闰四月的奏疏基本是对崇祯皇帝的一次彻头彻尾的隐瞒和欺骗。

而时任直隶巡按的方大任在事后的一份奏疏里也透露,他去宁远时,袁崇焕临行前曾经和他有过一次会谈。在会谈中,已经暗示了要有非常举动,跟他说“大丈夫不可有杀人之心,不可无杀人之手”云云。并表示这一去,一定要把事情解决好,要方大任不要妨碍他。

方大任猜到袁崇焕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不想泄露,也不敢相信。

毛文龙对自己面临的危险局面并非毫无预料。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毛文龙生前给朝廷发的最后一份奏疏写于崇祯二年的五月十三日。在这份奏疏里,毛文龙说“曲直生死,惟命是从”,在奏疏的末尾甚至请皇帝早点砍掉他的头颅,如果这样能够发泄众多官员对他的仇恨心理,从而拯救辽东生灵,东江军民重新获得生机,那他也死得其所。

可以说毛文龙不知道的是崇祯皇帝的态度,如果皇帝也认为他毛文龙该死,那他实际上已经做好领死的准备,有点用死来解脱,来表明自己忠心的意思。

毛文龙赴约前,他的一些部下表示过担心,认为袁崇焕一上任就切断东江物资供应,现在又突然说要会晤提供粮饷,其中必定有诈。建议他如果一定要去,可以多带兵士自卫。

毛文龙对此回答道:“我是朝廷封的总兵,如果袁崇焕不奉诏,他怎么敢杀我?如果他是奉诏要杀我,那我带再多的兵又有何用。”

袁崇焕五月十二日乘船离开宁远,中途可能还靠岸进行了一些视察活动,五月二十五日从北汛口开船前往此行的目的地——双岛。

这里对地点问题应该特别说明一下。无论《崇祯长编》里袁崇焕自己的奏疏还是《明史纪事本末》、《表忠录》、《毛总戎墓志铭》、《毛

太保公传》等等史料,包括清朝官方修的《明史》都一致记载袁毛会面的地点是双岛。

但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一文中似乎有新的发明,他认为这些记载都是错误的,袁毛二人真正会面的地点是一个叫“岛山”的岛。

他的原话是“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

查核《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该文作者是李清,曾经担任崇祯年间的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等职。他当然不是金庸所说的什么袁崇焕随行的幕僚部属,他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事件经过的记述大体应该来自于明朝官方档案文件,和《崇祯长编》的记载出于同一个史料源头,只不过相对更详细一些。

金庸认为李清记载的袁毛相会地点是在“岛山”,细读原文,再同其他史料对照,应是理解错误所致。

所谓“岛山”,并不是一个岛的名称,不过是指“双岛”上的山。造成金庸理解错误的最大疑惑点可能是:《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中说袁崇焕二十五日从北汛口开船出发,二十六日早晨停泊中岛,接下来又说二十六日齐泊双岛。接着二十七日早上风很大未开船,袁崇焕就在岛上视察了一番,然后午时开船,历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遂泊岛山。

我们对照一下《辽海丹忠录》,就可以发现问题在哪里了。《辽海丹忠录》对袁崇焕的行程是这么写的:“二十五日,北汛口开船,出大王山,双中岛住了一日。二十七日,登州游击尹继何带水兵来迎接。二十八日,从松木岛、大小黑山、蛇岛、虾蟆岛,复宿双岛。”

所谓“双中岛住了一日”，其实应该是“双、中岛住了一日”，对应李清记载的二十六日停泊中岛，又泊双岛。接下来，袁崇焕实际上是从双岛出发，视察了松木岛、大小黑山、蛇岛、虾蟆岛这些地方，然后再回到了双岛，等于兜了一个圈子。所谓泊岛山，是在双岛上的山扎营，后来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在这座山上进行的。

至于时间，这个视察也是在二十八日而非二十七日进行，李清的记载有误。

《崇祯长编》记载袁崇焕“二十八日风顺扬帆历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泊双岛，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和《辽海丹忠录》的记载对照，完全一致。

《崇祯长编》后面也提到“岛山”，就是指双岛上的山，而非岛名。如长编说“交拜毕，登岛山，谢参将暗传令营兵四面密布”，后面袁崇焕自己的奏疏里说“臣先设账房于山上坐待之，文龙至”，就是指岛上的山，而非有个岛名称叫“岛山”。

金庸应是对记载袁崇焕奏疏原文的《崇祯长编》没有过目，否则不会有这种错误判断。

袁崇焕到双岛的时候，毛文龙可能因消息沟通不畅，先去宁远迎接袁崇焕了，接到消息之后，才匆匆往回赶。

在毛文龙没到之前，袁崇焕除了在双岛周边岛屿视察一番之外，还对已在岛上的一些东江将士进行了一番劝诱，大意是希望他们可以成为水陆两栖作战的部队，最好是能到关宁效力。

劝诱的效果应该不甚理想，据《毛总戎墓志铭》说，众人对此的反应是唯唯诺诺。袁崇焕相当恼火，甚至把表示不同意见的东江军官捆绑起来，作势要杀。但随后又把人都放了，说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法度很久了，我就是教训你们一下。

毛文龙在二十九日晚上赶回双岛。随后几天的时间里，两人喝酒谈话。

至于谈了些什么，袁崇焕事后说，一是关于如何消灭后金的问题，毛文龙向他吹牛表示关宁的军队根本没什么用，只要东江两三千

人藏云隐雾，一把火就可了事。

袁崇焕的记载可能略有扭曲夸张。综合《表忠录》与《毛总戎墓志铭》的记载来看，毛文龙意思是后金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可怕，关宁那种只知道守城的军队确实没什么用。如果能给东江部队以充足的粮饷器械，那消灭后金，收复辽阳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袁崇焕转述的毛文龙所谓“一把火遂足了事”，对应的《表忠录》中的记载应是“关宁兵不可用，东江可用，苟任专而饷足，复辽阳如炬火燎毛耳”。

原本毛文龙是做了一个比喻，说后金其实已经到了濒临崩溃，难以为继的地步，只要明朝方面再加把火，那就如在干茅草堆上点火一样，消灭后金，收复辽阳并不是什么难事。

袁崇焕把毛文龙的比喻误会成实指放一把火了，不过无论有没有这种误会，总之在袁看来，毛文龙就是在漫天夸口。

两人谈的另一件事情，实质上就是要求东江部队彻底置于袁崇焕控制之下，毛本人呢，最好回老家杭州享乐游玩去。对此毛文龙当然拒绝了。

袁崇焕大概原本不过是通过谈话进一步麻痹毛文龙，喝酒谈话几天之后（六月五日），就动杀手了。

六月五日这天，他先是前往毛文龙处辞别，表示自己明天就要走了，把十万两银子的军饷移交给东江，意思是你们以后就不必再担心缺饷了。然后邀请毛文龙到山上去观看射箭比赛，毛文龙欣然同意。

袁崇焕先行上山布置，毛文龙带领东江军官随后上山，袁手下士兵四面合围，把东江将士堵截在外边。

毛文龙被杀时的情形，综合《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崇祯长编》、《表忠录》记载，大致如下。

众人汇聚营帐之后，袁崇焕先是问众军官姓名，听说都姓毛，就笑了，质问说怎么可能都姓毛呢？你们都是壮士好汉，应该为朝廷出力。关宁的官兵粮饷俸禄比你们多，尚且吃不饱穿不暖。你们海外劳苦，官兵家属老小在内都只能分到这么一点粮食，说起来实在令人

痛心。你们受我一拜，从此以后为国家出力，就不愁没有粮饷了。

说着，他就向众人拜了一下。东江各官见这一拜都感动流泪了。

接着袁崇焕转向毛文龙，厉声说我这几天和你商量的事情，你没有一件答应的。原本指望你回头是岸，谁知道你狼子野心，欺诳到底，国法岂能相容。下令左右绑了毛文龙，剥去衣冠。

毛文龙尚自反抗。

袁崇焕见状，勃然作色：“你以为我是一个书生，不知道我是朝廷的一员大将！”

接着就开始列举毛文龙所谓的十二大罪。

毛文龙不服抗辩。

袁崇焕说我杀你之后，如果不能五年复辽，愿意偿你的命。

袁崇焕又对一众惊愕不已的东江军官说，我奉皇帝的密旨来杀毛文龙。如果毛文龙不应该杀，你们就来杀我。

毛文龙听说有密旨，就不说什么了。

东江官员见此情形都错愕失色，下跪磕头求情，说毛文龙劳苦功高，还请高抬贵手。

袁崇焕则厉声驳斥称，朝廷封官赏赐足以酬报毛文龙功劳了，毛文龙无法无天，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乘着众人惊惧失色间，袁崇焕请出尚方宝剑，命令旗牌官张国柄用尚方宝剑斩杀了毛文龙。

按袁崇焕事后在自己奏疏里的说法，当时情势很紧张。被堵截在外的东江将士群情汹汹，颇有千钧一发之感。他如果再晚一点动手，甚至都不可能杀掉毛文龙。

毛文龙被杀时，他的族子毛承祿在守皮岛，听到毛文龙被害消息，以头击柱，血流于面。皮岛的东江将士聚哭，要追杀袁崇焕，被毛承祿阻止。

而从袁崇焕自己的表现来看，仅仅在双岛的东江士兵对毛文龙之死的群情激愤程度都可能大出他的意料之外，远非他原本想象的杀了毛文龙，士兵欢喜雀跃。

无怪乎在杀人的第二天,他就去哭祭毛文龙了。《崇祯长编》对此的记载是,“明日具祭礼,诣文龙柩前拜祭云: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遂下泪。各将官俱下泪感叹”。

而李清的《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则对袁崇焕祭拜毛文龙的说辞写得更直白:“‘昨日我奉皇上命斩你是朝廷法,今日祭你是本部院情’,遂下泪。各将官俱下泪感叹。”也即直接把杀毛文龙的责任推到皇帝的头上去了,而他自己则做好人,流泪惋惜哀叹。

我们不知道,袁崇焕流泪究竟是一种真情,还是一种表演。说是真情,他和毛文龙半点交情都谈不上;说是表演,那这种表演也未免太逼真了,对一个自己厌恶的人,说流泪就流泪,还能感染得旁边观看的将官都一起流泪,绝对是影帝级别的。

当然,从情理判断,表演的可能性更大。而袁崇焕之所以要进行这番表演,多半是因为如果不如此悲伤,不在众人面前强调杀毛文龙是皇帝的命令以便推脱自己的责任,他能否全身而退,都要打个问号。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双岛杀毛文龙,可以说是明朝与后金交锋的一个转折点。

杀掉毛文龙之后,袁崇焕分东江兵为四个部分,分别让毛承祿、徐敷奏、刘兴祚、陈继盛统领。

此后东江变乱不断。先是刘氏兄弟在岛上作乱,到崇祯四年(1631年)十一月,又是原属毛文龙部下的孔有德等人在登莱叛乱投金。后来东江在沈世魁的带领下又勉强坚持了几年,直到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皮岛沦陷,明朝彻底丧失了东江战略要地。

清朝有人在阅读了《明史·朝鲜传》之后评论说“圣世大一统之基,即于崇祯二年六月卜之,岂非天哉”?

其意就是指毛文龙之死是明朝和后金胜负之势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毛文龙、袁崇焕两人的功罪究竟如何评说?毛文龙之死放在明末的大背景之下,更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了。

第一章

努尔哈赤的憋屈

毛文龙，一个劣迹斑斑的军阀、土匪，骄横跋扈、贪财好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总之，这个人，不是死有余辜，也至少死不足惜。袁崇焕杀了他，那就杀了吧，没啥大不了的。

这应该是大部分人对这个人物的第一印象。

金庸武侠小说附录里就是这么说的，阎崇年的演讲里也是这么描绘的。

这种说法是扯淡吗？

准确地说，不是扯淡，有根据！

我们看一些明朝官员的奏疏，看朝鲜人《李朝实录》中的部分记载，他们所描绘的毛文龙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不扯淡和真实之间还是有距离的，而且这距离还很大。

法庭上审判罪犯，要请个辩护律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当然嫌疑人也有自我辩护的权力。

任何时候，如果只听单方面的指控，无论这些指控多义愤填膺、多绘声绘色、多详细具体，你如果就此深信不疑，那往往最后只能证明自己是被愚弄的傻瓜。

在毛文龙的问题上,应该说我们运气不错。有他自己写的东江塘报,还有同时代汪汝淳写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

这些材料给我们呈现的是另一番景象。

按毛文龙在天启四年(1624年)一份塘报中的说法,他自从开辟东江抗金基地以来,就不断袭扰后金统治区,使其心惊肉跳,丧失对辽民的信任,只能依靠屠杀维持统治。导致的结果是人心向明,一呼百应,极大程度地牵制住了后金的力量。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则说毛文龙的间谍侦探,常常深入到敌方境内辽阳、沈阳等地,策反札书漫天飞舞,后金头目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成天就只顾着追杀毛文龙奸细,杀戮辽民。因此归附明方的人越来越多。

一定会有人跳起来说,毛文龙这种军阀土匪,也能信?吹得再天花乱坠,也只能当笑话看!汪汝淳更只能是毛文龙花钱收买的枪手,他所记载的内容一文不值。

这里我们碰到了常见的困境,要厌恶一个人,就找来大把攻击丑化的材料;要喜欢一个人,就找来大把赞扬美化的材料。

然后大家就根据这些材料骂来骂去。至于哪些材料描绘的才是真相,那就只有天知道,就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正是如此。

不过幸好,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裁判,这个裁判提供的证词是最权威的,比明朝官员、朝鲜人,还有毛文龙自己的话都更有效力。

是谁呢?

聪明点的人应该已经想到答案了!毛文龙打的就是后金,对后金究竟有没有起到破坏作用,后金不清楚,还有谁能更清楚?后金自己的档案记录就是最好的裁判。

这个裁判提供的证词表明,在毛文龙起到多大作用这个问题上,说谎的应该是那些丑化毛文龙的人。

有时候要说明一个人的作用,敌对阵营的记载,尤其是原始档案的记载,远比己方的记载,更有价值。

清朝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和皇太极时期,有一批用老满文写的档册,算是当时后金历史事件的官方原始记录。这一批档案在乾隆时期被整理裱糊和重抄,后来原件到了台湾,影印出版被称为《旧满洲档》;而抄本留在大陆,被称为《满文老档》。

如果问《满文老档》中提到明朝方面官员将领名字次数最多的是谁,则此人不是所谓明末三大牛人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中的任何一个,而恰恰是一向被大部分人不屑一顾认为无足轻重仅仅作为袁崇焕附属物而存在的毛文龙。而且次数之多,和其他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光是直接提及名字的次数就几十次,如把与毛文龙相关的事件计入,则更多。

相比之下直接提到袁崇焕的次数大概在十二次左右,如果扣掉后金利用袁崇焕议和的信件往来,那就只有五六次了。

光凭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给我们一个印象:对后金来说,从天启初年到崇祯二年(1629年)初期这段时间内(对应于后金天命六年到天聪三年),明朝方面对抗他们的中心人物是毛文龙,毛文龙对后金造成的危害是最大的,其他人则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随便看一下《满文老档》中的记载:

石城炼铁把总张秉仪,因为抓住毛文龙手下传送策反札书的人,升为千总。协力擒拿的铁匠,赏银十两。

宽甸的赵游击,杀了毛文龙派来的曹都司,赏银一百两,并赏赐他的子孙世代继承他的职位俸禄。赵游击属下的中军佟文明,下令升为备御,赏银二十两刘吉宽告发双山备御苗宜庄私通毛文龙,下令革除苗备御的职务,升刘吉宽做备御。

沙厂备御王子登,查获毛文龙派来的奸细,升王子登为游击。抓住奸细的把总张重仪,下令升为千总。

一个叫张子敬的人发现并抓住毛文龙派来的奸细一人,所以让张子敬做备御。

汤山的守堡因为抓住毛文龙的奸细解送前来,所以升为备御。

岫岩备御乔邦奎和毛文龙密谋叛乱,被乔邦奎的家人告发,将乔

邦奎的宗族全部杀光，而且把乔邦奎的老婆和家产，全部给那个告密的仆人。

多铎管下的郎游击属下魏云登原本是代理备御，因为抓住毛文龙派来的奸细，升做正备御，并赏给银两，把奸细杀掉。

升某汉人千总做备御，因为此人曾经奏报、捕杀毛文龙派来的奸细和包庇窝藏奸细的人。

还有如库拜到析木城戍守，抓住毛文龙派来的奸细，杀掉四人，押解一人到东京（辽阳）。

这些记录有抓住毛文龙间谍而升官赏赐的，有告发毛文龙派人策划辽人反抗的，还有努尔哈赤下令严防所谓毛文龙奸细的。

从上述记录来看，凡是涉及毛文龙的，即便是一些我们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被郑重之地记录在老档里。而这还仅是提到毛文龙记载的一小部分而已。

《老档》这么多关于毛文龙的记录，是努尔哈赤和毛文龙哥俩好，感情深，所以特地来给他脸上贴金？又或者毛文龙是未卜先知的穿越者，外加修炼了瞬间转移大法，金人记录档案的时候，跃迁到他们面前塞红包，多提自己的名字？

当然不可能！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毛文龙的活动给后金首脑的印象最深刻，让他们最头疼。

具体的说，毛文龙派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的地盘，当然这些人不是去旅游观光的，他们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动员。大概意思就是告诉辽东的父老乡亲，不要再给金人做牛做马了，抄起家伙和金人干，干不过就逃，东江的毛总兵会接应。

第二件：策反。和汉人将官联络，告诉他们，后金是秋后蚱蜢，蹦跶不了多长时间，还是替明朝干事，或者至少给自己留条后路。

第三件：刺探。这个容易，就算单纯从金占区旅游一圈回来，所见所闻报告一下，敌方兵力驻扎情况如何，百姓情况如何，这就是情

报。当然如果水平高一些,还能获得更重要的情报,就是锦上添花了。

这三件事情只是预热,只要逮着机会了,毛文龙就直接出兵给后金来一闷棍。金人想回击,东江主力就像一条滑溜的泥鳅,一滑就滑得不见踪影。不去打,就再从后面蹦出来,继续闷棍、板砖齐上。

对这种情形,努尔哈赤想不恼火,不憋屈都不行!

他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

对普通人来说,要睚眦必报,并不是那么容易。许多时候拿对方没办法,要么学习阿 Q 来个精神胜利,要么就是把怒火憋在心里千着急。

但努尔哈赤不是普通人,不论你喜欢还是厌恶他,你都得承认,他是一个枭雄。

对于任何得罪他的人,他都会千方百计用十倍甚至百倍的手段去报复。而不幸的是,在大部分时候,他也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但就是这样一个枭雄,却只能咬牙切齿,念念不忘把毛文龙的名字挂在嘴边,恨不能千刀万剐,但偏偏没办法!

在毛文龙的影响下,努尔哈赤有一些狼狈甚至近于滑稽的表现。

一、对木棒的恐惧

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会害怕木棍?

看见这个标题的人,一定会怀疑他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

请放心,眼睛绝没有问题。

在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的十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倘若不是涕泪横流,也至少是满脸悲愤地做了一番控诉。

他控诉的对象是辽东的汉人,控诉的事件是汉人“置办棍棒”。

这事也挺稀奇,置办棍棒有啥大不了的?何以会让努尔哈赤大

动肝火呢？

棍棒类的物体，在农村本就是随处可得，又何需特地置办？挑运东西需要扁担，扁担就可以当棍棒使，更不必说各类农具锄头的柄也可以当棍棒。

答案很简单，因为汉人置办棍棒是要准备用来打杀金兵的，所以努尔哈赤如此悲愤。

这事情看起来有些搞笑，所谓天下无敌的女真铁骑，居然还会对老百姓的几根破木棍咬牙切齿，这不会是《笑林广记》的编外故事吧？

但请不要怀疑，这是《满文老档》里记载的千真万确的史实。据努尔哈赤说，我善良仁慈，把汉人豢养了这么多年，汉人却狼心狗肺，忘恩负义，居然要不断收藏棍棒，实在是太坏了！

注意，努尔哈赤说的是“豢养”，原话是“我等常豢养汉人，而汉人却置办棍棒不止”。

这时候的努尔哈赤已经有六十五岁了，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发出这样的怨诉，让我们恍惚中产生错觉：一位辛苦耕作了一辈子，勤勤恳恳的老农，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活带大，结果儿子不孝反而用棍棒对付他。老农浑浊的眼睛里饱含痛苦辛酸的泪水，怎一个惨字了得！

错觉毕竟是错觉。努尔哈赤并没有改行去当老农，他的职业是抢劫。

一伙强盗闯进你的房子，打砸抢了一通之后，开恩饶了你的性命，让你侍候他们。当然了，屋子里的东西现在都归他们了，你要在屋子里准备吃的供给他们享乐，如果有剩饭也赏你一口。从强盗的眼光看来，现在是他们在豢养你，而不是你在养活他们。

这是什么？

当然是强盗逻辑！但强盗这么想的时候，是很真诚的，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努尔哈赤也是真诚的，所以他真的很悲愤，纯洁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人心真是太毒辣了，太险恶了，怎么能这样恩将仇报呢？

他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强烈愤慨：“豹子好办，人心难测。”

豹子是容易对付的，人比豹子要坏多了。努尔哈赤同志不愧是打猎世家出身，用的比喻也如此形象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文学韵味扑面而来。

当然他并不是见花流泪、对月伤心，只会无病呻吟的文人，更不是靠哭天喊地，以头撞墙来发泄自己怨恨的老头子，所以除了语言之外，他还有另一种表达手段，那就是屠刀！

人心难测，那唯一的办法当然就是杀了，而且不是零星的杀，局部的杀，而是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全面铺开的、对整个辽东地区的汉人进行甄别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启五年后金对辽人的大屠杀。

如果你认为努尔哈赤杀人就是单纯发泄怨恨情绪，那就错了。

这老伙计自然不是什么心胸开阔的人，但也绝对不是一不高兴了，就来乱杀一气的二愣子。那样的话，估计他混不到四十岁就翘辫子，也没有以后的事了。

他在天启五年十月下令大规模屠杀辽东汉人，说是因为怨恨，自然也沾边，但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恐惧。

十月四日下令屠杀的时候，努尔哈赤有一个长篇告白，这个告白是很有意思的，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看看全文。

这里概括一下中心思想就是，我攻下辽东之后，对你们辽民够意思了，人也没怎么杀，房子田地财产也没有怎么抢。如此仁至义尽，你们是怎么报答俺的？到处杀我派去的人，到处都是叛乱，到处都在窝藏奸细。各种办法我也都想了，叛乱地方的人也杀了，还把容易捣乱的沿海地区的人都移民到北方去，结果不顶用，照样是叛乱年年有，奸细漫天飞，还有人不断准备木棒来打杀金兵。

原文中有一句话：“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

这意思是我们军队驻扎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这些辽人都胆大包天，要杀我们金人再逃走，还准备棍棒要和我们干；那我们出去打

仗了，你们还不反了天了。

这老头估计心里也直打鼓：老子在战场拼杀几十年，什么狠人没见过？最后还不是被老子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你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究竟吃错了什么药，软硬不吃，死活不管，非要和老子对着干？

这里要为努尔哈赤说几句公道话了。

这厮虽然很残暴，但他不是神神叨叨的希特勒，没事找事要去干种族屠杀的勾当。也不是疯子和傻子，虽然真诚地表示辽民应该对他感恩戴德，但估计还不至于真的二百五到半点理解不了在他的烧杀抢掠之下，别人的反抗心理和仇恨情绪。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是没有半点耐心的人，稍微受点刺激，就要大发狂性，胡乱杀人，否则不至于在李成梁（明末辽东总兵）身边做低伏小那么多年。

总之一句话，他在天启五年十月下达对辽民大屠杀的命令，是因为他在辽民此起彼伏的反抗面前，真的感觉有点架不住了。

有句话叫做：恶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啥招都用过了，啥招都不顶用，真没辙了，于是也就只剩下大规模肉体消灭的手段，才能缓解这老头的恐惧。

而这种情形，当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刺激造成的结果，我们不妨把天启年间辽民的反抗情形略微说一下，就多少能理解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看似强大的外壳下面包裹的脆弱与恐惧了。

小时候我们看的一些抗日老电影里，常常有这样的景象：一个日本鬼子手里拎着鸡，一对绿豆大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得意狂笑；或者两三个日本兵围住一个妇女，大叫“花姑娘”。总之是光顾着偷鸡摸狗，为非作歹，结果落了单。于是愤怒的老百姓，奋起而上，抓住机会把这些零散的鬼子干掉。

也不知道电影有没有夸张？但在三百多年前的后金统治区内，类似的情形，应该不止一次地真实上演过。

在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愤怒地指出在某些地方，“汉人见放牧之人少，即用棍棒击杀之。至盖州地方清点人数，

因派出之人少，有乌里堪及纳斋布牛录之二人，被汉人所杀”。

也就是在自己的地盘下，后金官吏和士兵过的都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日子，他们不敢单独行动，否则不知道哪里冒出一闷棍就把他们打死。

大家都是混日子的，虽然抢劫是一个另类行业，但目的还不是为了能过得更舒坦一些。结果在自己统治区内游荡，还得像过街老鼠一样提心吊胆，这日子过得实在太憋屈了。

身为带头大哥的努尔哈赤，对此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他冥思苦想之下，出台了一个办法。

啥办法呢？作为专业抢劫公司老板，努尔哈赤还是很有现代经济头脑的，他深知经济刺激的巨大威力。

他下令各处金人不准单独行动，至少要十人结伴而行，少一人，就要罚钱。具体方案是九人同行，罚银九钱；八人罚银八钱……一人者罚银五钱。

大概也就是结伴但少于十人同行，平均每人罚银一钱，如果是一个人独行，就罚银五钱。一句话，为了省钱，当然更为了保命，金人在本国范围内旅行必须组团。

但老板的话，也不是每个员工都会听，难免有人吊儿郎当，不当回事。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有这么一位老兄，大概觉着老板有些小题大做，杞人忧天，又或者是人手不够，总之他是独自到岫岩地方上去催征粮食。

结果就来了一个现世报，被岫岩的汉人抓住，捆成一个粽子，丢在车上。这些汉人大概本就是要逃亡到毛文龙那边去，正愁缺少一个见面礼，那老兄自动送上门来，自是再好不过。

但金兵当时正驻守森严，这些汉人最后也没能逃出去，就退了回来，把那个倒霉蛋杀了，然后躲到山上。金人得知后，恼羞成怒，为了抓住干这事的汉人，又杀了同乡的十几个汉人来逼供。

在天启三年四月，还有一个鄂善牛录下的叫纳米达哈里的老兄，被人“堵杀于威宁以内之大路”。

此类事件太多，努尔哈赤也急红了眼，只能是不断重申严令：老子叫你们不要单独行动，你们不把老子的话当回事，现在看见下场了吧！

当然死人已经是听不到他的话了，就算要罚银子也不顶用了，于是只能让死人的上级出点血了。

有一位老兄也算是后金的头目，到地方去征粮，去的地方多，没办法，把身边的人也派去催，结果落单被杀了。努尔哈赤逮着这个老兄拿来当反面教员，吹胡子瞪眼质问道：“你这厮为什么只派一个人去？”赶快掏钱吧，罚银二十两！

二十两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少算的话也要几千块，多算的话就可能要上万了，总之不是小数目。

如果看了上面的事实，您还不太理解努尔哈赤咬牙切齿地说“豹子好办，人心难测”的心情，那再看看下面提到的事实，相信您一定会和努尔哈赤一样怒发冲冠，义愤填膺了。

乘人落单，打闷棍也就算了。但问题是辽民实在太阴险，太狡诈，良心大大的坏。

打闷棍是宵小行径，但好歹还是摆明了敌对态度，用武力和你干。可气的是辽民还有比这个更毒辣，更阴损的招数。

天启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怀着极为沉痛和悲愤的心情，向驻扎各地的金人士兵和军官，下达了一份命令，在这份命令里他通报了辽东汉人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

哈哈纳牛录之“坐台诸申”和汉人“结交为友”，结果被骗到家里被杀掉（所谓坐台诸申不要和坐台女联系起来，是指驻守在台堡等据点的女真兵）。

驻扎在某地的七个金人，到汉人朋友家喝酒，结果被毒死，全部死光。

驻扎在某处的五个人，被汉人朋友带到家里灌醉后全部杀死，然后这个汉人弃家逃亡。

通报了这些可怕罪行后，努尔哈赤下令驻扎在各处的金人骑兵、

哨卒一律不准和汉人交往，不要到汉人的家里去，“若与汉人交往，去汉人之家，则治以大罪”。

痛心啊，实在太令人痛心了！

我们后金的士兵、官吏都是深知军民鱼水情的好同志啊，他们没有架子，不辞劳苦和你们老百姓交好朋友，到你们家里去联欢，到你们家里去喝酒，真是水乳交融，军民和谐。

你们呢？你们是怎么对待朋友的？把朋友骗到家里杀掉，喝酒下毒药毒死，灌醉后杀死，这是人干的事情吗？太卑鄙了，太阴险了，太恶毒了，实在是人神共愤。

当然，你千万不要认为努尔哈赤这里说“结交为友”是平时后金爪牙作威作福，白吃白拿汉人东西，这是极大污蔑！

努尔哈赤同志别的优点没有，但是个实在人，他说结交为友那就是结交为友。

好戏还没有完，就在同一份命令里，努尔哈赤还提到了一件事情。

他的女婿苏纳设立的一处哨卡，有三个哨卒。这三个哥们，大概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实在太冷，哆哆嗦嗦也睡不安稳，就燃起火堆取暖。结果汉人乘船沿岫岩河逆流而上，看见火光，把其中两人抓了俘虏。

到这里很正常，努尔哈赤接着说这乘船而来的汉人有一千多，都被苏纳给全歼了，还缴获三艘船。

这似乎也很正常，女真兵被吹成是天下无敌，歼灭区区一千多人，自然算不得什么。

接着画龙点睛的一句话，隆重出场了：“再有以此燃火而睡之哨卒，则杀之。”也就是再有哪个哨兵敢晚上点燃火堆睡觉，就杀掉。

看到这里，我们就要纳闷了，努尔哈赤这不是脑袋进水么？

以两人被俘作为代价，全歼一千多人，这买卖简直是太划算了。

这乘船而来的一千多汉人，从活动范围来看，只能是毛文龙军队。努尔哈赤应该多多鼓励哨卒燃火而睡，睡上个一百次，就能把毛

文龙军队都消灭了。

这比用条小蚯蚓钓大鱼都爽,这种好事别人想碰还碰不上。

努大帅应该好好嘉奖这诱敌的三个哨兵才对,还暴跳如雷地恐吓说再有这么干的就杀头,难道是神经搭错了?

如果我们不厚道地想一下,事情真相或许应该是这样。三个哨兵晚上点火睡觉的事情当然是真的,汉人看见火光,把其中两个人抓了俘虏,大概也是真的。至于因此全歼一千多人云云,估计是努尔哈赤实在被整惨了,脸上挂不住,不得不胡诌一下,稳定军心,反正吹牛又不上税。

牛是要吹,但也不能耽误正事。所以他一边吹牛,一边还是要严令禁止哨兵以后再点燃火堆睡觉了。

要我们替后金广大官兵同志们设身处地想一下的话,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累了。自己想到各地旅游兜风不行,必须组团,否则随便冒出一闷棍来,就得送命。

不旅游了,晚上睡觉,点个火取暖总没事吧?还是不行,会不知什么地方钻出一群人,把你给黑了。

想搞好军民关系,到老百姓家串串门,交交朋友,喝喝老酒吧,那还要做个选择题。是选择直接被毒酒毒死,还是被灌醉了,被活活打死,用绳子勒死。

这日子实在是过得憋屈啊。你说去外边抢劫,上阵杀人,也就是一阵子的事情,反正硬着头皮熬过去也就是了,大不了死了痛快。你说在自己地盘,还成天要把心提在嗓子眼上,这不是存心折磨人,让人生不如死吗?

换了我是努尔哈赤,也得急红了眼。

不过我们的努尔哈赤同志,毕竟是老同志了。面对冥顽不化,恶毒阴险的辽民,他没有马上不顾一切地搞彻底屠杀,相反还是展现了老同志应有的耐心 and 风范,当然也拿出了比较人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什么方案呢?

很简单，彻底没收汉人的一切武器，并且严禁向汉人售卖军械。

天启三年四月初六日，努老头下令：汉人军士及百姓，凡是有弓矢刀枪炮等武器的，限于二十日内，送交各处管理官员。超过二十天隐匿不送的人，被人告发，就治以重罪。禁止汉人的工匠售卖弓矢刀枪等军械，十天以后，敢卖的人要治罪，敢买的人同样要治罪。

到四月十三日又重申禁令：从牛庄以东，英额以西，边外之地，平民可以留有炮、弓、撒袋、刀、枪。从这以南的城堡屯乡，不能留有军械，核查各处管辖屯堡的军械，都全部没收，并限令四月以内，全部送来，如果没有收完，还留下军械，被人告发，那收藏之人，就治以重罪，管理官员同样要治罪。汉人如果打造、贩卖军械，只能出售给女真人，不得出售给汉人，否则无论是卖的，还是买的，都要治罪。

没收武器管用么？当然是不管用！

铁制的武器被没收了，那还有农具，还有木棍呢！所以天启五年努尔哈赤才要气急败坏地声讨辽民不断收藏木棍，良心大大的坏。

说到这里，我们又增加了对努尔哈赤的同情和理解。面对辽民的反抗，局部镇压也镇压了，武器也没收了，移民也移民了，该想的招都用了。

这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这么反复折腾，容易吗？不容易啊。

折腾了半天，结果还不管用。他真是要哭了，心里真的是发怵了，发毛了。于是就只能杀，而且是大规模的杀，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一点安全感。

那所有这一切和毛文龙有啥关系呢？

应该说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行为，并不能都看成是毛文龙挑动策划的结果，其中有一部分是自发的。

就比如天启二年老头子下令禁止金人单独行动的命令中，除了提到汉人用木棍击杀单独行动的金人之外，还提到去广宁的金人被一些蒙古人杀掉，这显然是和毛文龙无关了。

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满文老档》中与策划辽人反抗有直接关系，被确凿无疑反复提到的明方官员将领的名字只有一个——

那就是毛文龙！

毛文龙曾经说过要抵御后金，恢复辽东，必须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鼓之大义，动以良心”，才可以让他们奋不顾身，拼死反抗后金。

他没有吹牛，没有撒谎，而是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满文老档》关于毛文龙派遣人员策划后金统治区人民起义反抗的记载比比皆是。

就拿天命八年（即天启三年，1623年）来说，二月三十日，努尔哈赤接到情报，毛文龙派了五十个人拿着札书挑唆策反辽将，于是下令驻扎在后金沿南海的统兵大臣，要“严加搜寻踪迹”。

三月二十三日，毛文龙派遣张怀联络策划青苔峪的兰磐驿、达塔峪、桦皮峪三屯的人民起义被查获。

四月二十四日，某人报告，托兰山有一百多人要谋叛，一开始后金头目不相信，于是派宋进忠去探查，结果属实，而且打探到毛文龙派遣来策动的贾大、贾三就住在那里，打算初一日行动。努尔哈赤下令让他的女婿李永芳去查办，凡是新迁移到当地的人，为首者带到东京（辽阳）；原住民的话，就把男丁杀光，女人和小孩做俘虏。

有一些记载，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毛文龙的名字，但从其他史料佐证也当与毛文龙有关。如天启三年六月，后金对复州大屠杀事件，诱因就是努尔哈赤发现明朝（原文用的是“彼方”）派来的奸细实在太多，动不动就是成批量的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复州地方上的人也都不检举揭发。

如此大规模大批量派遣奸细，在《满文老档》中能核实的只有毛文龙一人而已。

在努尔哈赤指责复州奸细太多的同一天，还有一则关于辽人反抗后金的记录，驻守在南边的吉尔海游击报告说青苔峪、岫岩地方上的人，都要叛乱，已经把参与同谋、告密的两人带来，并抓住为首者数人。被抓住的人都供认叛乱情况属实。

努尔哈赤下令让告密的书生魏英科做备御，并且赏银五十两及

蟒缎衣服、大凉帽。

这一则记录里没有提到与毛文龙有关的内容，但就在第二天努尔哈赤给这些地方汉人的通牒里，直接承认这些地方的叛乱都是毛文龙鼓动的结果。

通牒的大意就是，看见魏英科这些汉奸的榜样没有？凡是告发叛乱的人都能升官发财，你们这些小老百姓，就应该识相点，快点学样出来告发！如果能帮助抓获图谋叛乱的官员，那就是功劳大大的。只要你们好好种田，不动叛乱逃亡的歪脑筋，那就是良民。你们放心，对良民的田产房屋，我是不会来动的。如果听信毛文龙的煽动，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对于能捕杀所谓毛文龙奸细的官吏，努尔哈赤不惜升官重赏。

如暖河的巴达，前往取粮，得知高尔厅地方上人的叛逃，于是“蹶踪追杀之，并杀毛文龙遣来挑唆之千总”，结果被升为参将，“给其挂十两银牌，服红蟒缎衣，满给一千五百汉人”。和他一起去的千总四人，也都被授为备御之职，赏给五百汉人。

《满文老档》中的一处记录，很能表明努老头和他手下汉奸对毛文龙咬牙切齿的痛恨，叫苦连天的心情。

天命八年四月十二日，我们的李驸马，也就是在抚顺归附努尔哈赤的汉奸李永芳痛心疾首地表达了他的困惑：

“你们南方各地（指的是后金沿南海地区尤其是南四卫：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的人怎么就那么不识相呢？诸申汗（即努尔哈赤）如此仁慈伟大英明，不像明朝的万历皇帝怂恿高太监来任意索取银两，你们居然不识抬举？”

“得到辽东后，动你们的房子了吗？动你们的田地了吗？本来相安无事，不挺好吗？”

“沿南海的居民因为听信毛文龙挑唆的话，杀了金国的人叛逃，这才下令迁移的。是因为你们的叛逃，所以下令迁移。被迁移的老百姓，不给粮食，难道吃泥土吗？因为移民没有粮食，这才取来给他们。”

“迁徙的痛苦也就是仅仅这一年而已，难道有年年受苦的道理？诸申汗和明帝交战，谁获胜，就投靠到得胜的那一方，安居乐业。你们又不是军人，又不是文武官员，你们是平民老百姓啊，和你们又有什么干系呢？你们抛弃故土、房屋、耕田，叛逃而去，谁来容纳你们，谁来给你们田产房屋？”

就这样，在毛文龙策划鼓动（努尔哈赤自己承认是毛文龙挑唆）之下，辽东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反抗逃亡。后金方面几乎陷入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乃至四面楚歌的狼狈境地。后金统治地区的民众反抗风起云涌，到处都成为了其头目和爪牙的陷阱，让他们在极度恐惧中疲于奔命。

套用一句现代的话说，真的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天命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有一道命令：戍守在南边的诸位大臣，如果敌人从那边来进攻我方两处，我军无法支撑而撤退的时候，不能因为相信我方的汉人而分散后撤。我方势力强大的时候，汉人就准备粮食来接待；如果我方势力弱小，则一定会来拦截，千万不能轻信。应该集中步兵和骑兵，不要经过汉人聚集的住所，要从野外返回。

这条记载我们后面还会反复提到，这里的敌人只能是毛文龙的军队。这里主要是看一下，后金在自己的地盘内都如临深渊，对己方的平民都要恐惧到这等程度，如此也算是一种奇观了。

在天命八年六月初一日，又有这么一则记载，大意是努尔哈赤听说女真人和汉人去取粮的事情，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于是命令兵丁随行保护。回来的时候，要殿后。也就是在自己统治区内获取粮食补给都要带兵保护。

天命九年正月（天启四年，1624年）还有这样的记载，努尔哈赤告诫驻扎在赫彻穆、英颖的金兵，要提防两村的汉人袭击，一定要日夜严加防范，不要和村中汉人同住在一处。

在自己地盘上，后金官吏和士兵都会担心不知哪里冒出来的人

把他们杀死。所谓战斗力强悍的后金军队，其实已如丧家之犬，在毛文龙的策略下，处于极度恐惧战栗的状态。

和此时已经色厉内荏的后金军队相比，那些明知起来反抗多半是赴死的辽东人民和那些明知前往后金统治地区发动人民反抗九死一生但义无反顾的毛文龙手下无数义士，才是真正的勇士。

这和后来清朝史书宣扬的，后金以及以后的清廷大军一到，各地望风归顺，人民都是软弱绵羊的记载是截然不同的。

可以说《老档》中提到的大量辽民反抗的记载，毛文龙的联络策动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孙承宗、袁崇焕那方面操心的始终都是如何修筑城堡，在他们看来把城守住就是盖世奇功了，无暇顾及于他。

一方面是毛文龙联络发动辽东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是毛文龙的东江群岛接应了大量辽东逃亡的人民，其数量大到了什么程度呢？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刘学成在给努尔哈赤的奏疏中说：“汗刚取得辽东的时候，上至旅顺口，下及镇江，都把人民养起来，安居乐业。然而无知的百姓辜负汗的恩义，年年叛逃。”

天聪八年（也即崇祯七年，1634年）十月初二日，原本是毛文龙手下，毛文龙被冤杀后投靠后金的大汉奸尚可喜，在给皇太极写的奏疏中也提到从皮岛开镇以来，后金境内的辽人男妇奔逃到各岛的人不下百万。

尚可喜这里说的辽人男妇奔逸各岛者不下百万，基本都是毛文龙时期的。后金所谓辽人，逃亡掉的，再加上因为辽人反抗被努尔哈赤屠杀掉的，到皇太极上台的天聪初年就已经所剩无几了，剩下的基本是铁杆顺民了。毛文龙死后，则是原本被毛文龙策反的辽人将官开始反向流向后金方。

毛文龙接应辽民百万，也可以从朝鲜的《李朝实录》中获得证明！

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壬午的记载提到归顺的假靺（即剃头辽人），万千成群……最近几天归顺的假靺，每天都在渡河而来，不知道有多少，或五十，或一百多，成群布野。

天启四年五月乙卯，朝鲜国王接见毛承祿时忧心忡忡地问道：“百万辽民，相继来投，前头接济，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天启五年六月的记载则叫苦说自从辽左陷没后，督府（指毛文龙）来到我朝鲜境内，招集辽人，所以辽人来投奔归附的人，数量极多，遍满西土。

同年十二月己卯，义州府尹李堯报告“最近边境，没有其他紧急的事情，就是毛营的侦察兵，一千多人，有的越境一天的路程，有的是二三天路程，往来不绝。饥寒交迫的剃头辽人有的二三十名，有的五六十名，每天都从后金境内逃出来”。

甲申，平安监司尹暄报告剃头辽人最近逃亡出来的更厉害了，有的在路被冻死，有的饿死，问他们逃亡出来的原因，都说金兵大举西向，与西边蒙古人相战，无暇东顾，所以才寻找机会逃出来。

从尚可喜的奏疏以及《李朝实录》的记载来看，毛文龙时期接济逃亡辽人，数目不下百万是可能的。当然这百万并不是全部都留在岛上，大部分是通过东江的群岛为中转站，又转移到内地去，还有一部分是分散到朝鲜各地。这在东江塘报以及其他史料上，也是屡有记载的。

而毛文龙则从逃亡的辽人里挑选了几十万左右的人，编练成军队。努尔哈赤给毛文龙写的信里就咬牙切齿地抱怨：“我好心养活辽人，他们反而忘恩负义，杀害我任命的官员和派遣的使者，和奸细勾结，叛逃而去。对这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我怎么可能不杀掉而白白释放？从我这里逃出去，投奔到你那边的人，你收容之后，不是把他们当成平民百姓来豢养，却让他们从军，反过来和我作战，所以在各处被我杀掉的人，其实是你杀的，是你没有道理。”

毛文龙把本来是给后金利用的大量人力资源，转而变成明朝效力的人力资源，一出一入，结果至少相当于消灭后金十万大军，这是不夸张的说法。

由此观之《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所说的老百姓怨恨金人而投奔毛文龙的人越来越多，毛文龙奏疏中说努尔哈赤杀戮太惨，人心已

失，驻守在空城里，野外都没有人替他们耕作，对照后金自己的档案记录，完全属实，并没有夸张。

有些说法，原先我们会觉得夸大离奇，荒诞不经，纯属吹嘘！比如《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提到的后金捕杀毛文龙的林畔之役，在毛文龙号召下“辽兵民无不响应，短兵接战，至执木棍、竹竿、农器者，皆突前杀贼，绝无畏却”。

没看《满文老档》之前，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

明朝的辽东正规军都看见后金部队畏之如虎，甚至望风而逃，那些被毛文龙组织起来鼓动起来的兵民，怎么可能拿着木棍、竹竿、农器杀敌呢？

这牛也吹得太大发了！

看了《满文老档》之后，我们才知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饱受压迫摧残的辽人，确实就有用木棍击杀金人的勇气！以至于努尔哈赤咬牙切齿地说“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以及“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

二、怕耻笑而宽容

明朝和后金的战争，是一场大戏。效仿现在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什么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等等颁发各种奖项的话，那场大戏是有许多奖可以颁的。

假如设立一个奖——最佳利用间谍奖，那么在天启二年以前，我们的努尔哈赤同志一定是这个奖项当之无愧的获得者。在聚光灯下，努尔哈赤可以神采焕发地列举自己在攻克抚顺，大战萨尔浒，轻取辽阳、沈阳，占领广宁历次大捷中，如何通过对间谍奸细出神入化的运用，策反离间明方人员，最终获胜的，台下也一定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如果在天启二年以后,再把这个奖颁给努尔哈赤的话,相信他的脸一定会变成猪肝色,在话筒面前接受采访也只能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奖项真正的得主只能是毛文龙了。而努尔哈赤则沦落到了被毛文龙的间谍奸细搞得苦不堪言,欲哭无泪的境地中,这就叫做终日打鹰反被鹰啄了眼。

按《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的列举,毛文龙离间佟养真和其爱妾,以反间计除掉后金将领阿骨,用间谍招揽敌方的刘爱塔、王子登等等。不过遗憾的是,这些事情该书都略而言之,详细情形并未叙述。

东江塘报里倒是相对具体地介绍了毛文龙在天启三年十一月的时候,用计除掉了两个汉奸柯汝栋、戴一位的事迹。

柯、戴这两位老兄,不知道是升官发财心切呢,还是纯粹的表现欲强烈,急于体现自己的能力价值,总之他们通过一些渠道耳目,了解到了毛文龙那方面的情况虚实,觉得机会来了,就对努尔哈赤献策:“江东毛总兵的军队数量不多,兵器军械都没有,粮食也没有,人都在饿死,不如乘着这个机会,让我们两人带着精锐军队过江把毛文龙部队剿杀干净,你老人家就好一心一意往西边去做事情了。”

有人能如此热情,努尔哈赤自然很高兴,爽快答应了,给了他们五千的军队。

应该说这两位老兄的提议,虽有些夸张,但情报也还不算太离谱。毛文龙军队数量是很多的,但真正有精良兵器军械的人,真的很少。至于粮食呢,还没到把人全部饿死的程度,但大部分人吃不饱肚子倒是真的。

若按这两位的主意,带五千精锐过江,要想把东江军队剿杀干净,那自是痴心妄想,但给予一定打击,有所斩获,还是完全可能的。

可惜的是,要当汉奸,尤其是出人头地的汉奸,光有热情,还是不够。

两位献媚心切的同志,低估了两点,以致断送了他们的性命。

低估的第一点是毛文龙的智谋,低估的第二点是金人的猜疑心理。

毛文龙当时本就派了机动兵力在后金袭扰，在各地布设疑兵。另外大概也知道这两个汉奸的作为，早就要除掉他们，所以在金占区到处散布两位同志乃是大明地下工作者的消息，这类缺德事没少干。

而这两倒霉蛋正好一猛子扎到圈套里，义无反顾地往黄泉路上狂奔而去。

十一月末的时候，这两人屁颠屁颠地带着五千人，来到草河口等地方。结果随军的众女真人看见路上有营盘灶窝，还有许多人马践踏不久的痕迹，心里起疑。

本来么，如果五千人真是由这两位统率的，那也不算啥，硬着头皮继续下令前进就是了。可人家分明只是把他们当做两条领路的狗而已，现在一看情形不对，那也不管他们怎么睁着水汪汪，无辜的大眼睛，摇尾表白，当然就是一脚踢开了。

于是军队回了辽阳，众女真兄弟愤怒地对努尔哈赤说：“您老人家被柯汝栋、戴一位这两个奸贼给骗了，他们说啥毛文龙人马不多，那全是屁话。要真是人不多，还敢派军队深入我们境内，到处发动袭击？分明就是要把我们骗过去，送给毛文龙当见面礼。外边的人早就说这两人不是好东西了。”

努尔哈赤一听，自然大怒，再加上原本就多疑，于是在十二月十七日，把柯汝栋、戴一位杀了示众。

这出好戏的总导演毛文龙，对男一号的表现做了中肯的点评：“努尔哈赤现在的情形是每况愈下，成天疑神疑鬼。柯汝栋、戴一位献策取媚，反而被杀。南四卫等地，因为被袭扰，也放弃不耕。就是李永芳之类的亲信，修建新城的坚固，也无法给他带来安全感了。”

大概是为了维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英明形象，掩盖其被毛文龙玩弄而乱杀手下人的丑态，《老档》把阿骨、柯汝栋、戴一位等被杀，以及后来刘爱塔叛逃等事件都给删除掉了，关于天命八年（天启三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的记录全盘缺失，只是天启三年九月的记录末尾留下一句“原档残缺”的话。

但即使如此处心积虑的掩盖，其中依旧留下了大量毛文龙派遣

人员策反离间，导致努尔哈赤对许多汉奸丧失信任的线索，足以验证《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和《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所言不虚。

天启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记载记录了一段努尔哈赤气急败坏下书训斥众多汉人将官的内容。

当时的情况大概是在边境各地防守的大大小的汉奸们心里害怕，觉得一旦守卫出问题，不定哪一天自己就被努尔哈赤当奸细给咯噎了。于是纷纷要求努尔哈赤，您老还是多派些女真人去防守吧，我们手下的汉人，我们自己也怕不可靠。

害得努尔哈赤大光其火，训斥道“边防上的事情，你们来推诿给我”？“你们的国人究竟可靠不可靠，你们自己应该知道！”

老头儿心里实在恼怒，老子养了你们这一大帮汉奸容易吗？到头来，光吃饭，不干事！要是女真兵够用，老子还养你们这些汉奸干啥？

不知道老头子是否阅读过《论语》通俗版，但无论如何这一刻，他有些孔圣人附体的感觉，说出了一句和孔老夫子的名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颇为类似的话：“对你们说话强硬点，你们就怕得要死；对你们客气温和点，又不肯乖乖听话。”

考虑到众汉奸可能对后金前途信心不足，努尔哈赤又声色俱厉地威胁道：你们都给我识相点，别自找没趣，认为我蹦跶不了多长时间。

老头儿估计还是底气不足，怕这样不够有说服力，又举了一大串所谓的天降异象来给自己撑腰，什么辽东城里井中出血，辽东城就被他攻陷啦；什么北京城里的河中流血了两次啦；还有什么各衙门的大树都被大风连根拔起，石牌楼都被折断啦等等。总之是上天降示的异兆，是要让他获胜云云。

如果光看这段记载本身，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天命七年（天启二年，1622年）正值努尔哈赤攻下广宁不久，明朝方面丧失全辽，都退到山海关内去了，熊廷弼和王化贞更被抓起来治罪了，龟缩尚恐不保，更何谈去进攻后金？

照理，这正是努尔哈赤势力大增，春风得意之际。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投靠后金的那些汉官似乎在抱怨边防有问题，手下汉人都不可靠，要把边防责任推诿给努尔哈赤呢？

如果把这段话同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的当时毛文龙频繁袭击后金的活动对照，就多少明白点了。

天启二年四月，朝鲜方面接到报告说剃头辽人逃过来的很多，而毛文龙则（朝鲜人称之为毛将）经常留在鸭绿江的近处，惹事挑衅金人。

天启二年八月辛未，则报告说文希贤（朝鲜派往后金的使者）还没有来得及到目的地，毛文龙又斩杀了真鞑（女真兵，和称剃头汉人为假鞑相对），金人一定十分愤怒，一旦迁怒于朝鲜，就祸事临头了。

这些记载同《满文老档》其他地方记载的毛文龙派遣大量奸细挑唆“离间吾国”以及《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说的“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而奴之疑惧益甚，凛凛终日”结合、联系起来看，就更豁然开朗了。

正是在毛文龙大量派遣人员策反离间后金汉官以及毛文龙频繁袭击后金的背景下，后金方面人心惶惶，努尔哈赤才会说出上面的一番话。只过后金和清的统治者为了掩盖努尔哈赤被毛文龙耍弄，以及吃败仗的真相，所以才在档案中将此事的始末都隐去，只孤零零保留了努尔哈赤的这段话，这段话所以才显得突兀和不可理解。

而这种因为毛文龙的策反离间表现出来的对各地镇守汉官的不信任态度，不只出现在这一处。

天启二年四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又致书各地镇守的官员将领，把上次的警告以及什么“辽东城井中出血”（老头儿对这类消息似乎有特别趣味）等等车轱辘话重复了一遍。另外再加了一大串显示自己野心、不伦不类的类比。

点睛之处是他表示南京、北京、汴京等，不是汉人独占的地方，而是女真人和汉人轮换居住的地方，你们辽东地方的人应该回心转意，不要存有邪念，否则将自取灭亡。

天启三年三月初三日，老头儿又是苦口婆心地警告驻守在边界的人：千万不要愚顽，要谨慎防守，如果听信小人的话，违背了我的训谕，存有欺骗诈伪的心思，疏忽怠惰，那你们一定会遭受祸患。

在毛文龙派遣的大量细作神出鬼没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不仅对地方上的汉人官员将领开始怀疑，连他自己身边的汉官都开始不信任了。

天启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老头儿气呼呼地责问：“尔等若念养育之恩，为何未将毛文龙所差之奸细查出一人？为何不查叛逃暴乱者？若不为汗效力，豢养尔等何益？”

这老头儿大概实在是被毛文龙奸细折腾得有些抓狂了，看谁都像是奸细。所以别人没有抓住毛文龙奸细送给他，他都要破口大骂：我养你们是干什么的？

但若是认为他神经暴躁，胡乱骂人，那也是不对的。据他自己说：外地的小人，经常擒获奸细送来，我这个地方难道有奸细不来的道理？

毕竟是老同志，这洞察力确实敏锐，应该予以表扬，根据东江方面的报告，毛文龙确实把间谍派到了辽阳、沈阳。

老头儿对手下众汉奸的麻木不仁极端愤怒，痛揭他们的老底：“你们这些官员，一半是被明帝判以死罪，关在监牢里的人，一半是被废黜的人。而且都是在阵前抓获被我饶命的人。是我抬举你们来当官，来豢养你们。”

这样出兵不出力，对奸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是忘恩负义，确实该骂！当然光骂是没用的，老头儿又咬牙切齿地威胁道：“如果听说叛逃而不报告，看见奸细而不抓住，被人告发，就按照苏世登、乔邦奎的例子处置（灭门）。”

很快他连自己的女婿李永芳都明确表示不信任了。天启三年五月初七日，努尔哈赤听说复州的人要叛乱，就下令调遣军队去镇压，李永芳劝阻：“说复州的人叛乱，那是有人在污蔑诽谤。如果相信了，真的派兵过去，会被那边的人（指明方）听见笑话的。”

老头子听了之后，很是恼怒，下书给李永芳，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从这通训斥来看，老人家的肚子里确实蓄积了太多的委屈。官修史书里装大神的人物，像个被欺压已久的小媳妇，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翻出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倾诉，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精彩不容错过。所以我们尽可能完整地把这段奇文转述一下：

“李永芳啊，李永芳，在抚顺的时候，我念你是一个通达明白的人，所以收留你，还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你当老婆。老天保佑，让我出兵叶赫、哈达、乌拉、辉发以及应付明之四路，一直到攻克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东、广宁以及蒙古边塞等处都很顺利。

“这都是老天的眷佑，对此，你李永芳却不相信。因为你们不相信老天的意思，所以你们认为明帝长久，而我只能得意一时。

“辽东汉人屡次要谋反，他们密谋的书信不断传来。我每次要查抄，因为你心向明朝，竟然用欺瞒来劝谏阻止我。他们叛逃而去了，你心里才痛快，如果被破获被诛杀，你心里就不舒服。倘若你果然忠诚，平定叛乱，灭掉明国，那倒是我错怪你了，你的谏劝就是诚心的。但现在是这样吗？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但我曾经听说，你们汉人的刘邦……（省略号处是吧啦吧啦一长段把自己和古代人的比附）。你如果私通明朝，北京城内河流血二次，各衙门的古树被风连根拔起，这都是上天降下的异象，你能劝止吗？可见你要辜负养活你的父亲和岳父了（应当都是指努尔哈赤本人）。

“然而现在你既然被我豢养做女婿，而且蒙古、汉人、朝鲜都知道这一点，如果要治你的罪，恐怕其他人就要耻笑我，也耻笑你。所以只能不予治罪，默然处之，但我心里头怨恨，所以告诉你这些心里话。”

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确实够伤心的，连他抓来的俘虏，自己的女婿都看不起他，也难怪老头子辛酸无比。

至于不断念叨什么井中流血多少次，北京城内河流血多少次，真是颇有祥林嫂的风范。但也可以理解，毕竟作为一个自卑的老头，这

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了。

倾诉委屈之余，老头儿也还是吐露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因为毛文龙的策反，李永芳等汉奸对后金政权的前途都持比较悲观的态度。

他应该已经掌握了一些李永芳和毛文龙往来联络的确切证据，这与《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叙述的天启三年三月间，李永芳、杨于渭、王子登、刘爱塔四人与毛文龙暗通款曲，乞求免死金牌、袍段，联络起事的内容相符。而登莱总兵沈有容听到风声后派遣巨舰四十艘去迎降，导致机密泄漏，之后，努尔哈赤把李永芳等人撤回老寨。此项记录则再一次证实了该书记述的可靠性。

如果换了个无足轻重的汉奸，努尔哈赤肯定是要杀掉的，但无奈，李永芳等人是投靠他的汉奸翘楚，已经招为女婿，立作招牌，广为宣传，用以招徕人心。如果连李永芳都被杀了，那还有谁再敢来效力？

光靠那点女真人，后金肯定不可能再维持下去。所以在明知道李永芳等人和毛文龙有联系的情况下，他也不能把他们杀掉。但又不甘心哑巴吃黄连，所以做了这一通发泄。

最后告白说，我这个心里恨啊，是怕别人耻笑我，才不治你的罪。真是有打落牙齿和泪吞的感觉！

因为辽东汉人的反抗连绵，汉人官员将领不断弃暗投明。努尔哈赤又开始对他的儿子贝勒痛加训斥，大骂他们只图自己畅快清闲，稀里糊涂，真应该朝他们脸上吐唾沫。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采取更严厉残酷的手段，对汉人和女真人应该区别对待：你们不明白审理断案的道理吗？为什么要把旁立授首的汉人，和我们女真人同等看待？倘若女真人犯罪，应该问他功，论他的劳，稍有口实，就可以从宽发落。汉人乃是生还之人，如果不忠心效力，再做盗贼，怎么可以不灭族，打一顿棍子就放了？你们的审断，没有迂回，竟和牛骡一般。

不过老头子大概也知道自己这份训令是见不得人的，所以特地

叮嘱要保密：“让八位贝勒召集你们各旗的贝勒大臣等，秘密阅读此谕，不要让别人知道。耀州的人扬言说，等我兵去后，要杀我们金人子女，各处的人毒杀我族人，你们还不知道吗？”

如果把努尔哈赤放到历史的审判庭上，他估计也是一肚子委屈，我可不是希特勒那个神经病，我原本也是想一视同仁的，原本也是要善待汉人的。李永芳不过是一个俘虏，我都特别优待，把女儿送给他当老婆。谁知道他们在毛文龙煽动下，都发了疯一样，拼命要和我作对，你叫老子有什么办法？

总之，在惊恐情绪的支配下，努尔哈赤已经彻底丧失了对手下汉人将领士兵的信任，在天启三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他接连两次下书。

第一次前面说过了，是叫军队支撑不住撤退时，不能因为轻信汉人平民而分散后撤。这是对汉人平民的恐惧和提防。

而在同一天的另一个命令中，则是表露了连军队他都不信任了，要把将官的家属扣作人质。下令一个游击所管辖的二万男丁中，四十名千总的父母、兄嫂、妻孥等，都要安置在东京城（辽阳），留二十名千总在辽阳，二十名千总前往游击处。编四十名千总为二班，轮流换班。

这意思当然很清楚，如果这些千总敢投奔毛文龙，那他们的父母、兄嫂、妻孥就肯定没命。当一个政权对自己军队的将官都彻底丧失信任，要依靠扣押人质的方式来驱使其卖命，那就已经是处在崩溃边缘了。

但反过来说，也正因为是处于崩溃边缘，所以努尔哈赤有时候也会迫于形势，不得不在毛文龙策反属下的时候，玩点装糊涂的伎俩。

《老档》记载天启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时候，石城地方上一个人来告发石城炼铁参将王子登，说他接受彼方汉人策反的札书，努尔哈赤审看了一下，说是假的。

到了七月二十一的记载，又明确说是王景隆告发王子登接受毛文龙的札书，经过审理，认为王子登无辜。

按后金的规矩，凡是告发别人，就算虚假，告密者也不会被反坐。

所以只是训斥王景隆说“王子登效忠我金国，和明朝结怨，明朝肯定不高兴要杀了他，你王景隆为什么要来诬陷他”？

如果认为事情真相就是如此，别人来诬告，这个札书是假造的云云，就天真了一些。

其实和毛文龙方面的史料对照，王子登可能确实受了毛文龙之书，被别人告发。

但问题是努尔哈赤也清楚，王子登毕竟为他们效过力，还受过奖赏，他接受毛文龙的书信最多是骑墙观望，还不是死心塌地为明朝办事，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如果把王子登杀了，那只会激发更多汉人将官的恐慌心理，引起更大规模的逃亡叛乱。

所以老头儿只能是装一下糊涂，放王子登一马，这与不杀李永芳是同一原因。但这种不得已的宽容，也足以说明当时后金政权处境的狼狈程度。

三、东奔西救何其忙

尽管被自己女婿看不起，但努尔哈赤至少在一点上，还是可以自负的，那就是打仗。

当然，他也有这个资本来自负，从起兵以来，用诡计也好，真刀真枪硬拼也好，总之是他把别人打得团团转，不断攻城克地，所有的对手都是他手下败将。

但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毛文龙登场，努尔哈赤发现眼前的这个对手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同。

当时的毛文龙是一个挂着都司虚衔的小小游击，带着一百九十二个士兵在辽东沿海地区流窜。按理说，这点队伍给后金塞牙缝都嫌不够，能倒腾出什么花样来？

后金刚攻下了辽阳、沈阳，明朝最精锐的川兵和浙兵都被歼灭，换了一般的将领，带着两百人不到的军队，能不被吓得尿裤子就不

错了。

但毛文龙不是一般人，他就领着这点人，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把金人手里的镇江给夺了下来。

夺了城池，把大汉奸佟养真给活捉了，外加策反了一批后金的汉人官兵。这是明金双方交战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以前只听说过明方的城池被金人打下来，什么时候听说过后金手里的城池被明方打下来？以前只听说过明方的将领被后金俘虏，或被杀或投降，什么时候听说过相反的事情？

明朝几万大军都没有做到的事情，而毛文龙带着两百人不到的士兵就做到了！这让所有人都张开嘴，合不拢下巴。

毛文龙是用出了什么魔法呢？

其实他只是做了三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

第一件：多方打探情报。其他明军将领几乎都把金兵当成不可战胜的妖魔鬼怪，但毛文龙显然不这么看。他知道再强大的敌人，也有薄弱环节。

第二件：联络策反敌方军官。确实大批人都投降了后金，但这其中许多人并不情愿，对这些人，只要能策反做内应，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件：发动辽民，让他们一起来帮忙。这些人最主要的作用是虚张声势，帮着喊几嗓子。

然后，在七月的一个深夜，镇江守将佟养真在睡梦里，突然被地动山摇的呐喊惊醒。他披了衣服起来，摸不着头脑，看这音响效果，分明是成千上万的明军在攻城，可难道明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此时的佟养真应该非常希望自己在梦中，但很遗憾，这个梦对他来说有些太长了。

他还在愣神的功夫，陈良策也就是毛文龙约定内应的人，已经带着人过来了。手忙脚乱中的佟养真，挨到了结结实实的当头一棍，这里不是比喻的说法，而是确实有一根棍子狠狠敲在了他的额头上，把他给打得跌倒在地上。他的儿子佟丰年，比较幸运（为什么幸运，看

后文便知),直接被砍杀了。

此时,城内的守军至少还有八百人(原本有一千人,两百人出去到地方上镇压了),按《明季北略》的数字,毛文龙其实就带了九十七人去攻城,那这惊天动地的呐喊声是从何而来呢?

《满文老档》给我们解开了谜团:“陈良策与毛文龙潜通。二十日夜,屯民数百人于镇江城外呐喊,陈良策自城内响应之,大呼‘明大兵至’。”

也就是一大帮当地的老百姓,被毛文龙组织了起来,在夜半时分,集体到镇江城外来吊嗓子了。大家如果看过侯耀文的一个相声的话,就应该深知五音不全的同志,在半夜里吊嗓子的恐怖效果。

总而言之,这一通狂喊,其效力约相当于武侠小说里的狮子吼加强版。

城内本来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守军,被半夜城外传来的疯狂噪音,吓得魂不附体。大家从床上爬起来,你望我,我望你,怀疑是不是集体得了幻听症的时候,毛承禄、王镐等人已经持枪登上城楼,主将佟养真也被绑了起来。

听这声音,看这架势,要打也是寡不敌众,只能顺水推舟,保命要紧。

当然,等他们得知毛文龙其实只有两百人不到,当真只有哭笑不得,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能暗骂毛文龙真他妈的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而那位佟养真此时应该羡慕他那个被一刀砍死的儿子了,因为迎接他的命运是被解运到北京,接受审判,最后被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我们不知道佟养真被剐时,内心有什么感想,不过倘若有记者去采访的话,他至少应该说一句“汉奸这个职业,也是有风险的”。

镇江之役已经展示了毛文龙的作战特点,不打则已,要打的话,那就是情报战、间谍战、心理战一起上。

他的部队,一开始人少,后来人是多了,但武器装备奇缺,无法硬

拼，很少采用正面进攻的阵地战模式。

攻城流程，主要方针是侦测敌情，联络内应。发现后金方面力量薄弱的地方，就动员广大百姓，积极配合，虚张声势，把守军胆子吓破了，再一鼓作气，攻占夺取。

天启三年智取金州城，是这一流程的完美实践。当时，努尔哈赤派人到金州、复州大肆杀戮，大批辽民逃亡到周边海岛上。

同时金州城旧守将刘爱塔因为受怀疑被努尔哈赤撤回调查，新旧交接未稳，城内虽有几百守军，但火药不多。

毛文龙派遣张盘先从逃难辽民中挑选壮丁三十五队，再让老幼妇孺的辽民伴随，乘夜上岸，“各举火把，一齐呐喊放炮，军声震天”。

结果吓得城内几百人以为大军压境，慌忙从北门逃走。金州城就拱手让毛文龙的明军占领，缴获大量物资装备。（《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说张盘收复金州是天启二年，显然有误，应以东江塘报为准。）

毛文龙进行野战的一般流程如下：派一队人到后金地盘上去，这些人的主要工作是野外旅游，兼职纵火以及放几个大型爆竹，总之就是闹出大动静来。

东北到处是野生老林，要放火，还是极为便利的。

等金兵被调动过来，抓破坏绿化的纵火分子，却发现这些缺德鬼已经流窜到别地去作案了，于是拼命追赶。

这么赶来赶去，广大的后金官兵，毕竟也是人生肉长的，难免要疲劳。在他们累得人仰马翻的时候，就会发现从某个山旮旯里会冷不丁窜出一大群杀人抢劫犯，像饿狼一样，眼冒绿光，直奔他们的人头而去。

用毛文龙自己的话说，辽民都痛恨后金统治者，所以熟悉后金情况的人，愿意当间谍，熟悉山川地理的人愿意做向导。千里范围内的疆土，我可以用轻兵袭扰。而后金则东奔西救，惊魂不定，还有什么功夫向西攻关？

这种作战方式使得努尔哈赤头疼无比，感觉有力气没地方使，只能暴跳如雷。

东江塘报中记载的天启元年十月的战役就是这种作战方式的生动体现。当时毛文龙联络宽甸、绥阳的义民高士芳、刘承德等为内应，派遣官兵带着火器，预先埋伏在各处深林空谷。等到后金骑兵出来，进入埋伏圈，就发动攻击，炮声震天，首尾冲杀，老百姓做内应，杀死金兵二千余人，剩余金兵逃遁。

看过老电影《地雷战》的人应该都知道，敌后游击队引诱日军前来扫荡，然后路边、灶头、鸡窝到处布设地雷，日军一来，结果被炸得哇哇乱叫，鬼哭狼嚎。

或许大部分人都想不到，早在三百多年前，毛文龙在对后金作战中，已经运用了相当于地雷战的手段。

天启三年七月初九日，毛文龙派遣手下游击马应奎和都司林茂春等人，挑选四百精锐骑兵，乘夜暗渡到后金统治区内。

这帮哥们儿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沿边各山头上，放炮举火，砍柴焚树，总之放在今天，是森林警察的抓捕对象。等烈焰冲天之后，就更换旗号服色，往来奔驰。

金人设立的瞭望台看见这等情形，也不知有多少数量明军出没，于是纷纷敲击梆子，传声报警。

而马应奎、林茂春等人按照毛文龙的吩咐在三天内进到深河寨、险山等处，预计后金军队的必由之路，暗摆空营三层，埋伏上地雷。

后金的声控报警体系效率是相当高的，两三天时间，就调集了大军四五万，浩浩荡荡杀奔过来。在七月十三日，一齐到满浦对过各山，沿边剿杀，看见了空营。鉴于明军望风而逃的优良传统，广大后金指战员对此自然不会感到太奇怪：“这帮孬种，胆小鬼，打不过只敢逃，还把营房留给俺们。”

当然表达鄙夷之余，还是要进营去参观顺带休息一下的。

结果这一进去，地雷引爆，真是如蚱蜢进了油锅里。无数后金战士，还没见着明军的面，就先去见了阎王的面，伤亡惨重，军心大乱。“经由空营地方，被地炮发击三次，自相踏死，不可胜数。”

毛文龙的军队再上前冲杀，战果丰硕，用极少的兵力就获得极大

的战果。

这仅仅是一个战例，有许多重要的袭击后金战役，我们会在后面结合具体的事件再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而《满文老档》对这类后金军队直接失败的战斗基本上采取回避和掩盖的态度。毕竟其所谓天下无敌的精兵良将，在毛文龙连正规军都算不上、装备破烂简陋的部队面前，屡次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狽不堪，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有损形象。这种情况给我们验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的描述带来了一定麻烦。

但考虑到从天启二年明朝全辽溃败，后金大获全胜之后，在以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胜利者却没有趁热打铁，乘胜追击，反而放弃已经获得的地盘，收缩力量，这不得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江塘报中的说法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更何况老档中还是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的线索。从这些线索可以看出毛文龙确实给后金造成了沉重的军事打击，使得努尔哈赤在后金统治境内不断调兵遣将，并屡次训诫军队要高度警惕，防备遭受袭击。

天启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在一份命令中承认敌人相当狡猾，为了诱骗攻取堡台之类的据点，假扮金兵，一半的人败退回射，另一半的人上前驱射，袭击攻取后金据点的例子很多。老头儿告诫守边的军兵，“须加谨慎，勿中敌人佯称逃人之奸计”。

那时候，熊廷弼和王化贞在闹矛盾，一个守右屯，一个在广宁被奸细孙得功忽悠，无此心计能力。由此，努尔哈赤这个命令所针对的只能是毛文龙的部队。

这也可以和《满文老档》同年同月记载的努尔哈赤给朝鲜的书信相互验证，信中抱怨毛文龙、陈良策、赵成功、李应龙、赵俊等驻扎在朝鲜弥山经常侵犯后金地盘，并愤怒地质问朝方：你们如果不把毛文龙、陈良策交出来，空口白舌假意说要和好，有什么用？

十一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又送书信给率兵前往镇江的阿敏贝勒，要他剿杀在汤山北峰上立寨的敌人，把新城、暖河的人家迁移到

萨尔浒。还要搜查环新城地方的高山，并在山巅设立哨卡，以防止敌人埋伏。

从《老档》前后文看，它所提到的镇江、汤山等地本身就是毛文龙部队活跃的区域，所以此处部署针对的应当也是毛文龙。

天命七年（天启二年）六月十五日，努尔哈赤进行的军事调动，更明确提到了毛文龙的名字。凤凰城、汤山、险山等处守堡报告，毛文龙派人乘夜前来窥探，它们请求调遣一千士兵前去援助。努尔哈赤派了二千士兵，在十八日前往。

可以说正是毛文龙不断在后金地盘内进行袭扰，才使得努尔哈赤在天命八年（天启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方势力强大的地方，能管束的人多，我方危难的地方，能管束的人就少了。我攻取辽东时提拔的众多官员，知道我军退去，就无人出来管束，全逃避在家中。”

那个时候，对于孙承宗和袁崇焕来说，后金不来打他们就烧高香了。关于这个时期山海关方面的明军势力范围，按周文郁的《边事小纪》的记载：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方面的明军用来侦察的哨马只能到中前所左右。而中前所离开山海关才三十里，朝东四十里是前屯卫，再五十里是中后所，再五十里是中右所，再三十里才是宁远。也即中前所距离宁远要一百七十里左右。而宁远距离当时后金还占据的广宁要三百里。

就是到了天启三年二月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差不多，周文郁记载孙承宗在二月份和袁监军（袁崇焕）一起出关，从前屯以外都绝无人踪。

当时能让努尔哈赤哀叹某些地方成了危难之地，以致无人敢出来管束，“皆逃避于家中”，也就只有毛文龙的部队能做到这一点。

联系到东江塘报里记述的，就在努尔哈赤说这番话后的不多几个月里，先是六月毛文龙派遣张盘智取金州城，守军望风而逃。七月份在野战中又用计谋把后金部队诱入布设地雷的空营中大量杀伤，让金兵损失惨重。我们就知道努尔哈赤这番话中的危难之地，究竟

是在谁的威胁下造成的危难了。

同年四月十二日的记载说，努尔哈赤给总兵布三、游击南吉兰、游击富克察、游击代理副将郎济达、备御代理游击延朱虎等人发布命令，其中有一句话是“如果让我方军队士兵疲于奔命、劳苦不堪，就算得胜了又有什么好处”。

两天之后，努尔哈赤又告诫驻扎在南界的骑兵和步兵的大臣说：“你们应该像布尔吉一样，在我方军队数量少的时候，不要进犯，应该等调动各处的军队都到了，我方势力强大的时候，再行征伐。”

这里所说的劳而无害，和“势强时，再行征伐”的对象如果是针对山海关方向的正面攻城，那肯定是努尔哈赤亲自部署大军，不存在势弱时将领自作主张进犯的问题。而且在《满文老档》里，所谓南界，或南边地方，正是毛文龙活动、袭扰最活跃的地区。

前面提过两次的，在天启三年努尔哈赤下令说，如果敌人从那边来进攻我方两处，我军无法支撑而撤退的时候，不能因为相信我方的汉人而分散后撤的记载，其所指对象更只能是毛文龙军队！

天启三年的时候，孙承宗和袁崇焕操心的是如何修城、守城，根本不可能来攻战两处，更不敢想象让后金军队“不支而退”。

还有如天命八年六月初五日，戍守在新城的八都虎副将派遣两人来报告说毛文龙士兵，渡过江河，在夜间从远处鸣炮呐喊，来攻击后金赴长甸取粮的十三人，这十三人先听到炮声，马上就乘马躲避，毛文龙的步兵在这天晚上空手而回云云。

听到炮声就如惊弓之鸟，赶快乘马避之。这也是后金方面以前吃过毛文龙的苦头才会这样。所谓“毛文龙步兵于是夜空手而回”，这口气很明显是还有其他时候毛文龙的步兵是不空手而回的，所以这次空手而回被当成喜事来向努尔哈赤报告。

再如天命八年六月十五日，叶尔坤游击、安崇阿备御率兵去增援戍守、驻扎在岫岩的军队。

然后是努尔哈赤在同一天下书给戍守在南海的诸大臣，指示骑兵在边外五十里之内，五里之外，选择草生长肥茁的地方驻扎，让步

兵记住骑兵驻扎的地方，步兵骑兵互相听到炮声而驻扎。如果有叛逃的人前往，就东西两军相约会合；如果遇到险要的地势，就到平地再擒拿。

照理说叛逃之人不过是平民而已，随便擒拿就是了。努尔哈赤还要派骑兵步兵配合，做如此慎重的部署，规定要躲开险恶的地形。这显然是有毛文龙的军队在策应“叛逃之人”，后金的军队吃过苦头，才如此郑重其事。

天命八年六月十七日的记载是关于天启三年的复州事件的，这则记载的内容是金人派到金州和旅顺口的取粮人看见两地有船，一处七十艘，一处近五百艘，又根据报告，长山岛一日放十炮，所以连夜急行。当十三日的时候，“杀复州城内男丁，将其懦弱者和小儿五百人掳养之”。

从登莱巡抚的奏疏以及东江塘报也可以看出，当时接应复州、金州等地，也是登莱和毛文龙东江方面联合布置。

虽然这个事件是后金方面已经截获了刘爱塔等人和毛文龙联系内应的证据，所以才调动大军事先防备。但听到放炮就“连夜急行”，“杀复州城内男丁”，还是有点草木皆兵的味道。

这同样是以以前吃过毛文龙军队的大亏，才会这么干。否则以后金军队在叛乱后夺取辽东，攻无不克的经验，根本不把明军当回事，他们是不会有如此反应的。

而天命八年七月初三日，后金接到海上看见船只的报告，就下令把盖州城南至熊岳，所有海边人的妇孺都收入到盖州城内，男丁仍旧耕田。耀州、海州、牛庄海边人的妇孺，也都收入耀州、海州、牛庄各处的城内，男丁仍旧耕田。

这又可以和东江塘报内记载的复州屠杀事件之后，毛文龙属下的程鸿鹏、毛有俊等人带领船只接应难民，而张盘从六月十六日到六月二十二日收容招抚辽民男女老幼四千多人，并在七月初二到七月初三日凌晨，乘夜上岸，攻占金州城的内容对照，说明它们基本处在同一个时间段。

后金之所以看见海上有船只，就要把海边妇孺皆收入城内，也是因为刚刚在毛文龙那里吃了大亏，连金州城都丢了，才极度警惕，风声鹤唳。

《老档》中更记载了天命八年九月初七日，努尔哈赤命令额克兴额、达柱虎、毛巴里等分别从暖河、岫岩、凤凰城等方向探寻所谓“彼方来人的踪迹”并加以堵截的一系列军事调动。

无论从东江塘报还是《老档》自己的记录来看，暖河、凤凰城、岫岩这些地方都是毛文龙最活跃的地方，所以这一番布置也是和毛文龙方面的活动有关的。

而且这些调动部署，可以和东江塘报中的天启三年九月初一日塘报，天启三年十月初塘报，天启三年十月十四塘报配合起来看。

九月初一日的塘报是有关毛文龙军队在暖阳、清河等地袭击后金军队的。各处都有胜利，其中一处是把官兵埋伏在山岭道路东西两边，让赵文仪带领内丁三百，引诱金兵过岭，然后埋伏在两边的枪炮齐发，东西夹攻，金兵死伤惨重。毛文龙军队乘胜追击剿杀，斩获首级六颗。然后又下令士兵在四处山上放火，烟雾满天。后金的大军怀疑毛兵数量众多，也不敢追赶。

十月初塘报中也有毛文龙在九月派兵攻打董古寨、阎王寨，斩获首级一百多颗的记录。

由此可知，努尔哈赤九月初七日调动几支人马，从不同路径“探寻由彼方来人之踪迹”，并且再三提醒手下“为恐队距远而受损，务须详加查寻而杀之”，是刚刚吃过毛文龙大亏后的表现。

再看《满文老档》中的这段话：（天启三年九月）二十日，乌纳各巴克什由所住处来报告有明兵三千人进金州城，告后……（原档残缺）

这段记录也是很有意思的，《满文老档》本身的记载当中没有交代六月金州城被毛文龙属下的明军攻占，这里却又突然冒出“明兵三千人进金州城”，透露出事实就是金州城已经在明方手中。一方面《老档》中竭力试图遮盖后金军队失败的狼狈情形，尽量忽略不提在

和毛文龙交战中的失败,而只提获胜的战斗,但另一方面某些记录却又没有删除干净,反而显示其记录的前后矛盾。

天命九年正月初十日,努尔哈赤又下令增加各地戍守的士兵,让栋鄂额附去驻扎在海州,达柱虎去驻扎在耀州,毛巴里去驻扎在牛庄。临行时努尔哈赤告诫他们一定要谨慎小心,作一些很细致的安排,碰到情况应该如何应对等等。

耀州、海州这些地方,清官修史书里就有毛文龙派兵袭击的记录,这些地方完全就是在毛文龙的袭击范围之内。

当时的孙承宗、袁崇焕还正忙着修筑宁远城,宁远城都没有修完,根本不敢来招惹后金。马世龙的柳河之败、试图袭击耀州也是天启五年的事情,能让当时努尔哈赤做出此等部署的,舍毛文龙更无他人!

而就在半个月之后,努尔哈赤又派军队在娘娘宫派兵四百埋伏,并下令用汉人的妇女儿童还有牛驴引诱。照理正面作战即可。但这里却说用汉人妇孺做引诱,让敌方进埋伏,这应该也是以前和毛文龙的明军作战失利,所以才会想到如此布置。

第二章

胜负天平的改变

一、天启二年后的怪事

回顾一下明朝与后金的战争过程,稍微细心一点,就能注意到一个让人大惑不解的问题!

后金从公开叛乱开始,对明朝的进攻一直保持相当活跃的势头。万历四十六年(1571年)侵占抚顺,万历四十七年(1572年)侵占开原、铁岭,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攻破沈阳。一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攻占广宁,明朝方面在辽东全线崩溃,退入山海关内。进攻的步伐几乎一年都没有停止过。

按常理,此时后金方面积极的选择,就是全面进占明朝退出后在山海关外留下的堡垒据点,并以此作为基础,向明长城沿线一带发动进攻,甚至乘明朝新败之余,守御无人,军心溃散,直接进攻山海关。

如果觉得连续进攻,太过疲惫,那还可以有一个相对保守一点的选择。就是把广宁作为一个重要据点,辐射势力,控制全辽,消化这个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再伺机对明朝发动进攻。

但这个时候,后金方面不仅停住了进攻甚至反而开始回退收缩了。努尔哈赤似乎换了性子,变成了另一个人。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明朝方面从天启二年正月惨败之后，可以用大把的时间悠闲争论熊廷弼和王化贞谁罪更大，可以用大把的时间争论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防线，修筑城堡。一直到天启二年九月初三日，孙承宗才算正式到山海关任职，整顿兵马。

如果说在天启二年，后金没有趁机填补从广宁到山海关一线明朝留下的空白，相反任由蒙古人游荡占据。这还可以理解为是需要时间休整，要先腾出手来镇压新占地盘上辽民的反抗（如十三山杨三、毕麻子等人），需要集结更多的力量来做下一步的准备。

但是过了整整一年后，出现了更为奇怪的事情，后金居然主动放弃了本来已经占领的重镇广宁，把城焚毁，撤出了这一地区。

《满文老档》天命八年（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二十四日有如下记载，努尔哈赤送书信给广宁，下令说“先查城内坚固的地方，摧毁掉，再烧光全部的房屋，前一天焚烧而没有烧光的屋子，过一天再烧，直到烧光为止。把城门上的铁件剥离下来或者烧掉，粮食运完后，全部人员都退回来”。

孙承宗和袁崇焕等人真正决定在宁远修城是在天启三年五月，从时间上看，就是紧接在后金放弃广宁之后。以此来看修筑宁远城本身就是拜后金撤离广宁之赐，否则以宁远和广宁之距离，在敌方兵力可以较快抵达的范围内修城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修城本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

当时祖大寿认为朝廷肯定不会守宁远，修城的时候，有些打马虎眼。孙承宗看到这位老兄如此不善于领会上级指示，只得亲自上阵，兼职了一把建筑设计师的角色，动手制定了关外建造城池的式样，要求必须严格按照他给的数字规格来。然后让参将高见、贺谦和祖大寿分别负责修筑，让茅元仪在旁边做参谋，约定到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的时候全部完工。

（有趣的是，《明史·袁崇焕列传》中修宁远城的记载完全抄自茅元仪的《督师纪略》，但把“定关外建城式”的人也就是孙承宗给换成了袁崇焕。）

即便从九月开始正式修建算起，修到明年春三月，也至少是整整半年，把前期准备算上，那就是将近一年了。而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等人居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在那里修城，后金方面毫无动静，所谓的“是时奴警不闻”，完全没有派兵来攻打阻止，对照以前后金频繁的进攻，这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

到宁远城修好了，仍然是一片太平景象，孙承宗和袁崇焕等人依旧在那里笃定无比，从容无比地分派布置。《明史》对此的说法是：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的夏天，孙承宗和袁崇焕商量，派遣将领分别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造城郭居住。于是从此宁远都是内地了，开疆复土二百里。

而张岱《石匱书·孙承宗列传》的说法更夸张，说“经营四年，辟地四百里”。

这给人的感觉是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的整整四年时间里，后金都在睡大觉。这实在不由让人奇怪，这些年后金干嘛去了？

二、后金抱头痛哭的神话

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孙承宗太能干了，所以让后金整整四年的时间里都窝在家里不敢动手，一直到老孙头离任了，努尔哈赤才来发动攻击。

抱有这种看法的包括金庸、阎崇年、李亚平，一直到当年明月（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

当然这种看法不是凭空而来，在明代当时就有人这么看。

比如孙承宗的门生，也是他头号粉丝的茅元仪就唾沫横飞地说：高阳公（也即孙承宗）在明军溃败之后，驱逐东西两边的夷虏，整顿边境地带的国土四百多里。把军队驻扎在右屯，游骑出入三岔。把努尔哈赤吓得屁滚尿流，一个晚上要惊醒过来九次，从辽阳迁徙到沈阳，又在老寨外营建巢窟，差不多就要吓破胆子，逃遁隐匿了。

孙承宗的二号粉丝周文郁也说：先前，努尔哈赤用数万的兵力守广宁，二万守右屯。到了这个时候知道我方兵势扩张，于是从广宁、右屯撤退，把余粮都烧掉而溜走了。

总之后金是怕了孙承宗，不是不想来，而是不敢来。不但不敢来，还一退再退，甚至要放弃辽东，逃回老窝去了。

茅元仪甚至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一副后金在孙承宗的威势逼迫下，聚在一起痛哭的景象：孙公渐渐往东推进，努尔哈赤害怕，于是向北搬到沈阳，仅用五百人守代子城，自己在沈阳甕城修筑宫室，屡未完成，又害怕受到袭击，就把珍宝财富都渐渐搬到老寨里去，又在抚宁关塞之外，营造城池，逐渐想开溜了。又屡次受到惊吓，众人每每聚集在一起哭泣。

但实际上孙承宗到任后，根本连和后金像样的仗都没有打过。要勉强说打过，也是败仗，他一手提拔的马世龙主动出击，渡柳河，结果四百人被歼，“骑八百尽失之”。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说后金怕了孙承宗不敢来，不但不敢来，还一退再退，自欺欺人到如此地步，茅元仪和周文郁也可谓昏聩已极。

而且孙承宗派人修宁远城，是到了天启四年三月才修好，至于“右屯及大、小凌河”就更晚。在后金放弃广宁前，明军只能在距离山海关三十里左右的中前所出没。

城都修好了的情况下后金不敢来犯还勉强说得通，那在天启二年下半年，整个天启三年，还有天启四年，后金在干什么呢？

更不必说即便明方真修好了城也不存在的后金怕的问题！

同样是这个孙承宗，在崇祯四年（1631年），修好了右屯和大凌河，并派遣祖大寿据守。结果后金来进攻，围城打援，孙承宗组织的明朝援军大败，“至十月，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城复被毁”，孙承宗也被追究责任而离职。

可见茅元仪、周文郁所谓的后金因为怕了孙承宗所以四年时间都不来，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明末义士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孙承宗为人干练

而才能普通，“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敌值耳”，也就是孙承宗镇守的时候，只不过是比较幸运，所以才不像他的前任和后任一样死于追究丧师失地的责任，这应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三、靠女人守卫的后金据点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从天启二年以后，后金对辽东正面战场的进攻步伐一下就放缓了，甚至出现一退再退的局面？这原因究竟是什么？所谓“辟地四百里”，“奴四年不敢内犯”的功劳究竟是谁的？真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功劳吗？

回答很简单！这里面起最大作用的不是孙承宗等人，恰恰是毛文龙。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个道理，在后金与明方的交战中，如果光靠建州女真的那点人也就是努尔哈赤所谓的“诸申”，那是绝对不行的。不必说攻城克地、扩大势力范围，就是守住原有的地盘，维持生存都成问题。

努尔哈赤在侵占了辽东大块地盘之后，想要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权，维持自己的军队，就必须依靠汉人。否则是死路一条。

而毛文龙起到的作用正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后金统治的基础。

从我们在上文中引用的大量《满文老档》记录可知，在天启二年以后，毛文龙一方面派遣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区发动人民起义反抗，策反敌方人员；另一方面直接出兵袭击，让努尔哈赤频频调兵遣将，分派驻守抵御。

天启二年以后的辽东局势，在明朝大部分将领和朝中大臣看来，或许是一派风平浪静，而在后金自己看来，却是惊涛骇浪，在镇压各地人民反抗以及应对毛文龙的袭击中，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大部分时间里，不要说无暇西顾，甚至守住原有地盘都已经倍觉吃力。

一方面是统治境内的汉人不断起来反抗，不断和毛文龙的军队联络内应。如果不加理会，那这些地区显然无法维持统治。另一方面是由于毛文龙的策反，使得努尔哈赤对手下汉人军队都失去了信任。

而后金真正亲信的女真人兵力是有限的，可能五万都不到。这里分配多了，那里就要出问题。平均分散在各地，又容易被各个击破。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只能是不断收缩兵力，放弃一些地盘。不仅已经无力再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就是已经吃下去的地方，都无法消化，要吐出来一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在天启三年三月的时候，努尔哈赤要决定放弃广宁，兵力回撤。这就是为了避免因为力量分散而全盘瓦解。

在从广宁撤回之前，从《满文老档》中可以看见努尔哈赤屡次三番色厉内荏地训斥部下“尔等勿存明国长久，我存一时等无趣之念”。

后金“日惟追杀毛兵奸细”，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努尔哈赤甚至怀疑自己身边都不安全，就在下令毁广宁城撤回兵力的同一天（即天启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他还在恫吓手下汉奸说“尔等若念养育之恩，为何未将毛文龙所差之奸细查出一人？为何不查叛逃暴乱者”？还哀叹说“我势强之地，能管束者多，我危难之地，能管束者少矣”。

有些地盘，甚至沦落到了要依靠女人来守卫的地步。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满文老档》有这样的记载，说是毛文龙的三百士兵在深夜，偷偷地摸到耀州南边的顺兑牛录住所南墙下，正要翻墙而过的时候，被村子里的三个妇女看见，把车辕靠在墙上，由青佳奴的老婆带着他丈夫的刀先行登上，另外两个妇人也相继登上，一同砍杀驱赶，吓得这三百兵魂飞魄散，从墙上跳下，“皆逃之”。

然后是努尔哈赤召见这三个妇女，大加赏赐。最后《老档》作者感叹说：系着裙子的妇女都能执刀驱敌，这是老天保佑英明汗，假手妇人的力量击败敌人云云。

当然这里的记载如果完全属实的话,那这三位妇女想必是从未来穿越过去的女版机械战警,或至少是佩上全套高科技装备的女特种兵,装备有红外线夜视仪、智能头盔之类的玩意儿,由此而能瞬间看见敌人,并清点人数,以一敌百,上演了一出三个女人赶走三百人的大戏。

回到现实。我们说这则记载完全是编造的,大概也不至于,否则无中生有去奖励三个女人这种闲扯淡的事情,估计努尔哈赤也还不会去干。

事情真相大概也就是毛文龙派了几个侦察兵暗暗潜伏过来,被这几个女人发现了而已。

但无论如何,后金要浓墨重彩地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欣喜若狂地对三个女人大加奖励,还涕泪横流地感激上天,所谓“系裙之妇能执刀驱敌,乃天佑英明汗”。这也就可见后金的人手缺少到什么程度了!

据《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记载,因为有毛文龙的存在,不时扬帆海上,东江诸岛威胁建州的后方,逼近宽甸、镇江等地,所以努尔哈赤只能次第抽回各地力量,以确保老寨的安全。当时努尔哈赤的亲兵实际上不满四五万,而收编的剃头汉人士兵逃的逃、死的死,一年之间,已经十去其三,又被毛文龙招回五六万。所以努老头疑心越来越重,杀戮的人也越来越多。编兵胆战心惊都想着逃亡。复州事件后,努老头又不得不把金州、复州等处的兵马以及李永芳等人,撤回老寨,广宁也被拆成白地。

这些描述和《老档》对照是完全不夸张的。袁崇焕赖以自豪的修宁远城、守宁远城这个机会其实本身都是毛文龙给他提供的。这些地方正是后金在毛文龙的威胁下,不得不收缩力量让出来的。可悲的是袁、茅等人还浑浑噩噩、稀里糊涂,以为是自己的功劳,最后居然干出了同室操戈、杀害毛文龙的蠢事。

或许有人会认为,后金统治本身就不得人心,即便没有毛文龙的存在,辽东地区的人民也会不断反抗逃亡;那些原本是汉人的将领官

员也会心向明朝，伺机反正。

这种看法是很天真的，屠刀淫威之下，平民奋起反抗，而且长年累月地反抗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没有人联络策划的情况下，一旦堡垒城池被攻破，即便大部分人民对后金统治充满愤怒，但在其屠刀下，也只能是逆来顺受，因为觉得即便自己反抗了，也只能白白死掉，毫无意义。索性破罐破摔，当顺民，为其提供人力、物力资源，还或许能升官发财。

这在明亡后，清朝在短时间内就席卷中国，并充分利用自己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去镇压各地反抗中可见一斑。

但在有联络、有策划、有接应的情况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天启年间后金人民的奋起反抗，能达到如此激烈、如此持久顽强的程度，让后金统治者焦头烂额，对已经占领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无法消化利用，反而成为其沉重负担，这其中毛文龙的策划、联络、煽动起了最为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

人们会觉得自己的反抗，是对后金的整体打击的一部分，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算因此牺牲了也不是白白浪费。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后金统治者动用最残酷的镇压手段，但只要有汉人的地方，反抗依旧是野火燎原一样，无法禁止。

当然仅仅口头上的联络和煽动只是一个因素，光有这个还是不够的。毛文龙对辽东人民的实际接济作用是另一个因素。东江力量的存在，给反抗者提供了一个逃亡获生的希望，正如前面引用过的《李朝实录》记载以及投金后尚可喜给皇太极的奏疏里提到的东江皮岛曾经接应过上百万辽东人民的逃亡，可想而知这种接应作用之大。

毕竟大部分人还是怕死的。可以勇敢，可以冒生命危险，但必须要有一线生机，如果是百分之百的死亡，那多数人还是会望而却步的。

发动辽东人民反抗后金统治对于胜负全局有决定性意义，孙承宗也是知道的。他在奏疏中说后金招抚辽人以供他们利用，还是杀戮驱赶辽人为我们所用，这是决定天下安危的关键所在。

不过他说这话却是成为拒绝毛文龙提出的要他配合东江军队一起对后金发动进攻的理由之一，按他的话说就是我深入敌方，敌方杀配合我方的良民，那以后老百姓就会抗拒我方了。如果我不去，后金杀老百姓，那就是不因为我而被杀的，他们就会更加痛恨后金。

这种逻辑自然是可笑的！道理他知道是“天下安危之大机”，而在如何运用这道理上，则就完全变得没有头脑。

按茅元仪的说法，孙承宗、沈有容也曾经派遣过奸细到后金去刺探情报，也曾经策反后金人员，但实际上多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吹嘘之辞。这只要看看毛文龙死后的表现就知道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客观的。唯一的判断依据就是看后金方面自己的记载《满文老档》，后金对于吹嘘自己或许有兴趣，要他去故意夸大敌方某个人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是没有这个兴趣的。

天启年间，《满文老档》中频繁提到的只有毛文龙，而对孙承宗之类连半个字都没有提到。这种情况下，对茅元仪拼命贬低毛文龙、抬高孙承宗作用的说法，我们当然不能采信。

所以，所谓后金渐渐想讨回老窟，又屡次受到惊吓，众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哭泣云云或许是事实，但这不是后金害怕孙承宗，而只是害怕毛文龙。毕竟，在毛文龙发动下，后金焦头烂额，连在自己地盘上驻扎都要如履薄冰，严加防范，害怕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攻击他们的汉人，那能不哭吗？

四、真正的对手

1. 后金战斗力的牛皮

后金在和明朝的交战中，屡屡获胜，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提到这个问题，许多武力崇拜者，一定会眉飞色舞，抢着举手回答“后金铁骑天下无敌，自然能以寡敌众，无往不胜”。

这些同学的兴奋之情可以理解，但事实真相或许会让他们大跌

眼镜！

在都是精锐军队相遇的情况下，后金的战斗力并不比明军强，明军才是以少打多，寡不敌众。

按民国的明清历史专家李光涛的说法，明人不能打仗的都是些根本连像样的训练都谈不上的士兵，真碰上训练还算行的明军，金兵（后来的清军）照样打不过要吓得开溜，或者硬扛上了，以多打少，还“死伤相当”。

细究起来，也确实那么回事。

后金一开始的那些胜仗，都谈不上双方拼战斗力，硬碰硬。

一大半是靠收买奸细做内应，还有就是间谍获得情报，知道明军动向，以多打少。《明史纪事本末》中说“建州最工间谍，所在内应”。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攻占抚顺，完全是仗着明朝没把它当回事，靠骗，让一些人装成部落的平民进抚顺贸易，大军跟在后面进城，算把抚顺骗了下来。

最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被说成是明朝出动大军，所谓的“明以倾国之兵”泰山压顶。真是乖乖不得了。

实际上呢，说出真相来，恐怕许多人会觉得大煞风景。

李光涛的评价是：“此次援辽之师，仅仅凑合了七万有零之兵，又杂以许多募兵和庭羸不堪的在内，以征建州十万之众。”“明朝各路之师，多只二万零，少则不满万。”

明军总数才七万，本身就已经是数量不占优势了，再分成三路，出兵的时间地点，又预先被努尔哈赤知道，如此情况下，不打败仗就是咄咄怪事了，努尔哈赤若再不胜就该找块豆腐撞死了。

之后沈阳、辽阳的陷落都是有奸细投靠后金，内应献城。王化贞时期的广宁，更是孙得功阵前投敌，导致明军大乱而败。

真正狭路相逢，明军敢于打硬仗的时候，后金并不占便宜，甚至在以多打少、兵力占据数倍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都是相当吃力。

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天启元年袁应泰溃败丢失沈阳，明军在浑河与后金的一场遭遇战。

李光涛在《清入关前之真相》与《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二文中提及此役，非常推崇朝鲜人的记载。

按朝鲜使者在后金打听到的情况，当时，金人用十万的兵力围攻六七千的明军，打得还狼狈不堪，死伤数量和明军差不多。以至后来每次提到这次战役，都要胆战心惊。

明方的《明熹宗实录》和清人编写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对这次战役都有更详细、更确切的记载。

综合各方记载，大致经过是：沈阳被攻，川浙总兵陈策率军去救，行军到了浑河桥南边的时候，接到沈阳失守的消息。

陈总兵一看情形不对，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撤回去凭城防守吧。可他手下一帮将领却不干，一个个血性十足，纷纷表示要和金兵干一场。

尤其是副将周敦吉等人，意见是在辽东也快两年，总是碰见金兵就躲，那算啥回事？不行，坚决要打，死也得轰轰烈烈。

陈总兵应该说还是挺尊重下属意见的，既然大家热情都如此高涨，那就打吧。

于是，从四川调来的石砬土司副总兵秦邦屏和周敦吉等将领，首先引兵渡过浑河，在北岸扎营。浙兵三千，在总兵陈策的带领下，在桥南扎营。

秦邦屏等人还没有把营扎完，金兵就从四面围攻上来。将卒拼死奋战，杀死两三千人。

金兵也怕死，看见这硬骨头不好啃，心里都发毛，将领带头和士兵往后退。在后边压阵的努尔哈赤看情形不对，气得火冒三丈，严令不许后退。

就这样金兵被打退了再冲上，打退了再冲上，反复搏杀了三次，还是攻不下来。

汉奸李永芳已经急红了眼，亲自给沈阳等地被俘的中国炮手松绑，然后每人赏赐一千两银子，发炮来攻川兵。炮弹所至之处，“无不立碎者”。

再加上久战之下的明军饥饿疲惫交加，而后金的生力军源源不断，明军这才逐渐支撑不住。周敦吉、秦邦屏、吴文杰、雷安民等人战死。其他将领奔回桥南，进入浙兵安扎的营寨里，金兵围困数重。

当时副将朱万良、姜弼拥兵在距离浑河数里的地方，观望不前。等到金兵围住了浙兵的时候，朱、姜二人才领军向前，刚一接战，就溃败不支。

金兵于是全力攻打浙营，一开始，浙兵用火器，金兵死伤累累。等火药用光后，再短兵接战。又作战良久，终于寡不敌众，总兵陈策先战死，童仲揆想要骑马突围，被副将戚金拦住问：“公何往？”

于是童仲揆下马对部属说“我二人今天就死在这里，死得其所”，和众将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都壮烈牺牲，只有周世禄突围生还。

把《实录》及《补遗》的记载和李光涛引用的朝鲜记载对照，可以发现明方此役兵力当在一万左右，而朝鲜记录，只说川兵六七千，未计入浙兵三千。另外朝方记载把血战功劳全归于“姜总兵”，而实则按《明熹宗实录》，此役总兵乃是陈策，真正之功臣是秦邦屏、周敦吉、戚金等人。所谓姜总兵者其实不过是副将姜弼，而且姜弼恰恰是拖延观望、贻误战机之罪人。

李光涛在《清入关前之真相》与《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二文中提及《实录》对此役（他称为黑山之战）的记载，均称太过简略，反以朝鲜道听途说之记载为详细可观，不知何意？莫非是未细看《实录》原文所致？而且似乎连《补遗》也未曾过目，所以谬误不小。

金人的《满文老档》对这场浑河血战也有提及，但夸大了明方之兵力，把一万多的军队说成两万，并且对己方伤亡之惨重一笔带过。但也不得不羞答答地承认明军战斗力之强，金兵颇为狼狈的事实：“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拿。”

当然努尔哈赤和后金及清朝的其他统治者都是虚荣心旺盛，死要面子的人，再加上金人素以野战为荣，夸耀于世，故对攻城伤亡不讳言。而一到野战，则为维护英勇神武之形象，掩盖自己丑态，档案

记录中往往粉饰遮盖,此是其常用伎俩。

所以在“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拿”之后,就直接说“击败其兵”,具体战斗的过程全都隐去,大约也是觉得自己以多打少,还死伤累累,实在不是太光彩的事情。

《明熹宗实录》的编写者对此役评论说:自从努尔哈赤发难以来,我兵都是望风先逃,没听说过有能正面血战挫其锋芒的。唯独这一战用一万多人,抵挡虏兵数万,杀敌数千人,力屈而死。至今还是凛凛有生气。当时这一战幸存的士兵有到辽阳的,把斩获的金兵首级献给按臣张铨。张铨命令照例给予赏赐,士兵在阶前痛哭,不愿意领赏,只愿意为主将报仇。

纵观各方记载,此役明军以寡击众,以一万人对阵后金军队近十万,结果杀伤相当。虽然最后全部壮烈战死,但战斗力之强悍,还在后金之上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结合朝鲜人记载的“虏至今胆寒”,则明军精锐部队战斗力之强悍是能让后金胆战心惊的。明朝吃亏的地方,不是战力不如对手,而是军队数量太少,寡不敌众。

后来金兵绕道入关大肆杀掠,都有记载表明其远非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强横无敌,甚至一听明军来就上下牙齿打战。李光涛在《清入关前之真相》一文中引用某些史料称入关金兵“每惊传官军至,则呼诸酣睡尽起,齿上下击如啄木,面惨淡无人色,而实无一官军也”。

2. 打蛇打七寸

后金攻城克地屡屡获胜,早期的主要伎俩有:

一是靠奸细内应,如天启三年顺天巡抚上的奏疏中就说“奴酋屡陷辽地,非善于用兵,而巧于内应”。

二是靠间谍刺探情报,明军每次的行军动向、方略谋划,后金几乎都能提前摸清,然后做出针对性的布置。

三是靠兵力人数上的优势,明军与后金正面交锋的实际有训练有组织的兵力,一直小于十万,在大部分的战役里,都是明军以少打多。

四是利用明军的怯战心理,这主要是天启元年之后的事情了。

但在和毛文龙对敌的时候,后金除了兵力(有精良器械装备)人数的优势依旧保持,其他伎俩完全失效。

前两个法宝不但失灵,而且反过来是毛文龙用这些法宝对付他们。

以前是后金每攻一地,就有奸细做内应,献城献地,而和毛文龙对阵则倒了过来,毛文龙每次袭击后金地盘,都有辽民甚至后金将领官员做内应。

以前是后金方对明军动向了如指掌,而明方对后金两眼抹黑。而在和毛文龙对阵时就成了毛文龙知道后金的动向,而后金却对毛文龙的行动摸不着头脑。

再说到明军的怯战心理,在正面战场上的官员也好,将领也好,士兵也好,在和后金军队对阵的时候,普遍的心态就是过去连杜松、刘綎(杜、刘为萨尔浒之战中的明方将领)、秦邦屏这样的牛人,这样的超级悍将,率领的队伍都打不过后金,那我们就更不行了,一听说要和后金打就心里发怵。结果造成了只敢守城,不敢野战,一到野战,往往临阵而逃。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而在毛文龙率领的东江部队那里,却又是另一番情形。东江军队本身大部分都是从辽东反抗后金逃亡的难民里挑选出来的。

从《满文老档》可以知道,为了逃出后金魔爪,许多人在没有任何兵器的情况下就直接操着农具、木棍和后金兵丁干上了。以致努尔哈赤恼羞成怒,咬牙切齿把汉人收藏木棍当成一大罪行来声讨。

所以毛文龙率领的这支军队,尽管武器装备极其简陋,但不仅没有怯战心理,反而敢于打野战,敢于深入后金境内,去袭击后金,给敌方造成重大损失。

所谓打蛇打七寸,如果后金政权是条毒蛇的话,毛文龙就恰好是掐住了它的七寸,点中了它的命门。

当然后金还有一个兵力上的优势,本来毛文龙也是找到了对付的办法,就是从辽东的难民中招募挑选士兵,其人数初期就达十几万,据汪汝淳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说“合亦有劲兵十四五万。内

有衣甲器械者，仅四万人”。如果明朝政府能给毛文龙足够的军饷，提供足够多的物资，那这十四五万人完全可以成为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但可惜的就是这种支持始终没有给予，否则在较短的时间内扫平辽东应当不是奢谈。

关于毛文龙军队改变明金作战能力之对比，后面还会有更详细之论说。

此处只需要注意一点，明军和后金作战，问题并不在于野战能力不强，而是在情报间谍、军队人数这些问题上被后金钻了空子。

要想战胜后金，是必须要打野战的，必须要解决人数太少居于劣势的地位。只要明军受过训练，人数足够多，情报得力，完全可以在野战中战胜后金。靠逃避野战，一味修城守城，堡垒战术层层推进其实是在帮后金的忙，是在助长官兵的怯战心理，最后只能拖垮自己。毛文龙代表的作战路线，才是明方应该选择的。

第三章

缩回的拳头和脑后的板砖

有一个比喻,打架的时候,先把拳头缩回来,然后打在对手身上才更有力。这比喻是用来说明,在战争的一定阶段,战略上主动收缩和退却的必要性。

还有一个比喻,能正面直接打倒一个人当然很好,但如果正面力量还做不到的情况下,这时候能有一板砖拍对手的后脑门上,那也顶大用。国家和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垒攻击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两个比喻和明金战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要从熊廷弼说起。

一、熊廷弼的弃子争先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王化贞从广宁溃逃,驻扎右屯的熊廷弼没有收拾残兵溃将,固守关外,而是选择了和逃难辽民散兵一起回撤到关内,这给他埋下了杀身之祸。

那熊廷弼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一种看法是熊廷弼在和王化贞赌气,另一种看法是熊廷弼觉得

没有守住关外的把握。

但更可能的是这两种看法都不对。熊廷弼既不是在赌气，也不是觉得不能守住右屯。问题不是能不能守，而是当时的情况下，该不该守？

在朝中的官员看来，你熊廷弼弃地而逃，那无论是什么理由，都难逃死罪！而在熊廷弼看来，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这本身就是为国家考虑后唯一正确的选择。

熊廷弼在二次出山，收拾袁应泰留下的残局的时候，就有所谓三方布置之说。但奇怪的是这个三方布置在不同的史书记载中有明显差异！

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对这个三方布置是这么说的：熊廷弼最初提议三方布置，增加登莱、天津的军队数量，而把重兵屯在山海关，等各镇的兵马都调集过来后，登莱的策应也准备齐全，然后三方大举进兵。

从这里的记述看，所谓“三方布置”，登莱可以视作一方，天津可以视作一方，再加上山海关。

但再看《明熹宗实录》的记载，表述就与此有很大不同了：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建议，认为恢复辽左必须要三方布置，广宁用骑兵步兵和金兵对垒于河上，牵制住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进入南卫（指金、复、海、盖等地），大张声势，动摇其人心；金人必定忌惮，只能急忙回保巢穴，如此辽阳可复。于是提议登莱、天津都设立巡抚，山海关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统一事权。

按此，则三方布置似乎又是指广宁、登莱、天津这三方，而山海关仅仅是居中节制。

那究竟哪一种记载更符合熊廷弼的原意呢？

如果按照前者，熊廷弼整个布局是先守后攻，守的时候，整个防线重心是在山海关一带的长城沿线。等到各方兵力调集准备得差不多，对后金的情况也摸得清楚了，各方面时机条件都具备了，再一举进攻消灭后金。

而按后者，则一开始就摆出积极进攻的姿态，关外的广宁占据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可惜的是《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也好，《明熹宗实录》也好，它们都没有引用熊廷弼三方布置奏疏的完整原文，而仅仅是按照编写者自己的意思进行了概括，而熊廷弼这份极为重要的奏疏，其完整原文似乎也没有在其他史书里保存下来，这给我们判断其原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之所以会出现不同史书中对这个三方布置策略不同的表述，问题就在于熊廷弼在表述他的战略时，故意留下了一些暧昧和含糊的地方，从而导致部分人理解上的偏差。

这个暧昧含糊的关键点就在于对关外的城池和据点包括广宁的处理态度。

显然，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把关外辽东的这些据点，当作寸土必争，严防死守的地盘，就如后来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守宁远守锦州一样，除非对方攻下来，否则绝不放弃；而另一种选择就是灵活对待，用少量兵力留驻，后金来攻，则主动放弃，后金不来攻，不妨驻守。

有足够的理由断定，熊廷弼选择的恰恰是后者。他正如一个拳手，要把对手打疼，就先把自己的拳头缩回来，然后再打出去。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实质上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退缩固守阶段，在这个阶段内，重兵是放在山海关，主要任务是稳固守住长城沿线。在这个退缩固守的基础上，调集各路大军，聚集在山海关、天津、登莱三方，为下一步做准备。

第二个阶段是大举进攻，一部分从山海关方向出发向后金地盘发动正面攻击，另一部分是从登莱、天津由海路出发袭击敌人后方。

在这个布局里，关外的据点和城池包括广宁在内其实是处于可以主动放弃的地位，真正的重点防线是以山海关为中心的长城沿线。这是第一阶段防守的要点，弃子争先，放弃关外，看似退缩，但实则能为明方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而当主力进军关外之时，目的就不能再是守住某几座城或某个据点，而是直奔着消灭后金去。用正面战场的进攻吸引拖住后金的主力，从登莱出发渡海的舟师和留驻朝鲜的明军直奔敌人的后方，策动辽民起义，动摇金占区内的人心，攻其必救。后金主力回撤，则正面战场上辽东明军乘胜追击，如果不撤，那其老巢被破，后勤供应切断，也是必败无疑。

这样来看，《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的表述是更符合熊廷弼原意的。

而熊廷弼自己表述的暧昧导致了实录编修者的误解，他的奏疏应该压根没有提起可以主动放弃关外的地盘，甚至故意掩盖这一点。他只是说先把重兵放在山海关，在天津、登莱增兵。一切就绪后，再从广宁出兵牵制住后金的主力，然后海上出兵，直捣敌人后方。

之所以如此，不外乎是考虑到如果明确提出关外不妨主动放弃，那这个战略从一开始就会被那些视弃地为卖国的文官骂得狗血喷头，不但没有执行的可能，反会惹来更大的麻烦，所以熊廷弼含糊其辞，甚至刻意提了广宁作为障眼法。

而在他的真实战略里，广宁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在河西的正面战场上拖住后金主力。如果广宁已经是被后金占领了，那可以围城打援，如果没有被后金占领，就直接以广宁为据点进发。

现在经过他刻意掩盖的表述，就有了明显的矛盾。首先组织进攻是需要时间的，整顿训练队伍，肃清内奸，获取情报，登莱舟师的配合工作等等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

在这段时间里，如果重兵聚集于山海关，那关外怎么办？能确保广宁不被攻占么？如果不能，但如何又能在进攻阶段，“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

《补遗》的作者和《实录》的编修者都看到了这个矛盾，区别就在于：

前者理解了熊廷弼的真实意图，所以干脆就在三方布置里不提广宁；而后者却没能看透熊廷弼的真实意图，所以为了弥合矛盾，干脆自作聪明地把进攻阶段的部署直接当成三方布置本身，略去了前

面防守阶段把重兵屯于山海关的内容,而把广宁提到一个突出显眼的位置,最终完全歪曲了熊廷弼的本意。

有人或许会问了,按你前面所说,受过训练的明军野战能力并不下于后金军队,既然如此,当时明军在广宁有兵十四万,完全可以正面进攻,又何必先退缩防守去当乌龟呢?后来王化贞溃败,还不是内奸孙得功干的好事吗?如果是熊廷弼亲自坐镇广宁,以他的睿智精明,孙得功还能兴风作浪?那在正面作战中把金兵打个落花流水也不是不可能吧,何必再绕大圈子?

这么问的人还是把打仗看得太简单了!

广宁是有十四万军队,但这十四万和浑河之役的川兵浙兵是没法比的,甚至是否有资格算真正的军队都应该打个问号?

再加上明军新败之余,普遍都有怯战畏敌心理,辽人将官怀有二心的恐怕也不是个别人。孙得功不过是个突出代表,否则光靠他一个人也是折腾不起来的。

即便没有人变乱,和金兵作战也是五五开的局面,可能战场上随便一个偶然因素就会使胜负天平倾斜,一旦倒向不利于明朝的方面,那依旧会是兵败如山倒。

熊廷弼不是一个赌徒,把战胜希望寄托在侥幸之上。

他的三方布置战略,必须先有一个退缩防守整顿的阶段,这一点是他在奏疏里多次明确表述过的。

他在叙述到广宁考察的情形时说:士兵虽然挑选出来,但还不知道隶属于哪个将领。马匹数量不到三万,因为缺少草料而倒毙的多得无法报告。盔甲器械,都是北京运过来搁放了很久没有实际用处的,又没有工匠来改造。士兵大多是戴着毡帽,挂着布片,拿着棍子立在那里。火炮战车则全都没有,即便是用来抵御骑兵的枪、牌、斧、蒺藜之类也没有一样是齐备的。再说粮草,米豆百十万石,都暴露在海边,而运粮车不到六百辆,各个仓库没有一粒粮食的储备。说到人心,辽河以东后金占领区的人民盼望获救的愿望确实很迫切,但河西的辽人就三心二意,虽然有子弟乡兵八千多人,很多是冒名顶替的,

也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愤激。军心、将心也都不济事。将领考虑的都是如何加衔，如何称病求去。各级官员一听到要进兵，就皱起眉头发愁，恳求我做主。

在当时辽东部队的建制，还有马匹、盔甲、器械、粮草都尚处于一团混乱、糟糕的局面之中，军心士气也都萎靡不振，如此情形贸然出击，那只能是把胜望寄托于奇迹了。熊廷弼的才能是建立在审时度势，对形势的正确判断之上，而不是如同神仙超人一样，在毫无充分准备的情形下去打胜仗。

熊廷弼下面这段话说得更清楚了：“我一开始提议三方布置，必须要使士兵、马匹、盔甲、器械、火炮、车辆、粮草等等都一一准备齐全，正面和后金对峙的能起到正面对峙的作用，策应的力量能起到策应的作用。然后约定时间一起行动，向前进取足以一战，退缩的话也足以守御。而现在碰到事情就手忙脚乱，只因为蒙古军队过来，就把希望寄托在依靠蒙古人帮忙而仓促行动。虽说有兵部尚书张鹤鸣在中央主持，巡抚王化贞在外决策，可以预料能一举成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应该为山海关设想一下，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该怎么办？”

熊廷弼的意思就是河西的山海关方向进攻出击能起到长时间拖住后金主力的作用，这叫做“正对者成一正对”；登莱天津渡海部队以及朝鲜明军能起到奇袭后金老巢的作用，这叫做“策应者成一策应”。

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先有一段时间的退缩防守整顿的阶段。主张直接进攻的张鹤鸣、王化贞自然是智者，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行军打仗必须先做好最坏的准备，设想到最糟糕的可能性。明朝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确保的是山海关一带长城防线的安全。

如果把关外据点当成死防死守之地，或者不经过退到山海关防守整顿阶段，仓卒举事，直接大军出击，那只能是看运气了。有获胜希望，但更有失败的可能。只有先守后攻，三方布置，才是获胜的万全之策。

二、请看证据

上面说的熊廷弼三方布置的实质是弃子争先,不着眼于关外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而是有充足的史料根据作为证明。

1. 可以当预言看的奏疏

熊廷弼在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初次经略辽东的时候,就上疏对整个辽东的形势有一个分析。大意是要保住辽东,必须守住辽阳、沈阳。

以前的情况,后金是东有朝鲜,北有北关、西南有辽阳,只能在东北方向活动。如果当时负责的官员能耐心点,先收复清河、抚顺,守住宽奠,在柴河、靖安间都布置重兵,形成犄角之势,慢慢困住对方,那奴夷也只能在洞穴里蹦跶而已。

结果三路进军失败,开原丢失,现在朝鲜、北关都暗地里屈服在金人淫威之下了,蒙古人也有和金人勾结的嫌疑。如果后金收买蒙古察哈尔众部落进犯昌平、蓟镇、宣府、大同,以牵制中国。然后长驱直入山海关,或从海道直取登莱、天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熊廷弼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后金能想到的策略,他想到了,后金没有想到的策略,他也帮他们想到了。而他想到的东西,明朝许多官员可能要过个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能在实际教训面前想到。

这份奏疏里,他说得很清楚,如果要保住辽东,首先就必须守住辽阳和沈阳,否则是“必不能保辽镇”。而且他还敏锐地注意到明朝在昌平、蓟州、宣府、大同等地的防守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一旦被后金利用,则后果不堪设想。另外考虑海道进攻的话,则登莱、天津的战略位置也极其重要。

当熊廷弼第一次出任辽东经略时,辽阳、沈阳还在明军手里。他整顿辽沈,为收复开原做准备。可惜一年左右,他就被朝廷内的文官

给赶下台去了。结果袁应泰在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上台之后，也就是半年多一点的功夫，到了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沈阳、辽阳就相继失陷。

在这之后，熊廷弼二度出山，但此时他面临的形势已经和第一次完全不同！沈阳和辽阳已经失陷了，而昌、蓟、宣、大的防线存在的问题依然如故，敌人从海道进攻登莱、天津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那这时候，按照熊廷弼对局势的分析，他还会选择死守关外的据点么？显然不会！

辽东不能守，并不是因为关外的城池据点坚固程度不足以守，而是这些已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城池据点，即便再坚固，要去守，也完全可能被后金围困，那时候明朝就陷于彻底被动的局面，只能被后金牵着鼻子走了。

如果不支援，那就是白白损失这些守城的人力物力；如果支援的话，那就是被后金围城打援，这是必败之局。更不必说，从关内调拨粮饷，后勤补给线拉长，同样加重了财政负担，也是得不偿失的。正是所谓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再退一步说，即使能守住这些据点，后金也存在利用昌、蓟、宣、大这些防线漏洞而入关的可能性，熊廷弼很清楚把希望寄托在蒙古人身上是靠不住的。

以熊廷弼的聪明才智，他早在万历末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局势分析得如此清楚透彻，那在天启元年，辽沈已经丢失的情况下，就更不必说了。

这正是他提出三方布置的背景。重兵屯在山海关，无论昌、蓟、宣、大出现什么问题，都能最迅速地支援。同时也窥伺后金破绽，可以正面出击。而在天津、登莱聚集军队，不仅可以防止后金从海路的进攻，此举更是本身就瞄着敌人的后方。

至于关外据点，则是以灵活轻动的姿态对待，随时可以主动放弃。

可以说他的三方布置，是反客为主，攻守兼备，看似平淡无奇，实

则蕴藏凌厉杀招的一步棋。当时天下，才智之杰出，军事眼光之犀利，无出熊廷弼之右者。

2. 一段让人扫兴的对话

在夏允彝的《幸存录》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

熊廷弼在地方上的时候，有人恭维他说：“公至必能灭敌而固辽。”

按照一般的套路，此时热血点的表演应该是摆出踌躇满志，壮怀激烈的态度来，拍胸脯放言舍我其谁，老子马到成功（袁崇焕就喜欢玩这一手）；低调点，那也至少要说些为国效忠的场面话来意思意思。

但熊廷弼却是不按常理出牌，别人一本正经，他却偏偏要一脸怪笑：“老兄是个明白人，怎么也说出这种话来了，辽东的事情还能有指望吗，能有一个相对好点的结局就不错了。”

夏允彝记载了这段轶事后，愤愤地评论道，看熊廷弼那德行，分明没上任就要撂挑子了，骂人惹怒朝内官员，根本就是存心想让别人赶他走，这是把国家当回事的人吗？

夏允彝还是太严肃，熊廷弼的话其实是半真半假，带有一定戏谑和开玩笑的性质。但是也说出了部分真相，那就是在朝廷内文官胡乱牵掣的情况下，辽事确实是很难办，通过骂人的方法，以退为进有时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具体联系到他二次出山的时候，这段记载对理解熊廷弼当时的作为是很有帮助的。

他本身对局势的分析已经透彻清楚无比，按照他的部署坚决执行，明朝对后金是有胜无败的。但棘手就棘手在，把他的计划和盘托出，在朝廷内那些极端迂腐，清高，刚硬的文官能同意，那就是活见鬼了！

所以他的三方布置中关键的一环，让朝廷主动放弃那些还在明军手里的据点，肯定是行不通的。朝廷内那些官员尤其是东林党人以及孙承宗、袁崇焕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听到这样的主意，当时就能把熊廷弼给生吃了。

而这时候,正好有王化贞任辽东巡抚,把熊廷弼的权力分掉大半,按照传统的说法,熊廷弼应该是很恼火。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此种情况正中熊廷弼的下怀。

所以他任由王化贞去闹,自己则不断上疏说怪话,讥诮讽刺,嬉笑怒骂无所不至,言辞滑稽,语言刻薄,分明就是一副希望朝廷先把自己撤了下去的样子。

熊廷弼打的算盘是,他先把三方布置的主要内容说了出来,就留着关键的一点,主动放弃关外据点不明说。让王化贞闹去,把朝内官员骂一通,让他们撤了自己。等王化贞吃了败仗,把关外地盘都丢了,也验证了自己先见之明的时候,他再被请出山,这时候再彻底实施三方布置的战略,可以说就扫除一切障碍了。

在这个算盘中,王化贞反而是熊廷弼的一枚棋子。

但弄巧成拙的就是,本来朝廷内的官员确实要把熊廷弼给撤了,让王化贞独当大任。可偏偏天启皇帝凭自己的直觉,对熊廷弼非常倚重,坚决不同意,于是他只能继续留任。

而当王化贞溃败之时,熊廷弼当然不可能还固守在关外了,于是收拾难民,回到关内,结果最后就成了熊王一起承担弃地丧师的罪责。

3. 远离前线是胆小如鼠?

前面说过,熊廷弼对三方布置暧昧的表述本身就存在明显的矛盾。朝廷内的官员也并非都是傻瓜看不出来。在天启元年十月的时候,就有一位叫苏琰的官员上疏指出了熊廷弼三方布置里的蹊跷之处:“三方布置,每一方都设立巡抚,然后由经略作为统帅,这策略不是不好。但我觉着疑惑的就是,经略熊廷弼的驻地不太对头。山海关离开广宁有四百里,光是文件往返来回就十天有余。军情紧急,千钧一发,能这么耽搁吗?春夏间的邸报里都说经臣熊廷弼足以担当大任,因为他离职了,所以奴酋才又起了狼子野心。甚至有人把经略被撤职比作岳飞被金牌召回的。现在再次出山,难道不是金兀术痛哭的时候吗?那为什么不驻扎在接近辽东前线的地方,凭借过去的

威望，稳定住形势呢？正因为经略离开广宁太远，兵马策应广宁也必定懈怠！军机才会白白丧失，粮米会白白腐烂，不满的议论也会频出。”

这里苏琰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军事决策稍有延误，后果就不堪设想。如果三方布置里广宁是作为最主要的一方，处于正面对敌的最前线。熊廷弼的驻地山海关离广宁如此之远，如何才能指挥得宜？

登莱、天津等地在后方，不是和敌正面交锋，可以从容准备妥帖，等到最后渡海联络朝鲜一起进攻时，已经是一切就绪了，当然不必熊廷弼亲自坐镇。而广宁不一样，这里时刻都面临后金的正面进攻，处置失当，就是全线崩溃，哪还谈什么牵制金人主力？

这显然是熊廷弼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而熊廷弼对此的回答却是含糊其辞，没有正面的驳斥，而仅仅是不痛不痒地举了一些过去的例子，说是宋代的韩琦、范仲淹经略西夏的时候，就驻扎在某地如何如何，和现在驻扎在山海关而节制广宁、登莱、天津的情况相同，苏琰是不熟悉典故云云。

但问题是过去的例子和当时的情形是否真的相同，这都没有具体分析，如何能用以搪塞呢？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熊廷弼胆小如鼠，对守住广宁也没有信心，所以才非要驻扎在距离前线四百多里的山海关。

但是不对啊！

熊廷弼自己胆略过人那是出了名的。万历末辽事大坏时，他曾经不顾劝阻，亲自冒着危险率领四百人巡视抚顺、清河，并不存在因为害怕所以不愿亲临前线的问题。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的三方布置真正的用意本来就是先要把防线退缩到山海关一带，至于广宁，由于后勤补给艰难，容易被敌方围困，在他的布局里本就是处于一个灵活对待，可以主动放弃的位置，只是他不方便明说而已。

4. 推行屯田别找我

熟悉明末历史的人都知道，凡是主张在关外修城守城的官员，基本上都同时主张在关外屯田，孙承宗是这样，袁崇焕更是这样。否则对于一心要省钱的朝廷官员来说，财政负担是太沉重了，无法作为长期推行的政策。

即便是熊廷弼自己，在辽沈未失时，也是力主屯田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说：“廷弼亲自考察边境各寨，决计效法赵充国制服西羌的办法，坐困后金。”而历史上赵充国就是以推行屯田政策闻名的。

但是到天启初年，他第二次出山，辽阳、沈阳已经陷落之时，他却一改前议，认为“屯田必不可行”。

当时内阁首辅叶向高在奏疏里有这么一段话：

“臣的意思是近年以来为了征兵和转运军饷，导致民力困竭，如果辽事长久都不结局的话，内乱必生，恐怕祸患不止于四川一带。臣曾经拿赵充国的策略和经臣熊廷弼商量，但熊廷弼认为屯田必不可行，不征调军队，不转运军饷肯定不能守御辽东。这是臣反复思考，感到深切忧虑的地方。”

叶向高的意思就是光靠朝廷发军饷，实在负担太重，还是要如历史上的赵充国一样推行屯田政策才行，但是熊廷弼却偏偏坚决反对，所以他对此很头疼。

面对叶向高的指责，熊廷弼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既然知道我不主张屯田，那你可以去找巡抚王化贞啊，自寻烦恼干什么？

这已经是语带讽刺挖苦了，我觉得屯田不可行，所以不会去推行屯田，那你就让觉得可行的人去推行屯田，看看最后究竟是个什么结果？

那究竟是什么让熊廷弼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力主屯田，坐困努尔哈赤，到认为“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转饷必不足守辽”呢？

根本原因就是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之时，虽然明军吃了几次败仗，丢了铁岭、抚顺，但总体上在

辽东元气还未大伤，重要的城池据点还在手里，人民也还未散失，通过固守要害，占据地形优势，各地军队联络照应，封锁困死后金的条件还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屯田当然是可行的，也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但是到了辽、沈已经丢失，明军在辽东各地的据点已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辽民也大量逃亡的情况下，再要主张屯田，显然是刻舟求剑的蠢事。明军新败之余，军心不稳，怯于野战，如果困守广宁孤城，一旦被后金重兵包围，切断各地之间的联系，到时候怎么办？所谓的屯田，岂非成了给后金送粮食？

但完全依靠政府支援广宁粮饷，后勤补给线拉得如此之长，长期维持下去，也必然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熊廷弼既然否定了当时在关外屯田的可行性，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在暗示叶向高，广宁是有必要主动放弃的，明军已经是不能指望靠单纯守御来困死后金了，必须要主动出击野战才能解决问题。但在出击之前，必须要经历一个防线收缩到山海关一线退守整顿的阶段，可惜的是叶向高对此并不能完全领会。

熊廷弼提倡屯田固守也好，提倡主动弃地退缩也好，乃至提出主动出击的谋略，本身都是根据形势变化来决定的。而其他人没有他的头脑，只知道拘泥某种固定的策略，自然会对熊廷弼的主张疑惑不解。

5. 监狱号泣：“我被老孙所算”

以上的证据如果还算是旁敲侧击的话，那下面的证据就是决定性的。

尽管我们无法看到关于三方布置奏疏的完整原文，但在熊廷弼其他奏疏里，有些内容就明确是把山海关和登莱、天津并列在一起的。

比如《两朝从信录》卷八里记载的天启元年九月，熊廷弼在《三方布置有名无实》的奏疏里，说怪话，用反讽，有一段话，是接连三个“而始悟……之非”。

第一个是“……而始悟登莱建议之非”；

第二个是“……而始悟天津建议之非”；

第三个是“……而始悟山海驻扎之非”。

紧接在“始悟山海驻扎之非”这句话后面就是，“有是乎三方虽设，而于辽无益也”。显然他就是把山海关而非广宁，和登莱、天津并列作为三方布置中的一方。

而在天启元年十月的奏疏里，他说得更清楚了：“初议三方布置，本图登、津、山海，兵师甲杖炮车刍粮，一切齐备，然后出关与广宁共进。”

显然仍旧是把山海关而非广宁作为三方布置的一方，广宁仅仅是作为进攻阶段时的据点。

熊廷弼获罪受审的经过同样能说明问题。

广宁溃败，退入山海关后，熊廷弼一开始受到的处分仅仅是“革职回籍听勘”，当时攻击他的人不少，为他辩护的人也不少。

熊廷弼本来已经回家乡了，但是害怕自己不在京城，事情不说清楚，会被人陷害，于是就主动跑回北京。结果这一来，反而是害了自己性命，如果当时他老实呆着，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回去，孙承宗等人就不能放过他了。

我们不妨先看看熊廷弼受审的经过，当时审问熊廷弼、王化贞二人的是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

王纪和周应秋两人我们或许不熟悉，但邹元标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早在四十多年前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中，当时还是小伙子邹元标，写了一篇奏疏，里面骂张居正“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

把张居正骂成禽兽不算，他对皇帝也是极尽刻薄之能事，挖苦嘲笑张居正死了爹离开三年，你就受不了，那要是张居正自己死了，你该咋办呢？为了让这份谩骂性质的奏疏被皇帝看到，以便领受到八十廷杖，他甚至不惜贿赂太监把这份奏疏送进去。

其人可谓铁骨铮铮，嫉恶如仇。后来他读书讲学，成为东林党著

名的招牌人物，名气之大，声望之高，比之顾宪成、高攀龙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天启初年，此公已经是正人君子的代表，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了。

有这样一位以品德高尚著称的大人物坐镇审理熊廷弼和王化贞，自然是公正无比。审理的过程是很有趣的，按说熊廷弼此时已是犯人了，就该跪在那里。可熊廷弼还是很倨傲，他只是稍做样子跪了一下，就马上站了起来。接着他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对此的记载是：“廷弼言‘起自田间，复任经略，原议驻扎山海，无驻扎广宁之名’。”《明季北略》的记载是：“熊廷弼一跪就起，言‘从田间起，原议住扎山海，并无住扎广宁字样’，一躬投一招揭。”

熊廷弼的意思很清楚，他以前的三方布置的奏疏，本来就说是重兵屯于山海关，他本人也是驻扎在山海关，因此广宁丢失，他并不承担任何责任。

只能说这时候他是有些天真了，不这么说，或许还没有什么事，这么一说正是触犯了朝廷内这批以积极进取自命的东林党官员的忌讳。

王纪、邹元标、周应秋给熊廷弼、王化贞定死罪的判决书可谓是煌煌大文，义正词严：

皇帝如此提拔重用熊、王二人，待遇算是优厚了。两人一向自命为豪杰，就应该感恩图报，同心协力灭了后金。结果想不到互相斗气，大闹一场，就把国土拱手送给了后金，最后一逃了事！

王化贞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广宁危如累卵的时候，独力支撑了八个多月，谁不同情呢？但可惜为人朴实，不懂兵法，想利用蒙古人反被蒙古人利用，想利用间谍，反被间谍利用。孙得功这样的人每天围在他左右，被骗得团团转。吹牛说要渡河决战，结果一打起来，敌人的骑兵还在百里之外，就丢下广宁，一个人骑着马连夜逃走了。

可悲啊，王化贞空有忧国之心，扫平后金的志气，却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已至此，罪责难逃，只能定死罪了。

至于熊廷弼的才能、见识、气魄，都自负天下无人能及，不可一世。过去镇守辽东而辽东存，离开辽东而辽东亡，重要性不言而喻。

再次出山担任经略，熊廷弼以卫青、霍去病自许，其他人也都把他看成是卫青、霍去病。皇帝也赐予种种优厚礼遇。然而刚出京城，熊廷弼就献上所谓三方布置的策略，当时有见识的人就已经看出他有放弃广宁的意思。

等到达山海关后，说我兵不应该鲁莽出战，说蒙古人不能完全相信，说的每一件都应验，预料事情的智慧，远在王化贞之上。可惜的是性格刚愎，为了争论毛文龙功罪的事情，和王化贞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成天就顾着唇枪舌战，把防守准备等事情都抛在了脑后。等到金兵一来，就错愕不知道该怎么办，还火上浇油，飞书催促王化贞派兵出战，打得算盘无非是如果胜利了，可以成就我的名声，失败了也可以应验我以前的话。却不知道身为防守边疆的大臣，破坏边疆的防守，国家是有规定的法律来制裁的，再巧言辩解又有何用！前后矛盾，战或守都谈不上，就算想用过去不主张出战来求得从宽发落，能行吗？

如果广宁告急的时候，熊廷弼能坚决支援，平定祸乱；或者坚守右屯，收拾残局，为恢复国土做准备，那也能转败为功，就算死了，也是不朽。结果没有这样做，反而逃奔山海关，就算有盖世的气魄，也不足以赎回丧师失地的罪责了！

熊廷弼到了审讯的时候，还一副倨傲不肯服帖的样子，为什么不看看以前的那些经略的下场。扪心自问一下，你比杨镐还多了一逃，比自杀的袁应泰还欠了一死。如果杀了王化贞，而对熊廷弼从宽发落，不但不能让天下万世的人心服，恐怕就是杨镐和袁应泰都无法心服！应该用重典定罪，警示将来。

这篇雄文真是泰山压顶，“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于是熊廷弼只能被判死罪了。（在《两朝从信录》里，这份判决书还多了一个最后部分，大意是有些人提议熊、王二人是国家的高级官员，可以赦免死罪，但这三个主审法官的意见是他们只负责定

罪，至于赦免不赦免，这是皇上您的事情了。)

其中一句话非常关键“其初出春明门，即微有三方控扼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

这是《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的版本，在《明熹宗实录》中，这句话是“其初出春明，即邀有控扼山海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

那这个“识者”是谁呢？说句实话，王纪、邹元标、周应秋，这些东林党的书呆子，还真未必有这个见识能看得出熊廷弼战略的真实用意，《明熹宗实录》的纂修者在提到三方布置奏疏的时候显然就没有看出其中的玄机。

前面提到的御史苏琰应该是看出一些端倪来的，但还有一个人，也必然看得出来，这个人就是孙承宗！

孙承宗在熊廷弼入狱，乃至最后定为死罪这当中起到的作用，应该是比邹元标等人更为关键。

当广宁溃败，明军退守关内之初，天启皇帝也好，朝中的多数官员也好，并没有想到要把熊廷弼抓起来，更不必说处死他了，因为当时的普遍看法是熊廷弼在之前多次提出忠告，是王化贞一意孤行，才导致惨败。所以开始的时候熊廷弼就是“革职回籍听勘”。

而真正导致熊廷弼下狱并让邹元标等人的判决书那样给事件定性的关键人物就是孙承宗！这事情不是别人污蔑的，而恰恰是孙的得意门生茅元仪写的《督师纪略》里喜气洋洋地将之作为巨大功绩而写下来的。

大致情况是，一开始许多维护熊廷弼的人，不但不让他和王化贞一起入狱受审，甚至希望能再次任用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孙承宗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说熊廷弼按照法律就应该和王化贞一起抓起来，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孙承宗可不是普通人！他当时就是天启皇帝的老师，而且按《明史》记载，皇帝非常喜欢这个老师，对孙承宗简直眷顾得不得了。这皇帝的老师一句话，自然效力非凡，再加上抓熊廷弼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于是熊廷弼只能入狱了。

而这仅仅是第一步，在入狱之前，孙承宗说是“罪可详核”，也就是为了法律公正，先进去再说，具体定什么罪，可以从容商量。

而到了入狱之后，大家在为熊廷弼究竟应该定什么罪争论纷纷的时候，孙承宗又发话了，杨镐、李如桢这些被处死罪的人，尚且有无辜被冤枉的地方，如果让熊廷弼漏网，拿什么让杨镐等人心服，又怎么让天下人心服呢？

大家仔细体味一下这中间的意思，简直就是“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这句话的母版。

《明熹宗实录》里孙承宗的奏疏有另外一个版本，似乎是孙承宗说不应该给熊廷弼等人扣通虏的罪名。但茅元仪的《督师纪略》成书于熹宗实录之前，而且实录纂修者在收录奏疏时，会有缩略改写的情况。而茅元仪本身作为孙承宗的门生，不会刻意修改孙承宗的原意，他的记录显然是比实录记载更为原始的资料。更为关键的是，熹宗实录记载的奏疏里就没有人说熊廷弼、王化贞通虏，都是说他们经抚不和导致误国。说这两人通虏的意见纵然存在，也绝不是主流。如果理解成孙承宗呼吁不要给熊廷弼、王化贞扣通虏的罪名，那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连基本的情理都不通。

孙承宗既是皇帝的老师，又和东林党人的关系亲密得很，两边都能说得上话，这就使得他的意见成了定熊廷弼死罪最为决定性的因素。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孙承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他和熊廷弼有什么私人恩怨，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答案是否定的！孙承宗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出于公心，是因为他和熊廷弼执行的战略有根本性的分歧。因为这种分歧，导致他对熊的行为痛恨之至，认为是他故意弃地丧师，罪不容赦。

而且孙承宗的军事眼光还是在一般迂腐文人之上，再加上本身的敏感，别人没有看出三方布置里的潜台词，他是能看出来的。熊廷弼放弃关外不是在王化贞溃败之后才做的选择，而是早在三方布置战略里就已经包含了这种意图，不过说得不是那么直白。既然如此，

他和王化贞之间的争吵也好，谩骂朝廷官员也好，都有那么点故意戏弄利用对方的意思，最后撤回关内，也不是因为无力守御下的不得已选择，而是正中下怀，顺坡下驴。

这样一来，熊廷弼问题的性质，在孙承宗的眼里就严重得多了，这显然就是故意欺君欺国，故意弃城弃地。

如果这还可以勉强含糊过去，从宽发落的话，那有一点是孙承宗必须要考虑的，如果不把熊廷弼抓起来，不先给他定死罪，那以熊廷弼的才能和威望，他被重新启用，戴罪立功，几乎是免不了的。

熊廷弼革职回籍，不回来也就罢了，可偏偏他主动跑回了京城。不仅如此，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主张再次任用熊廷弼，这孙承宗就绝对不能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就要坚决主张把熊廷弼抓起来定罪，而且一定就是死罪，对他和邹元标等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依法办事。

可以说正是因为决策路线的本质性分歧，导致孙承宗对熊廷弼的这个态度。有些人把孙承宗、袁崇焕定为主守派，然后把熊廷弼也定为主守派，然后认为他们之间即便不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也算得上英雄所见略同，是志同道合者。这是天大的误会和笑话。

殊不知孙、袁二人和熊廷弼推行的战略，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的。孙、袁二人是货真价实的主守派，对他们来说，守就是全部，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任何可以守住的地方，是他们行动的根本原则。

放弃一城一地，在他们看来都罪大恶极。不仅已有的地盘必须要守住，而且还试图通过修筑堡垒的办法，层层推进，守即是攻，一直守到后金的家门口，再把后金给封死堵死。

而熊廷弼是完全不同，在他看来，守也好，战也好，都不是目的本身，如何把战略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才是真正的关键。在辽、沈还在明军手中的时候，确实能以守代攻，慢慢封锁扼杀后金力量。但在辽、沈都已经丢失的情况下，这时候再靠堡垒战术，再靠死守几个据点只能把主动权拱手让人，是行不通的。这时候必须要战，但在战之前，必须要退，必须先确保长城防线的安全。就如同拳击手，要给对

方沉重打击,得先把拳头缩回来一样。

这才是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的实质所在。但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欲战先退守的战略,孙承宗根本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所以他要熊廷弼抓起来,要给熊廷弼定死罪,其用心就是防止熊廷弼东山再起推行那种战略,孙承宗的本意倒并不是真一定要熊廷弼去死。

对这一点,茅元仪在一段记述中是表达得很清楚的。熊廷弼进监狱之后,在茅元仪看来,仍旧影响着孙承宗鼓吹的关外修城固守的决策,说维护熊廷弼的人为了给熊廷弼脱罪,故意阻挠孙承宗。

茅元仪先说了一句“廷弼之人狱也,自公发之。廷弼尝号泣曰:我被老孙所算”。

也就是熊廷弼入狱是孙承宗的功劳,熊廷弼在监狱里曾经哭叫说“我是被老孙算计的”。

然后就叙述孙承宗其实也很顾念熊廷弼的杰出才能,而且朝廷同时设立经略、巡抚导致互相牵掣,两败俱伤,他自己也是亲历其中的苦处,也是体谅的。而熊廷弼和王化贞虽然关在监狱里,但他们各自都有党羽,忌恨孙承宗收复辽东的努力。

为什么要忌恨呢?

因为据说如果孙承宗能到关外建造宁远等城进行防守的话,那当时熊廷弼放弃关外,罪责错误就更加突出,就更没有希望脱罪出狱了,所以熊廷弼的党羽一定要阻止孙承宗出关云云。

孙承宗为了避免那些希望救熊廷弼的人阻挠自己出关修城守城的战略,就发慈悲,建议把熊廷弼等人流放就算了,不必处死了。

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人看见了吧,我并不是一定要杀了熊廷弼,只要我能推行自己的出关修城守城的战略,照样可以给他一条生路,而且也可以显示出朝廷的宽大。先定罪再从宽发落,朝廷的法律尊严也能得到维护。

其中孙的一句原话是“边政之不利于诸臣者,便生议论”,就是指他推行的关外修城守城的战略是直接和熊廷弼当年放弃关外退回山海关的举措是对立的,如果他的战略是正确的,那就更证明了熊廷弼

死有余辜,那些想要救熊廷弼的人因此要反对他的战略。而现在我孙承宗主动建议把熊廷弼等人流放算了,反对这个战略的人就可以闭嘴了。

但实质上让熊廷弼免死当然已经是不可能了,熊廷弼得罪太多人了,东林党他也得罪,魏忠贤他也得罪,他只要不下监狱,不定死罪,万事好说。一旦被定了死罪了还从宽发落,就算皇帝和孙承宗怎么慈悲为怀,也是不可能的。恼恨嫉妒熊廷弼的人太多,处死熊廷弼是名正言顺,不拼命推一把,难道还等熊廷弼东山再起,继续和他们作对?对此孙承宗自然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就是做出一种姿态来,既不得罪要杀熊廷弼的人,也顺带讨好了那些希望救熊廷弼的人。

6. 毛文龙的看法

有趣的是毛文龙在提到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时,也把广宁算在里面。天启二年八月的《明熹宗实录》里有这样的记录。

毛文龙的意见大体上就是以前说三方布置,是以广宁作为重点的一方,登莱、天津作为配合从海上奇袭敌人后方。

现在的话,按照毛文龙的观点,山海关应该防守,登莱、天津适宜出战。天津的军队应该支援山海关,而登莱连接旅顺,靠近朝鲜,而且和海上各岛可以联络。各岛的居民自从王化贞招抚后,都感激恩德,愿意效命。利用好海上各岛,可以灵活机动袭击敌方,出没海上,联合登莱和朝鲜的力量,对于恢复辽东来说,是战略要害所在。

从这段话来看,毛文龙也认为以前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是把广宁当成一方,而且是主要的一方,而他现在提出的三方布置,则是把山海关作为一方,防线应该定在山海关一线。

有人因此会产生疑惑,既然连毛文龙这样深通军事的人都会认为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是包括广宁在内的,那你上面所说的还能成立么?

但其实这里关键是要理解毛文龙的处境和心理,如此就会明白他误解熊廷弼三方布置的原因了。

首先毛文龙开始的时候不过是下级军官,后来又深入敌后,基本

没有机会看到熊廷弼奏疏全文,充其量看到的是邸报上已经被人为概括简化的内容,而这简化内容很有可能就是类似《明熹宗实录》中的记载。他也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不同的版本加以对照,来分析弄清熊廷弼的原意。

第二,毛文龙本身也不存在弄清熊廷弼原意的心理动机。如果他按照自己的军事眼光,当然会认为三方布置里,应该把山海关作为一方,防线定在山海关一线,才能掌握军事主动权。但他未必认为熊廷弼也能看到这一点。

要知道因为王化贞和毛文龙的关系,对毛文龙袭取镇江贬损最力的就是熊廷弼,毛文龙对此当然是很清楚的。在毛文龙心目中,如此厌恶自己的熊廷弼,大概也就是和后来的袁崇焕之类是同一流人,由于感情倾向的作用,他也不大容易想到熊廷弼能有这样的谋略。

三、天启两次大捷的尴尬

那关外究竟是可守还是不可守呢?正确的是熊廷弼还是孙承宗呢?

回答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毛文龙,则关外可守;无毛文龙,则关外不可守。在熊、孙二人都轻视毛文龙的前提下,正确的是熊廷弼。

毛文龙起的作用恰恰如同拍向努尔哈赤后脑的板砖,在正面力量应对不当的情况下,他起到的作用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孙承宗等人关外修城的理由无非是既想积极进取,又认为野战打不过后金,那就只能依托坚城,步步推进。这表面上看似乎是扬长避短,攻守兼备,两全其美,但这种策略其实是攻不成攻,守不成守。

说守,别人可以绕开你的城池,绕道薊门,攻进关内。

说攻,修建宁远、大凌河这些城池本身是害怕野战,既然如此当然不会主动进攻,只能龟缩在城里,成天等着别人来攻你。别人不来

打,你就拿对方没有办法。

在金人后方稳固的情况下,明朝关外几个孤零零的据点,就算攻不下来,后金也可以长期围困。如果明方派出军队去解围。这样的形势就变作后金围城打援,以逸待劳,等你进入预定的战场来。

为害怕野战而修城,修城的结果却是让明军在更被动的形势下进行野战,这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等人推行的政策的实质。

这个政策的唯一作用就是白白消耗明朝政府本就极端紧张的人力物力资源。

而从历史事实来看,在毛文龙死后,明军两次大败都是被围城打援的结果。

第一次是崇祯四年(1631年),大凌河被围,孙承宗派遣吴襄、宋伟去救援,结果败于长山。祖大寿守了三个月,粮尽投降后金(后又逃回来了)。

第二次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锦州被围,明方派遣洪承畴前去援救,结果在松山大败,这回坚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祖大寿再降。

这两次失败都为固守,结果白白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对明朝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那问题就来了,在天启年间,为什么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反而是出现了天启六年(1626年)的宁远大捷和天启七年(1627年)的宁锦大捷?

按许多人的想象,这是袁崇焕卓越超凡的军事才能的结果,是他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体现,也是他和孙承宗推行的修城守城战略的成功。

如果袁崇焕是经受了比后来祖大寿守大凌河、守锦州更严峻的考验,坚持了更长久时间,最后还取得守城胜利的结果,那或许可以同意这种看法。

可问题是,事实是这样吗?

我们不妨看一下两次所谓大捷的经过。

第一次是宁远大捷，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后金军队抵达宁远，二十四日攻城不克，二十五日攻城还是不克，于是就解围去打觉华岛了，一共就围攻了两天。

再看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这是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掌权时的事情了。后金天启七年五月十一日围攻锦州，二十八日分兵进攻宁远，两处都没有攻克后，在六月五日撤回，并“毁大、小凌河二城”。这次比上次时间长了一点，但依旧是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

这是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在明朝政府瓦解，南明全线崩溃时，江阴的人民完全在自发组织的情况下，尚且坚守了八十天的时间。要说守城，就是叛乱的孔有德、耿仲明的表现都比袁崇焕更出色。他们在崇祯四年十一月叛乱，到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逃奔后金，期间占据登州城也要将近一年的时间，顶守住了明军大大小小的围攻。

如果光论守城能力的话，明朝比袁崇焕强的将领没有一千也有一百。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天启六年和七年后金两次攻打宁远、锦州等地，短则两天，长则一月不到？对照崇祯年间，后金围困大凌河三个月，围困锦州长达近一年的时间，两者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原因何在？如果后金当时就采取长期围困的政策，那袁崇焕能有比祖大寿更好的下场吗？

这就是下面要分析的内容了。

1. 杀敌数百，自损数万

天启六年，后金攻打宁远仅仅两天就不打了！是后金力量不足么？恰恰相反，宁远解围，后金马上就分兵去攻打距宁远不远的觉华岛。

明史中的记载是“我大清初解围，分兵数万略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

在天启六年四月辛卯的《实录》中有更详细的记载：觉华岛士兵丧命的有七千多人，商人平民男女被杀戮得更惨。而储存在河东堡、笔架山、龙官寺、右屯的粮食全部被烧光，损失不小。

觉华岛军民基本上被全歼，明朝损失惨重。

觉华岛是有特殊意义的。

当初孙承宗提出修宁远城,许多有头脑的官员就提出质疑,如张应吾就质问道:宁远孤城,一旦被攻击,何以接应?而邢慎言也苦口婆心劝告说“就算应该守,也要分出轻重缓急”。

兵部尚书王在晋正是基于这些相对理性的意见,竭力反对在关外宁远等地修筑孤城。

而当时孙承宗就是用觉华岛作为挡箭牌,他的意思是用百万多的金钱,来修筑宁远,附近就有觉华岛,正好可以和宁远形成犄角之势,互相配合。一旦后金来打宁远的话,觉华岛上的军队,就可以绕到金兵的后方去进行攻击。

但事实表明孙承宗这种设想完全就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觉华岛根本没有起到他说的这种犄角牵制作用,反而先被彻底击溃。

天启六年初期的这场宁远战役,杀敌数百,自损数万,这按照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一场惨败。

明方之所以宣传为大捷是因为此前如袁应泰时期、王化贞时期,往往后金一来,就有内奸叛乱献城,而这次不管怎么说,是齐心协力守城守了两天,后金也撤退了,城池没有丢。为了鼓舞士气,所以宣称大捷。(而之所以没有内奸,其实也和孙承宗从天启二年开始对军队的整顿有关,不能把功劳算在袁崇焕的头上。)

作为战时之宣传可以如此,但事后之反思总结,尤其作为历史记录,天启六年这场宁远攻守战是不够资格称为大捷的。

回顾战役经过,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觉华岛被击溃之后,后金也没有选择继续围困宁远孤城,而是打道回府了。是努尔哈赤太蠢了么,想不到围城打援这种伎俩?

这显然是把努尔哈赤看成弱智了!又据说努尔哈赤在进攻宁远时被炮击重伤了,这当然更是一厢情愿。努尔哈赤就算有伤,也只能是轻伤。

事实上攻宁远之后的几个月,努尔哈赤还亲自领兵去打過蒙古人。他死是因为老病生疮,和炮击毫无关系。何况就算真受伤,也完

全可以让他儿子率兵围困宁远，困死宁远守军解恨，他自己回去就可以了。显然这些理由是说不通的。

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毛文龙在天启六年正月二十日发出的塘报，就可以解开谜团。

在这份塘报的开头，毛文龙列举了来自三个人的情报，第一个是内丁守备陈国忠，第二个是毛永福，第三个是亲差哨探兵丁金国赏。这三个人的情报都表明努尔哈赤最近要率大军侵犯河西（也就是右屯宁远一带）。

然后毛文龙马上的就开始行动了，他在天启六年的正月十四日（也就是努尔哈赤从沈阳起兵出发的同一天，金兵正式攻打宁远的十天之前），派遣了三路人马。一路是由林茂春、王辅二人率领，火速前赴夜袭海州；一路是由杜贵、曲承恩^①率领，前往威宁营，相机暗袭沈阳；一路是由易承惠、毛有麟率领，到宽奠、绥阳等地方，远近接应（从后文来看，这第三路人马实际上和前往威宁营的一路是合并在一起了）。

毛文龙下令各营都要多带枪炮，暗地潜伏。如果看见金兵向东进发，就先等队伍都过去了，然后在各山顶上，晚上放火，白天放炮，用疑兵袭扰其后方。如果金兵西攻宁远动用的兵力雄厚，那就一定要让大队人马都过去完毕后，官兵才能攻城，只要能让努尔哈赤心神不定，达到牵制他回来的目的就行了。

从这份塘报可以看出，在努尔哈赤真正出兵攻打宁远之前，毛文龙已经提前根据情报得知后金的行动，在正月十四日，分派各路人马去袭击海州，袭击沈阳，并在各处“夜则举火，昼则放炮”，以疑兵牵制后金。

再看接下来的天启六年二月初六日塘报，明军一路人马在一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还要在这两天之后才抵达宁远）半夜赶到威宁

^① 原文中人名根据前后文似有误，应该是易承惠、曲承恩。

营，金人都在熟睡之中，只有西边的七八间草房里有灯火，于是把各屯围住喊杀。到天亮的时候，金人吓得纷纷逃散，明军活捉了六个女真人，斩获六颗女真兵的头颅，还有其他一些战利品，解救了三十八名汉人。随后官兵在前进过程中，又打听到情报，得知沈阳城中防守很严，于是在沈阳附近的山上纵火、放炮，然后回兵。

李茂春、王辅这一路人马则在一月二十二的夜晚，赶到距离海州城八九里的地方驻扎。恰好碰上前面派遣的侦察兵郭加等人回报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在十八日的中午过了三岔河，一直往西去了，他们跑到海州城里，通知辽民，约定等大军到来的时候接应。

王辅等人接到这个消息后，就派一千五百士兵，乘半夜赶到海州城下放炮攻城。城内金兵被枪炮打死不少，又看见城外山顶上炮火连天，兵民喊声动地，吓得龟缩成一团。

等天亮了，明军收兵，城内金兵恐惧，也不敢来追。这一次袭击海州，除了活捉和斩杀了一些女真兵之外，还解救出来五千多辽人带回东江。

把努尔哈赤仅仅攻打宁远两天，并且攻破觉华岛获取大量物资之后，却不围困宁远，反而回兵的奇怪举动，同毛文龙的塘报两下对照，我们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基本就一目了然了。

努尔哈赤当时所以不能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恰恰是因为毛文龙的存在，毛文龙起的作用就是围魏救赵。

对这一点，鹤放道人的眉批也说得很清楚：“毛帅得知奴兵向西进犯宁远，就分兵进捣沈阳、海州等地方进行牵掣，所以努尔哈赤在袭击觉华岛得到大批粮食储备之后，按理可以长久驻扎，却急忙回来，不敢对宁远长久围攻。”

如果没有毛文龙，早在天启六年就要上演后来崇祯年间大凌河与锦州围城打援的惨剧，不仅袁崇焕自己早死掉了（如果他不投降的话），明朝方面如果援救的话，损失会更惨。

而袁崇焕等人浑浑噩噩，稀里糊涂，把仅仅守了两天宁远当成是他自己的盖世奇功！连觉华岛的惨重损失都可以轻描淡写。而有些

极为昏聩的评论者，还在那里说“敢言战守，自崇焕始”。

2. “使非毛帅捣虚……”

而事实上毛文龙这一年的牵制行动远不止于此！

天启六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军亲征蒙古喀尔喀部，但值得注意的是综合毛文龙方面和明朝其他方面的情报，后金最初的行动远不止攻打喀尔喀，而是有更大的图谋、野心。

二月初六日的东江塘报说，从后金逃回来的徐有功报告毛文龙，他在沈阳听说努尔哈赤从宁远回来后，又在积极准备下一次对明朝的进犯。毛文龙为此提醒关宁方面要多加注意小心。

随后在天启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奏疏中，毛又一次提醒朝廷，后金在四五月份可能打算绕开宁远进攻关门，毛文龙表示拼死也要阻挠努尔哈赤这一行动。这一次的奏疏里他还对武之望、袁崇焕等人对东江的猜忌、限制表达了不满，说自己“但知一身报国，将死之日，无畏人议也”。

这估计也是毛文龙面对袁崇焕等人以及朝中文官之类想当然的污蔑诋毁的愤激之辞，意思就是你们在那里看人挑担不吃力，说我假冒战功，那我就不顾一切，如果战死了，你们总可以闭上嘴巴了。

而明朝其他官员到四月才察觉后金进攻的动向。四月二十日薊辽总督阎鸣泰上疏说：连日来屡次接到关于努尔哈赤要再次进犯的报告，有的是来自蒙古人的侦探，有的来自从金占区逃亡出来的辽人的目击。事情好像是真的，这次倾巢而出，必定来势汹汹，诡计多端。也许会假装进攻宁远，而实则进犯关门；也许是表面上进攻关外，实则偷袭关内。这都是有可能的，防范一定要周密。

在四月二十三日阎鸣泰再次上疏说得到情报，后金有可能绕开宁远，而从薊镇入关。蒙古抄化部落里有一个喇嘛在寄给他的消息中说，努尔哈赤野心很大，关内城池的防守必须坚固再坚固，千万不能松弛懈怠。因此阎鸣泰担心“一转而薊门为前茅，亦不可知，此职之大惧也”。也就是薊镇反而可能首当其冲，这是他最害怕的事情。

在阎鸣泰连疏告急之时，袁崇焕到四月二十七日才上疏声称确

实观察到后金要倾巢出动的迹象：“奴贼狡猾想要再次进犯，从后金逃出来的人已经屡有报告。我兵到三岔河一带侦查，看见沿边都是烟雾，而且听说金人妇女都在磨箭头和盔甲，房屋都拆了来造船只。一开始报告是初八过河，接着又报告是十三日，又报十五日。想来其积蓄愤怒，恨不能一刻飞驰过来。我方应该防备也正在这个时候。”

各方面的消息渠道都证实了努尔哈赤要率领后金军队在四五月份倾巢出动，只不过毛文龙比其他人提前两个月（二月初六）就获得了消息。

努尔哈赤的意思大概是，你毛文龙不是不断威胁我的老巢吗？让我往西打都打不痛快。那我干脆连老巢都不要了，倾巢出动，连女人都磨箭，房屋都要拆了。以打蒙古部落作为掩护，窥伺机会绕道攻进关内，直接打下北京城。

对这个意图动向，毛文龙应该是最早探知的，阎鸣泰在四月份也从蒙古秒化部落的明方情报人员那里窥见端倪，唯独袁崇焕浑浑噩噩，还在以为“故石门路、喜峰口一带，或可无恐”。

但此次努尔哈赤打击蒙古喀尔喀部，并绕道进关的如意算盘，被打得粉碎。

天启六年五月十九日（毛文龙出兵深入后金腹地血战之后）毛文龙给朝廷的报告里把前后经过说得非常详尽。

毛文龙根据王辅、毛有惠拿获的伪游击李世虎，哨探内丁金尚智接回的钟国祿等多方面的情报，得知在四月间努尔哈赤要越过义州、宁远直接奔袭长城关口，已经把战车弓箭粮食分散，全都准备好，就等着在关上诈降的奸细回来报信，定于四月二十日过河。

于是毛部署各路人马，督率水陆官兵，分为四路进攻后金各处，总之要联络声援，张疑设伏，打乱努尔哈赤的出兵计划。让金兵来不及深入进犯，或者进犯不久，就牵掣其回顾老巢。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算没有斩获，损兵折将，也都按功劳来算。

此次出兵，毛文龙以寡击众，以弱打强，许多地方都是硬拼的，而且是出动东江精锐，不完全是类似以前的游击战术。

有几路灵活机动的是打了胜仗，但王辅这一路六千多人，攻破鞍山的时候遇伏，包括王辅在内的众多将领以及士兵往来冲杀，血战到底，“二千四百余员名，俱皆阵亡”，剩下三千多人突围回营。如此血战无非就是实现毛文龙事先说的“务在用命勤王，扑剿狂逞，不敢西寇榆关，纵无斩获损兵，俱以功论”。

而在其他各路，由于辽民提供的情报，全部灵活改变战术，依旧斩获不少。

比如毛永嘉、毛有忠这一路带领六千余人，进攻辽阳。在四月二十二日的晚上，行军到甜水站，遇到派出去的侦察兵金惟明等回来报告说：据金占区辽人范承功等人的消息，辽阳各屯的老百姓都被收到城内，奴酋知道东江的军队一定要来攻杀，所以预先在虎皮驿埋伏了五千人，在头观站各屯埋伏了两千士兵，情报非常确切。我军如果直接去攻城，就肯定要吃亏。

毛永嘉、毛有忠等人一商量，甜水站到辽阳城还有九十里的路程，而头观站距离这儿只有五十里，既然有伏兵，不如将计就计，就趁机把这些伏兵给端掉，那样的话辽阳也不攻自乱。

于是率军连夜急行，在晚上十一点之前，赶到了头观站。把敌方情况摸清楚，就把各屯围住，然后放火烧房，喊声震天，枪炮攻杀许久，金兵尸横遍地，活着的也溃散逃跑。

其他各路进兵，和后金激烈战斗的过程，此处不再一一叙述了，

这次毛文龙出兵血战，尽管有得有失，不过理性的说，也是过于情绪化了，愤激太过。本来按照以往灵活扰敌的战术，完全可以用更小的代价，实现同样的结果。但不这样硬拼一场，袁崇焕之类人，始终不会明白东江将士起到的重大作用。

这次血战之后，袁崇焕总算半遮半掩地承认东江的牵制之功，在天启六年八月的奏疏中说：后金本打算倾巢出动，孤注一掷，一进不退。谁知道毛文龙直接袭击辽阳，不得不回兵应付。如果不是毛帅直捣敌方空虚之处，那锦州、宁远就又要受到攻击了。毛帅虽然负伤，而且损兵折将，但数年以来牵掣的功劳，这一次最为巨大。

后来王在晋引用袁崇焕的奏疏原文，辛辣评论道，毛文龙牵制的功劳，是袁崇焕自己都承认，并且热烈赞颂称许的。那毛文龙又怎么能随便杀掉？杀了毛文龙，后金直犯京城，这是明知故犯！袁崇焕获罪受刑，真是咎由自取。

不过袁崇焕其实仍旧是浑浑噩噩的，当时从毛文龙和阎鸣泰探听的情报来看，努尔哈赤本来就已经打算弃宁远不攻，直接绕过去进攻关门，而他似乎认为努尔哈赤还是仅仅来攻打宁锦。

至于他所谓的“数年牵掣之功，此为最烈”，全似说梦，毛文龙的牵制之功，几乎从天启二年开始就没有断绝，以前几次的牵制功劳，没有丝毫下于天启六年的这一次，而袁崇焕等人始终如在梦中，浑然不觉！还以为从天启二年一直到天启五年这整整四年的时间，后金不来攻打是怕了他们！

3. 宁锦大捷，惨败的腰斩

袁崇焕是一个一根筋的人，某个念头一旦占据了她的头脑，脑子里就只有这唯一的念头。他不会再去考虑后果是什么，面临的最坏情况是什么，应该如何提前预备处理，这些问题对他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按照脑子里的念头去做就是了，大不了一死了之，以命相赔就是了。后来杀毛文龙是这样，天启七年（1627年）宁锦攻防战也是这样。

先把这次宁锦战役的大概经过叙述一下。

五月初六日，皇太极率兵起行，初十日到达广宁，十一日进攻大小凌河，明军弃城而逃。金兵追杀至锦州城下，四面合围。当时守城的是太监纪用和总兵赵率教。后金攻锦州不下，又于二十八日分兵进攻宁远，杀伤城外明军数量颇多。在这之后，继续围攻锦州不克，在六月五日撤回。

这次围攻锦州，从五月十一日算起到六月五日撤回，时间上比天启六年打宁远要长了些，但还是一个月都不到，后金依然没有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而是直接攻城，短时间内攻不下来就解围撤走。

也幸亏后金撤了，否则崇祯十四年锦州被围，明军增援，主力在松山被围歼，锦州最后也投降的惨剧在天启七年将提前上演了。这是否是我危言耸听呢？

《明熹宗实录》里有一段袁崇焕自己的说法，大意是：

“金兵把锦州围困得如同铁桶一般，关外的精锐部队全都在宁锦前线，现在被金贼拦断切割成两处。金人以累胜之势来进攻，而我军积弱，十年以来站不住脚跟，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守。如果要求出城作战，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宁远等是山海关的藩篱屏障，如果宁远不稳固的话，山海关必定震动，这关系到天下的安危，所以不敢用四城的守军去远救锦州，只能派遣一些奇兵威胁一下金兵了。”

注意，这里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而这和袁崇焕当初鼓吹在关外用持续修城守城的方式来不断向前推进从而收复失地的时候说的话，已经是完全相反的了！

在孙承宗等人一开始推行关外修城战略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质问过他们：如果后金派遣大军围困孤城，那时候该怎么办？孙承宗当时说可以指望宁远和觉华岛互为犄角，结果事实证明觉华岛靠不住。宁远之所以保住了，仅仅是因为后金攻了两天就撤了。

但是袁崇焕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因为所谓的宁远大捷，得意忘形，变本加厉，认为宁远守住就证明以前推行的战略是成功的。

《明史》中有他一句铿锵有力的宣言：“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

但老问题依旧存在啊，如果后金派大军围困这些孤城，那明朝该怎么应对？袁崇焕在天启六年四月丁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步步向前推进：

“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步步活掉，处处坚牢。守关与复地不得分作两截功夫。”

这个时候，真是说得天花乱坠，动听无比，“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似乎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到了后金真的围攻锦州，

需要宁远救援，袁崇焕的态度却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变成了“责之赴战，力所未能”。

他只肯用所谓的奇兵去救援锦州了，而这奇兵是什么呢？

先是派了两百人的敢死队去冲击后金的阵营，当然这两百人是送给后金当点心吃了，这一点袁崇焕自然也心知肚明，自供说“今已深入、未卜存亡”。还有其他一些不着边际的空头支票，什么“舟师东出而抄其后”，什么联络蒙古人来帮忙之类。

比较切实一点的是，要派四千人去东援锦州。这四千人中，两千人由满桂从山海关带来的一万人里挑选两千，另外两千则从关外挑选出来。

于是这四千人，就被袁崇焕当成所谓的奇兵去东援锦州了。

明军在袁崇焕修城战略的灌输下，本就怯于野战，现在用众寡悬殊的兵力去救援锦州，而美其名曰奇兵，只能说是存心把这四千人送给后金当见面礼。

后金早就等着打援了，《满文老档》记载的皇太极给锦州守城将领的信中说：“我知道你们等着援兵到来，所以不肯投降。我们难道是傻瓜，白白守在这里吗？正要等着你们的援兵来呢。”

袁崇焕派去的四千人中的两千，在《满文老档》中就有被击溃的记录：“当天晚上，命令额附苏纳挑选八旗蒙古骑兵，率领被选中的人，星夜奔驰去截守塔山西路。当天晚上过去，在二十二日遇到明兵两千，额附苏纳下令进攻，击败敌人，继而追杀，获得马匹一百五十多匹。”

这场战斗经过可以和《两朝从信录》中满桂的塘报对照。满桂率领的明军是第二次东援，第一次是五月十六号，被金兵打退。这第二次，满桂率领两千人，乘夜摸上筑篱山，试图打破后金对锦州的信息封锁，结果仍旧是无功而返。

派四千人去援救锦州，连袁崇焕自己都知道不过是应付朝廷，让人送死而已。而锦州如果没有外援，后金只要长期围困，则必破无疑，这一点，袁崇焕当然也非常清楚。

他在奏疏中说如果打不破后金对锦州的封锁，那锦州必定完蛋。后金再用围困锦州的手段来围困宁远，就算守城的准备再充分，等粮食吃光、援助断绝，该城同样会完蛋。

此时，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朝廷调集所有可能调用的力量来救援关外，“则预为宁远、山海援者，非蓟门三协与宣、大两镇乎”？

而在五月丙戌的一份奏疏里，表说得更明确了，他就指望两个：一是运气，一是关内援兵。

“如果后金撤退的话，那就是皇上您运气好，否则锦州败亡，宁远也必定被围攻，这是火烧眉毛、迫在眼前的祸患。必须赶快调集蓟镇、宣府的军队到山海关准备救援，现在除了调兵遣将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了。”

而我们知道，当时明朝最精锐的力量，最多的物资都已经放在关外修城守城上了。类似蓟镇、宣府这些地方，虽然有军队，但都是常年拖欠军饷，士兵早就疲劣不堪。如果靠调用这些地方军队救援宁远、锦州，那明朝估计当时就离亡国不远了。

本来主动窥伺时机，寻找后金薄弱环节发动攻击，胜负或者还有一拼。而如果是老老实实修城，等着后金来围城，来打援，在极度被动形势下手忙脚乱地调集军队去和后金野战，那无异于自杀。后来崇祯年间大凌河战役、锦州松山战役明军惨败无不验证了这一点。

袁崇焕这所谓的“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几近垂死哀叹。到了五月辛卯，他更是六神无主，乱了阵脚，如同输红了眼的赌徒，在奏疏里干脆就赤裸裸地提出了自杀式的办法。

他说锦州完蛋的话，宁远也肯定完蛋，与其到时候罄尽天下的力量和后金在山海关前一决生死，还不如现在就在宁锦来一个彻底的了断。所以要求朝廷调集各路人马，骑兵步兵一起进发，和后金决一死战云云，宣称“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

袁崇焕的意思就是为了这一个锦州，要把明朝全部的军队家当都押上，拼死一搏，试图来个鱼死网破。

而实际上他此时能调集的军队也不过就是五六万而已，以五六

万的军队去和后金十万左右的军队野战,再加上他们一直灌输给官兵的怯战心理(和后金打只能守城),这种仗不打就知道结果了。

当他们鼓吹在关外修城的时候,说得真是天花乱坠。明军和后金打野战是万万不行的,增加军队数量也是不顶用的,消极退守也是不行的,所以只能不断修城往前推进,靠修城守城就能避免打野战,就能制胜。

而此时按照袁崇焕这种拼死一搏的部署,就是要让明军在最不利的被动局势下野战。

为修城而妄想避免野战,结果把明军逼入在最不利的形势下打野战的困境中。袁崇焕推行战略之自相矛盾,顾前不顾后,毫无头脑,已经尽显无疑。而这种局势不过是当初熊廷弼早就预料到的结果。

围城打援正是后金求之不得的事情,这一点当时一些明方官员也已经看得很清楚。在天启七年五月壬午的时候,太常寺少卿仍管兵科都给事中许可徵就上疏说:“后金进犯锦州,就料定我军必定要救援锦州,其意图就是引诱我军野战,以发挥其军队的长处,这是奴隶狡诈的地方。火器虽然是我方的优势,但必须要战车和骑兵互相依靠,变化莫测,才有胜算,不知道关外对车战是否操演熟练?让毛文龙联合朝鲜,出没海上,往来侦探,牵制后金,或许才是挫败后金图谋的办法。”

天启皇帝此时对形势也看得相当清楚,他在一份奏疏的批示中说:“锦州围困,不得不救,然奴亦度我之必救,为敌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堕其计。”

皇帝都明白的事情,袁崇焕就是不明白。他这种毫无头脑的赌徒似的部署,让他的顶头上司蓟辽总督阎鸣泰只能苦笑不已,悲叹连连:

“袁崇焕自打一开始就对援助锦州攻破后金围困,毫无信心。现在又突然说要拼死一搏,意思无非就是他自己赔上一条命就完事大吉了。朝廷的精兵强将全在关外,你拼完了一死了之,朝廷从哪里再

寻另外一批军队？袁崇焕只需要担当辽镇的责任，而我不仅要管辽镇，还要挑着蓟镇的重担，如果我阎鸣泰要为自己考虑，那可以比你袁崇焕先上战场死掉算了。”

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被吹嘘的神乎其神的天启七年这场所谓宁锦大捷的真相是极为不堪的。后金不过才围困了锦州二十几天，袁崇焕已经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一会儿说宁远是绝对不能派主力去为锦州解围的，一会儿又说要倾巢出动，和后金决一死战。

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清醒理智，冷静谋划，有的只是一阵接一阵毫无头脑的狂热冲动。先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修城守城上，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能修城，能守城就胜券在握了。而一到了城池被围困，就马上陷入极度狂躁恐惧之中，又要明军所有的力量都孤注一掷来搏命野战了。

也幸亏后金及时撤走了，如果再稍微拖一点时间，估计这个袁崇焕只能跳城自杀了。

如果天启六年的时候，袁崇焕好歹还守了宁远两天的时间，那天启七年的宁锦战役，在袁崇焕那里基本看不到任何可以一提的亮点。要说守城，那后金这次主要围攻的是锦州，而守卫锦州的是赵率教和纪用，太监纪用的表现都比袁崇焕要镇定得多。要说派兵救援，袁崇焕派去东援锦州，由满桂负责统帅的那几千军队，两次出去，都被后金拦截，灰头土脸地被打了回来。

而说到坐镇指挥，袁崇焕的表现更是惨不忍睹，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极端慌乱。看看他奏疏前后的言论，你会纳闷这样一个毫无定算，主意前后矛盾的人，他是哪来的自信去当边臣领兵打仗的？难道凭的就是那种顾前不顾后的狂热与冲动？可离奇的是，就是这样糟糕的表现，仅仅是因为后金主动撤走了，又被吹嘘成是袁崇焕的丰功伟绩。

实际上，宁锦战役，要真算功劳的话，参与守卫锦州城的太监纪用都比袁崇焕大得多。《明熹宗实录》中巡按直隶御史梁梦环报告称

其冒着暑热，兼程赶赴关门，得知锦州城外，内臣纪用和将领两面夹攻，矢石交下，金兵的尸体遍野。

后来的史书藏头遮尾，对史料精心裁剪一下，就变成了又是袁崇焕的奇功了！

4. 后金撤走是天气太热？

天启七年五月，后金攻打锦州之前，刚刚为剿杀毛文龙而去进攻朝鲜回来。也就是在后金看来，要想打西线，就必须先扫荡东边毛文龙的力量。从结果来看，皇太极仅仅是部分实现了目的，一方面确实迫使朝鲜有条件屈服，也消耗了毛文龙不少的力量；但另一方面毛文龙的有生力量被保留下来，对后金的威胁依旧存在。

这才是导致后金十万大军攻打锦州，却依旧试图短时间内正面攻下城池，而不实行长期围困战略的根本原因。

天启七年五月初六日，也就是皇太极率兵起行去打锦州的同一天，毛文龙在塘报里，就提醒关宁方面后金一面向东进犯，留有部分军队在朝鲜防止他去袭击其后方；另一面将要往西攻关。

在整个五月、六月，毛文龙对后金的袭击牵掣是没有停止过的，毛文龙在天启七年七月初十日的奏疏中说：“自从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没有一天不在对敌厮杀，弓矢盔甲器械，全都损坏，火药也都用完，而且士兵衣不蔽体，赤身跣足，这是四个来东江视察的太监亲自看到的。”

而《李朝实录》中的一段记载，把毛文龙牵掣后金的行动说得更具体，天启七年六月，毛文龙派毛大已见朝鲜官员时，毛大已说毛都督从薪岛前往海州卫，为袭击牵制后金回撤做打算，刘海（即刘兴祚）全家老小都在海州卫中，到了那里肯定会有接应。

对于后金一个月不到就撤回的原因，《明史》中的说法是天气太热了，再加上伤亡大。这个说法应该是抄自《满文老档》叙述的初四日，攻打锦州城南边，本来想凌晨五点进兵，早上七点攻城。因为城壕深阔，正值酷暑，打的话很难在短时间内攻下来。这一场仗，士卒阵亡的很多，所以在初五日，大军从锦州撤回。

有些人看到《满文老档》里提到“是役也，士卒阵亡甚众”，大概又会洋洋得意，认为是袁崇焕功绩的证明。

但其实这和袁崇焕没有太大关系，袁崇焕当时驻扎在宁远，后金的损失主要是攻打锦州城造成的。而在分兵攻打宁远这块的记录是“击败，尽斩之”，“疾驰进击，击败之，追杀至宁远城壕，击毙于壕内，弃甲胄刀枪而逃遁坠壕、被创坠壕、及无伤坠壕者无算，尽歼之”。

所谓天体太热，无法坚持下去不过是后金为掩盖自己在东线战场上被毛文龙袭扰失利之下，为防止老巢丢失，不得不回撤的遮羞之辞。

前面也说过了，在后金看来，如果攻城不下，损失一些力量，这是不算丢脸的。但如果是在野战中，被毛文龙声东击西，吃了亏，那他们就觉得丢人了，一定要设法掩盖。

如果《满文老档》天气太热之说成立，那后来在崇祯时期，清军围困锦州，从崇祯十四年四月一直围困到崇祯十五年三月，整整一年的时间，难道夏天的时候天气就不热了？

说攻城时损失太大，所以就撤走了，这也是讲不通的。因为后金完全可以采取围困策略，围而不攻，只要切断城内的物资供给，活活困死城内军民，那又怕什么士卒多损伤？

可见根本原因还是毛文龙牵掣的结果，清统治者出于掩盖毛文龙作用的目的，就把撤兵推到天气热这种可笑理由的头上去了。

四、板砖用好，满盘皆活

说到这里，有人会说了，看来确实如你所说，在有毛文龙的时候，关外城池可修可守，而没有毛文龙的时候，就不可修也不可守了。

照这样说来，当初熊廷弼和孙承宗等人的分歧正确的还是孙承宗一方啊，毕竟那个时候毛文龙的力量就已经存在了。

回答是不然！我们说的有毛文龙，首先是要承认毛文龙的巨大

作用,否则有和没有也不存在区别了。

而熊廷弼也好,孙承宗也好,都是轻视毛文龙,他们的一切策略部署都是以毛文龙没有太大作用的前提进行的。而事实上,就天启二年初的情况来说,毛文龙甚至连以皮岛为中心的根据地都没有建立起来,能否自保都成问题。在那个时候,无论是谁都不会把赌注全部押在毛文龙身上。熊廷弼毕竟不是神仙,他和毛文龙没有太多接触,谈不上多少深入了解,不可能预测到毛文龙的能力和作用。

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熊廷弼放弃关外,把防线回缩到以山海关为中心的长城沿线是完全正确的,而孙承宗的方针看似进取,实际上是让明军陷入彻底被动之中。

在明朝有限的财政力量之下,防线回缩好处是很明显的。

一是缩短后勤补给线,大大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二是把精兵强将集中在长城沿线,使本来废弛的关防,尤其是蓟州一带,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整顿,使那些散兵惰将能对得起发给他们的军饷。两处合并精简,又能大幅度减少军饷开支。

三是精锐部队集中于以山海关为中心的长城沿线,对外可以抵御入侵,对内可以镇压可能的变乱,距离北京的距离也大为缩短,这是可进可退,攻守兼备的举措。

四是关外的大凌河、锦州、宁远这些孤城,会被敌方包围,切断后勤补给,而如果驻守长城就不存在被包围的问题。如果有信心守住宁远,那守住长城就更不成问题,如果连守长城的信心都没有,那还守什么关外?

而且更重要的是,退守长城不仅仅是消极防守,如果和毛文龙的东江力量配合,那完全是能在短时间内致后金于死命的杀着。

实际上在明代就已经有人把这其中的道理分析得很清楚了。比如给《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做眉批的东海鹤放道人就说:关外河西一线七百里,土地不足以屯种,地势没有足以扼守的险要,出屯关外,是自陷于被动,自己拖垮自己的策略。当然了,没有险要隐蔽的地方可以出奇兵攻袭,还可以认为虽不能出战但可以守御。但归根结底,怎

么会有山海关不能守,反而去守河西的道理?而先后镇守关门的人,这一个说守关一定要在关外,那一个也说守关一定要在关外,这都是只关心“守”而已,何尝有消灭后金的打算?实际上在以前就有人指出我方就算不守河西,河西也不会丢失。屈指十年以来,后金虽然打下广宁,打下大凌河,都只是毁弃城池,却始终不肯驻守河西的尺寸土地,这话已经应验了。而我方这样死守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能退守山海关,扼住险要,而早早在登津、皮岛之间训练军队,储备粮食,为一举扫平后金巢穴做准备。每年光省下的金钱粮食就不下七八百万,而以此苏缓百姓的疲劳,充实九边的军粮,还担心有什么不够的?兵法说“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取”正是这个道理。

鹤放道人的意思很清楚,战争最终胜负,有时候并不取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谁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谁能消耗敌方的有生力量!

如果明军坚持守关外孤城,那战争的主动权就在后金手中,可以围城可以打援,而明朝方面不得不被牵着鼻子走,所以是“自屈自疲之策”。

而如果明军退守长城,表面上是退缩,而实际上陷于被动的是后金。后金连锦州、宁远这样的孤城短时间内都打不下来,要攻破严阵以待,精锐云集而且有大后方源源不断提供人力物力支援的山海关到蓟镇一带的长城防线就更是痴心妄想。打不下来,无法入关抢劫,要长年维持十万人的有战斗力的军队,那即便是全民皆兵的后金都是难以支撑多少时间的。

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战略,确实是高瞻远瞩,极其厉害的招数。

而毛文龙建立的东江根据地,相当于在敌人的后脑勺放了一块随时可以敲上去的板砖,为这一战略的实施争得了更大的便利条件。

如果明政府财政资源充足,关外宁远、锦州明军和东江同时能得到充足的军饷,则前有攻势凌厉的拳头,后有板砖伺候,金人必败。

而在明政府财政不足的条件下,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在关外修城,把军饷的大头给关外宁远等地,而东江无法获得足够物资,那就是天启年间明军现实的情况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相持局面。后金担心毛文龙捣巢,无法长久出击围困宁远、锦州,而毛文龙军队也无法有足够的实力,大举出击,攻破后金。

但相持下去,后金无法通过抢劫获得补给,还是挺不下去的。只要时间一长,必定走投无路趋于崩溃,实际上在天启七年、崇祯元年(1628年)、二年(1629年),后金已经是到了这个崩溃的边缘,只要这种相持局面再拖个三年,后金同样完蛋。

另一种选择是仍旧按照熊廷弼原先的部署,重兵屯于山海关,整顿长城防线,这样在关外修城驻军的钱省下来了,而更多的军费可以提供给毛文龙的东江部队,此举足够建立起一支十万人左右的精兵。

这时候毛文龙的东江部队其实起到了比原先熊廷弼三方部署的登莱渡海部队更强、更有力的作用,无论是对辽民的策动起义,策反敌方汉人将领,还是军队直接袭击,地形利用,都是更为得力。

在此情况下,后金主动出击,长途奔袭来攻关,无论是攻山海关,还是绕道攻蓟州,明军都是以逸待劳,就近支援,后金同时还要抵御来自后方毛文龙的袭击,显然就是自找死路。

而明军主动出击,以东江军队为主力,以山海关出击之明军为辅,后金还是死路一条。

可见有毛文龙东江部队这一块板砖在,明军满盘皆活,无论采用什么策略,都是占据主动位置。

第四章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茅元仪有一段话是歌颂孙承宗的，说是金人的动静，孙承宗没有一天是不知道的，所以努尔哈赤非常害怕，四年都不敢来进犯。而等孙承宗离职没多久，金人就来进攻了。又没多久我方派遣吊丧使者去，实际上是不知道努尔哈赤的死活，所以用这个办法来试探。在利用间谍刺探情报这方面显然不如孙承宗在的时候。

这段话所谓“奴之动静，无日不闻”，当然是对孙承宗的过度吹嘘，真正能做到无日不闻的是毛文龙，而不是孙承宗。这只要从《满文老档》里只有记载捉毛文龙奸细，而从来没有说捉孙承宗奸细，就可见了。

但孙承宗确实向后金方面派遣过一二刺探情报的人员，则是可以肯定的，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的《明熹宗实录》第2294页，也即梁弘志影印本《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九中摘录有《两朝从信录》内的一封孙承宗的奏疏。

这份奏疏对毛文龙进行了热烈颂扬，说他是“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间”，联络朝鲜，收容逃亡难民，屡次挫败努尔哈赤，袭扰金国后方，牵制其力量。种种英勇行为和慷慨志向“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

然后孙承宗说自己有一个细作探子在后金，这个人回来后，详细叙述了毛文龙有间谍在后金被抓住了，还有广宁人铁信最近也逃来说这个事情，所以孙承宗得出的结论是“文龙之胆智，无日不在贼巢之外”。

可见毛文龙倒确实是“奴之动静，无日不闻”，这是孙承宗自己都承认的。当然后金《满文老档》的记录更证实了这一点

而茅元仪说的“又未几而我发吊使，实以不知奴生死，遂出此以探之”指的正是袁崇焕！

在《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戊戌，袁崇焕的奏疏中说努尔哈赤屡次诈死来使明方麻痹懈怠（也不知他说的屡次是哪次？），这次或许仍旧是假的，也不可知。

到了天启六年十二月辛亥，熹宗实录中又有一段记录，大意是一开始辽东巡抚袁崇焕认为努尔哈赤死的这个消息，还不确定。于是奏报派遣喇嘛李锁南，用烧纸吊丧的名义去侦探。到这个时候喇嘛回来了，于是袁崇焕把其到后金的情况描述了一下，然后又奏报说原先努尔哈赤死的消息不敢确定，幸亏魏忠贤在内主持，在外镇守的太监和各级官员也都有谋略。而且喇嘛和尚足够聪明，能随机应变，所以能去能回。努尔哈赤死的确切消息，以及后金方面的情形，我方都知道了，还有什么求？

袁崇焕愚到要依靠派遣喇嘛去吊问的方式才能刺探对方的情报，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以至和他站在同一条线上的茅元仪都看不过去了，指责他“盖以用间不如前明审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指责还是在袁崇焕春风得意，备受重用之际！

而关于努尔哈赤死的消息，毛文龙其实早在天启六年九月初二日的具奏里就说得很清楚了：“我的家丁和门下人大概有一千多，其中有海州门下人叫耿仲明的，他的胆子最大，心最细。我一向委托他潜伏在沈阳，以通报消息。到了今年八月初二日，他急赶回来报告我，老奴背上生了一个恶疮，带兵三千，现在到威宁堡狗儿岭汤泉去洗疮了。”

毛文龙闻讯后派遣一百五十名士兵前往骚扰，结果努尔哈赤“十

一日，急急要归沈阳，上船行至辽阳西古城堡河边，本日午时命绝。此毛士德沈阳探归确报也”。

耿仲明就是后来和孔有德等人一起投金后被封王者，而当时则在毛文龙派遣下做侦查间谍工作，八月初二日他回来把努尔哈赤背生恶疮的消息通报给毛文龙。而对努尔哈赤八月十一日身亡的确切时间、地点，毛文龙也通过毛士德的情报，在第一时间内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即此一事，也可以看出袁崇焕等人与毛文龙的差距之大。

下面我们再着重从后金绕道喜峰口进入关内这一件事情上看看双方的差距！

一、唠叨的毛文龙^①

1. 意料中的后金绕道

学者李亚平先生曾评价道：“对于战争史研究者来说，（后金）这次军事行动具有极高的军事想象力和超人的创造力，在作战意志、战略战役战术指导、军事行动上均达到了超凡脱俗的高超、卓绝、豪迈之境界。仅仅凭此一战，皇太极就远远高出了他同时代的所有政治、军事人物。”

所以袁崇焕运气差啊，碰上了皇太极这样百年一遇的天才，后金早不施展这具有“极高的想象力”、“超人的创造力”的军事行动，晚不施展这“超凡脱俗的高超、卓绝、豪迈之境界”的军事行动，偏偏就在袁崇焕春风得意，大权在握，督师薊辽仅仅一年多的时候，施展了这个行动，真是太冤了，太倒霉了！

① 有些人认为在天启年间提醒后金绕道入关是完全无必要的，因为相关蒙古部落在那时未和后金勾结，尽管我列举的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大部分集中在崇祯年间，但为了透彻起见，对此问题还是有必要做一辨析，放在附录中供读者参看。

但事实或许会让李亚平先生扫兴。

后金绕道进攻入关的设想,既不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才开始策划的,更不是如李亚平先生那样歌颂的什么超凡脱俗,出人意料。

前面部分我们就看到,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时候,熊廷弼的上书里已经提到了相关可能性,“如奴以数十万金饵虎墩诸部人犯昌、蓟、宣、大,以辍中国不敢出京城一步”。

当然熊廷弼这里说的是后金收买蒙古人进攻,但既然可以让蒙古人进攻,收买之后自己直接率兵绕道进攻的可能性也就必定存在。

在这之后,在天启三年(1623年)初,后金绕道进攻的可能性被更明确地提出并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据茅元仪《督师纪略》的记载:当时三屯营的将领王威就提出后金会借道蒙古人的地盘,从喜峰口直达京师的可能。

茅元仪的意思是王威为了出人头地,苦于没有升迁机会,才故意提出这种哗众取宠,杞人忧天的说法。而让他尤其不满的是一些在北京的高级官员,非常重视王威的意见。所以嘲讽说“长安贵人助威者,颇著其说”。

茅元仪这里完全就是一种尖刻讥笑,甚至有点心理阴暗胡乱揣测别人动机的态度。

那他提到的长安贵人是谁呢?《明熹宗实录》里没有提到王威的塘报,但在天启三年四月的记录里,却提到了一位官员对后金绕道可能性的重视,这位官员是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潘云翼。

他在奏疏里指出根据塘报,后金已经有借道进犯的迹象。而沿边蒙古部落乘机来勒索赏赐,他们暗地里和后金勾结的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无论如何对此应该有所提防准备,守御的工作必须要提前做好。

潘云翼的判断是后金要么装作蒙古部落来窥伺喜峰方向的进军路径;要么就是靠宣称借道绕路来懈怠山海关的防守,所以关门的兵马必须加紧整顿。至于喜峰方向诸多关口,潘云翼说实在让人寒心。光是喜峰一个关口,就可以容纳通过一万骑兵。夏天、秋

天的时候还有河水可以作为守御凭借，到了冬天河水冻结以后，就无所凭借了。而且青山口、(潘)家口、董家谷、铁门关，到处都是要害。而这一带本地的驻扎军队再加上骑兵、步兵应援官军只有六百多人，秋防的时候把本地军队和外地调来的客兵合起来，南北官军也只有六千多人。若不赶快筹划调集增加更多的军队，严加防守，一旦误事，那就是噬脐之祸，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里潘云翼提到的塘报究竟是谁的塘报，没有明说，但参之以茅元仪的《督师纪略》，则当是王威。(当然毛文龙在天启二年八月的时候也曾经写过奏疏提醒后金从喜峰口入关的可能性。《明熹宗实录》第1251页有天启二年八月己巳平辽副总兵毛文龙陈恢复事宜的记载，但实录所载已经不是奏疏原文。在《辽海丹忠录》记载的被实录删节省略的一部分中，就有毛文龙提醒朝廷注意喜峰口方向防守的内容。)

潘云翼这里已经是把后金在崇祯二年实施的战略行动，以及明军防守上的问题，提前分析得很清楚了。

那孙承宗对此是个什么态度呢？他对后金可能“借西虏之境，舍辽攻蓟，自喜峰口竟趋京师”的说法是很不以为然的，认为这不太可能，理由是后金绕这么远的路，准备粮草太困难。

茅元仪把他老师的话给记载了下来，大意是许多人都相信后金绕道喜峰的可能性，孙承宗则质疑说假如金贼真要从喜峰方向入关，就必定要借道西虏(相关蒙古部落)，道路遥远而粮草的耗费巨大，不知是西虏为他们准备呢，还是金人自己准备？金人既然能自备粮草来进犯喜峰方向，为什么不能自备粮草来犯山海关？

总之世界上是没有这个道理的，后金是不会舍近求远的，许多人不过是凭借道听途说，胡乱猜疑而已。

孙承宗这里的这份奏疏和后来天启六年袁崇焕的奏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别人提醒他们要注意后金借道西虏，从喜峰方向入关，而他们则言辞凿凿地表示这不可能，是别人在杞人忧天。

实则后来的阎鸣泰也在天启六年和天启七年(1627年)多次提

出后金绕道薊镇入关的可能,但都被袁崇焕当成庸人自扰了。

2. 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

如果说熊廷弼、王威和潘云翼还仅仅是提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也就是理论上有个可能,但究竟后金是否会把这种可能变成实际行动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毛文龙那里,他就是直接根据从后金获取的情报,指出后金确实已经存在绕道进关的行动方案。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数次绕道攻关的意图,都被毛文龙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前识破。

根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的记载,我统计了一下毛文龙向明朝政府提醒的次数:天启四年(1624年)一次,天启五年(1625年)一次,天启六年一次,天启七年达到三次,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更是高达惊人的六次,到了崇祯二年也就是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掉的那一年,又提醒了两次。

前前后后毛文龙一共向明朝中央政府提醒了十四次之多(如果算上天启二年的那次则是十五次),然后就是毛文龙被杀,紧接着就是后金把多年以来一直试图实施而未能实施的绕道进攻入关的行动计划变成了现实。

第一次提醒

毛文龙的第一次提醒出现在天启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塘报中,大意是根据金占区逃回的辽人徐孤臣的报告,努尔哈赤从去年以来,就和最亲信的李伯龙(现在改名李茂隆)以及李永芳、黄建极等人终日商量,带了很多礼物去送给西边的蒙古部落,要借路进兵。头目接受礼物后表示“你们两家自去厮咬,输赢尽你,我不管你”。

而后努尔哈赤布置了种种准备工作,接着就是如下打算:“今年年底,要从潘家口进攻丰润等县,从冷口进攻台头,建昌无备之处,一鼓攻进边墙,得了中国,管他关上雄兵,江东这敌尽有多少人马都是我的。又喜今西达憨酋是我买到,招养各家西穷达子万余,且得喜峰进攻,夹带奸细消息,肯如前番痴误!不乘此时西去,更待何时?”

毛文龙提醒朝廷“潘家口、冷口诸隘之攻,断不可玩。如或弛防

疎守，賊薄城下，將何以待之”？“严防喜峰進貢之奸，曲撫西夷于關外，毋令窺窺內地。東虜平，而西虜自然靜矣。”

對此東海鶴放道人眉批說：“奴定計在六年以前，而其發難也，在將軍被誅三月以後，豈天將以此祚將軍乎？”

毛文龍的這份塘報，對於後金行動的時間、地點、行動方式都描述得極為清楚。

時間是隆冬，後金己巳之變也恰恰就是選擇在冬季起兵。地點是薊鎮喜峰口方向的潘家口和冷口，和後來後金繞道進關的龍井關在同一个地區。

在一段介紹河北省遷西縣的旅遊文字里有這樣的描述：“遷西北部，87公里長城串聯起龍井關、潘家口、喜峰口、董家口、青山關等20余座雄關險隘。”

也就是潘家口緊挨着龍井關，毛文龍幾乎就是直接準確預言了後金繞道進關的路線。

行動方式，向蒙古人借道，和後金的實際行動相比，絲毫不爽。

有意思的是，對毛文龍的報告，天啟皇帝極為重視，而包括孫承宗在內的廣寧方面的明軍將領官員反倒是渾渾噩噩，不以為然。

在已經殘缺不全的《明熹宗寶訓》卷四中保留了一段天啟皇帝給內閣的訓示，這段記錄相當寶貴，有助於我們了解真實的天啟皇帝。

在這份訓諭中，天啟皇帝說據毛文龍塘報，努爾哈赤和親信漢奸商議，要賄賂收買西虜，借路潘家口等處，假道長驅，為害不小。要內閣傳示兵部，馬上派人去傳信給孫承宗，仔細考慮塘報內容，“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度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途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仔細防御”。另外各關口把守的將士軍官，都要晝夜防守，仔細盤問進貢出入的蒙古人，防止其中夾帶奸細。

天啟皇帝不但鄭重其事地向臣下提出警報，甚至连如何应对，都帮他们想好了。而对此孙承宗等人的反应相当迟钝。《督师纪略》记载孙承宗奏疏里回报称努尔哈赤狡猾，并且一向很谨慎，肯定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可以说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等人始终就是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的。毛文龙在东江拼命袭击后金后方，加以掣肘，而他们全像没事人一样，认为后金不来打他们是怕了他们，后金不去绕道进攻是因为不可能去冒险。从这来看，没有毛文龙的话，后金在天启年间就早打到北京城下了。

为了避免累赘繁琐，下面的十三次提醒，就简单摘录，不再详细展开了。为保存原貌，不再转成白话，读者也可以跳过这部分。

第二次提醒

毛文龙天启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揭：“伏乞诸上台垂查兵多食少之苦，军火器械不备之可忧，共建公论，转达天聪，设策区处，速为接济，官兵幸甚。更谕喜峰等口，严加谨饬，齐保无虞，社稷又幸甚矣！”

第三次提醒

天启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奏疏：“窃海外无粮绝食，因武、袁二抚台贪忌所误。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职今死报朝廷，发愤过江掣后，守关上台火器坚壁，固守无害，必不可摇动。但知一身报国，将死之日，无畏人议也。一介武夫，原倡义杀贼，即见人叩首亦愿。假以礼节争闹，说谎称快，误公家之事，此职之不敢也。”

第四次提醒

毛文龙天启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后金攻打宁远）不克，将绕道从喜峰、潘家口、墙子岭、一片石等路直入。其阴谋定算，真有惊飏迅雷之忽发，即旬下未可保者。”

“其喜峰、潘家口、墙子岭、一片石等处，度其要害，务早埋伏地雷各项火器，凡城堡用先臣郭登守大同法，近城遍设绞地龙，坚壁生怯，切弗轻动。俾奴徐至而蹈我机，以静御动，以弱制强。臣于是时，缀偏师挠之，誓以死报。明知我兵自经徐敷奏（袁崇焕手下之人）之诱，精锐悉逃，至今尚无固志者，而驱之以必死，则臣心为之耳。”

第五次提醒

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启：“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此奴做事，步步踹着我痛处，句句说着我空处，御之不早，必为着

手。职思宁远固奴所必攻，而其捷径尤在喜峰口、一片石、潘家口、墙子岭等处，须亟亟于等处相其要害，张设疑兵，埋伏各项器械，近城堡处，设绞地龙，此制敌之法，断不可少者。”

“职愿恩台俞允下情，凡所陈设，件件依行，职尚可为关门牵后如不听职言，虏一至，如入无人之境，祸岂独朝廷忧哉。”

第六次提醒

天启七年十月十日塘报：“据鹿岛游击毛有忠报称，新汗制造金银马鞍酒器等无数，买通西虏，随要预先混入队伍中，径到喜峰口，假称作马市，伏兵在后，‘杀他措手不及’。又统大虏奔攻宁前一带抢粮，‘死活与他做一场，难道无有一处得胜之理’，等情到职。除一面差遣选锋兵马直入内境，或进或退，相机剿掣外，伏乞上台俯鉴犬虏蠢动，假道西夷，更乞提防山海关，喜峰口一带，多设空营石炮，提防马市暗举之祸，杀其素来蓄逞之心，不致疏虞，疆场之幸。”

第七次提醒

崇祯元年三月十三日塘报：“卑职于崇祯元年三月初六日，亲率南北官兵拒贼镇江，相持十余日，活擒达贼十一名，淹死四名，绑回七名。译审鞑子挑兵西去锦宁，相机攻抢，大略不便，要与新女婿小歹青从喜峰口等关，一待草长，悉兵抄入今先更换马匹西装，互市几次，熟识路径，分兵镇江，挡战是实。本月十一日，有降奴马秀才，同四王子管家牛鹿等六名，持貂皮十四张，求款文书一封到卑职，声说我达子家小重大，往西实忧‘马法’倒后，几番眼见得兵马害我，急忙追赶，又不知藏在那个山湾岭角。今特来求‘马发’，听凭吩咐。卑职将求款达子分营羁候间，火速报闻上台，急令西峰等关一带，日夜严防，万分真的，万分不可弛懈也。”

第八次提醒

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一着输赢，间不容发，兢兢以图，固晨夜以之，而更虑奴之求款于东，而正欲肆骑于西。”

第九次提醒

崇祯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塘报：“据鹿岛副将王承鸾报称：四王子

发兵西去，欲往喜峰、一片石等路犯关是实，卑职随即传南北坐营中军陈继盛、龚正祥等，各调水路官兵间……（省略处为这时候碰上王廷试要来查核兵数），事系紧急，不敢坐视，但营伍不敢尽发，止挑每营精锐一二百名，大营或三五百名，立督上岸，相机剿掣截杀。”

第十次提醒

崇祯元年六月初三日塘报：“又据旧门下刘卫国禀报：五月初一日，酋长会议起精兵三千余骑，前寇宁远等处，掳掠牲畜田禾，直待秋获，自喜峰口入寇，妄图燕地。闻知各岛大兵过江，各处攻剿，奴兵急从大路转回牛庄矣。”

东海鹤放道人眉批：“东江牵制奴酋，已不遗余力矣。”

第十一次提醒

从内容来看应是崇祯元年八九月的塘报：“况日今纠合西虏达酋，四面分逞，督造战车，日夜不休，度其意，盖未肯即遽然帖服已也，冬初复当远举。臣敢矢心报国，以报陛下知遇之恩。然不虞之戒，关、宁、喜峰等处，尤宜吃紧，不可斯须懈弛者。总之，庙议如坐饭涂羹，无当于实用，仍复铸室道旁，以至边将迄无成功，坐此弊端耳。”

第十二次提醒

崇祯元年九月初五日塘报：“又据来乡张大头等禀称：听得西夷两大营，一营名克尔趁，在喜峰口一带讨赏，一营名人哈嘛，在宣府，大同讨赏。今克尔趁等带领部落鞑子五百余名，到奴酋地方做买卖，与慈携刀起誓，情愿齐心共攻南朝。于八月十一日，引领奴贼从沈阳往西，相度那处关口地利好进兵。职一面挑选精兵相机截杀外，一面飞报。”

东海鹤放道人眉批：“侦探煞甚分明。”

第十三次提醒

崇祯二年三月十三日具奏：“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志实灰，只为圣恩未报，不敢不遵明旨，力疾以做未完之局，非敢栖栖恋位也。于三月初二日以来，海冻初开，接得去冬十月邸报，见我皇上宣召廷臣，问对发帑记注。臣涕泣感叹抱惭，边将如林，都不能以实心实着，

纾圣主东顾之忧，致我皇上，远虑边情，日愁帑匱，真有神武圣君，而无报国臣子。因记刘爱塔来时，云奴密谋，必于今冬还图大举。臣遂将层叠流言，一刀割断，奋然自鼓意气，预算图克五岭关，沈阳等处，奴便裹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鬼神知，不敢以一字欺圣明也。”

第十四次提醒

这是毛文龙生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奏疏里最后一次提醒，三个月后他就被袁崇焕杀害了！

平辽总兵己巳四月初二日具奏：“恐沿边一带地方，四王子已差大头目固山前往乌龙江外，从不朝贡敌火儿动处，及受天朝敌义哈喇汗并聪儿侵处，俱已许借人马与他，只等固山回，就要上马西犯。又远哨参将毛永诗（即后来之孔有德——引者注）稟报：敌临边境，外扬兵马，吃挪回渐江已有谋犯情形。各稟前情到镇，俱此谢。职看得敌狂狡，蓄谋叵测，发兵窥我车师，实欲长驱西寇，而山、宁等处，尤宜昼夜严防，蓟、密沿边，须用时刻提备，除一面添兵远哨，相机截杀，为此理合塘报。”

纵观毛文龙十四次苦口婆心，反复不已的提醒，有三点是很突出的。

第一点就是指出后金一旦绕道进攻，必定会采取种种隐蔽掩盖伪装的手段，比如“更换旗帜”、“混入队伍”、“假称作马市”等等，而绝对不是大张旗鼓，等着你调兵去堵截，所以不能因为对方行动隐蔽就浑噩糊涂，不当回事。

第二点就是指出后金如果绕道进攻，时间多半是在冬天，比如崇祯元年的几次提醒里说“直待秋获”，“冬初复当远举”，崇祯二年的提醒说得更清楚（“必于今冬还图大举”）。

第三点就是毛文龙为那些守喜峰口方向边关的官员将领代想了许多兵力不够条件下的办法，比如说“其喜峰、潘家口、墙子岭、一片石等处，度其要害，务早埋伏地雷各项火器，凡城堡用先臣郭登守大同法，近城遍设绞地龙，坚壁示怯，切弗轻动。俾奴徐至而蹈我机，以静御动，以弱制强”，“多设空营石炮”。

也就是一定要尽可能利用地雷杀伤敌人,在兵力不够的情况下,以静御动,以弱制强。毛文龙不但为东江的事情操心,还为别的防区操心,只是这份苦心,在当时又有几人能理解呢?

看了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就可以清楚知道,后金之所以不早不晚,偏偏就在毛文龙死后的三个月绕道蓟镇,攻进关内,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首先他们有这个打算,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在努尔哈赤活着的天启三年就已经萌发了这个想法,天启四年就已经和蒙古人达成了协议,到后来的天启七年、崇祯元年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急火燎地想把这个行动付诸实施,但却始终不敢下这个决心,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毛文龙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动向,甚至在没有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毛文龙掌握得一清二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动,无异于自投罗网。有毛文龙在,那他们的行动,只能是孤注一掷,有去无回了,北京攻不下,老窝回不去,只有死路一条。

而到了毛文龙一死,阻碍他们这个行动的最大绊脚石就被搬走了,虽然还有风险,但已经被减低到了最小限度,对于袁崇焕这种对手,皇太极是有足够信心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的。

二、麻木不仁袁崇焕

从李光涛到阎崇年,到金庸,到李亚平还有一些网文的撰写者,都言之凿凿,声称袁崇焕有先见之明,早就料到后金要绕道蒙古地区进攻入关,提醒过崇祯,只是崇祯皇帝不加重视而已。

比如李光涛说:“此一行动,关外之袁崇焕早已虑及。”

李亚平说:“袁崇焕曾经专门就此地的防务严重警告过皇帝。”

金庸说:“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

一些网文的作者说:“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

阎崇年甚至说：“皇太极采取绕道蒙古突袭北京的做法，可以说是新招，也可以说是险招，他居然敢从沈阳绕道蒙古来打北京，这在过去从未有过，除了袁崇焕，谁都没有想到，当然是新招。”

事实真相如何呢？

阎崇年所谓的“除了袁崇焕，谁都没有想到”，从我们上文摘录的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就已经可以看出是违背事实的。

这些论者，要么就是有意识地歪曲事实，故意误导别人；要么就是连基本的史料都未认真看过，只是抄袭和照搬其他人的说法。

只要稍微核对考察一下一些最基本的史料（比如东江塘报，《明熹宗实录》，《明熹宗宝训》，《明清档案》），就会发现事实不是袁崇焕提醒皇帝，而是明朝的皇帝从天启到崇祯，还有一些官员将领（尤其是毛文龙）都反复向袁崇焕提醒过后金要绕道进攻的可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沿边蒙古部落上。

而袁崇焕浑浑噩噩，如在梦中，置若罔闻，他所有相关的奏疏都在反复强调一点，对沿边蒙古部落是可以信任的，因此不必太过担心后金绕道进攻

1. 老学者的移花接木

所有这些人中，以阎崇年列举的论据最多，阎崇年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到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焕再疏奏喜峰、古北关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师又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谏议——‘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一面具疏——‘济其市粟糊口，免其导诱入犯。’”

我们在这里不妨一条一条地来辨析！

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一条论据

阎崇年说“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疏陈战守布置大局:强调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

而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知道,早在天启四年的时候,三屯营的王威也好,毛文龙也好,天启皇帝也好,都已经反复向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提醒要注意后金绕道进攻的问题。

毛文龙的提醒几乎年年不断,就在天启六年三月,还明确提醒朝廷“窃海外无粮绝食,因武、袁二抚台贪忌所误。贼四五月持火器奔宁远攻关”。

而袁崇焕的上级阎鸣泰同样在四月壬辰提醒朝廷说后金“多算而行,其计必诡。或佯攻宁远,而阴薄关门”,“或明攻关外而阴袭关内。皆势之所必至,而防之不可不周者也”。

仅仅两天后,阎鸣泰再次上疏提醒说后金有可能绕开宁远,而从薊镇入关。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阎鸣泰第一次提醒的六天之后,才有袁崇焕这份奏疏,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后金绕过宁锦防线,攻击关城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惟有从宁锦之后溢出以西,此为我之虚怯”,另一方面他说用不着担心,因为有蒙古人帮忙:“然臣早已虑及此,故约西虏虎酋遣其领兵台吉桑昂寨将十万,于四月初一启行。”

对待边疆防守大事,袁崇焕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蒙古人身上,已经是糊涂无比,而尤其糊涂的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什么有把握的事情,用了一个“或”字,“石门路、喜峰口一带,或可无恐”,也就是“也许”是安全的。在他看来“或可无恐”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袁崇焕的这份奏疏,不是什么他来提醒别人,而恰恰是在明朝的天启皇帝和其他官员将领不断提醒他的时候,他做的一个回答!

而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就说得更清楚,面对别人的反复提醒,他的态度是后金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情。而这份奏疏恰恰就是阎崇年先生拿来当成是袁崇焕先见之明第二条论据的奏疏。

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二条论据

阎崇年说“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

说句实话，当我看到这条史料完整原文的时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断章取义的情况，也见过不少了。但断章取义到如此和原意截然相反的程度，还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来历史是可以这么来研究的！

这条史料的原始出处是《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二，天启六年六月十七日，辽东巡抚袁崇焕疏言。

原文如下：“而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着，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

也就是袁崇焕在奏疏中说：有些人担心后金席卷西虏，绕过辽东而去进攻山海、喜峰诸处。别人考虑到这点，我一开始也担心。但后来一想，后金起兵到现在，都是稳妥无比，不会冒险。所以我料定后金绝对不会绕道进攻的。

大家看见了没有，阎崇年引用的“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在什么地方？

是在“说者俱虑”下面！

也就是别人提醒袁崇焕有这种可能，而袁崇焕下面则是反驳这种提醒，他认为不必担心，因为后金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情！这就是袁崇焕的真面目！

面对史籍中白纸黑字，彰明昭著的记载，有些人居然硬可以来个乾坤大挪移，割裂文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本来是明朝的皇帝和官员在提醒袁崇焕，这种可能性你要提防，结果到了历史专家的乾坤大挪移之下，居然变成了袁崇焕去提醒皇帝了！

如果是因为无知也就罢了，可明明这些史料本身都是这些人一清二楚的，可是他们还要去篡改，去歪曲，然后就是一大帮群众的喝彩赞美。对事实的篡改成了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如果有人去澄

清真相,反而会成为人民群众厌恶的对象,成了为翻案而翻案的哗众取宠!

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三条论据

阎崇年说“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焕再疏奏喜峰、古北关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

这条奏疏的出处是《崇祯长编》(汪楫编)中“崇祯元年十月壬辰督师袁崇焕言”这一条的内容。

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完整地看这一段袁崇焕的发言,我们就很清楚袁崇焕这里非但不是提醒,恰恰相反仍旧是试图说服皇帝,蒙古人是必须笼络的,而且可以笼络!

后金一旦和蒙古人勾结,就有可能借道攻入关内,这是毛文龙和明朝皇帝反复提醒过袁崇焕的事情,而袁崇焕的态度一直就是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在我们前面引用过的天启年间袁崇焕的相关奏疏里就看得很清楚了。

而在这里,他似乎总算稍微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仍旧是把希望寄托在蒙古人身上。

就在袁崇焕上这份奏疏的前一个月,也就是崇祯元年九月初五日,毛文龙就在塘报里明确指出蒙古人和后金勾结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见我们上面摘引过的毛文龙九月初五日塘报的内容)。

而袁崇焕呢?在毛文龙如此明确的情报警告之下,他还在做将边防大任寄托于蒙古部落的美梦。

在他看来,如果这些蒙古部落和后金勾结,确实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要设法笼络,就在这份奏疏里,他交代得很清楚,自己打的如意算盘是“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

也即如果蒙古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多给一点钱和物资也不算什么。如果不行的话,再寻找机会剿杀驱逐,不让他们逼处边境。

从袁崇焕后续的奏疏来看,他最后的决策就是选择了前者“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

而实际上,据毛文龙的塘报,也根据我们能看到的蒙古档案和清方记载,当时沿边蒙古诸部和后金勾结已经是铁定的事实了!根本不是明朝送点钱,送点物资就能改变的。袁崇焕沉浸在自己的一厢情愿之中,甚至用自己的一厢情愿去说服皇帝。这不但不是提醒,恰恰相反是在麻痹明方的警惕之心。

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四条论据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师又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这一条又是在断章取义,和事实真相完全相反!

我们不妨把崇祯二年三月的这个《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前前后后的相关内容都介绍一下。

这件档案一开头就是崇祯皇帝严厉警告袁崇焕,提醒他蒙古部落已经分明和后金勾结在一起。

而袁崇焕是怎么回答的,他的意思是这些蒙古部落没有勾结后金,对他们只能收买,万万不能得罪的,否则的话就是蓟门靠近京城,兵力又不够,一旦蒙古人做向导,勾结后金入犯,就有大麻烦了。

所以他要把这些蒙古人招来,允许他们在关外的高台堡上交易,但只许用布匹粮食交换柴薪之类,违禁物品都是严禁的,而且责令他们不要和后金交易。但那些蒙古人都说,实在穷得一干二净了,不转卖一些布匹给东面的金人,拿什么来糊口呢?

然后袁崇焕大发同情心,说我亲自劝告他们,但看见他们确实穷困交加,如果断绝了他们活命的路子,就马上要死了,所以只能通融通融,让他们和后金做买卖。

崇祯皇帝对此的回答是,你这个奏疏里说各蒙古部落卖布匹给后金,这分明就是接应,拿什么来遏制、封锁金人?你必须马上严行禁止!至于你招来的蒙古人,如果确实饥饿贫困,那可以查明部落人口多少,按照人口数量来换粮食,不能把布匹和违禁物品卖给他们。

再有违背就以通夷论罪。

从这份档案来看,是崇祯皇帝提醒袁崇焕沿边蒙古诸部已经和后金勾结在一起了,要袁崇焕意识到严重后果,要严加提防。

而袁崇焕不以为然,认为“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是可以相信的,甚至认为“市买一二布帛于东”都是可以通融的。这使得崇祯皇帝严令禁止,告诫他只能“查明部落多寡,计口量许换米”。

袁崇焕一边在充满爱心地接济蒙古人,而就在同一个月,袁崇焕禁登莱商舶入海,切断毛文龙东江部队的经济来源,导致岛上饿死无数人。

可以说袁崇焕是对自己人(毛文龙)如冬天一样残酷,对敌人和敌人的同盟者如春天一般温暖。

2. 小朋友的天真和温情

有不少人至今仍旧抱着一种极为荒谬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袁崇焕是绝对正确的。他提供给蒙古部落粮食等物资,甚至允许这些部落和后金交易也是完全正确的。不接济这些部落,就会导致他们倒向后金,而如果按照袁崇焕的政策执行到底,就会让他们忠于大明。正因为崇祯皇帝严行禁止的政策,导致这些部落几个月后勾结后金攻入关内。

这样的观点,真是洋溢着幼儿园小朋友的天真和温情,几乎要令人感动得涕泪横流了。

但现实是冷酷的!当时的情况已经是铁定的:明朝不接济这些蒙古部落,他们要倒向后金;明朝接济这些部落,他们更要倒向后金。

道理很简单!这些蒙古部落统治阶级的决策只受一个因素影响,那就是实力!

你实力比我大,那我不敢和你作对,相反要讨好你;你实力不如我,那就对不起了,我就是要来侵犯你,掠夺你!

而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人有这样一种愚蠢的逻辑,我给你送的东西多了,你就对我感恩戴德,就不来打我了;我给你送的东西少了,你就不满意,就要来打我。

按这种逻辑,实际上连后金叛乱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还用浩大物资赈济努儿哈赤统治下受灾的女真地区,还把他们当自己人,也真可谓仁至义尽到了极点。而仅仅到第二年,也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老头就公开起兵反明。

游牧狩猎部族的统治阶级一向信奉的就是弱肉强食,他不来打你,不是因为你送给他的东西多,而只能是觉得你实力比他强。他如果来打你,只能是因为你实力无法抵御,而不是因为你对他不够好。

当时的形势摆在那里了!在关外,实力最大的就是后金,那些部落要么和后金合作,要么和后金敌对。既然无力和后金敌对,唯一选择只能是倒向后金。明朝送给这些部落的物资越多,就越是说明缺乏对抗外侵的武力,就越坚定这些部落投靠后金的决心,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至于什么对天盟誓之类不过就是一种骗,把袁崇焕当作傻瓜来骗,能骗多少就是多少!

袁崇焕昏聩到什么程度?当时的情况是明方连自己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就在袁崇焕上任前,宁远刚刚发生因为缺饷导致的兵变,逼得巡抚毕自肃上吊自杀。

就是在袁崇焕自己的奏报里都有各边明军缺饷的报告,他在崇祯二年的一份奏疏里说练兵一定要先有充足的军饷,不能给他们充足的军饷,他们怎么肯来为我当兵。所以发了多少军饷才能说有多少兵。现在九边的兵饷没有一个地方不缺的,缺的不是一两个月,当兵的常常连吃一顿饱饭都做不到。

就在这一年的己巳之变里,都有忠心耿耿从外地赶来北京勤王的军队,因为缺饷,士兵为免于饿死,不得不抢掠民间,结果带兵的官员将领被下狱定罪。军队溃散回去,成为乱兵、叛兵。

如果是明朝政府有足够的钱,那么一边在蓟镇重兵把守,一边给予毛文龙军队充足的军饷,一边用钱麻痹蒙古人的注意,那也还可

以。而现在的情况是明朝政府自己的军队都处在因为缺乏军饷而随时可能发生变乱的境地中。袁崇焕还不顾崇祯皇帝的警告，拿钱来资助蒙古部落，而拼命裁兵减饷。

袁崇焕成天害怕不接济蒙古人，蒙古人就会帮后金（实际上蒙古人帮不帮后金和明朝接济不接济毫无逻辑关系）。他唯独不害怕不接济毛文龙，会逼反东江将士！

或许在他看来，如果能逼反东江将士，他能更名正言顺去杀毛文龙。如此同室操戈的心理，让人还有何话可说？

袁崇焕上任没多久就竭力鼓吹汰兵减饷，也就是裁减关内外的兵马。《崇祯长编》里有这样的记载：一开始，万历四十七年辽东战事起来的时候，让各处招募士兵，河南磁州、山东兖州、真定恒山等处都招募有兵员而没有调集，到这个时候袁崇焕提议要削减军饷，坚决请求把这三个地方招募的兵员裁汰回去务农，把军饷保留解送到部里去，而各处的兵则慢慢裁汰，每个月裁掉多少，减饷多少，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也就是他把各地已经招募的军队都给解散回去务农了！本来按照当时的军事形势，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扩充军队数量。以明朝当时的国力人口，痛下决心，这点是完全能做到的。

要知道在经济远比明朝落后的战国时期，土地人口远比明朝中国少的秦国、赵国之类都能养兵六七十万，经济残破、战争连年不断的汉末三国时期，魏、蜀、吴军队数量总和也在百万以上。就是明朝开国之时，元末经济极端残破，陈友谅仅仅是割据一方，都能训练组织起六十万以上的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进行征战。以明朝当时的国土面积，人口经济，要训练调动起一百万以上的军队来征伐后金是完全能做到的，关键是能否下这个决心。

既然袁崇焕认为明军战斗力不如后金，那就至少应该保证与后金对阵之明军数量应该占据压倒性优势，可是他却偏偏反其道行之。

在崇祯元年十一月的时候，他奏疏里呈报的关内外兵马数量是：“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而

到了崇祯元年十二月，他就一下裁掉了两万多名士兵，见他的奏疏：“督师袁崇焕奏：核定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千余员名。”

也就是关内裁掉了一万五千多名，关外裁掉了七千余名。他的意思是军队数量能少则少，可以尽量省钱。钱宁可花在关外的修城上，花在用来接济蒙古部落上，让他们帮助守边，多划算的买卖啊！省钱办大事，真是英明无比！

在关内兵只有四万多的情况，要守住蓟镇到山海关的长城，自然就是捉襟见肘了，这也是为什么袁崇焕要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蒙古人的身上。而到事后，袁崇焕的党羽程本直两张嘴皮子一翻，就把责任推到皇帝头上去了。

袁崇焕的见识比起天启年间先任蓟辽总督后任蓟辽督师的王之臣都远远不如。

天启五年，当户部提议要裁减蓟门等地的军队时，王之臣表示坚决反对，说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仅仅是从节省钱粮来考虑，而不是为边疆防守考虑。蓟镇的军队士兵这些年来耗损在援助辽东一事上，缺饷缺粮而逃亡的为数不少，精锐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了。幸好现在招募的新兵里还有许多蒙古族和汉族的壮士，还能勉强壮大声援之势，为万一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准备。现在朝廷在东西两边和后金，和蒙古部落之间都有矛盾，而蓟门东边、中路、西边各关口都是要害，每处地方都要做好防备。

在王之臣看来，蓟门的兵力应该不少于当年的辽阳重镇，不增加也就算了，怎么能再削减呢？

而在袁崇焕看来就是完全相反了，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省钱给关外修城，省下钱来笼络收买蒙古部落。蓟镇等地的防守，有蒙古部落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而早在天启六年八月的时候，就有明朝官员根据边镇情报指出，蒙古部落和后金勾结，用金钱收买是靠不住的。

南京御史蒋守藩的奏疏里说皇上每天都在念着要消灭后金，朝

中和地方的众多官员也都每天说着要联合蒙古部落来遏制后金。本来许多蒙古部落似乎确实和我们关系不错，而和后金有仇。但曾几何时，情况似乎已经发生改变。督师的奏疏里提到朵颜的蒙古诸部，表明上顺从，背地里已经悖逆了。总兵左辅的塘报里也提到努尔哈赤和西边一些蒙古部落建立了姻亲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收买联合蒙古人的策略还能长久依靠吗？

对袁崇焕的昏聩举措，明末史学家谈迁曾经评论道：蒙古诸部毕竟和明朝政府不是同心同德，狡计叵测，而我方把粮食辛苦运到边塞，本身就极其艰难。换回来的貂皮、人参又不能当饭吃，袁崇焕把民脂民膏去喂养敌方，被金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贻误国事到这样的地步，就算吃了袁崇焕的肉能解恨么？

纵观袁崇焕的所作所为，他的心态就是对敌人和敌人的同盟者，往最好的方向去想；而对自己人，他可以用最恶毒、最坏的心理去猜忌。

对敌人，笼络唯恐不及；对自己人，杀戮唯恐不及。这就是袁崇焕其人的行径。

3. 金庸等人的论据

李光涛作为论据的《崇祯长编》记载

民国历史学家李光涛在《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一文中说“此一行动，关外之袁崇焕早已虑及，只因关内疏虞（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旨），因而金人始能从蓟州之龙井、大安二关口闯入”。

他括号内的“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旨”应该就是根据了。那《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有什么记录呢？

《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和袁崇焕相关的只有如下一条记录：“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书王洽疏言：‘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今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飭。’”

这分明就是兵部尚书王洽在清军入大安口之前，已经得到情报，要袁崇焕派祖大寿赵率教预先伏兵袭击后金军队，结果袁崇焕置若罔闻，导致后金分两路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境，所以请皇帝下旨严飭

袁崇焕。

这又是一条别人在事先提醒袁崇焕，而袁崇焕不当回事的证据，结果被李光涛用来做相反的论断。其实从李光涛引用的形式就已经很清楚。如果真是能证明袁崇焕事先提醒过的史料，那以李光涛这位袁崇焕铁杆粉丝的性格，绝对会在摘录史料原文的基础上，浓墨重彩，长篇大论，反复强调。像现在这样一句带过，仅仅在括号里不显眼地提一下出处，那只能是他试图掩人耳目，含糊蒙混过去。

某网文作为论据的《崇祯实录》记载

还有一篇网文提供了一条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论据：“己巳之变，皇太极进入关内是通过的蓟辽总督刘策的辖区，而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虚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在袁崇焕自己的辖区内，他做到了‘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这些预警措施，而在刘策的辖区内，‘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却被友军王元雅一口拒绝。一个月后，后金长驱直入的正是王元雅负责的遵化段长城。”

这条记录的出处是《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九月己丑。其实在周文郁的《边事小纪》中对此有更详细的叙述，其大意是：崇祯二年春天的时候，我想请求回去没有得到许可。七月份，有间谍侦探到后金要渡河的情报。我也说辽东准备得很充分，金兵来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是蓟镇边境单薄，我们应该赶快派一支劲旅去防备才行。如果后金的间谍知道了，也可以打消他们进攻蓟镇的谋划。袁公表示同意。

九月九日重阳的前一天，又接到报告说金兵已经渡河，袁公立刻派参将谢尚政等人去蓟镇防备。等到了那里，蓟镇巡抚认为金兵来的情报不准确，仍旧叫谢尚政等回去了。

清人编《崇祯实录》中的记载显然就是从周文郁的《边事小纪》中抄来的，而周文郁是何人？

此公天启初做过孙承宗的幕僚，后来作为援助东江的淮营军官

被调到东江呆了一段时间。从他的自述来看，他是属于登莱准营的编制，在天启七年，又曾经作为登莱援助东江军队的一部分，去过皮岛。

到了崇祯初年又跟随袁崇焕左右，是袁崇焕的亲信党羽。他的《边事小纪》中充满了对孙承宗、对袁崇焕、对他自己的吹嘘之辞。

作为事后写的记录，他对和他同属一个集团的人进行了许多美化粉饰，而对他视为异己的毛文龙照旧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污蔑。把这样一个人的话都当成客观事实来对待，那是很成问题的。

他所谓的“袁公立刻就上疏奏报朝廷，谆谆告诫，担心蓟镇的防守”中的袁崇焕奏原文是哪些？很可能就是阎崇年、李光涛断章取义的那类奏疏。

现代已经脱离利害关系的历史学家，仅仅因为自己的倾向，都会对史料如此歪曲，那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袁崇焕亲信，我们又能有多少信任呢？

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直接的奏疏原文，周文郁这类含糊其辞的“随疏闻”是不能拿来作为证据的。

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周文郁的叙述前后经过，我们倒是可以看出袁崇焕等人的糊涂程度。在后金行动前后，一些情报以及蛛丝马迹已经显露后金的动向，但即便在这个时候，袁崇焕依旧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狐疑不定。一方面确实担心后金真有绕道入关的行动，另一方面按照他一贯的逻辑，他总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派了谢尚政到蓟镇去查看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就又回来了。

如果袁崇焕真当回事了，他会仅仅让手下人到蓟镇去逛了一圈，公费旅游了一下，就回来了？要知道，这位袁崇焕可是连矫旨杀人都能干得出来的主！

事后周文郁就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王元雅身上一推，反正王元雅已经是死人了，不能再为自己辩护。但他在竭力抬高自己一伙人的时候，不经意这句话“然而金兵的踪迹，也竟然诡秘无闻，所以蓟镇的防守更加懈怠了”还是暴露了马脚，也即他们自己对后金的行

动完全就蒙在鼓里，所以抱怨“诡秘无闻”。

而实际上，毛文龙早在一年前乃至四五年前就提醒，后金一旦借道蒙古地区入关，必然是假换旗色，行动隐秘。如果毛文龙在的话，基本上后金起兵之前，具体行动路径就已经了如指掌，参看以前毛文龙的塘报就知道了。而袁崇焕等人，完全是两眼抹黑。对后金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只能捕风捉影，摸不着半点头脑，最后哀叹句“逆奴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把责任往别人身上一推就算了事！

李亚平和金庸的论据

最后我们来看看李亚平和金庸等人的论调。

李亚平说：“在理论上讲，皇太极所突破的长城地段，归蓟辽总督管辖，袁崇焕并不需要对此负责。而且，袁崇焕曾经专门就此地的防务严重警告过皇帝：‘蓟州地位至为重要，而兵力并不强，万一有人做向导，引后金军队由此进犯的话，则祸有不可知者。’（《明清史料》甲编，《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因此，他建议皇帝：‘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满文老档》，太宗卷六。）并且希望皇帝能够严厉督促当地诸军，加固工事，高度戒备，将此当成最最紧急的工作来抓。然而，对于袁崇焕是头等大事的，对于皇帝却并不一定那么要紧。事实上，皇帝也确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按照常规让有关部门研究研究，结果自然不了了之。”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说：“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薄，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

李亚平前面那个所谓《明清史料》甲编的奏疏，估计没看原文，直接抄自阎崇年。而那个奏疏的前后本末上面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无需重复。

至于后面一条，“他建议皇帝：‘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

(《满文老档》，太宗卷六。)",《满文老档》太宗卷六记录的是天启七年的事情,先不论有没有这个建议,天启七年的记录怎么能和崇祯二年的奏疏构成因果关系?更何况《满文老档》中根本没有这个记载。

李亚平先生大概是从别的地方抄来这条记载,又不注明是转引,而非直接引用原始文献,结果一时疏忽,抄错了注释中的参考文献,以至于出了这种错误。

他所谓的“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的出处当然不可能是《满文老档》。再看金庸提到的“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金庸对这里的说法也没有给出注释说明出处,但显然他和李亚平根据的材料有同一来源,所以翻译成白话的时候,大同小异。

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程本直的《矾声记》、《漩声记》和余大成的《剖肝录》。

《矾声记》中的原文是:“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发布着议,疏固犹在御前也!”

《漩声记》中的原文是:“且也崇焕之疏曰:‘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臣身在辽,辽无足虑。严饬蓟督,峻防固御,为近日急著’此固入于半年前。”

《剖肝录》的原文是:“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不听,至是果如其言。”

这两个人所谓的“蓟门单弱,请宿重兵”是袁崇焕奏疏中的原文么?《矾声记》中的原文一见即明,不是!而是他自己概括的意思。

《漩声记》和《剖肝录》的原文似乎更有迷惑性,《袁崇焕资料集录》里甚至还加了双引号,表示是直接引用。

而实际上,把《剖肝录》和《矾声记》、《漩声记》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剖肝录》就是在《矾声记》的“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前加了一个“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而加的这句又是把《漩声记》里的话意思改头换面了一下。

余大成显然也根本不知道袁崇焕这个所谓事先提醒的奏疏原文

是什么,所以只能在《吼声记》和《漩声记》的基础上,再自己整合修改一下,然后冒充成袁崇焕奏疏里的话!

而《漩声记》里的记载从口气看似乎是袁崇焕的原话了,但完全经不起推敲!

第一,从内容来看,程本直说袁崇焕的这句话是在后金入关半年前,也就是三四月份说的。而现在从明清档案里能够查到的袁崇焕崇祯二年三月的奏疏原文,恰恰是皇帝提醒他蒙古人可能和后金勾结,边防可虞,而袁崇焕辩解说蒙古人可以信赖,所以不要紧,这和程本直编造的奏疏是直接矛盾的。

第二,袁崇焕是以兵部尚书衔任蓟辽督师,可以说他就是蓟辽总督刘策的直接上级,要严饬刘策,那首先是他袁崇焕的事情,而不是把皮球踢到皇帝那里去。他连毛文龙都可以矫旨乱杀,现在守边是他的正经份内事了,反而要推到皇帝那里去?简直是笑话!

更关键的一点,古人写这类纪实性质的文字,需要说明某人说过某话,通常的做法都是大段大段摘录奏疏原文。比如茅元仪的《督师纪略》遇到孙承宗的奏疏都是原文大段抄录,大段引用。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凡是提到孙承宗奏疏的地方,也多是如此。

甚至被称为小说的《辽海丹忠录》都是大段大段抄录奏疏原文,绝不会是拿孤零零的一句话出来当证据。

如果就是毫无上下文背景的一句话,那其性质就多半和阎崇年当成论据的四个奏疏一样了,也就是通过断章取义,来给袁崇焕脸上贴金。

程本直、余大成和周文郁一样,是袁崇焕的死党;和周文郁一样,都是不直接引用袁崇焕的奏疏原文,而只是用自己的意思概括(如果勉强算《漩声记》的那句话是奏疏原文,也就是孤零零的一句,而实际上还不可能是)。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三个人到了袁崇焕提前预警,如此紧要关键的地方,却都如出一辙,不是为了证明事实真相,把袁崇焕的奏疏原样呈现,而只是笼统地说“公随疏闻”,“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

“有疏谓”，死活不肯给出上下文！被指为小说的《辽海丹忠录》遇到奏疏的时候，都是原样大段摘录而非藏头缩脑，比他们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没有奏疏上下文背景的话，那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性质？

是否如同阎崇年断章取义的四份奏疏一样是曲解原意基础上的附会，就不得而知了！

更重要的一点，《矶声记》、《漩声记》和《剖肝录》连明代原文都算不上，明显是篡改后的文字。明人凡是提到后金的时候，一律称“奴”，称“虏”，称“贼”，或称“东夷”、“建虏”，而这三篇文章里提到后金，称“敌”，称“兵”，这就显然是被清人修改过的版本了。

更可疑的是《矶声记》、《漩声记》、《剖肝录》的出处。在《袁崇焕资料集录》中，这三篇文章归属在无名氏辑《袁督师事迹》之下，而这个《袁督师事迹》中还收录有《明史·袁崇焕传》，《明史》是在清乾隆时期才正式完成的。如此看来，《袁督师事迹》是乾隆之后出炉无疑。而正是在乾隆时期，钦定要把袁崇焕作为表彰褒扬的对象！

那就无法排除御用文人为了秉承乾隆旨意而炮制出来上述资料的可能，《矶声记》和《剖肝录》中提到的袁崇焕上书预警之事，完全有可能是在乾隆授意的情况下，清人在明代原文基础上编造添加进去的。那就连二手史料的资格都轮不到了，所谓“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发布着议，疏固犹在御前也！”云云，把它们当成比小说都不如的私货来看更加适合。

4. 杀人有理，边防无责

李光涛说“己巳之变，其失乃在关内（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与袁崇焕无关”。

李亚平说“在理论上讲，皇太极所突破的长城地段，归蓟辽总督管辖，袁崇焕并不需要对此负责”。

真如他们说的那样，袁崇焕没有责任么？

实际上《崇祯长编》元年四月甲午的记录说得清清楚楚：“袁崇焕起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登莱、天

津等处军务，移驻关门。”

袁崇焕的职务就是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如果说蓟镇和他无关，那朝廷要他这个蓟辽督师是干什么用的？直接让他和天启年间一样当辽东巡抚不就得了？

给袁崇焕推卸责任是无耻的！无耻到了什么程度呢？

当袁崇焕杀自己人，杀毛文龙的时候，他可以不顾死活，可以狂妄越权，还有一大批人叫好喝彩，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这种越权的犯罪行为辩护。

当袁崇焕对本就属于职责份内的事情都没有做好的时候，结果就说这不是他的责任了，这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了！

越权杀自己人，可以拼了命去做；职务份内的边防责任，可以拼了命推卸。这就是袁崇焕和袁崇焕的拥趸的行径。

更何况，明朝在不彻底改变当时税收体制的情况下，财政情况就是拆东墙补西墙，顾东就不能顾西，顾前就不能顾后，没有人比袁崇焕自己更清楚这一点！当时崇祯因为信任他，关内关外的军队调度整顿全都是袁崇焕一手操办的。

正是在袁崇焕的竭力鼓吹之下，要求崇祯把主要的财力物力都供应给关外去修筑防守几座孤城，而对关内，不但没有增强实力，反而裁剪掉了四分之一还多的军队，甚至已经招募的兵马，都在袁崇焕的坚持下，解散回去务农了。

正是在袁崇焕的竭力鼓吹之下，明朝要把边防的希望寄托在笼络蒙古人身上，宁可自己的军队发不出军饷来，也要把物资提供给蒙古人。

崇祯皇帝再三提醒他、警告他，他都当成无所谓。

在《崇祯长编》里有一段崇祯皇帝的话，大意是王象乾、袁崇焕两个人不是一直在报告说蒙古人很恭顺吗？但从蒙古人的表现以及边防将士的报告来看，完全就是相反的情况。事情是你们在办，我这里的消息也是你们在提供。我觉得蒙古人不可靠“明系要挟”，你们觉得可靠，那也可以。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相机操纵”也好，“严饬

战备”也好，都由你们自己看情况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御不得疏虞！否则国法无情！

这几乎已经是最严厉的警告了，崇祯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还要怎么样？

结果呢，到最后出事了，一些人嘴皮子一翻，居然是成了袁崇焕一贯英明正确，什么都是崇祯皇帝的责任。还可笑至极地说袁崇焕提醒过崇祯要重兵屯守蓟门，且不说这种提醒本身就是编造出来的谎言，事实真相恰恰是袁崇焕竭力主张对关内包括蓟镇军队进行裁减（看前面分析）。就假设真有这样的提醒，那岂非更加搞笑。皇帝已经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给了他一切能给的权力。最主要的军力物资都集中在袁崇焕手中，为此明朝甚至大幅度牺牲了其他方面的供给。结果到头来，袁崇焕说，你再拿出一支所谓的重兵来去屯守蓟门！

这是在开什么外星玩笑？难道这支重兵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莫非袁崇焕的意思是要崇祯皇帝自己跑到蓟门去守边？

这荒谬程度就如同一个足球教练让一个守门员去守门，结果这个守门员不在那里守门，却跑去向教练报告，我觉得皮球有可能射到门里去，教练你一定要当心啊！估计如果这个教练员脾气火爆点，非当场扇这个守门员两耳光不可。

崇祯皇帝给袁崇焕的职务，先不管蓟辽登莱天津这些辖区好了，说白了就四个字：对付后金！

启用你袁崇焕，给你那么多头衔，是干什么用的？不就是让你对付后金吗！

结果你说，后金从我那里绕道走开了，然后攻入关内，这不是我的责任，那该给这样的人什么样的评价？

你把毛文龙杀了，现在你的驻地本身就是离后金统治区最近的，结果后金这么大的军事调动，你袁崇焕连半点确切的消息都没有，有一些风声走漏，你也没有真当回事，这不叫渎职，叫什么？

对照一下毛文龙的塘报，凡是后金有大规模行动，毛文龙的塘报

里几乎都是提前把后金行动的时间地点,参与的人物,采用的方式,需要注意的地方,应对的办法,极为详尽地列举出来。

和毛文龙一比,袁崇焕对敌情的麻钝,几如木头人一样。

《前清秘史》的作者李亚平先生还颇为搞笑地说:“《明史》作者揣测,‘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很有可能,袁崇焕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有理由希望皇帝和朝廷百官通过眼下的危机,意识到自己的先见之明,从而,给自己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不知道,情形严重的地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想像的最坏的程度。”

而实际上袁崇焕还不至于如此颡顽,他在后金入关后,自己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崇祯长编》里就有“督师袁崇焕上疏引咎”的记载。要说意识到先见之明,那也只能是意识到崇祯皇帝的先见之明。

三、究竟谁才是胸怀全局

1. 修城守城的狂热感情

在上面的叙述里,有一个现象很突出,那就是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等关宁一系的官员将领对后金绕道进关这种可能性,要么就是竭力否认,甚至认为提出这种可能性的人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认为靠笼络蒙古人就能解决问题。他们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偏执呢?

茅元仪的《督师纪略》显然是在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发生前写的,所以在书中,茅元仪真是畅快淋漓地对那些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进行讥讽诋毁,还不惜长篇累牍大幅引用孙承宗否定后金绕道可能性的奏疏。

不过也幸亏如此,给我们保存了许多反映历史真相的材料。

如果只有一个人这样,我们或许还能说仅仅是这个人愚蠢,但从孙承宗到茅元仪到袁崇焕都是这样,那就需要问一个为什么了。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孙承宗和袁崇焕等人一直坚持的就是把防线推到关外修筑孤城的战略，如果后金绕道的可能性存在，那么他们这个战略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是错误的。

按明朝官员竭力推行的低赋税政策，如果把重点放在关外修城守城，那长城一带的守御就必定缺乏力量支持，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正因如此，他们为推行在关外宁远、锦州等地修城守城的战略，就必然要竭力否认后金存在绕过锦宁一带进关的可能性，或者就算承认这种可能性，也鼓吹依靠笼络蒙古人就能解决问题。

在他们看来，自己推行的关外修城守城战略，是积极进取的，是寸土必争的，是唯一英明的策略，反对这种战略，就是消极保守，就是割地误国的庸人。尤其是茅元仪、袁崇焕等人更是把这一战略上升到政治正确性的高度，倾注了他们的全部感情。凡是同意他们这个方针的，就是正人君子，不同意他们这个战略的，他们就咬牙切齿痛恨，认为是误国的奸臣、懦夫。

所以当有人提醒他们，后金完全存在绕道进关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不是感激，而是一种恼怒愤恨，认为提醒的人是故意和他们作对，故意来动摇他们修城守城的决心，破坏政府对他们的支持，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掣肘。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茅元仪在《督师纪略》里表露的那种情绪了，一说到有人提出后金绕道的可能性，就用极为刻薄甚至恶毒的语气进行贬损，三屯营的王威被他说成是为了个人地位私利，重视这种可能性的官员，被他讥讽成“长安贵人”。

而对于连年上书提醒，并且其意见得到天启皇帝高度重视的毛文龙，当然就更被茅元仪等人恨得咬牙切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认为毛文龙是和他们存心作对。

到了袁崇焕，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执狂了。眼里只有修城守城，修城守城……其他的事情，他一概都看不见。

对袁崇焕来说,他最怀念的大概就是在天启三年到天启四年修宁远城,然后天启六年守了两天就获得的所谓宁远大捷。所以拼命地想再现这段美好时光,拼命地希望后金和他谈和,后金能安静地乖乖地继续让他修更多的城,然后乖乖地来强攻这些城,好让他能获得类似宁远大捷这样的战功。

为了能谈和,争取更多的时间修城守城,在袁崇焕看来,关内的守备荒废也无所谓,朝鲜被后金攻占也不要紧,毛文龙的东江被攻陷当然更让他称心如意。于是就上演了天启七年和崇祯二年,袁崇焕两次谈和都被后金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悲剧。

2. 袁崇焕的隔岸观火

第一次谈和,《满文老档》的记录很有意思,首先是记载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八日,“命贝勒阿敏、济尔哈郎台吉、阿济格台吉、杜度台吉、岳托台吉及尔托台吉,率大军往征驻朝鲜明将毛文龙”。

然后紧接在这条记录下面,当中没有夹杂任何其他事情,就是派遣方吉纳、温塔希两人送书信给大明宁远都堂袁崇焕,表示要谈和“誓诸天地,永归和好。袁大人,尔即以此言转奏尔皇帝”。

也就是后金派兵攻打毛文龙,派人与袁崇焕谈和完全就是同一天同一时间的安排。

后金的意图很清楚,他派出主力去攻打毛文龙和朝鲜,老巢空虚,害怕明军来袭,于是为了征剿毛文龙的行动能顺利进行,就在同一时间派人去与袁崇焕谈和,所谓谈和的意思当然就是让袁崇焕乖乖呆在宁远,不要来打后金。

毛文龙早在天启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塘报中就已经把后金兵几乎倾巢出动来攻打的情形说得很清楚了,袁崇焕如果稍有知觉,在一月或至少二月就应该派遣精兵攻打后金老窟,不说乘机拿下,至少也起到牵掣作用。

可惜袁崇焕迟钝如同行尸走肉,还沉浸在后金攻打东边,自己正好多修城池的美梦中。还要等到皇帝来提醒他后金如果去打朝鲜,朝鲜一旦屈服产生的严重后果。

从三月份的旨意内容看，天启皇帝是很着急的：马上派人去，说给在宁远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乘着金人老巢空虚，挑选关宁精锐，选择智勇双全的将领，轻兵直捣其巢穴，大兵后续跟进，以牵制其力量，缓解属国的危急情形。

袁崇焕对这一命令表面答应，实则敷衍了事，派几千兵丁，装模作样到三岔河那里游荡了一阵，王在晋批评说“乃官军望河而止，此真所谓纸上之兵也”。

而在他事后的辩解中，则信口开河说后金有二十万大军：听说金兵派了十万大军进攻朝鲜，十万军队留守。他甚至质问批评他的人，你们凭什么妄自揣测其老巢空虚？我纵然全军出动去袭击，对以逸待劳的金人又有什么威胁？

皇太极听到此论，估计大牙能笑掉，和自己对阵的辽东明方大臣袁崇焕，居然连己方究竟有多少具备战斗力的部队都不清楚！不过他可能也是正因为知道袁崇焕如此糊涂，才敢于如此行事，换个稍微头脑明白点的人在辽东主持，则皇太极就断然不敢倾巢出动去攻剿毛文龙和朝鲜了。

而有些人为了替袁崇焕粉饰，则不惜颠倒黑白宣称毛文龙报告的后金征朝的军队为八万是谎报军情，因为据说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阿敏所带军队只是三万。朝鲜人的记载则比毛文龙塘报及《清太宗实录》更为可信，所以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有四五万。按照明军的战斗力，袁崇焕的七万宁锦军队是不可能战胜后金云云。

而实际上，毛文龙没有谎报军情，刻意撒谎的反倒是这种说法的炮制者。所谓《李朝实录》记载阿敏所带军队只有三万怎么回事呢？李朝实录中的原文不妨摘录如下：“本年正月十七日，据平安道都巡查史尹宣等诸将官节续驰启‘本月十三日四更时分，奴贼三万余骑卒袭义州，从水门口杀其门将’。”

所谓的三万余骑，仅仅指的是袭击义州的兵马。而毛文龙在天启七年元月二十二日的塘报里说得一清二楚：“正月十四日，奴兵八万余人，分路犯抢。六王子带领四万余贼，突抵铁山，围职衙门拿职。

职在云从岛，不得拿住。”

有些人实际上做了两次断章取义，第一次对《李朝实录》断章取义，把袭击义州的三万余骑说成是后金此次出征的全部军队；第二次对毛文龙塘报的断章取义，丝毫不提毛文龙说后金分路进犯，其中一路是四万多人，袭击铁山。

而且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李朝实录》这里记载的后金攻击义州的时间本身是有错误的，按照《满文老档》记载，进攻义州的时间应该是十四日夜，原话如下：“正月初八日起行，十三日至明哨地，冷格里总兵官、叶臣、雅荪、猛安等四大臣，率兵八十名乘夜攻取其诸哨，六哨无一脱者，至朝鲜义州城，十四日夜，即树梯登城克取之。”

后金是攻城是直接行动方，其记录远比朝鲜方面准确，而且据李朝实录记载，义州被攻下后，“大小将官，数万民兵，屠戮无遗”。那这所谓攻城时间，攻城经过全是朝方得自于道听途说甚至自己的推测，这里只能以《满文老档》的记录为准是毫无疑问的。

《满文老档》记载“先取义州之夜，分兵往攻毛文龙所居之铁山，斩明兵甚众”，也可以印证毛文龙塘报。所谓“先取义州之夜”，也就是在攻击义州的同一夜或这之前分兵攻打铁山！而不是什么后金全部兵力只有三万，然后都在攻打义州。

从时间来说也完全对得上，后金攻打义州是正月十四日，而攻击铁山同样是在十四日，在进攻义州之前，就已经做了分兵的部署。

《满文老档》前面叙述出兵经过的时候，更是明确陈述，此次出兵主要征讨对象是毛文龙，征伐朝鲜反而是从属性质，顺带的；明朝的毛文龙驻扎在靠近朝鲜的海岛上，屡次收纳逃人。我方于是愤怒前往征讨毛文龙，如果朝鲜可以攻下来，就顺便取之。所以用兵两图之。

本来《东江疏揭塘报》中的记载八万人和《李朝实录》中的记载攻击义州城是三万兵力毫无矛盾，更可以与《满文老档》中的记载互相印证，结果被两次断章取义，就成了是对立的了，成了所谓毛文龙

谎报军情了，真是很幽默！

判断后金老巢是否空虚，最为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只能来自后金自己的记载，让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满文老档》第 834 页，大概是天启七年二月初八日左右，出征朝鲜的后金将领岳托说：“惟汗与二贝勒留家兵少，蒙古与明，皆为我敌矣，设若有警，难应付矣。”

这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当时后金留在老巢兵力很少，甚至后金将领自己都忧心忡忡，一旦有军队来袭，就难以应付。

《满文老档》第 836 页还有一段话，是说征伐朝鲜的后金军队派了七个人到沈阳报信，到了三月十四号抵达沈阳，而当时后金的情况是什么呢？留在沈阳的兵少，所以皇太极率领那些贝勒，在边境上驻营，“张扬兵威”，在那里虚张声势。其意图就是唯恐关宁方面明军知道自己老巢空虚来袭。这样低劣的伎俩，居然就能把袁崇焕骗得团团转了。

《满文老档》的这两则记载和毛文龙塘报中报告的皇太极手下的军队数量不满一万，都是心寒胆怯，常常害怕西边关宁方面的大军来直捣巢穴，现在宁远一定要派出大军直接渡过三岔河，攻击沈阳，狡奴自然覆没无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绝不可错过完全是相互印证的！

后金沈阳空虚，害怕关宁明军捣巢，也可以从《满文老档》该年三月初二日记载的岳起鸾给皇太极的奏疏里看得很清楚：“该员奏书于汗曰‘我大军尚未度江河，潜驻凤凰城何益？宜速撤回。倘此处有警，路远不能猝至也。’”

就是说如明军大举进攻沈阳，驻扎在凤凰城的军队（这支军队也是为对付毛文龙而设置的，凤凰城就在后金与朝鲜边境附近），就算马上回来救援，都会因为路远而来不及！

从岳起鸾奏疏中的担心可见毛文龙塘报里说的后金老巢的人“俱是心寒胆怯”并无夸张。袁崇焕后来杀毛文龙的时候，说毛文龙不受节制，而事实真相恰恰是他自己不受中央节制，姑息纵敌，反而

是毛文龙每次在后金要攻击关宁一线的时候，拼死血战牵掣！

对袁的昏聩举动，明朝方面的官员也多有指责，而后来他也正是因此被天启皇帝撤职。

他自己写的告白书里的辩解是如果把锦州、大凌河等城池都修筑好了，那就有进无退，有胜无败了。又何必为了一个区区东江，去挑衅后金？还不如用谈和来麻痹对方！东江、朝鲜之类，不去援助也没有什么要紧的。

袁崇焕有这种心理不奇怪，在他看来，毛文龙的功劳都是假造的，后金不来都是怕了孙承宗和他；后金也不会绕道进攻关内，就算会绕道，也可以笼络蒙古人帮助抵御；后金也不会长期围困城池，也不会围城打援，只会进攻两三天最多一个月就退回去。在这样的如意算盘下，当然就只要拼命修好大凌河等城就行了。

袁崇焕大概还觉得后金的皇太极等人真是愚蠢啊，去攻打毛文龙纯粹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毛文龙对明朝是有害无益，对后金有益无害，他袁崇焕才是后金最大的威胁。后金不抓紧时间来打他，反而先去打毛文龙，真是太蠢了。而他袁崇焕则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抓紧修城，真是太英明了。

袁崇焕在这种鼠目寸光，眼睛始终盯着自己眼前这块地盘的心态作用下，他干出什么样的蠢事都不奇怪，他能对天启皇帝让他发兵援助毛文龙和朝鲜的命令阳奉阴违就更是必然。

而反观毛文龙，从他的塘报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放眼全局，不仅极力维持壮大东江的抗金根据地，而且还代其他的明军防区操心，不时提建议。每次后金要意图往西边攻击，他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得到情报，并用最快的行动去牵掣破坏后金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天启年间，后金无力前进一步，反而不断退缩的原因。

只是类似茅元仪、袁崇焕之类人，把毛文龙的功劳都看成是假的、是吹牛，后金是怕了他们才退缩的。

3. 杀了毛文龙，小白鸽降临

再说袁崇焕第二次谈和，就显得更加诡异了。第一是时间长，第

二是袁崇焕自始至终就没有向崇祯报告过,第三是双方来往以及用词都显得极为暧昧。

我们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把前后经过大概叙述一下。

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十三日,皇太极派人(生员郑信,把总任大良)给袁崇焕送信,表示要谈和。信中说,何必为了朝鲜的缘故,耽误我们两国修好的事情。去年正月就送信去要谈和了,竟然没有回信(那时候袁崇焕不在),现在听说你又上任了,所以赶紧派人来送信给你。

这次送信因为用印问题被袁崇焕很快驳回。

到了二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第二次派人送信说:老天希望我们两国修好,共享太平。我渴望和平,所以诚心派遣使者来。怎么议和,都听你们说了算。

这个时候,皇太极简直是殷勤得不得了,一次送信没有答复,就来第二次,甚至说出“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这类卑顺溢于言表的话。

随即,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次皇太极派的使者在袁崇焕那里整整呆足了两个月,也就是整个三月和四月之后,到了闰四月袁崇焕才派杜明仲和后金派遣的两个使者一起回去。《满文老档》中的记载是:“闰四月初二日,杜明仲同我所遣郑信,任大良赍书至。”

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

如果袁崇焕拒绝对方谈和,那对方使者到的当天就可以做出回应。如果是虚与委蛇,大家都是空对空,那也是一两天之内就可以做出回应,总之算上回路程最夸张的也就是十几天的时间,实际从后面的记录看,如果当即回信,六天之内就可以一个来回。

究竟是什么事情,可以让袁崇焕把后金使者整整留下两个月来讨论呢?而且后金是明朝的敌对方,把敌对方派遣来的使者留两个月,与此同时丝毫不向皇帝报告,这本身就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再看袁崇焕回信的内容:一开头是“奉帝命统辖边兵之兵部尚书袁,敬复于汗陛下”,措辞何其恭敬。然后就是说您要谈和,那是不忍

心让两家的百姓遭受战乱之苦，大汗您的美好意愿，这是天地都看到的。

接下去袁崇焕承认，崇祯皇帝继位，非常英明，不是可以随便糊弄的，所以谈和的事情他没有向皇帝报告，下面又要求皇太极“当思议和之道，则边关有荣，亦不失汗之美意”，所谓的议和之道，无非就是要让皇太极退还部分辽东的土地，然后他才方便上奏给皇帝。

但袁崇焕不是白痴，皇太极更不是白痴，如果袁崇焕的意思是平白无故就让皇太极退还土地，这样的回应，是根本用不着把对方的使者留住两个月才能给的，因为这等于让对方投降。袁崇焕也根本不必用这副恭敬的态度来写回信。

答案浮之欲出，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后金的使者和袁崇焕一定是谈某个交易，只是这个交易不方便形诸笔墨，所以后金是带皇太极的口信去，杜明仲则是带袁崇焕的口信给皇太极，而在书信里，则只是朦胧提及。

那这个交易是什么呢？只要看袁崇焕在后金使者呆在他那里的三月、四月加紧做的事情，即切断毛文龙的经济来源，收紧勒向毛文龙的绳索，就大致清楚了。

到了闰四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就派遣一个喇嘛去给袁崇焕回信了，在信里似乎和谈已成的样子，皇太极大谈划定双方界限，什么明以大凌河为界，金以三岔河为界，简直是完全能成全袁崇焕安安稳稳在大凌河等地修筑城池的如意算盘，而关键是在最后两句：“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乃出于至诚，尔等亦真诚言之。我等双方勿得头顶皇天而施诡计也。”

皇太极真正和袁崇焕商定的事情都是通过喇嘛使者的口信来传递，而不可能蠢到写在纸上。他信里最后两句就是对袁崇焕的一个所谓保证，我是决心要罢兵的，我答应你的事情都出于真诚，你也要真诚地去做，不要出尔反尔，施展诡计。

接下来就更为蹊跷了，皇太极派遣的这个喇嘛又在袁崇焕那里整整留了两个月多。他是在闰四月二十五日被皇太极派出去的，那

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七月初三日，我所遣白喇嘛，郑生员等至。”不仅回来了，还带了袁崇焕的两封回信。

尤其诡异的是，上次使者在袁崇焕那里呆了两个月，皇太极一点都不着急，而这次在两个月不到的时候，皇太极就已经按耐不住了，就又写信去催了两次。

《满文老档》中的记载是六月二十日，出使的喇嘛久久还没有回来，皇太极派遣图鲁什带着书信到边界，交付明方的哨兵转达，书信中说“我前面两次派遣郑信等到你那里去，后来看见你派杜明仲回信，以为你是诚心修好，所以派白喇嘛去。去的时候曾经对喇嘛说如果议和的时间太长，就先派一个人来报信。现在约定的时间已过，恐怕事情有误，所以又送这份信给你方，如果在七月初五日前，还不见回来，想必就是被抓了。”

过了七天，又一次写信去催了：“二十七日，遣图鲁什所执明哨卒赵登高赍书往。”

这两次催促很蹊跷，首先皇太极明知道袁崇焕始终没有把谈和的事情报告给政府，这是袁崇焕自己就明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派喇嘛去和袁崇焕议什么和？而且还对“议和日久”有心理准备？

在袁崇焕不上报给政府的情况下，你和袁崇焕谈的时间再长，讨论得再详细，不都是白扯淡吗？到最后政府不同意，难道是袁崇焕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皇太极难道是闲得没事干，故意来扯皮解闷？

正因如此，皇太极说“尔若议和日久，先遣一人来报信”就显得相当离奇了，看来皇太极是提前准备好，这次喇嘛到袁崇焕那里去是要呆一长段时间，以至要长到先派人报信的地步，有什么事情在袁崇焕隐瞒朝廷的情况下需要讨论那么久？而且从皇太极说的“约期”来看，他们约定了日子，似乎是预计某个事件要发生，发生之后派人回来报信。

有充分的理由判断，这次皇太极派遣到袁崇焕那里去的喇嘛，不是去空口白话谈判的。那究竟为什么喇嘛在袁崇焕那里呆了整整两

个月，而皇太极都心急地等着消息，以至于都有点沉不住气，写信再去催呢？

那就同样再看看这两个月，也就是五月和六月袁崇焕做的事情就行了。正是皇太极的使者呆在袁崇焕那里这两个月的时候，袁崇焕全力策划并实施了对毛文龙的杀害！

袁崇焕五月出海，大概六月五日的时候，杀毛文龙。而后金的皇太极大概正在忐忑不安，心急火燎地等着毛文龙被杀的消息。在六月下半旬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得到一些情报，但还不完全确定，所以又在二十日、二十七日接连两次写信去催促试探，当然信中都是暗语隐语，无非都是借催促使者回来之名，希望得到最确切的情报。皇太极怕的是毛文龙假死，他们实施绕道攻关的计划之后，来一下出其不意的打击，所以心急于最全面、最确切的报告。

而在七月三日，喇嘛带回来的袁崇焕给皇太极的两封回信里，一封信是催促皇太极归还辽东土地，还说“止有受而不可言，故未奏帝知之”，意思是你至少要做个姿态，我才好奏报皇帝知道，现在就不方便说了。

第二封信里则大拍皇太极的马屁，说知道他“敬天好生之诚心”，恳求皇太极“与其求诸天，莫如先求于心。天道唯移也。使臣来时，我出海，是以久留，别无他事”。

按照常理，如果后金使臣来，袁崇焕不在驻地，那他部下是根本没有权力私自把后金使者留在那里，而且还长达两个月的。就算要瞒着朝廷谈和，那合理的决定也应该是先让使者回去，等袁崇焕回来后再说，否则私留金使，又绝口不向朝廷通报，这够得上杀头的罪了，谁能承担得起？而现在偏偏袁崇焕若无其事，似乎理所当然地说“使臣来时，我出海，是以久留，别无他事”。

显然这里面是有潜台词：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使臣来时，我出海，出海是为了什么，你皇太极当然一清二楚，现在该是你兑现诺言的时候，你要扪心自问，不能毁约。

他们之间真正约定的具体内容自然都是通过口信传递，袁崇焕

绝对不敢留下书面证据，所以只能用这么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了。

这个时候，皇太极知道毛文龙被杀是真，估计已经欣喜若狂了，什么归还辽东土地，谈和之类，那就见鬼去吧！

天聪三年七月初十日，他给袁崇焕写了回信，派任大良送去，中心意思只有一个，要我归还辽东土地给明朝，门都没有！至于和议，爱谈不谈，拉倒吧，“我岂能强令修好耶”。

不过有意思的是，皇太极这个时候或许真的对袁崇焕感激涕零了，所以写了上面这封赖账的信之后，又在上面的信后紧接着给袁崇焕写了一份感谢信：

“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袁大人，虽不议和，然犹待我使者并遣之还。特此致谢。”

虽然不议和了，但这么款待我的使者，并且让他们在你那里留了两个月，看了一场杀毛文龙的好戏，还把他們乖乖地送回来，这是一定要感谢你的。当然这个特别感谢也是有和毛文龙对比的意思，因为皇太极派到毛文龙那里的使者不但没有被款待送回，反而被杀的杀，抓的抓。

这回袁崇焕的反馈倒是极为神速，在六天后也就是七月十六日就派人送来回信了。在皇太极已经明确说不谈和的情况下，袁崇焕还在低声下气地哀求。

大意就是，我和你的心是一样的，我够诚心的了，半点弄虚作假的成分都没有，你也应该诚心啊，你送来的使者白喇嘛都见我两次了，请再想想吧。

到此地步，袁崇焕基本上是像猴子一样被皇太极耍。皇太极又给他回了一次信。然后在《满文老档》里，又是紧接在回信后，直接就是这么一句话：“十月初二日，即丑日巳刻，谒堂子，率兵起行。”也就是正式进发绕道蒙古进攻明朝了。

袁崇焕期待已久、后金化身的“和平小白鸽”终于降临了。

以上所说的判断都是基于后金《满文老档》的记载，那在明朝这方面，有没有史料可供佐证呢？

回答是有的！在《崇祯实录》崇祯二年十二月中有这么一则记载：

御史高捷弹劾大学士钱龙锡说：袁崇焕的罪案已经定了下来，我不必多说。但惟独幕后指示的钱龙锡，还逍遥法外，让人不胜痛心！在刚抓袁崇焕的时候，祖大寿也不说冤枉，两日后就扬长而去；这不是钱龙锡和袁崇焕挑动激起的吗？袁崇焕杀毛文龙，钱龙锡密语书信，和袁往来商量不是一次，这是可以检查核实的。另外袁崇焕给王洽的书信里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请求处理幕后主谋者，以告慰边防将士之心。

崇祯帝对此的回答是：“辅臣钱龙锡佐理忠顺，你不要多说了！”

接下来的记录就是“壬申，钱龙锡称病离职”。

这是高捷弹劾大学士钱龙锡的一份奏疏，《崇祯实录》为清人所编，清人对毛文龙并无特殊好感，对此类奏疏，显然毫无编造的必要，而且这份奏疏本身是导致当时重要人物内阁大臣钱龙锡辞职的原因，这和具体历史事件也是对得上号，经得起考证的。所以奏疏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高捷在这份奏疏里提到袁崇焕曾经给兵部尚书王洽写过一份信，这份信中说辽东谈和的事情，朝廷内已经有大臣赞成、支持了，如果毛文龙能够同心协力，当然就可以没有猜嫌，否则就砍下毛文龙的头颅，我袁崇焕能做这个事。

会不会是高捷无中生有，编造信件内容，故意诬陷袁、王二人呢？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兵部尚书王洽是在十一月因为渎职被捕入狱的，而袁崇焕也是在十二月入狱，也就是当时两个人都在监狱里了。高捷之所以能知道袁崇焕写给王洽信件的内容，只能是王洽入狱之后抄家查出来的，这是无法编造的。否则，崇祯只要问一句，你是从何得知他们通信的内容？那高捷如何回答？

王、袁二人都在狱中，随时可以当面对质。如是高捷编造出来的

内容,那一旦拆穿,就是欺君之罪了,高捷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所以这封袁崇焕写给王洽的信件不但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恐怕崇祯皇帝比高捷看到得更早,所以在批复高捷的弹劾时,崇祯只说钱龙锡忠顺,没有反驳高捷对袁崇焕写信给王洽图谋杀毛文龙以谈和的指控,可见对存在这封信,以及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是没有疑问的。

再看《崇祯长编》,其中也记录说锦衣卫曾经追问过袁崇焕杀毛文龙和擅自谈和两件事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袁崇焕的供述是,对于杀毛文龙的事情,钱龙锡和王洽两人频繁用书信来问,最后是袁崇焕自己专断杀掉。主和一事同样是袁崇焕和王、钱两人频繁商量,但王洽和钱龙锡并没有同意。

袁崇焕自己供认他杀毛文龙和与后金谈和两件事情是放在一起办的,而他在监狱审了八个月,最后定的罪名之一就是“以谋款则斩师”,更明确了袁崇焕与后金谈和同杀毛文龙之间的因果关系。

只可惜明朝审讯袁崇焕的详细档案记录,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否则这八个月的审讯记录一公布,一切疑问就都不存在了。

但即便如此,现在通过综合《满文老档》、《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的记载,已经足够让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

4. 嬉笑怒骂的戏弄

纵观袁崇焕两次与后金谈和,第一次,后金与他谈和的同一时间,派大军征剿毛文龙未果,但逼迫朝鲜屈服;第二次,袁崇焕私自和后金书信往来从一月持续到七月,丝毫不向政府报告,而这期间,他杀了毛文龙,仅仅三月后就是后金大兵出动,绕道进攻关内,兵临北京城下,导致己巳之变。

尤其是第二次,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私通敌方的罪行。就是竭力吹捧袁崇焕的阎崇年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仅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间,皇太极与袁崇焕往来书简12封,《崇祯实录》和《崇祯长编》均没有记载袁督师向崇祯帝奏报此事。”

有些人用袁崇焕在给崇祯的策略里提到过“和为旁着”,并且得

到崇祯赞许来为袁崇焕辩护,也是离奇得很。所谓的“和为旁着”,前提本身就是与后金谈和在政府知道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否则这叫什么谈和?

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谈和是可以抛开中央政府来进行的?

在崇祯二年,袁崇焕始终隐瞒和后金往来的情况,居然还奢言这是“和为旁着”,偷换概念不是这样来偷换的!

反观毛文龙,每次后金要来劝降或谈和,毛文龙都是立刻洞悉后金打的算盘和其未来动向,并报告给朝廷,如崇祯元年三月“卑职将求款达子分营羁候间,火速报闻上台,急令西峰等关一带,日夜严防,万分真的,万分不可弛懈也”。

元年五月“更虑奴之求款于东,而正欲肆骋于西”。

和袁崇焕的昏聩麻木,被后金反复利用,玩弄于股掌之间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如果说袁崇焕在和后金的私自和谈中,是被后金当猴耍,那毛文龙和后金的和谈,则是把皇太极当猴耍。

袁崇焕和后金的往来书信,其语气之恭敬礼貌,态度之阿谀奉承,令人读之几欲作呕。

反观毛文龙与后金之书信,天马行空,淋漓挥洒,或诞言相诱,或嘲笑斥骂,或诡词欺哄,或直抽耳光,毫无顾忌,无所不至。语言之生动,气势之夺人,直有把对方当作小丑任意玩弄之感觉。读之畅快淋漓,大开胸臆,足以捧腹。

不妨把毛文龙的一封给皇太极的信摘录片段,看看毛文龙如何戏弄对方的:“岂知你奸计百出,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似此颠倒反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休说负天之盟,即常言亦不为。故不待详审,可知先番背盟之事,罪故不在我也。第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信字要紧,人而无信,不其虽生犹死乎?况拿去的人不过是我沙汰下不成材的光棍,没行影的花子,安插在北岸就柴薪之辈。在得之者有何益?失之者有何损?况我这边人,原是你那边走来的,今你抢去是你自己抢了自己的去,与我大关系处有何碍窒耶?我自思自悔,当初原不该与你通这个机密,你到底是鞑子家做事,只图目

前小利，哪知日远之大玄妙。”

这封信的背景，就是毛文龙诱骗了皇太极手下的马秀才和可可孤山等人，杀的杀，押解到北京的押解到北京。而且刚刚收留了弃暗投明而来的刘爱塔（即刘兴祚也即刘海），而这刘爱塔是皇太极那边的心腹爱将。

皇太极看见这份信，估计脸都要气得绿了。第一句就要气晕，“岂知你奸计百出，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皇太极会想明明是你毛文龙先把我派去的人杀了，还策反了我这边的刘爱塔，反而倒打一耙。

至于看见“况我这边人，原是你那边走来的，今你抢去是你自己抢了自己的去，与我大关系处有何碍窒耶？”更是一把刀戳在心窝里，要气得吐血。

因为这就是从天启年间弄得后金政权焦头烂额，鸡飞狗跳，苦不堪言的毛文龙。人都往东江诸岛那边逃，结果搞得六七年里，后金不但寸土未得，反而疲于奔命，几近崩溃。

毛文龙毫无忌惮，直接嘲骂他“到底是鞑子家做事”，那就是直接往皇太极脸上一耳光，除了毛文龙谁敢直接这么嘲笑他啊。

更可气的是，单纯的一份斥责嘲骂的信也就罢了，毛文龙还在继续把皇太极当傻瓜戏弄，一边肆无忌惮地嘲笑，一边还在给甜头诱饵，继续哄骗。说我毛文龙是好心与你合作啊，你后金不相信我那就是太蠢了，你要“翻然醒悟、顿改昔非”（毛文龙信中原话）。

这分明就是对皇太极的公然侮辱了！

第五章

十恶不赦罪行逐一辩

在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起事之初,不费朝廷一分钱粮,擒斩敌酋,献俘建功,这个时候,官员对他的感情应该还是不错的,赞誉纷纷,首相叶向高都替他说话。

但随着东江建镇,为了维持这支敌后抗金力量,接济投奔东江的辽东难民,毛文龙不断请求增加军饷,他也就被越来越多的官员厌恶。

再加袁崇焕等人的嫉妒仇视,后金拼命的离间挑拨,多种因素凑在一起,对毛文龙的攻讦之声,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幸亏当时天启皇帝英明睿智,随着了解信息的增多,对毛文龙的支持不但没有因为攻击诽谤而减弱,反而在逐渐加大,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同意毛文龙东江军饷百万的要求。

但可惜,还未来得及落实,天启就不幸病死。朝廷内的那些官员,就如打了鸡血一样,乘着新旧皇帝交接班,崇祯刚刚登基,对一些情况还不是太熟悉的当口,又纷纷上奏弹劾毛文龙。一时之间真可谓谤书盈篋。直至崇祯二年,袁崇焕矫旨杀害毛文龙为止。

我们先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攻击列举一下。

崇祯元年二月,工科右给事潘士闻弹劾毛文龙说,岛兵只有两

万，却虚报十五万，贿赂私通核定军饷的太监，谄媚巴结魏忠贤，假冒功劳，糜费军饷，贪财好色，滥杀降人等等。

据东江塘报，这时应该还有原登莱巡抚武之望上疏攻击毛文龙贪污甚至叛逆之类。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又有时任山东总兵的杨国栋弹劾毛文龙十大罪：

第一条大罪是，专制海外八年，靡费钱粮无数，毫无恢复，反而有铁山失陷之败。

第二条大罪是，后金数次过河屡犯宁锦，毫无牵制。

第三条大罪是，在朝鲜采参挖金，扰害朝鲜，导致朝鲜生有二心。

第四条大罪是，铁山失陷，朝鲜半入敌手，伤残属国，损兵折将。

第五条大罪是，难民来投奔，冒充兵数，要么饿死在沟壑，要么被金兵杀死，还掩败为功。

第六条大罪是，皮岛孤悬海中，不是用兵之地。去年和内臣太监串通合谋，请求军饷百万，把百姓膏血都拿来填苦海。

第七条大罪是，零星收降，捏报献俘，还假造后金的书信，欺骗朝廷。

第八条大罪是私自贸易，用粮食布匹，交换敌方的人参貂皮。

第九条大罪还是通敌接济，做生意，怨声载道死亡相继。

第十条是，辽民总数不满三万，而造册说有十五万人，侵克钱粮无数。

还有对移镇之类的提议，置若罔闻，对皇帝要求回话，也绝无应答。还有借口遭遇海上风浪，在登州上岸，许多船只在登莱沿海窥探，不知意欲何为等，都是重大罪行。

当然罗织毛文龙罪状最有名，并最终用作杀害毛文龙借口的，就是袁崇焕的手笔。

袁崇焕给毛文龙定的所谓十二当斩之罪，相关历史读物都会提到，而且其实大部分和杨国栋弹劾的十大罪雷同。但这里为了完整性起见，也还是介绍如下：

第一条是，按照祖制，武将在外，必须受文臣监督辖制，而毛文龙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的管辖核实，专横恣意。

第二条是，毛文龙开镇以来，没有一件事没有一句话核实的，捕捉零星金人，杀投降者，杀难民，冒充功劳。

第三条是，毛文龙刚愎撒泼，没有人臣的礼节。而且最近根据登莱官员报告，他还说过“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话，大逆不道。

第四条是，文龙当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没有分毫发给士兵，每月只有散米三斗五升，所以是侵盗边海钱粮。

第五条是，皮岛自己开马市，私通外夷。

第六条是，毛文龙让数千部下官兵改姓毛，而且自行给授副将、参将、游击、守备等札书不下千人。

第七条是，从宁远回来，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人，取银九百两，没收货物，夺取其船只，还把入关起来，恬不为怪，带头做盗贼。

第八条是，收部将的女儿为妾，民间妇女有姿色的，都设法收纳。身为不法，官丁效尤，好色海淫。

第九条是，人命关天，毛文龙拘束禁锢难民，不让一个人渡海移居到山东等地方去，每天只发给米一升，命令到金占区挖掘人参，惨遭后金屠杀无数，怕死不去的人，就听凭其饿死在岛中，皮岛白骨如山。

第十条是，奏疏请求内臣出镇，派人到京城活动，拜魏忠贤为父，位置魏忠贤冕旒像在岛中，交结近侍。

第十一条是，奴酋攻破铁山，杀辽人无数，毛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

第十二条是，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观望养寇。

这里所据为明清史料内阁大库残留档案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二十一日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毛文龙死后，是非难定，即便一些肯定毛文龙功绩的人，也对他有不满之辞，如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毛文龙“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这个评论被很多资

料汇集性的史书如《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所抄袭。

纵观毛文龙所受攻击，横加之罪名可谓多矣，如袁崇焕死党程本直说的“客亦闻乎年来中国所议文龙乎？否也。曰虚兵也；曰冒饷也；曰假俘献捷以骗功骗赏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长也；曰一跋扈将军也”。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加在毛文龙身上的罪名总共有如下几个方面：

糜饷问题，冒功问题，贪财好色的问题，谄媚魏忠贤问题，专制一方的问题，野心问题，通敌问题，浮夸骄恣问题。

下面我们不妨逐一来分析驳斥。

一、说毛文龙糜饷是天大的冤枉

关于糜饷，可以分成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是毛文龙实际领到的军饷是否过多，第二毛文龙是否虚报兵数以谋求骗取更多的军饷。

1. 兵减饷增，袁崇焕该当何罪

攻击毛文龙的说法是“专制海外八年，靡费钱粮无数”，那实际如何呢？崇祯初年任工部主事的徐尔一在一份奏疏中说：

东江实际收到的军饷，从天启二年（1622年）到天启七年，一共就是银子一百零五万两，米豆等粮食共九十多万石，还在纷纷责怪毛文龙虚冒军饷。然而关宁一镇，五六年来，每年用银三百万两，米豆一百三十万石，再加上内帑不时给发，为什么还成天担忧缺少军饷而导致士兵哗变鼓噪呢？

也就是毛文龙六年收到的军饷总数，甚至还不到关宁一年军饷的一半，如果这是“靡费钱粮无算”，那孙承宗和袁崇焕负责的关宁明军那估计就要找个地缝钻下去了。

毛文龙在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曾经把东江收到的军饷粮食，逐年开列，这里不妨列举如下：

天启二年收到饷银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二两，米豆八万三千石。

天启三年（1623 年）收到饷银七万，米豆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一石。

天启四年（1624 年）收到饷银十一万二百八十六两，杂粮十九万五千二百六十四石。

天启五年（1625 年）收到饷银二十七万九千三百八十两，杂粮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

天启六年（1626 年），饷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二十两，杂粮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

天启七年，饷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一两，杂粮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石。

把天启二年至天启七年每年收到的饷银和粮食数字加起来，合计六年收到饷银总数为一百零五万一千九百三十六两，粮食为九十三万四千五百七十八石，和徐尔一在奏疏中所说的数字完全吻合。平均下来，每年收到的饷银不到十八万两，粮食不到十六万石。

以上数字经得起所有来源的史料对照查证，《明熹宗实录》、《崇祯长编》、《李朝实录》甚至后金的《满文老档》都有记载明方给毛文龙东江部队军饷极少，导致其依赖朝鲜供给，因此指责朝鲜说“毛文龙系明将，其明帝且不给钱粮，尔国却给田耕种，供给钱粮豢养之”，“至毛文龙信，其明帝亦置之不理，不供其饷，尔为何供其粮也”？

有些人曾经提出毕自严在崇祯年间的《度支奏议》中的《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额饷额数疏》，说里面提到天启七年东江饷银是八十万，那只能说明他们根本连《度支奏议》中的完整原文都未看过，辗转抄袭就拿来糊弄别人了。

实际《度支奏议》奏疏原文说的是天启七年六月，天启皇帝下令把东江军饷增加到百万，然后户部设法从不同渠道加派来筹措凑满这百万军饷，其本身就掺杂大量水分，所以毕自严抱怨说“昔日所派之数原虚，今日所省之数愈少矣”。更不必说这筹措的军饷在崇祯元年也没有真正实发给东江。

为了便于大家自己对照，我在附录里把《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额饷数疏》的相关原文，和毛文龙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的塘报关于天启七年军饷领取情况都摘录出来，一比对，事实就一清二楚了。

而关于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明朝发给毛文龙饷银每年十几万两，下面的部分还会提到，这里就不摘录了。

东江部队收到的军饷连袁崇焕的关宁明军十分之一都不到，而在军事上对后金的打击、牵制作用却是关宁方面望尘莫及的。就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许多人，不分青红皂白，昧着良心说毛文龙靡费军饷无数。

也就难怪毛文龙在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愤慨地说道：如果用有数字可查的军饷，故意夸大其辞来激起陛下的雷霆之怒，一定要冤枉我，给我扣上冒滥军饷的罪名，我也决不求生避死，只是两目不瞑于九泉而已。

而袁崇焕不顾事实，偏偏还是要给毛文龙扣上侵盗钱粮的罪名：“文龙自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无分毫给兵，每月止散米三斗五升，侵盗边海钱粮。”

先不论这所谓“每岁饷银数十万”已经是在扯谎。就说他指责毛文龙饷银“无分毫给兵”吧，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实际情况是，毛文龙就算把朝廷发的所有饷银都拿去买粮食，还无法让岛上军民吃饱肚皮，毛文龙自己在奏疏里就说得很清楚：“如年来本折四十万，南兵辽兵，均藉其食。”

更不必说还有大量其他杂项支出以及物资器械的购置：奖赏军功，安抚夷民，买修船只，粮食种子的本钱，马匹需要的草料，皮张、火器、盔甲、弓箭之类，都在这本色粮食和折色饷银合计的四十万内。而对比之下，其他各边镇发给额定的军饷之外还另外有行粮月粮、马匹草料。

毛文龙拿什么银子去直接发给士兵？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毛文龙死后，口口声声说毛文龙“侵盗钱粮”，并对岛上军队一裁再裁的袁崇焕，反而给崇祯上奏说原来的钱

粮不够用。

先是说岛上粮食不够，“督师辽东袁崇焕疏言毛文龙既诛，岛中需米甚急，请令登莱道府速运接济从之”。

然后又上疏说要比毛文龙时期增加饷银；“银则加于旧额十八万五千余两，而草折料豆在外也”。

显而易见，袁崇焕在事前给毛文龙定的罪状，和事后给崇祯皇帝的上疏里必然有一处是在撒谎！

如果说他在把东江军队裁减到两万八千之后，饷银却比旧额增加十八万五千余两是实际需要，那扣在毛文龙头上侵盗钱粮的屎盆子当然不攻自破！毛文龙不但没有侵盗钱粮，相反在国家军饷不足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自己想办法填补了不少亏空！

如果说毛文龙侵盗钱粮是真的，那就只能认为袁崇焕自己侵盗钱粮成倍以上了。

良知还没有丧尽的人就自己做一下这个选择题吧！

毛文龙军饷是多是少，最后可用明朝官员自己提供的史实做一个对照。《崇祯长编》里有这样一条记载。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的时候，陕西道御史余应桂弹劾登州巡抚孙元化，说他每年耗费金钱八十多万，是过去毛文龙的军饷数倍！结果两年下来，收复四州援助大凌是谈不上的，就连岛上士兵两次变乱，也都充耳无闻。而且登兵号称二万多人，调动奔赴关宁的人，也只有二千五百而已，光是这些篓子破绽，罪已滔天。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精通西学，在行政、军事方面的能力不去说他，但其个人品德是没话说的，绝对不会拿着国家的钱胡乱糟蹋。可就是这样一位官员，一年到手的饷银八十万，是毛文龙的数倍（明官员的原话，而实际按每年平均数算的话，也确实如此），结果表现出来的成绩实在糟糕，不要说岛兵两变，最后是登莱本身都因缺饷发生了兵变，连登州城都沦陷，整个山东都被叛兵凌虐了一年有余。

毛文龙用少得可怜的军饷至少还苦撑了八年多，而孙元化呢，两年都撑不下来！对比之下，只能说那些硬昧着良心污蔑毛文龙东江

军饷过多，给毛文龙扣上糜饷帽子的人，是基本事实都不顾的。

2. 兵数，朝鲜人的证词

夸大虚报兵数，也是扣在毛文龙头上一条很重要的罪名。

潘士闻说“岛兵不过二万虚称十五万”，杨国栋说“难民来归冒充兵数”，“岛中辽民总凑应点不满三万，欲冒皇赏，册开十五万”。

这两位还是太客气了，毛文龙自己在塘报奏疏里曾经提到过的兵数最多的时候，其实远不止十五万，而是数十万，或更具体一点是二十余万。

如崇祯元年十月初八日具奏里说“每年以二十余万之众，而叨二十万之饷，蒿目劳心，千疮百孔”。

还有崇祯二年五月十三日的奏疏里说“故兵每称二十余万，岂职虚报多数而冒粮饷乎”。

所谓的十五万或十六万，是早期东江开镇之初的数量。如《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说“略选兵已十余万；并新归附各岛，安插屯种，辽之男妇，合兵民已五六十万矣”。“合亦有劲兵十四五万。内有衣甲器械者，仅四万人，余俱发屯种。”

而到后期，尤其是天启四年之后，随着逃往东江的辽民数量越来越多，相应选出的军兵数量也就水涨船高，达到二十余万是没有问题的。

在天启后期到崇祯初期，凡是毛文龙提及军队数量十五六万的时候，前面都是加修饰语的，并不是指东江军队的全部数量，而仅仅是指挑选出来的精壮兵丁。

如崇祯元年五月初七日的具奏里说“该各岛兵丁精壮者合计实有十五万余”。

还有如崇祯元年四月毛文龙在东江塘报中说“辽人归者，每以千百计。臣挑选精壮官兵十五万四千余名报部”。

这十五六万或为王梦尹、姜曰广二人至东江核查后削减的数字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里说，一开始，毛文龙报称兵二十多万，给事中王梦尹、编修姜曰广上岛视察，报十六万。

毛文龙在自己的奏疏里也有提到情况与此相符,其大意是说谁知道朝廷议论纷纷,今天说我报的数字太多,明天说我贪求无厌,以致先帝被这些议论迷惑,派遣科臣王梦尹、词臣姜曰广,到岛上点阅核查,因为朝廷财政困难,就减报到一十多万。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熹宗实录》里记载的天启六年王梦尹、姜曰广二人至东江考察后回来上呈的报告里,内容似与上面两则记载矛盾。

从熹宗实录记载来看,王梦尹、姜曰广二人的意思分明是东江地区兵民总计不过十余万,而他们觉得这其中能用来作为兵士的是两三万而已。

这显然与《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和毛文龙塘报里的记载有很大出入。

那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首先当时东江聚集的兵民总数究竟是多少?王梦尹、姜曰广两人说只有十余万,这显然是严重低估了。这种低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他们两人毕竟只是出使朝鲜顺带视察东江,受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对情况的了解是有限的,也不可能一个岛一个岛、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详细统计过来。

另一个是他们作为朝廷派遣的官员,考虑的最大问题还是如何尽可能减轻朝廷负担。这两者结合起来,使得他们宁可按照最小数字来估计。

按照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投金后的尚可喜在奏疏里称东江接济过金占区逃亡辽民百万,朝鲜《李朝实录》里君臣的对话也提到东江接应辽民百万,《满文老档》虽没有具体的数字,但仅从其记录的辽民逃亡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巨大,也可以窥见数量之多。综合多方面的史料证据,则王、姜二人所说的当时东江兵民十余万是过少的,至少也当在几十万以上。

另一点,王、姜二人说“目前堪用者二三万”,实际也是从朝廷愿意提供的军饷器械所能支撑的数量而言,而毛文龙说数十万兵,则是

从东江军队带有全民皆兵的特殊性而言。

那为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和毛文龙奏疏都把王、姜二人报的辽民数量说成兵数十万呢？在一些人眼里，这当然就是毛文龙信口开河，胡乱虚报，篡改大臣意见，其用意不过是为了骗取更多的军饷；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作者偏袒毛文龙，当然就帮忙一同说谎了。

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不妨来看两条记载。

一则来自朝鲜的《李朝实录》在天启六年十月丙午记载的一段朝鲜君臣之间的对话：“上又曰‘毛之军兵几何？而人心亦如何云’。晚曰‘人口数十万云，而设有投虏之举，愿从者不多，冰合之后，则逃散必多’。”

这段对话里所谓“人口数十万云”是对“毛之军兵几何”这个问题的回答。

如此看来，一些朝鲜官员如张晚估算的毛文龙光是军兵数量就达到了数十万之多，那也就是至少二十万。

还有一个人的证词就更可玩味了，那就是反毛急先锋袁崇焕提供的。在崇祯二年二月，袁崇焕上疏说：东江兵二万八千，这是登莱道按察使王廷试说的数字。数十万，这是东江总兵毛文龙说的数字。我屡次派人察看，没有数十万，但也未必只有两万八千。现在只算应该用多少兵，和能够养多少兵，又怎么能把辽人全都当成兵来养呢，在二万八千之外的人，在关外随便安插，让他们自己屯种就行了。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也好，袁崇焕也好，他们都是厌恶毛文龙的，对他们来说不存在故意夸大毛文龙军队人数的问题。

按照朝鲜官员张晚的说法，毛文龙东江军兵有数十万，按袁崇焕的说法，没有数十万，但也肯定不止两万八千。

这里袁崇焕的说法是格外值得琢磨的，他是厌恶毛文龙，并且拼命在皇帝面前诋毁毛文龙的人。他派人几次考察过东江部队人数，这点应是没有问题的。他身边的一些亲信如徐敷奏等人，在天启六年就亲自到过东江，利用东江条件太苦，军饷又低，煽动了李矿、郑继

魁等一大批人跑到宁远去，这些人本身就可以给他提供相关信息。所以对东江部队士兵人数究竟多少，他心里应该是有点数的。

如果东江的军队人数是在十万以下，那按照他的心态，估计早就把虚报兵数作为毛文龙的罪状，在给崇祯皇帝的奏疏里，猛烈抨击了。

但现在呢？他的言辞却显得相当含糊和暧昧，不是数十万，也不是二万八千，究竟是多少，他却不说不。是不愿意说呢，还是没有能力说？答案多半是毛文龙的东江军队士兵人数至少也在十几万以上，所以袁崇焕才刻意回避具体的数字。

看到这里，有些人会说了，如果毛文龙真的有十五六万人甚至二十万的兵力，那他完全可以对后金正面进攻了，又何必再打游击战？

要回答这个问题，以及要解答前面姜曰广等报告说民数而毛文龙说是兵数的疑惑，就先要了解一下基本的背景。

毛文龙的东江部队，和其他明军不一样，不是朝廷现成指派给他，大部分是他自己从后金统治区逃亡出来的剃头辽民里挑选、训练出来的，再加上各种军用物资如盔甲器械的奇缺，导致兵民难分。这也是东江军队数量究竟多少，不同的人争论不已，不同地方的记载显得矛盾混乱的原因。

但是综合《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以及《满文老档》、《李朝实录》，还有《崇祯长编》里袁崇焕的奏疏等等记载，我们仍旧可以大致弄清事实真相。

首先毛文龙赖以起家的部队，只有两百人，这点是没有疑问的。在袭取镇江，前往朝鲜期间，大批后金统治区内的剃头汉人来归附，这在朝鲜《李朝实录》中有记载，说毛文龙“所率兵士不满数百，其余皆剃头归附之人”。

天启二年，明朝政府决定支援毛文龙，并开镇东江，建立以皮岛为中心的抗金根据地，这个时候毛文龙大概就已经收拢聚集了十万多辽民，“老幼男妇归者十万”。

在这之后，无论是从《满文老档》还是《李朝实录》，我们都可以

看到有大量金占区内的辽民投奔毛文龙的记载(具体可看本书第一章的内容),其规模当在百万左右,扣除那些通过东江转往山东等内地,以及病死战死的人数,则常年在东江的辽民总数也有几十万。

那么这些辽民是否被毛文龙选拔组织成军队呢?回答是肯定的!

前面已经引用过努尔哈赤给毛文龙的书信,明确说从后金那里逃亡出去的辽人,被毛文龙收容后,“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

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东江的“从军”显然和在关宁,在内地那些穿着正规军装,拿着足额军饷,器械充足,训练严格的从军是完全不同的。

对东江军队的数量问题,关键是要区分清楚三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所有愿意接受毛文龙节制调遣的人数,也就是包括到后金去做间谍刺探情报的人,可以充当疑兵吸引后金注意力的人,可以壮大声势呐喊助威的人,也当然包括半兵半民,种田、打鱼、挖参乃至经商,自力更生解决部分后勤供给,需要时也可被毛文龙调用参与军事行动的人。这些人是东江军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计在内,全部东江军队人数应该在二十万以上。

第二个概念是那些经过挑选,身体还算结实,受过毛文龙的组织训练,只要吃饱肚皮,提供军械盔甲,就完全可以充当正面对敌厮杀力量的人员数量,这部分人就是毛文龙报部的“十六万”。

第三个概念是毛文龙东江部队能够分派到军服,盔甲,器械,火药等等作战物资的人数,这部分的人数完全视后勤供应而定,在不断变动。如果明朝能提供更多的物资,那这部分人数就相应会多,如果明朝提供的物资少,这部分人数就会少。比如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记载的是当时“内有衣甲器械者,仅四万人”。

区分清楚这三个概念,我们就可以对不同记载之间的混乱矛盾,以及为何毛文龙虽称有军队二十万,但还是只能打游击战,无法对金正面攻击的疑问茅塞顿开了。

在姜曰广、王梦尹二人看来,东江大部分辽人都是瘦得皮包骨

头，疲累不堪，不足以充当士兵的人。但在毛文龙那里，这些都是历经九死一生，精明机智，不怕吃苦，善于忍饥耐寒，熟悉辽东地形，风土人情的精锐。只要朝廷肯发足够的军饷，让他们吃饱肚皮，肯发足够的器械，装备齐全，完全就可以成为一支让后金胆寒的军队。

实际上，东江军队这种复杂情形，明朝的皇帝天启和崇祯倒是比他们那些迂腐的臣下更清楚。崇祯皇帝就明确说过：“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难与内地金募额饷相同。”

这应该是极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崇祯皇帝都能清楚的事情，袁崇焕会不知道么？其实在上引的关于毛文龙军队数量究竟有多少的奏疏里，袁崇焕提到的“今只计应用兵若干，与能养兵若干，亦安能尽辽人而兵之，而养之”这句话，本身就是暴露了真相。

也就是他很清楚，毛文龙在东江实际上是“尽辽人而兵之，而养之”，基本上除去妇孺老弱之外，群岛上已经是全民皆兵，把所有能够投入军事作战的人都动员起来的。否则袁崇焕这句话就是无的放矢了。

朝鲜的张晚，是朝鲜国王派到边境去查看后金和毛文龙情况的官员。他曾经亲自去毛文龙的东江视察过，当时对东江部队器械的简陋，人员的疲劣印象深刻，大加丑诋，但对东江接近于全民皆兵的性质，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在回答国王“毛之军兵几何？”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才会回答说“人口数十万云”。

袁崇焕的意图无非就是根据朝廷愿意提供的兵饷数量来规定东江军队人数，而不是根据东江军队人数来提供军饷。

这基本上已经足以让毛文龙的军队数量究竟多少这个问题真相大白了。

类似袁崇焕这样不是根据实际的作战人数来提供军饷，而是根据愿意发的军饷，来规定人数的做法，其实在之前明朝派遣的核查东江军队人数的官员那里毫不算新鲜了。

王梦尹和姜曰广二人的核查是第一次，这两人是清正廉洁的，为

了给朝廷省钱,把东江总人口缩减到十五六万,而能当兵的限制在三万。

而到了崇祯元年,黄中色和王廷试两人先后核查,一个人把兵数定为六万,另一位则直接削到两万,理由都不外是“极论粮饷艰难,劝臣汰兵”。

由此可见,并不是毛文龙骗取军饷而虚报兵数,真实情形恰恰是许多官员为了节省军饷,而拼命虚报削减东江军队的兵数。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一下,袁崇焕在杀害毛文龙之后,曾经在一封奏疏里说东江“合老幼止四万七千,然人也,而非兵”。

当时东江因为袁崇焕封锁海路,禁止通商,切断经济来源已是半年有余,确实已经饿死和逃亡流散大半,还有许多被送到山东去了,人数急剧下降是事实。但是像袁崇焕说的那样,“合老幼止四万七千”,则是在公然撒谎了。

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有一段孙承宗的话,正好揭穿这个谎言: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兵部尚书梁廷栋提议把东江军队调到宁锦一带,督师大学士孙承宗说东江军队目的是牵制,但驻扎的不是地方,如果移驻到要害,足以起到牵制的作用,而且其兵民十多万,兵调走了,那百姓不能独自留在那里,用船渡,恐怕急切之间也不够。

也就是即便人数急剧下降之后,当时各岛上兵民合计还有十多万,而不是袁崇焕所说的四万多。

3. 从《史记》王翦的故事说起

看了上面这些内容,就会有人说了,那毛文龙为什么非要维持二十万左右队伍,明知道政府的财政困难,那就干脆自己从一开始就只维持两三万人左右的队伍,其他人都送到山东内地不就行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重温一下《史记》中的《王翦列传》。

里面说到秦始皇要灭楚国。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回答只需二十万;再问王翦,王翦回答说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认为王翦是怯弱,于是就派李信去。结果李信率领的秦军大败而归,秦始皇这才

后悔，向王翦道歉，让他率领六十万军队最后攻灭楚国。

从这个历史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敌手实力摆在那里的时候，要实现特定军事目标，军队数量必须达到某个底线，这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无论军队战斗力多强，统帅水平多高，谋略多出众，如果数量达不到，那还是不行！一个合格的军队统帅，对双方实力对比，达到胜利需要满足的条件，必须心中有数，而不能寄希望于奇迹和侥幸。

这条军事原则，放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同样合适。当时的情况，明朝与后金的战斗，问题不在于战斗力差别如何，恰恰在于军队数量本身太少。

战胜后金的诀窍，不在于修城，而在有足够的经过训练的，敢于作战，充满斗志的军队，规模至少要在二十万以上。

但这二十万的军队从哪里来？从别的地区调来，成本高昂，劳民伤财不说，他们对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的不适应也不说，除开少部分精锐的川兵和浙兵，光是士气和斗志都差很大一截，这怎么能打仗？

类似袁崇焕等人召集的没有在后金统治下呆过就直接逃出来的辽人辽将，他们怯敌心理更大，要守城可以，一到野战，往往也是未战先怯，最后还是要掉链子。

而那些亲身经历过后金残暴统治，已经家破人亡，拼尽万死从后金统治区里逃亡到毛文龙东江地区的剃头辽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本身是从鬼门关上来的，他们已经知道后金统治残暴到什么程度，他们宁愿冒着被杀死，半路上饿死，冻死的危险，也要逃出来。他们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用木棍用毒药也要和金兵干。金兵看见这帮疯子心里就发怵。

这样的一些人，把他们组织成军队与后金作战，本身就已经是有拼死一斗的决心，其效力远比其他军队要大得多，事半功倍。

更不必说这些人，对辽东的地形熟悉，对气候适应，对后金的情况了解，知己知彼，他们也惯于吃苦，忍饥耐寒的能力都不是其他人能比的。

陆云龙曾经在《辽海丹忠录》中慨叹：“尝闻东江辽兵最耐苦，持炒一升，可支十许日，昼伏夜行，卧草餐霜，能出不意杀人擒人，皆一班可用之士。今其士固在也，谁其用之？谁其用之？”

可以说从后金逃亡到毛文龙管辖的东江群岛的辽民去向，在明朝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是决定整个明金战争成败的枢纽所在，能否把这些辽民转变成有战斗力的军队，是能否消灭后金的关键。

如果任由这些人流散，衣食无着，反而可能成为内乱的由头；如果散在关外，仍旧可能被后金掠去为其所用。只有设法收拢住这些人，聚集住这些人，整合为军队，才是收复辽东之第一要着。

正如毛文龙所说：招集训练辽兵，既可以免除安家的费用，又可以节省因为远距离调动导致的时间拖延，再加上熟悉敌方的情况，我方得到一人，敌方就损失一人。有些人担心辽民藏奸，不许他们渡海。不知辽人将官或者多有通敌的，但辽民真的是心怀报国，何奸之有？

毛文龙正是以自己出类拔萃的战略眼光，洞察到了问题的要害，所以才拼尽全力来收拢住逃亡过来的辽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要设法维持住数十万人的规模，这就是毛文龙的苦心所在。

他在奏疏里曾经吐露自己的一片赤诚：我身处东江危险之地，和敌人相邻，来投奔的辽东人民，每年都至少以万计，全都想奋臂报父兄妻子被金人杀害欺辱的大仇，希望能拿回被金人抢去的土地田宅。我也忘迹于将官和士兵的区分，全心全力，希望上能报答国家的恩德，下能对得起老百姓的期望。所以每每报称二十多万的兵数，难道是我虚报多数来冒领粮饷，来贪污金钱吗？不过是希望收复辽土而大声疾呼，盼着朝廷能给予足够的支援。如果军饷器械都充足，就可以趁机扫平金人巢穴了！再没有别的心肠，再没有别的打算！这一片赤诚之心可以交给朝廷查证，可以质之鬼神，对之天地。

真是字字带血，语语含泪。

但朝廷的官员，还有袁崇焕这些人的逻辑和毛文龙是完全不同的。

朝廷官员想的是如何让军队数量能迁就眼前的财政状况，如何能更加省钱，避免增税，避免让南方老百姓承受更多负担。

袁崇焕想的是，反正野战打不过后金，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去修城，宁可裁减军队，省下钱来也要修城，绝对不能让任何其他事情打扰、妨碍他的修城计划。

而毛文龙看到的是，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用军队数量的优势去战胜消灭后金，那所谓的省钱，恰恰是让所有的军队耗费都成为无功，所有的钱都是白白浪费，一年一年地拖下去，最后耗费的军饷物资，只会十倍、百倍的大。至于靠裁兵节省经费来修城，那更是饮鸩止渴，等于无形中助长、默许怯敌心理。

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如索性也不要军队了，反正最后一样失败，这样省的钱还多一点。他在天启三年的一封奏疏里说早消灭敌人一天，就早省一天的费用。本来应该花费的，反而吝啬不给，不能趁机荡平，让金贼迁延岁月，勾结其他敌对势力，那危害就无法估计了！哪一个省钱，哪一个耗费巨大？而且发足军饷，也不过是百万，迟平一年，就要多耗费四百万。如果朝廷真的要节省，那三年以来，发给我的数万银米，也终究不能完结平奴大事，对社稷国家来说，终究是白白浪费，为什么不撤回东江兵马，让我归田休息，连这数万银米也干脆都节省算了。

后来在崇祯二年，毛文龙又再次苦口婆心地疏说：朝廷为恢复辽东做的打算，难道就只考虑眼前缺乏军饷所以要如何省钱？难道不知道敌人是什么样的兵马？什么样的器械？敌人跳梁十多年，都是久经战阵锻炼的精锐之敌。让饿着肚子的二万八千士兵，要战胜如此强敌，天下人听到了，难道不笑话我对敌方情况缺乏估计到如此地步？如果我确实能用二万八千人可以战胜强敌，那也不必拖延到今天了！俗话说：“成大事者，不惜小费。不一劳者，不永逸。”现在我九年以来陆续耗费的粮饷，也有一百万多了。如果八年前就能答应我的请求，给足军饷，那不是远胜于现在吗？

可惜的是朝廷官员至死不悟，崇祯皇帝千方百计设法打破官员

的禁止，设法增加赋税，加强军力，仍旧阻力重重，最后只能以死壮烈殉国。

二、功劳是吹出来的？

所谓冒功，就是功劳都是假的，是吹嘘出来的。

这又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说：

一个是杀良冒功，这自然包括杀降冒功，杀难民冒功，总之就是不敢和后金打仗，只能用投降的或平民的人头欺骗朝廷，博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欺骗了，而是属于最恶劣的罪行了。

一个是掩败为功，那就是把失败说得轻描淡写，甚至反而说成是胜利。

再一个就是牵制虚套，也即明明没有起到任何牵制作用，却硬说自己是牵制敌军。

下面我们也来逐一分析一下。

1. 杀良冒功？听多方证言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看看袁崇焕的前辈孙承宗是怎么说的，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的《明熹宗实录》第2294页有孙承宗的一个奏疏，前面引用过其中孙承宗证实毛文龙派间谍到后金活动情况的内容。

而在这份奏疏的前半段，还有孙承宗的一段话，是说天启四年正月初十日接到毛文龙的报告，呈解屡次斩获的金兵首级和俘虏。孙承宗让当时任关外道监军副使袁崇焕逐一查核检验了三次，验明的首级有三百七十一颗，都是真正的后金女真兵的头颅！当阵生擒的虏贼四人，除了二名已经死掉的不外解，解运的两人也都是真正的金虏。

孙承宗为此赏赐报功人员陈汝明等银两，并命令将士聚集在衙门外，三炮三爵，用彩亭送各员役到住所。当时在宁远，恰好来领赏

的蒙古林丹汗等部落的人都在，孙特意让各官押解这些首级、俘虏经过各部落，然后抵达宁远。

孙承宗表示这样做不但能鼓舞激励边人，也可以让世人知道天下还有能杀贼的人，后金叛贼自有可以被消灭的一天。取得的效果也不错，一时人心，都颇为感动云云。

也就是说毛文龙送解的后金士兵首级，当年是孙承宗派袁崇焕过去，亲自严格查验过的，查验的结果“俱是真正壮夷”。而到了五年之后，袁崇焕居然颠倒黑白，宣称毛文龙杀良冒功，那这样看来，岂非当年他自己就是杀良冒功的帮凶了？

这或许只能解释为，杀毛文龙之时，袁崇焕确实为了与后金谈和，达成秘密协议，明知毛文龙是后金恨之人骨的劲敌，却还要不惜一切手段，罗织罪名，将其除掉，以取媚于后金。

有些人为抹黑毛文龙，干脆一口否认孙承宗奏疏内容的真实性，他们的意思就是孙承宗也在造假，在谎报军情，欺骗朝廷！为了糟蹋毛文龙，不惜把孙承宗和袁崇焕一起拉到欺君谎报的泥潭里去，这心理确实够偏执的了！

对于毛文龙杀敌献俘献首级，是真是假，我们不妨再听听在朝鲜和东江地区巡访视察过的两位明朝官员是怎么说的吧。

天启六年的时候，明朝派遣了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兵科给事中王梦尹出使朝鲜，兼视察东江毛文龙部队。天启六年九月，这两个人视察回来，给朝廷提交了报告。前面在虚报兵数问题上已经提到过他们的报告了，他们非但不存在偏袒毛文龙的问题，反而刻意压低了东江的人数兵数。

他们的报告主要内容有八条，其中兵部批复四条，户部批复三条，还有一条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兵部批复的四条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辽民”、“辽兵”两条外，还有“辽官”和“俘解”。

关于俘解，两人是这样说的：明方的军民，从旅顺到铁山的沿海和金人相邻，耕种、放牧、侦探，到处都可以相遇。或者是对方，或者是我方，以多擒少，以壮擒弱，这都是经常发生的情况。特别是今年

五月(指天启六年五月)之战,毛文龙亲自督率军队袭击金占区。虽然被金兵杀伤,损失了许多将领和士兵,我军也略有擒获。

以前朝廷因为毛文龙解送俘虏次数太过频繁,所以奉有明旨:不是真正要紧的头目、首脑,不必押解俘虏到京。但我们两人觉得堂堂大将,率领自己部下的士卒,斩获敌方的首级和俘虏,这功劳也是值得表彰纪念的。今后除了零星小丑听任文龙自行处置正法外,那些俘获的真正军官头目,似乎也不妨献俘押送到京,以壮国威。

说的很清楚,“以多擒少,以壮擒弱,或彼或此,此常情也”。这本身是和东江所处的特殊地理形势有关,也和毛文龙采取的积极袭扰的战略有关。

有些只知道龟缩守城的人,自己无能,不敢和后金野战,就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也就难免疑神疑鬼,看见有擒斩献功就当成是假的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姜曰广、王梦尹受了毛文龙的贿赂才来说毛文龙好话的呢?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位文官实际上本身就是打压东江力量的文官集团里的成员,所以根本不存在故意造假来粉饰毛文龙的问题。这里他们的记录不过是保持了一点起码的客观公正而已。但对那些丑化毛文龙到了歇斯底里、走火入魔程度的人来说,任何一点对毛文龙功绩的正面评价,他们都会断定是评价者受了毛文龙的贿赂,以此彪悍逻辑,自然无往而不胜。

为了打消他们的多疑心理,这里还是有必要说说这两位官员是什么样的人。朝鲜《李朝实录》中对这两个人的品格有详细的记载,这两个人清廉简朴,得到朝鲜老百姓的一片颂扬,所过之处,当地老百姓都成为他们的粉丝,甚至想要立碑来歌颂。

在姜曰广、王梦尹两人临别时,朝鲜方面甚至有这样的记载:都城老百姓拦着道路称颂诏使的清德,百姓数量几乎到一万五六千左右。父老五六十人叩头拜谢说“近古以来,不曾见如此之行,老爷恩德,无以为谢”云云。而两位天朝使者,下轿举手称谢良久才离去。

姜、王二人之清廉刚正，连朝鲜人都感佩不已，显然他们是不会受毛文龙贿赂的，更不存在故意夸大美化的问题，比起那些道听途说，他们的话比那些胡乱想象的人妄自揣测而来的断言要可信得多。

如果有些人觉得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们不妨再从后金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一下。倘若毛文龙是杀良冒功，是在皮岛吃饭不干事，那最高兴的大概就是后金了。那他们不但不会竭力设法除掉或招降毛文龙，还应该感谢他才对。第一可以做个活生生的反面广告，告诉辽东难民，你们看投奔明朝的下场就是被杀掉；第二可以白白浪费明朝的粮食，消耗其国力。

但实际上，后金对毛文龙是个什么看法呢？不妨看看天启五年努尔哈赤试图招降毛文龙的书信内容：

你如此效忠君主，但你们皇帝年龄还小，大臣都昏聩，就算你能蓄积朝鲜八道的财帛和皇帝所拨给的钱粮像山一样，又有谁来羡慕你的处境，你能使京城的大臣赞扬你吗？我的意思，不如你去攻取朝鲜的义州城，和我相邻而居，那朝鲜敢来侵犯你吗？你驻扎义州之后，朝鲜如果投降就算了，如果不降，那你来借用我的军队。如果你能和我相互倚靠，迫使朝鲜投降，那你的前途无量。你既然得罪了皇帝，不能再回到明朝，而朝鲜又不能容纳你，我能置你于不顾吗？你还能到哪里去呢？如果你因为派奸细、收纳逃人而恐惧我责备你，那你不必多虑了，这是各为其主效力，难道我还会因此对你心存恶念吗？你如果归顺我，难道不也是要这样来为我效力吗？古代的韩信，抛弃楚霸王而归顺刘邦，胡敬德抛弃刘武周而投降李唐，因为他们投降而成就大功，留给美名于后世。有什么人来鄙视他们不忠于君主而叛投其他主人呢？

在努尔哈赤看来，毛文龙不仅是为明朝忠诚效力，而且是效很大的力，明朝那些官员对毛文龙的攻击，在他看来是“君幼臣昏”。

当明朝的官员对毛文龙嗤之以鼻，认为他毫无价值、冒功糜饷的时候，而努尔哈赤却迫切希望毛文龙像为明朝效力那样来为自己效力，所以才说“尔若降我，岂不亦如此效力于我乎”？

如果有些人所谓毛文龙杀良冒功是真的，难道努尔哈赤会希望毛文龙“亦如此效力于我”？也会希望毛文龙杀后金自己人来欺骗他？荒谬性一目了然！

为了招降毛文龙，努尔哈赤开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甚至不要求毛文龙直接投降，只要毛文龙脱离明朝，攻击朝鲜，自立一方就可以了。

而到了一年后，天启六年五月，努尔哈赤又写信试图招降毛文龙说：“毛将军，无论你怎么样为国效力，但你的国家灭亡的时候已经到了，君臣昏聩，反而降祸给你，你又能有什么好处？明国灭亡已经是注定了！各处战乱刀兵纷起，丙辰年刮大风……都城内河中流血，这难道不都是老天显示的灭亡之兆吗？天时古鉴，将军为什么还惘然不知呢？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如果等时机尽失，悔之何及？佟驸马，刘副将都是孤身一个人逃过来的，李驸马和辽东广宁的官员，都是被我阵前抓住的俘虏。他们都尚且被我如此提拔、重用、养育，你难道不知道吗？如果你能诚心归附我，那我给你的待遇肯定要比他们优厚得多。”

在努尔哈赤看来，毛文龙为明朝确实已经拼尽全力了，而明朝的官员（尤其是袁崇焕等人）还在拼命贬低、攻击毛文龙。所以他才如此苦口婆心地劝说毛文龙。

他的意思是，毛文龙如果真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就应该投降后金了，而且他举例子说，像李永芳这样的人都是战场上的俘虏，我尚且招他做驸马，优待无比，你如果是带着兵来投降我，那地位尊崇优待的程度，就必然超出李永芳等人了。

现在问题就来了！究竟是那些隔岸观火，唾沫横飞，嘴唇上下乱翻，说毛文龙是冒功的明官员和朝鲜人的说法符合事实真相，还是后金努尔哈赤的说法符合事实真相？被某些历史学家和明朝官员贬低

得不堪至极的毛文龙，努尔哈赤却高度评价，迫切想招为己用，希望毛文龙能像给明朝效力那样来为自己效力，难道努尔哈赤真是神经错乱了？

答案当然不是！正因为毛文龙对后金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后金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对付毛文龙。军事剿灭，投书招降，逼迫朝鲜抓捕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看一下从天启初年到崇祯初年的《满文老档》，凡写到后金与朝鲜交涉，都必定要提毛文龙：

“明朝集结十三省的兵力来进攻，尚且不能获胜，你朝鲜国王容纳一个毛文龙，能有什么好处？”

“朝鲜使者来的时候，守路之人截留彼处，问其是否归还毛文龙。”

“初十日，送朝鲜阿吉根莫尔根、华连通事二人至广宁……又问之曰：‘何不执送毛游击？’”诸如此类等等。

尤其是到了天聪元年，也就是天启七年，后金为了解决毛文龙问题，直接派大军倾巢出动去打朝鲜。这次后金出兵的首要目的是毛文龙，而不是朝鲜，这在《满文老档》中是记载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含糊和疑问的：

“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命贝勒阿敏、济尔哈郎台吉、阿济格台吉、杜度台吉、岳托台吉及尔托台吉，率大军往征驻朝鲜明将毛文龙。”

“天聪元年，岁在丁卯，征朝鲜国。先是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然此次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驻近朝鲜海岛，屡收纳逃人。我遂怒而往征之，若朝鲜可取，顺便取之。故用兵两图之。”

而在天启七年后金给朝鲜的声讨书中，列举了打朝鲜的七个原因，其中三个都是和毛文龙有关：

“老天把辽东送给我，但你朝鲜容纳从我这里逃过去的毛文龙，连年扰害我辽东人民，派遣奸细挑唆，而我仍旧愿意和睦相处，但你竟然不听从，这是第四条罪状。”

“辛酉年，我方去抓毛文龙的时候只搜捕明人，并没有侵犯你朝鲜，就因为我方仍旧希望和好，但你们竟然没有一句好话，这是第五条罪状。”

“毛文龙是明方的将领，他的明朝皇帝都不给他提供足够的钱粮，你们国家却给他的军队提供田地耕种，供给钱粮豢养他们。这是第六条罪状。”

在后面给朝鲜的回信里，争论的主要内容仍旧是毛文龙。

“至于毛文龙的奏疏，他的明朝皇帝都置之不理，不供给他军饷，你们为何要供给他粮食？……你们又说‘毛文龙的军队侵扰你们后金，我们朝鲜没有提供半点武器相助他’这样的话来搪塞。你们容纳毛文龙的军队士兵屯田驻扎，给他们提供田地耕种，提供粮食赡养；允许其驻扎，一头沿江抵达昌城，一头抵达安州，安插哨探，守卫你的边境来对付我方。所谓没有提供器械相助这些话，是你们的狡辩诡计。又说‘辽东之民，系毛文龙挑唆’这些话。你们容纳毛文龙驻扎在你们的地盘，挑唆我辽东的人民，你们还说不知道？”

看了以上事实，稍微有点头脑的人，已经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了。

此外根据《李朝实录》的记载，毛文龙从天启元年，到崇祯初年，对后金军队的袭击截杀，没有一年停止过，朝鲜因为怕惹怒后金对此怨恨不已。即从这一点也足以看出毛文龙对后金的作战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什么不敢和后金作战，因此要靠杀良冒功来蒙骗朝廷。

更何况，如果毛文龙是杀逃亡过来的剃头辽民来冒充金兵蒙骗朝廷，难道岛上的辽民是傻子，他们还会听从毛文龙的指挥？

真是这样，用不着袁崇焕来杀毛文龙，几十万辽民自己早就把毛文龙杀掉了！他们连极端暴虐残酷的后金统治都敢于拼死反抗，还有什么不敢反抗？难道到了毛文龙那里，就突变成了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绵羊了？

明朝的某些官员包括袁崇焕等人，身在局中，不明是非还有可以谅解之处。而许多现代人，在资料完备，事情前因后果都已经呈现的

情况下,还在颠倒黑白,肆意毁谤毛文龙,就不能不让人摇头了!

2. 掩败为功? 说袁崇焕吧

袁崇焕所谓毛文龙掩败为功,主要指的是天启七年初,后金东征,攻占原本由毛文龙驻扎的铁山等地,“铁山之败,杀辽人无算,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杨国栋攻击毛文龙的时候也说“铁山既失,鲜半入敌,伤残属国,失律殒师”。而真相又如何呢?

首先明朝的皇帝和官员都很清楚,他们对东江部队的期望从来不是正面直接对抗,否则以他们给毛文龙的那点可怜至极的军饷、器械装备,岂非是在开玩笑?

他们希望毛文龙只要能保存力量,接济辽民,伺机袭扰,以类似游击战的方式牵制敌人就行了,做到这些就是功劳。

天启六年到皮岛视察后归来的编修姜曰广、给事中王梦尹二人报告里就说毛文龙派遣二百人到镇江,占据铁山,召集溃散辽民多达十余万,就算说不是攻袭后金的心腹要害,那也可以说是收纳辽左的才遗,不比辽阳一陷落,军民都望风溃散的要强得多吗?

他们表示像毛文龙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豪杰。如果堂堂正正和金兵的铁骑在平原一决胜负,他们也不敢相信毛文龙,但说到设埋伏、用间谍,乘敌出奇,毛文龙自信他的能力,他们也相信毛文龙的能力。

游击战的方式,不外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避其锋芒,击其惰归。当后金主力来袭,毛文龙退守海岛,本来就是完全正确的。

袁崇焕自己也在天启七年五月的奏疏里说毛文龙不必和金兵正面硬拼,只要能打打游击就可以了。

而仅仅两年之后,袁崇焕似乎就把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全部忘记,把本来避敌锋芒的正确行为罗织成毛文龙的罪状。以每年十几万的饷银,要毛文龙直接和后金大军正面对抗,那每年领取三四百万军饷的袁崇焕这些人的脸皮岂非比城墙还厚了?

更何况,袁崇焕等人还对事实进行了严重歪曲!

在开镇东江之初,毛文龙确实在铁山安插、驻扎了大量辽东军

民,但是到了天启五年,为了防备后金袭击铁山,他已经把主力撤到了云从岛一带。

《明熹宗实录》天启五年十二月戊寅的记载中说毛文龙五月以后,就在须弥岛也就是云从岛建造房屋。十月又把铁山的士兵、百姓和商贾全部迁移来充实云从岛,而铁山这个地方就空了。

明史的《朝鲜传》里也可以找到此记载,但较简略。

正因为主力早就撤走,所以天启七年正月的东江塘报里,毛文龙说得很清楚:“奴虽犯抢一番,杀伤不满千人。”由此观之,所谓“铁山之败,杀辽人无算”纯属妄言。

而袁崇焕说的“文龙逃窜皮岛”更背离事实,真相是毛文龙当时在云从岛,而不是在皮岛,后金攻铁山扑空之后,就马上派四万大军进攻云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启七年的时候,袁崇焕还是另外一种说法,说毛文龙每到冬天海面结冰的时候,就躲到遥远的海岛上,铁山只有老弱和朝鲜人,并没有主力。

所谓“铁山之败,杀辽人无算”和他以前的说法都是直接矛盾的。

而所谓“避之远岛”,这里他说的远岛也不可能是皮岛,而是指云从岛。之所以后来改成“逃窜皮岛”,恰恰就是因为毛文龙早就把所谓云从距离铁山很远的说法驳斥得体无完肤了。

在一年之前的天启六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在奏疏里就针对朝廷内一些官员污称须弥岛(即云从岛)离后金老巢两千余里根本无法牵制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对云从岛的地理形势做了详细说明:以陆程计算,云从距离铁山只有八十里,以水程计算,铁山距离云从仅仅三十里。云从和西弥从陆地去义州,只有一百六十里,铁山从小路去也是差不多。义州和镇江相对,不过三四里,镇江到辽阳三百六十里,则铁山和西弥距离金人巢穴,总之在五百里以内。

毛文龙为此质问道:现在说距离金人二千余里,不知是谁如此撒谎?欺骗我皇上。去年冬天移驻到云从岛,是因为铁山树木已经用光,没有可供樵采的,所以迁移更方便,而被指责为规避,又不知道是

谁在这样胡乱议论，污蔑东江？

到天启七年七月初十日，面对袁崇焕等人的无理指责，毛文龙又上疏对云从岛的位置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有人说我退居云从，与金兵毫无作战。却不知道铁山和云从地脉相连，只有涨潮的时候难以渡过，退潮的时候不过二三里的间隔。冬天和春天冻潮不长，方围数百里结冰平坦，人马通行，其水陆距离远近，地理险易，我上年遵旨奏报，就一一叙述分明，当事者为什么不把我的奏疏拿过来看一下呢？而用隔靴搔痒的话，欺骗我皇上，导致一生万死之身，竟然埋没于雌黄之口。

正因为云从距离铁山相当近，在冬天的时候，又是水面冰冻，人马通行，所以事实真相不是袁崇焕所谓的“今一攻以合，毛不能一矢加遗”，当然更不是什么“文龙逃窜皮岛”，而是在天启七年正月的时候，毛文龙在云从岛上就和后金展开了血战，利用自己的谋略和地形的优势，给后金造成了重大杀伤。

东江塘报叙述得很清楚，金兵四万赶到云从，毛文龙一接到报告，就带领南北官兵，星驰堵住各关口，用火器坚守。金兵扎营休息，毛文龙料准其连番奔走，人疲马困，所以正月十五号晚上，派遣内丁都司毛有见、尤景和等各带兵一千，用枪炮火器，分路冲打。当时金兵疲惫劳苦，猝不及防，被打死几百人。惊惶之下，奔到山上分散开来。但这一役，毛有见等人也都中箭阵亡，损失士兵七百多人。

毛文龙其实就相当于派了一支敢死队，目的是给金兵一个下马威，虽然己方损失也不小，但在心理上给对方的震慑，对其士气的打击是相当巨大的。

而后毛文龙激励南北将士，坚壁固守。金兵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九日退回宜川扎营。金兵由于在毛文龙那里吃了苦头，因此非常痛恨带路的朝鲜人，说你们声称活捉毛都督不难，结果我们马匹跑死，兵也被打死，又捉不住毛都督，为什么要死活哄骗我们过来，你们肯定是奸细，于是开刀屠杀朝鲜人。

对后金围攻云从岛，《明熹宗实录》里也有记载，兵部尚书王之臣

批复登莱巡抚李嵩的塘报说：东江军队屡有战功，朝鲜借此得以无恙。现在接到报告说金人集结重兵围困云从等岛，形势又相当危险。幸亏登莱运了三十多船的米，天津运军需八船，大解倒悬之厄，缓解了军饷困难。但人多粮少，能满足多少需要呢？查户部有应补上的饷银十万多两，现在应该赶快解运。登莱、天津二镇各自再发米五万石，限日解送。

在王之臣批复袁崇焕的塘报里也提到后金围攻云从不克的事情：奴子进犯东江，不几天就攻克艾州、宣川，抢占铁山、郭山，攻云从不下，又向东攻克安州，直走黄州。一时人情汹汹，都怕毛帅那些饿着肚子的东江士兵终究不能支撑，幸亏厂臣魏忠贤多方接济，内镇胡良辅等又统率大兵，从登莱出海，奴子还敢久留在朝鲜吗？

在云从岛战役之后，毛文龙部下又伺机多次袭击金兵，斩获颇多。

如毛有禄、陈继盛等人探听到义州西门驻有金兵一营约一千多人，晏庭关口驻有两个营，约三千人。于是在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各自带领官兵到义州西门，发动突然袭击，金兵在睡梦中猝不及防，结果被打死大半，剩下的人逃奔到江边，被明军追赶，又淹死无数。活捉一个牛录哈知卜，金人妇女两名。在当天晚上，又赶到晏庭关口，同样乘其措手不及，发动突然袭击，枪炮乱打，打死一千多，追赶淹死一千多，活捉一人，金人妇女一名，官兵无一损伤。

再有如内丁都司毛永诗（即后来的孔有德）等人奉命率兵在小铁山地方设埋伏，在二月二十二日，有两百多后金骑兵经过，等金兵队伍过后，明军就从后面杀出，枪炮齐放，金兵被打死数十人，活捉一名牛录卜赤打哈。

三月初四日，毛文龙在抓获为金人效力的剃头朝奸，审问得知金兵行军路线后，又亲自率领官兵，占据龙王坨子悬崖，居高临下，让人埋伏在悬崖左右。在早上辰时（相当于现在七点到九点的时间），披戴盔甲的一千多金人骑兵，经过龙王坨子。明军站立在山上，弓箭石头齐发，打死金兵数百。三个领队的金人头目凶悍异常，勒马狂呼，

想要攻上山来，结果被毛有功等人，连发鸟枪、弓箭和石头，全都打下马来。毛永诗等人左右冲杀，剩下的金兵惊惶无比，把三个头目的尸体驼在马上，连同其他尸体都拖曳着逃了回去。

必须说一下，这样的设伏歼敌，仅仅是三月十一日的塘报中列举的近十多个战例之一，其他战例之斩获不下于此。

如一次是夜晚袭营，二更时分（相当于现在的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毛文龙属下的明军上岸，放火烧仓，金兵猝不及防，手忙脚乱，被打死数百。

一次是毛文龙部下乘船水战，金兵不谙水性，被明军乘上流顺风放炮，打死三百余名。

还有是先发动夜袭，烧杀一阵，引得金兵来追杀后，藏于附近深山，再乘对方搜山人少时，冲出袭杀。

还有预先在金兵经过的路口埋下地雷，等其经过时引爆地雷，打死三十多个骑兵，其他金兵溃逃。

总之通过这类变化多端的游击战术，毛文龙把后金军队打得鬼哭狼嚎。

到了四月，毛文龙更是动员东江军队的主力，发动了一次鸭绿江战役，毙伤后金七千多人。

这次战役的前后经过，在天启七年四月二十日的塘报中有详细记载。

当时毛文龙探听清楚后金在镇江驻扎一万骑兵，千家营有一万人，义州有四五千人之后，于四月初五日做出战役部署，召集诸将，根据地理的远近险要，发兵设伏，分路出击。并命令前锋毛永诗暗地潜伏到千家庄附近，探查清楚金兵屯营的准确情况。到十三日，秘密传令随征诸将一齐向鸭绿江进发，抵达、接近金兵营房。毛文龙亲自督率官兵登岸鏖战，合兵冲杀。经过从早上到中午激烈的战斗，枪炮乱打，金兵死伤六七千多人，打死固山三名，牛录八名，马骡一千多匹。毛文龙自己的左臂也被射中两箭，左脚被射中一箭。后续接应的各船，也扬帆开到岸口，奋勇登崖，火炮攻打，喊呐震天，各路官兵，合并

杀到义州江口声援接应。金兵看见两岸明军势众难以抵挡，惊慌溃乱，逃奔到镇江。

毛文龙的战功在《明熹宗实录》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天启七年五月乙未巡抚登莱、右金都御使李嵩奏报说金兵以十万之众蹂躏东江，毛文龙乃能于狂锋正炽之际，奋敌忾迅扫之威，现今押解到活夷三名，金人首级四百七十七颗，鞑帽二百九十顶，逐一核验审视，历历皆真，毛帅之功，于是乎不可及矣。

天启皇帝也下旨表彰“毛帅孤悬绝岛，力遏狂氛，设伏出奇，获此屡捷。皆赖厂臣，沉谋秘算，设计行间，说的是。这俘获巨魁，奏报已久。既验审明白，着上紧解来正法”。

正因为天启七年正月到四月，后金东征毛文龙，只在朝鲜那里获得便宜，而在东江接连遭受失败，所以《满文老档》的记载出现了相当奇怪的现象。

最开始的时候明确说是“率大军往征驻朝鲜明将毛文龙”，也即出征直接目的就是要打毛文龙。后来依旧说是把毛文龙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朝鲜则是顺带的目标。

但令人奇怪的是，到了记叙征伐经过的具体内容里，比例完全颠倒过来了，长篇累牍都是说怎么打朝鲜了，而打毛文龙的内容几乎无从寻觅，只有含糊其辞的一两句话，而这一两句话，还不尽不实。

如“先取义州之夜，分兵往攻毛文龙所居之铁山，斩明兵甚众”，实际根据明方的记录包括袁崇焕自己提供的证词，毛文龙的主力当时就不在铁山，这里所谓的“斩明兵甚众”显然是后金自己的吹嘘之辞。

而真正发生激战的云从岛战役以及其他战役，后金只字不提，这只能理解为掩盖其在毛文龙那里没有讨到便宜的事实，为了维护后金统治者英明神武的形象不受损害，而遮羞掩丑，把相关记录全部删除所致。

而且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丁卯之役，后金虽攻下朝鲜，但却仅仅和朝鲜签订了一个极其温和顺的条约（甚至允许朝鲜保留和明

朝的关系)就退了出去。正是在毛文龙那里吃了大亏,他们不敢把朝鲜君臣逼得太急,就怕万一弄巧成拙,朝鲜人不受国王约束,自发抵抗浪潮一起,再加上毛文龙的打击,那他们就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由以上所说可见,毛文龙不但没有所谓的掩败为功,相反他的真正功劳之巨大,是被人刻意缩小、掩盖的。

而在天启七年初这场后金东征之役中,真正有罪的,恰恰是袁崇焕。刘兴祚送情报提醒于前(对此我们后面说到朝鲜部分时会提到),他置若罔闻,只顾自己修城;皇帝催促他援助于后,他又百般推脱,装模作样,完全是不受节制,只顾自己地盘的军阀嘴脸。

要说掩败为功,袁崇焕在天启六年的宁远之役中倒才是不折不扣的掩败为功,守宁远仅仅两天,击毙金兵不过数百,而觉华岛上数万军民,惨遭屠戮,物资损失无数,是不折不扣的一场大败。而他能守住宁远城还是拜毛文龙牵掣后金所赐。此举反而被袁崇焕和其党羽吹嘘成了大功。袁崇焕最后却倒打一耙,污蔑毛文龙掩败为功,这真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3. 不牵制? 后金在玩游戏?

通过前面的论述,毛文龙起到牵制作用的事实是不言而喻了,不必再多说。但一些人颠预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所以仍旧有必要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示众剖析一下。

茅元仪在《督师纪略》里说毛文龙其实并不能牵制后金。后来孙承宗离职,金兵入犯,毛文龙连知道都谈不上,谈何牵制?幸亏孙公早就恢复修建了宁远城,才得以防御金兵入犯。

程本直则说敌人在天启六年进攻宁远,天启七年围攻锦州,假如不是袁崇焕死战死守,等不到崇祯二年己巳之变,金兵就已经长驱直入在京城下肆虐纵横了。而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也没听说他派任何军队,甚至哪怕一个骑兵渡江去牵制后金。在今天又怎么能断言一定能牵制金兵呢?

这两位言论出奇的程度是很值得注意的。

对茅元仪的言论，我们其实已经大量提到过了。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他把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将近四年时间里，后金不来进攻，反而退缩，说成是怕了孙承宗的缘故。

再结合这里引用的他和程本直的议论，就可以明白这些人是个什么逻辑了。

如果后金不来攻打关宁方面，那绝对不是毛文龙的牵制，而是后金怕了孙承宗或者袁崇焕。

如果后金来攻打关宁方面，那又成了“奴人犯，文龙且不及知，何况牵制”，“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

令人费解的是类似茅元仪、程本直这类人，他们对后金的情况固然是不了解，对明朝这方面的奏疏、塘报居然也没有起码的了解。大家不要奇怪，明代的有些官员就是这样，他们只关心自己想关心的事情，有时候就可以在基本信息都懒得查阅的情况下，信口开河。

对他们所说的“奴人犯，文龙且不及知，何况牵制”，“而文龙当日固居然岛上帅也，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本来不值得一辩，要辩的话，也近于笑话。

因为当时明朝一些官员（比如薛国观）污蔑毛文龙，而毛文龙上疏已经用事实将其驳斥得体无完肤了，这是明朝方面的档案材料里彰明昭著、一查就知道的东西。

毛文龙提醒于事前两个月，“臣于上年十月内，即发塘报，言奴于灯节前后，必大举入犯右屯等处，宜加严防，是臣已先知之矣”。又出兵牵掣于努尔哈赤从沈阳发兵之同时，在前面第三章论述毛文龙战略作用，引用毛文龙天启六年正月二十日的塘报里，这一点我们就说得很清楚。努尔哈赤从沈阳出发是正月十四日，毛文龙派兵去袭击海州、沈阳等地也是正月十四日。后来努尔哈赤之所以只围攻宁远两天就着急回去，就是因为毛文龙的袭击所致。

如此提前警告，如此迅捷神速的反应，如此尽心尽力的血战牵掣，而到了程本直之类人的嘴巴里，就成了所谓的“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

他们大概认为后金只打宁远两天，是纯粹出来和他们玩游戏的吧！不知道他们看到毛文龙死后，金兵攻围大凌河，攻围锦州数月甚至一年之久，又做何感想？

昏聩到这样地步，真是可以让志士寒心、英雄血冷，令人怀疑程本直、袁崇焕之类是否是成天生活在自己大言不惭的谎言世界里，整个人都在梦中。

毛文龙如果在后金出兵之前，就提前袭击牵掣，让其无法出兵，袁崇焕、茅元仪等人会如傻蛋一样，毫无知觉。他们会浑浑噩噩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毛文龙上报过来的功劳，他们全当成是假造的。而他们对后金不来进攻的唯一解释就是因为努尔哈赤怕了他们，所以才不敢来，没毛文龙什么事情。

而如果毛文龙在后金出兵的同时或稍后，再来袭击牵掣，后金能够在宁远、锦州一带闹点动静，那就又成了毛文龙牵制是假的。因为按照他们的要求，毛文龙只有做到让后金彻底无法动弹，才是真的牵制。

用他们这种无往不胜的流氓逻辑来对付毛文龙，毛文龙除死之外别无他路。

毛文龙自己对这种荒唐情形，也是哭笑不得，无可奈何，他在天启六年的一份奏疏里说：敌人不来打你们，你们不说是我牵制得力。敌人只要有一个骑兵过河呢，又成了是我不牵制了？合着我怎么干都不是人。

程本直、袁崇焕之类的人，一方面把后金当成外星人了，强大到根本不能与之野战的地步，所以只有修城守城，修城守城。所以在他们看来毛文龙所报的战功都是假的，都是捏造的，毛文龙说的只要给他足够的军饷，就完全可以在一两年内消灭后金，自然就更是扯谎了。

而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把后金看成是弱得不值一提，所以要求每年二十万两饷银都拿不到的毛文龙，领着器械装备极其简陋的军队，就要彻底捆住后金的手脚，使其彻底瘫痪，不能出老巢半步，只要

后金出来攻打宁远、锦州，那就是成了毛文龙不能牵制了！

既然如此，那还要他们这些人干什么？每年领着几百万军饷在宁远那里欣赏风景么？

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宽容到了病态的程度，对毛文龙的要求又严苛到了病态的程度。当时的人这样也就罢了，令人费解的是，现代的某些人，置基本历史事实于不顾，还拾起这些早就被当事人驳斥过的唾余，以为至宝，拿来攻击毛文龙。

比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说：“他升官发财之后，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战马三千余匹，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作为皮岛的外围，宁锦大战之时，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击清兵后方做牵制。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但因管他不着，无可奈何。”

金庸是以写小说起家的，在历史问题上不够严谨还可以理解。可是挂着历史学家招牌者如李光涛的表现，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光涛在《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一文中说“迨丙寅之役，奴儿哈赤倾国围宁远，号称三十万，视文龙牵制，旁若无人，则所谓寇关却步者安在？甚至朝鲜丁卯之祸，金人更长驱无忌，文龙则避之云从岛，不敢出一兵，以救属国之急。由此言之，则明朝用毛文龙之失策，可概见矣”？其中所述事实之谬误荒诞，前文都有详细论述、驳斥，也就不必多说了，把他的言论放在这里，也是见识一下，在偏见作用下，即便是历史学家也能对事实歪曲到什么程度！

三、贪财好色是欲加之罪

1. 说你是，你就是

贪财好色当然不过是一个笼统的罪名，有许多具体的罪行，是可以被归结到其下的。比如袁崇焕列举的侵盗钱粮、强令难民夷地掘参、劫掠商人、收掠民间女子等。

侵盗钱粮的问题，前面已经分析过了，纯属血口喷人，无中生有。

至于让难民到后金的地盘去挖人参，不是毛文龙自己要赚多少钱，而是通过挖来的人参进行贸易，解决部分军饷问题，也是帮朝廷减轻一些负担。

而且更重要的是，毛文龙派去的人，不是单纯地挖人参，只要长着眼睛，带着耳朵，能潜入到后金统治区内再回来，把看到的、听到的情况说一下，这本身就是起到刺探情报的间谍的作用。再积极一点，搞人参之余，再能散发传单，策反后金官员当然更好。只要看一下《满文老档》遍地都是毛文龙奸细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了。

袁崇焕说毛文龙是强迫人去，问题是这是靠强迫得来的吗？跑到敌占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如果靠不情愿的强迫，一过去，就叛变，反而出卖己方的情报，不是砸自己的脚么？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自己基本的情报侦察工作都做不到，还把毛文龙派遣侦察兵兼从敌占区获取经济来源的正当举措当成罪行来声讨。这样糊涂的人，也就无怪乎被后金当成猴子来戏耍。在他杀了毛文龙之后，自己不侦探，东江的人估计也不敢再派人到金占区挖人参了，自废耳目！

所谓劫掠商人就更可笑了，毛文龙海上通商，前提条件就是让商人觉得有利可图，自愿不断前来，如果是劫掠商人，你可以劫掠一回两回，那以后呢，商人恐惧不来，不就是自己切断了经济来源吗？

毛文龙非但不是劫掠商人，相反非常注重保护商人的利益，这才可能让皮岛成为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这只要看一下毛文龙历年塘报提及来皮岛做生意的商人情况就知道了。

袁崇焕说的劫掠商人，其实是毛文龙打击那些向后金供应贩卖物资的朝鲜和汉人船只。在天启七年之后，朝鲜和后金签订盟约，然后后金要求提供粮食，毛文龙的部队对这些船只往往劫夺。

比如《李朝实录》崇祯元年三月记载毛文龙和手下众将聚在一起谈到朝鲜米船的事情，众将说：“朝鲜人载米去供应金人，实在不像话。幸而劫获了米船十余艘，就据此奏报朝廷，仍旧夺取他们的米

船,以补充军需,名正言顺。”

附和这个提议并鼓动怂恿的人很多。

至于收掠民间女子问题,更是无中生有的恶意污蔑,连具体可供对证的姓名人员都无,难道仅凭空嘴一说就可以给人定罪了?在杀死毛文龙之后,如果袁崇焕能在奏疏里一一举出被毛文龙抢来的女人,究竟叫什么名字,如何抢来,如何因为被解救而高兴,这样至少还可以让人相信一二,可惜的是完全没有!

总之袁崇焕和他的粉丝们就是先定下罪名,然后不管不顾去拼凑事实附会到这个罪名上去。没有确凿证据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的逻辑。

只要不能拿出百分之百的证据彻底排除可能性,那毛文龙就是贪财好色的。说你是,你就是,以这种彪悍逻辑,自然可以无往而不胜。

2. 领着白毛女拜祭黄世仁

其实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并非是袁崇焕的发明,在他之前,早就有人给毛文龙泼过此类脏水了,而毛文龙也早在奏疏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

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通敌云云,而毛文龙回答得很精彩,你武之望扣我这些屎盆子,又是从何得来的?莫非靠着道听途说,造谣诽谤就可以给人来定罪。要是给我栽的这些赃都是真的,老子不必等你今天来下毒手污蔑了,早就被岛上剃头辽人干翻了!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毛文龙在后金的后方已经活动近八年,这八年里,如果他贪污,把本来应该发给辽人的军饷私吞,任由东江的士兵和难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饥寒线、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又是强迫挖参,又是不令渡海,饿死岛上,而他自己用贪污来的军饷肆意挥霍,奢侈享受,美女围绕。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

这些从后金魔爪下拼死反抗逃亡出来到东江皮岛的剃头辽人,

有哪一个任人愚弄、揉捏的软柿子？他们连穷凶极恶的努尔哈赤都不怕，都要反抗，还怕一个毛文龙？

再说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所在？纸醉金迷歌舞场，销金窟，明代中国最繁华、最奢糜的地方。连同周边的苏州、南京，这些地方都是经商者的天堂，美女云集的温柔富贵乡。

一个头脑活络，口才出众，胆子大，能力强如毛文龙这样的人，要贪财，要好色，放着气候宜人，生活舒服的家乡杭州不呆，放着黄金遍地、佳丽云集的江南不混，却跑到苦寒的辽东，跑到波涛险恶，海风凛冽可以把人肌肤都吹成砂皮的所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实现贪财的梦想，好色的梦想！那究竟是毛文龙的脑子有病呢？还是造此无耻谰言、谎言的人头脑有贵恙？

明代晚期因为士兵不满军饷亏欠，而哗变造反，是三天两头的家常便饭！就是被重点优待的关宁士兵，在军饷少发的情况下，都会兵变，把辽东巡抚毕自肃逼得上吊自杀！

而毛文龙镇守的东江，政府本身就是最大限度压低待遇的同时，还百般拖欠克扣军饷，真正能发到东江的军饷连关宁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对岛上聚集的士兵和辽民来说，最基本的吃饱肚子往往都是奢望，无论是《李朝实录》，还是后金的《满文老档》，对东江的士兵和辽民绝粮，面皆菜色，甚至多有饿死的记载比比皆是。

可以说东江地区的士兵和人民比之关宁乃至其他地区的明军面临的处境是十倍的困窘和艰难！

可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困苦，甚至基本的生存所需的物质都无法充分保障的情况下，这些士兵和辽民在毛文龙的带领、组织下，在东江地区活动了八年，不仅没有大规模的兵变叛乱，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对后金的打击和牵制作用。

如果毛文龙是一个贪财的人，是一个靠吞没军饷来过奢侈生活的人，他还能做到这一点，那只能认为毛文龙是神仙，而非人类了！

可是偏偏有些人愿意相信神话！比如李光涛对朝鲜的某些人刻

意编造、传播的无耻谰言，什么毛文龙在岛上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什么毛文龙每天吃五六顿饭，身边都围绕着七八个美女这种谎言深信不疑，还当成奇货可居的材料来大肆宣扬，也真不知道他头脑里想些什么？

毛文龙在另一份奏疏里说得更清楚，他之所以不断向朝廷催讨军饷，唯一的希望就是让将士能吃饱肚皮，能平定辽东。

“我东挪西借，剜肉医疮，就是痴心盼望朝廷有明白鉴查我苦衷的一天，而让三军将士能吃饱肚子来和敌人作战。日望一日，结果等来的就是有人不断用冒饷来弹劾我。我的誓愿不过是扫平金贼，原籍故居止存留空空四壁。现在驻扎在皮岛，屯兵安全，和士卒住在一起，冒领军饷来干什么？冒领军饷能有什么用处？况且商贾们在耳边不断唠叨，军士嗷嗷待哺，凡是稍有血气的人，没有不伤心的。在这样一个地面上，又怎么忍心来冒领军饷？”

毛文龙说得够清楚了，在东江群岛这些辽民、辽兵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地方，克扣军饷，拼命敛财给自己享乐，还抢夺民女来满足自己淫欲，这是享乐还是找死？莫非毛文龙有受虐癖，存心把自己放火炉上烤？

写《表忠录》的朱溶，不仅曾经和毛文龙的孙子毛有韩交往过，亲自看见过毛文龙的家书，还亲自询问采访过诸多当事人。他了解到毛文龙在朝廷发的军饷不足的情况下，确实通过做生意赚了许多钱，但这些钱都是用来供给军队所需，毛死的时候“室无赢财”。毛文龙在杭州的家乡，仅仅只有旧宅一间，山田二顷而已。

正因为毛文龙光明磊落，坦荡无私，所以他才可能得到大部分东江将士的衷心追随和拥护！

而按照袁崇焕的描述，毛文龙在东江无恶不作，残害岛民，残害士兵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纯粹一个恶棍地头蛇。他杀毛文龙，完全就是解救岛上军民于水火之中，岛上应该是欢声雷动，欢喜雀跃。

而实际上如何，岛上军民是这态度吗？

在厌恶毛文龙的朝鲜人的《李朝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崇祯二年六月癸未,金时让向朝鲜国王报告,毛文龙被杀后,“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椴岛(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

一个“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足以戳穿一切用来污蔑、丑化毛文龙的谎言。而《崇祯长编》记载,袁崇焕自己在杀害毛文龙后,在第二天还假惺惺地流泪拜祭,一边拜祭,一边宣称“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他还流下了眼泪,“各将官俱下泪感叹”。

这本身就是讽刺至极!

要知道如果他加在毛文龙头上的贪财好色导致军民惨苦不堪的罪行都是事实,那他杀毛文龙就是东江百姓、士兵的救星,岛上应该一片欢天喜地的景象才对。

现在居然还要如此惺惺作态去给毛文龙哭丧,还掉眼泪,这就如同领着白毛女去流泪拜祭黄世仁,在高玉宝面前给周扒皮哭丧一样荒诞可笑,他就不怕激起民愤?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袁崇焕在杀害毛文龙之后,没有看见预期中的军民拍手称快的场面,相反见到的是一张张悲愤至极,敢怒不敢言的面孔。按照《李朝实录》的记载,当时各岛军民在听说文龙被害的消息之后,就几乎要发动变乱了:“文龙之诛,岛中危惧,几于生变。”

所以袁崇焕眼看情势不对,就赶紧演戏,到毛文龙的棺材面前掉几滴鳄鱼眼泪,来挽回人心,而把杀害毛文龙的罪行栽赃到朝廷和崇祯皇帝的头上。

岛上官兵信以为真,只能把仇恨转移到明朝政府和皇帝头上,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朝廷和皇帝的授意,袁崇焕自己也真的不敢胆子这么大来杀毛文龙!

这也为后来岛上军民叛乱不断埋下了祸根。袁崇焕行为固然卑鄙,但无形中却也不打自招,加于毛文龙头上的贪财好色、残害军民罪行的虚假性,已经一目了然。

四、谁才是谄媚魏忠贤

给毛文龙扣上阉党的帽子，也不是袁崇焕的发明，在他之前的杨国栋就干过了。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文龙没有给魏忠贤献媚过，反倒是杨国栋和袁崇焕两人，货真价实地对魏忠贤极尽谄媚之能事。估计他们之所以要给毛文龙扣上这顶帽子，正是以己度人，再加想当然的结果，觉得我都这样了，你能不这样吗？

杨国栋的小人面目，在毛文龙驳斥其污蔑的奏疏里就加以揭穿了：“杨国栋污蔑我依附魏忠贤，难道就忘记了以前他把曹承恩当作飞黄腾达的捷径，亲笔书信还留在我这里，而我置之不理么？难道就忘记了，称颂魏忠贤功德齐天，请求建立生祠的奏疏，还在御前么？又难道忘记了，在皇城岛创建魏忠贤生祠，金碧辉煌，让他的儿子剃头给魏忠贤守祠吗？

“如果我真的要依附魏忠贤，难道不能效仿杨国栋的所作所为，不断上奏疏请求给魏忠贤建立生祠？难道不能效仿杨国栋那样不断上疏给魏忠贤歌功颂德吗？”

毛文龙的这份奏疏痛快淋漓地把杨国栋毫无羞耻、倒打一耙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真正谄媚、依附魏忠贤的恰恰是杨国栋自己，他请求给魏忠贤建立生祠的奏疏，还在皇帝那里呢！

而毛文龙自己却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压根就没有给魏忠贤献媚过，所有过去的奏疏都是可以随便查，也不怕查！

他的这两句质问“假使臣果欲附珰，岂不能效国栋之为忠贤请建生祠，历上奏疏？岂不能效国栋之为忠贤称功颂德耶？”足以让所有试图给毛文龙扣上阉党帽子的小人哑口无言！

而实际上，在现在所有能看到的毛文龙奏疏里，包括《明熹宗实录》中记载的，我们也确实看不到任何毛文龙给魏忠贤歌功颂德的言

辞,更不必说什么请求给魏忠贤建立生祠。

即便是受风气影响而对毛文龙极尽丑诋之能事的《樵史通俗演义》,也不得不承认:“且说毛文龙只有一件好处,文官员好些拜魏忠贤为父亲,自家做干儿子,他只是不肯。常道他在朝里做半朝天子,我在海外做岛中天子,我进贡他些罢了,为何平白地做儿子起来。不替杭州人争气。”

杨国栋的无耻嘴脸,在毛文龙的塘报里就被揭穿了,那袁崇焕又如何呢?在天启六年十一月,袁崇焕一边吹嘘自己靠屯田就能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

但天启皇帝的头脑却非常清醒,不但没有因为袁崇焕大吹牛皮,溜须拍马而高兴,相反训斥了他一顿:这奏本内说,奴子如果不投降,就一定会被你抓住,诸位大臣谁不乐意听到。但以我的看法,金人未必投降,投降是不能相信的;交战也未必能获胜,胜利不要輕易放在嘴上谈论。

在天启七年四月,《明熹宗实录》中又有这样的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请求给魏忠贤建生祠的,不是毛文龙,明明是袁崇焕自己啊!

如果说袁崇焕是迫于形势,不得不随波逐流,这大家不是不可以理解。而他令人费解的地方,恰恰就是把自己做过的事情,硬要栽赃到根本没有做过,骨头远比他硬得多的毛文龙头上。

五、毛文龙的野心

1. 皇帝不急太监急

袁崇焕把毛文龙专制一方,当作可以杀头的大罪列举在第一条。他的意思是按所谓祖制,武将一定要受文官节制,如何如何。

不要说，毛文龙还算不上专制一方，即便是专制一方，这也根本不是什么罪！

有些人一提到明末的历史，就说因为是君主专制，所以皇帝对官员将领如何猜忌云云。而实际上，明朝晚期的几个皇帝，万历不猜忌，天启不猜忌，崇祯更不猜忌。

真正动不动就对将领猜忌不已的恰恰是类似袁崇焕这类刚愎自用的文官。任何一个武官将领，能力稍微强一些，权力稍微大一些，他们就眼里喷火，疑神疑鬼，把对方当成比公开的叛乱分子还要可恶的对象来排挤乃至陷害。

真要算明朝的祖制，朱元璋和朱棣的时候，遇到出征平乱，武将本就是独挡一面的，并不比文官矮一头。专征于外必请文臣监之是后来才有的事情。

当军情紧急之时，让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官却握有掣肘、牵制武官的大权，恰恰坏事。此种弊端，作为袁崇焕师长辈的孙承宗，都有清醒看法，按《督师纪略》的记载，孙承宗曾经特地为此上疏陈述文官来指挥武官的弊端，并建议应当加重武官的权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文吏的干扰。

孙承宗给出的办法是只要不再多设立文官，那武官的地位自然就能得到提升。加重武官的权力，对文官也是好事，不必出了事情就把罪责全压在文官头上。

毛文龙在东江能独挡一面，恰恰是符合孙承宗“重武吏之权”，“但得无多设文官，则武吏不轻”的说法，无形中扭转了原来以文统武的弊端。

在孙承宗看来是好事，而在袁崇焕看来，居然就成了毛文龙的罪状，其心胸之狭隘，见识之鄙陋，比之孙承宗都远不如。

至于袁说毛文龙“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抚管核”，也是欲加之罪！确实东江的军事财政，不受某个经略、巡抚管辖，但始终在明中央朝廷的核查、监督之下。

《明熹宗实录》也好，《李朝实录》也好，毛文龙的东江塘报记录

也好,我们可以看到毛文龙在东江的九年里,光是前来查核的文官就来了好几拨,而毛文龙自己把经过钱粮,都一笔笔详细开列,完全经得起最严苛的核对。做到这个地步,袁崇焕还要横加罪名,仅仅是因为毛文龙在名义上不受某个特定的文官控制。

天启皇帝不猜忌毛文龙,崇祯皇帝不猜忌毛文龙,却偏偏袁崇焕要猜忌!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

或许有些人会说了,毛文龙可能确实没有投降后金,但不能排除他狼子野心,想割据一方,独自称霸。

其实本来这种推测,会适用于大部分专制一方的将领。但可惜的是,偏偏这顶帽子是扣不到毛文龙头上的!

论起来,毛文龙确实具备所有想割据一方的军阀的条件。他如果要放开手脚,打朝鲜,打登莱,控制沿海一带,招商贸易,彻底放纵士兵抢劫,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军费是问题不大的,至少可以做一个郑芝龙式的人物。

再不济一点,只要他不去对后金做任何牵制、骚扰,放任后金绕道蓟镇进关,或者放任后金对锦州、宁远长期围困,那在明朝政府自顾不暇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乱中取利。

最糟糕的结果,也还有投靠后金这一条退路,待遇绝对会在李永芳等人之上,李永芳不过是后金抓住的一个俘虏而已,尚且被重用,努尔哈赤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如果是毛文龙带兵投降后金的话,那地位远与李永芳之上是起码的,至少可以捞一个王当当(实际上原本身为他手下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投奔后金,皇太极都欣喜若狂,后来都封了王)。左算右算,这都是包赚不赔的买卖!

但是毛文龙这么做了没有? 没有!

相反,他始终在尽心竭力地向明朝政府提醒后金的可能动向(一直到崇祯二年,在他自己处境已经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还在提醒),他始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拼尽全力血战,牵掣后金的力量。

对比之下,袁崇焕对朝廷指令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叫其出兵牵制,却派人去装装样子。还要把野心跋扈的帽子扣到毛文

龙头上，实在是让人慨叹世上无是非可言！

2. 孙承宗的教诲

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还是要说一下的，袁崇焕说毛文龙给部下改姓毛，所以如何大逆不道云云。

要理解毛文龙给部分官兵改姓，首先要结合东江军队所处的极端艰苦、险恶的环境来考虑。前面说过，毛文龙在开辟东江根据地之初，真正依靠的只有两百多人的明军，后来明朝又支援了几千人的南方水军。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都是从后金统治区逃亡出来的剃头辽民，朝鲜人称之为假鞑。这些人跟着毛文龙也不是在享福，甚至连军饷都发不足，随时会饿死、会战死、会冻死。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依赖关系呢？以前辽东明军多次失利，都是内奸作怪，如何能防止这种情形再次发生呢？

动以大义，晓以良心，当然是一方面。自己身体力行，与士兵同甘共苦，作为榜样来号召当然也是一方面。

但要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处境甚至绝境下，管理这样一个人数极为庞大的群体，光靠大义，光靠道德感召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这时候就有必要用一些更容易入手，更符合下层百姓心理的手段来收拢、凝聚人心。

而毛文龙给一些官兵改姓，就是这种手段之一。

在上下级关系之外，多了一种亲人之间的依赖感，有难同当，荣辱与共，再以这些人核心，层层组织，凝聚住几十万人的军民，以达到同心协力的效果。其手段自然不登大雅之堂，但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却不失为一种简单却行之有效的方法。

《督师纪略》里孙承宗就有一段话，大意是文官不通达时势，喜欢用自己的小聪明，小见解，沾沾自喜，凌驾在将吏之上，结果使得武将手脚被束缚，无法施展。大凡武将用来驾驭、领导士兵，让他们肯出死力的办法，讲出来或许被人笑话，但办法确实能切近人心。

毛文龙给一些部下改姓，建立宗亲关系，就是属于这种“将吏所

以御士卒，而得其死力者，讲说或足为笑，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的手段。

而袁崇焕对此横加指责，活现了孙承宗所说的“文吏不达时势，好用小见解，沾沾将吏之上”的狭隘。

六、通敌？皇太极是傻蛋？

毛文龙通敌之说，袁崇焕没有明确提出。但后世袁崇焕的拥趸，为了论证袁杀毛乃是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之举，对此不遗余力加以证明。他们拿来当成证据，以为奇货可居的就是收录在《满文老档》里的所谓毛文龙与后金私通的书信。

这些人大概是既不看毛文龙给崇祯皇帝的塘报、奏疏，也根本不看收录在其他地方，载有皇太极回信的档案文件。

实际上这些书信往来及其用意目的，毛文龙都是明确报告给明朝皇帝的。如果这叫私通，那袁崇焕前后收容金人使者近半年，而丝毫不报告给皇帝的行为就不知道算什么了！

崇祯元年三月十一日后金派遣使者马秀才等人到皮岛要谈和，毛文龙在三月十三日的塘报里就报告给崇祯，并提醒政府，当心后金西犯攻关。

在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中，毛文龙说得更清楚，他和后金书信往来，纯粹是为了耍弄对方，把对方爪牙、奴才骗来，能杀一个是一个，绝对合算的无本买卖。当时皇太极手下有一个叫大海的爪牙头目，通晓文义，皇太极当成心腹。毛文龙希望最好是能把这个人骗来除掉，所以在马秀才等人第一次来后，又放他们回去。但皇太极没有上当，第二次仍旧是派马秀才等五人来。

毛文龙也就索性不绕圈子了，把这五人抓了起来，那个叫马秀才的汉奸，民愤极大，当场就被岛上人民杀死，剩下四个后金头目解送到北京。

同时毛文龙提醒朝廷，金人到我这里来求和，肯定是想向西进攻肆虐，所以西边关口一定要注意好防守。

而毛文龙另一边又对后金回信说是马秀才等人误上船，请皇太极不要误会云云。这当然完全是把对方当小孩骗了，其实说穿了就是对皇太极的欺侮、戏弄，有趣的是现在居然还有傻瓜相信误上船的说法是真的。

据他们说毛文龙是真心要和后金勾结的，但不巧的是后金使者在皮岛上误登了户部派来的船只，所以毛文龙就没有办法勾结下去了！

这是把后金派来的使者当白痴了，也是把毛文龙和皇太极都当白痴。

皮岛是毛文龙的地盘！如果毛文龙连自己的地盘都控制不了，连后金派来的使者上哪条船都管不了？那他还混什么？

有些人一边往毛文龙头上扣海外天子的帽子，什么专制跋扈，横行一方云云，说得真是手舞足蹈，唾沫横飞；另一边却相信毛文龙在自己的地盘连后金派来的使者都保护不了，这个使者又神经搭错，自己主动跑到户部的船只上去，然后被送到京城领死。

这些人究竟是被仇恨毛文龙的情绪冲昏了头脑呢？还是真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线？

实际上毛文龙捕杀后金使者的行为，起到了非常好的震慑作用。以至在毛文龙死后，金人对此还心有余悸。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岛上内讧变乱不断，后金乘机来招降时还提到此事。

罗振玉编《史料丛刊初编》收录的《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有这样的记录，崇祯三年岛上作乱的刘氏兄弟和皇太极联络，希望能派个金人到岛上去。皇太极回信说，本来呢，确实应该派一个金人到岛上去负责和你们联络的，但是因为以前毛文龙对后金派来的使者，不是杀掉就是送到北京，所以我们这边的金人都不敢再到皮岛上来了云云。

对这封谕贴涉及的事件，后面还会有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还

是回到正题。在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毛文龙给崇祯的奏疏里，也把后金多次有书信来，而他也多次回信加以哄骗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据远哨拨夜带回来乡胡四等口称：系敌孤山名下跟役，在营内听得敌说屡次有书差人送与毛都督请和，虽有书回我，俱是哄我，及差人送礼讲起，又不依。反将我人解送赴京。又将我心腹刘爱塔等兄弟七人收回岛去。”

对自己回信给后金，戏弄欺骗对方的事情，毫无隐瞒！

袁崇焕收留后金使者，在近一年内秘而不宣，丝毫不向政府报告，对照毛文龙，后金使者一来就上报，后来又又把后金使者抓的抓，杀的杀，前后多次向政府报告经过情形以及自己的想法安排。两相对比，究竟谁才是在通敌？谁才是忠诚不二？

还有一个被许多人拿来大做文章，说是毛文龙通敌叛国证据的，就是《满文老档》所载毛文龙给皇太极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亦不归尔管辖。”

而实际上呢，这本身就是毛文龙对皇太极的戏弄之辞，也即后金所说的“虽有书回我，俱是哄我”的情况。如果毛文龙要真心勾结后金，那会建议后金去打山海关吗？山海关是明军重点防守地区，那不是让后金去找死吗？

从毛文龙的奏疏来看，他在天启年间就知道明朝的薄弱地区在蓟镇，最担心的就是后金绕道进攻喜峰口一带，为此不厌其烦，反复提醒政府注意这一地区的防守。现在他给皇太极的信，反而去让他打山海关，用意如何，不言自明！

对这一点，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里就记载了皇太极在天聪二年也就是崇祯元年十月给毛文龙的回信，里面恼羞成怒的说：“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你用虚言诱骗差人几名，有何好处？”

皇太极的意思，我去攻山海关，让你毛文龙先知道，这不等于让明朝提前设伏，后金军队自寻死路吗？你当我皇太极是傻瓜吗？到

现在你毛文龙的所有行动都是在帮明朝来打我，却口头上说让我去攻山海关，你真把我当蠢驴来戏弄啊！

有些人把毛文龙对皇太极的愚弄、戏耍之辞全都当成真的，然后唾沫横飞以此认定毛文龙是真心要勾结后金，真心建议后金去打山海关。

当时处在和毛文龙敌对第一线的皇太极根据自己掌握的消息、情报，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毛文龙始终在戏弄欺骗他们，实际行动处处都是在和他们敌对，不存在任何让毛文龙投降他们的可能！

而他们这些人根据从毛文龙写给皇太极的信中断章取义截取的一句话，就信口雌黄断定，他们比掌握第一手资料的皇太极更了解情况，断定毛文龙就是私通、勾结后金！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究竟谁才是傻蛋？是皇太极呢？还是这些人呢？

七、最客气的罪名：浮夸骄恣

相对于上面的种种吓人罪名，说毛文龙浮夸骄恣，已经是很温柔客气了。自从夏允彝的《幸存录》这么说之后，其他还算中立客观的史书就对此纷纷抄袭沿用。然而，在当时的人以为客观，在现在我们能看到更充分史料的情况下，却未必还是客观了。

首先来说浮夸。

浮夸可以理解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现有战功的虚报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对未来的许诺，比如夸下海口，说只要军饷充足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消灭后金等等。

1. 能证实的功劳很大

这似乎和上面的冒功重复了，但其实不一样，冒功是说功劳有还是无，而浮夸涉及的是功劳是小还是大的问题。

这也可以分解成两点。

第一点是毛文龙对自己总体上所起的作用,有没有虚报夸大?

第二点就是具体的数字,比如接应辽东难民多少,杀敌多少,擒获俘虏多少,策反敌人多少,有没有虚报夸大?

就第一点来说,本书开头几章,就长篇累牍地提到《满文老档》的记载,结合当时形势的分析论证来看,不存在任何虚报、夸大的地方。毛文龙自己甚至还显得过于谦虚了一些,他对后金不是纤芥之疾,甚至也不是芒刺在背,而是威胁到其生死存亡的心腹大患。

至于第二点,目前可以通过第二方、第三方来验证的数字,主要是毛文龙从后金占领区策反接应的辽东难民数量。后金的《满文老档》以及内阁大库残留档案,还有朝鲜的《李朝实录》可以验证,此数量确实达到百万规模,这方面毛文龙是没有虚报夸大的。

剩下的就是毛文龙与后金作战每次具体的杀敌数字,但这一点要完全验证,比较困难。作为后金这方面的记录来说,金人素以野战无敌为荣,攻城受损,并不以为耻,也不讳言。而唯独在野战中屡次败于毛文龙,损兵折将,则视为羞耻,讳言其事。

而清后来的统治者又为掩盖努尔哈赤、皇太极曾经有过的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无能,并且保持和他们在各种官修史书英明神武形象的一致,刻意删除、修改相关档案记录。

所以我们只能在《满文老档》中找到大量蛛丝马迹的旁证,却无法获得最直接的记录来和毛文龙的东江塘报做对照验证。

而朝鲜这方面,君臣昏庸,畏敌如虎,侦探不明,他们只能知道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却无法探明每次作战,后金具体损失多少,加之其本身厌恶、仇视毛文龙的立场倾向,也不愿意记载毛文龙具体的战功,所以也无法从《李朝实录》中获得最直接的杀敌数字记载。

历史是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我们只能根据已经掌握的事实来下结论,而不能用自己的胡乱猜疑和想象给历史人物来定罪。

就目前掌握的事实来说,毛文龙在总体上给后金的打击、牵制作用是极其巨大的,这点《满文老档》自己的记载就足以证明,至于具体每次战斗杀敌情况,在缺乏足够论据之前,不能妄下断言说毛文龙在

虚报。

2. 灭后金不是夸海口

对于许多明朝官员来说，后金似乎是战斗力强悍到根本不可战胜的对手，任何在短时间内能够消灭后金的说法都让他们觉得难以置信。包括向崇祯皇帝夸海口说五年灭虏的袁崇焕，他自己都承认五年不过是随口应付，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靠修城守城慢慢拖死后金。

在这种情况下，毛文龙说过的一些话就显得很刺眼了。

比如他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十日的奏疏里说如果朝廷早点能相信他，粮饷器械能和关宁一样凑手，那奴夷早就被消灭了，辽东早就收复了。奈何朝廷文官对他始终半信半疑，猜忌、毁谤不断。

在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塘报里，毛文龙又说九年以来，他呕尽心血，每每把后金的情形，以及进兵的关键，一口担当，屡次上疏请求，恢复辽地。如果能有人和他同心协力，早就成功了。可是大臣们自己不了解地利、敌情，还偏执无比，舆论掣肘，耽误到如今。

毛文龙说只要给他充足的军饷、器械，“奴早灭，辽早复矣”，在一些人眼里，自是吹牛无疑。

但实际上，我们只要看过《满文老档》，以及深入分析明金战争的态势，以及几次交战胜败的原因，就可以知道毛文龙不但没有吹牛，而且是在极其透彻了解局势情况下的断言。

大部分人是被以前明军的失败蒙住了眼睛，吓破了胆子，以至看不到真相了。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明军最初的失败比如萨尔浒战役，主要原因不是战斗力不如金兵，而是既知己也不知彼，轻敌，再加军队数量本身就偏少，行动计划又没有保密性，才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

天启初年的几次失败如袁应泰之败，王化贞之败，则基本上都是内奸作乱献城，导致全线溃败。

论真正的战斗力，后金军队远没有各方人士吹嘘的那样厉害，受过精良训练的明军，只要敢于作战，即便在占据数量劣势的情况下，也能给后金造成相当大的伤亡。天启初年的浑河之战就是证明。

许多不动脑筋的明方官员、将领只是看到以前与后金作战的一连串失败，就心惊胆战，将失败简单归结为后金军队战斗能力太强了，而很少真正具体分析失败的原因。

官员、将领是如此，普通士兵当然就更如此了，这导致明军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怯战心理，一听要和后金打野战，就心里发怵，就觉得要失败。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再去打仗，本来可以相持下去的战斗，都会因为临阵怯懦而全线崩溃甚至未战先逃。

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是怯战，就越是打不过，越是打不过，就越觉得后金强大无比，更加怯战。再加上明军的数量大部分时候都处于劣势，于是战胜乃至消灭后金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也就难怪乎许多人认为要对付后金，唯一的办法就是修城守城，避免野战，慢慢地拖。

官员们会觉得只有投入到修城守城中的银子才是有价值的，如果是把银子和大量物资投入到供给更多数量的军队上，他们就会觉得心痛，觉得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打仗，那还不是白白给消灭了。

修城用的银子毫不吝啬，拼命投入。而另一方面对养兵需要的军饷，却吝惜至极，甚至不是设法增加军队数量，反而拼命裁军。

而最后的结果是，关外修筑的城池捆住了明军的手脚，让明军的力量为保住几个孤城陷入彻底的被动，被金兵牵着鼻子走。到最后这些城池成了消耗明朝人力、物力的一个无底洞，一次次的围城打援，结果是野战也失败，城也守不住。

大部分人都被假象迷惑住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而恰恰是毛文龙眼光犀利，一针见血，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也看破了后金外强中干的本质。

明军当时只要解决了三个问题，彻底消灭后金不是五年十年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三年四年的问题，而是一两年之内就可以实现的目标。

哪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情报问题；第二个是数量问题；第三个是士气问题。

就情报问题来说，就是一定要弄清后金的作战特点，行军动向，兵力分布，一句话，后金在干什么，都要心中有数。当然也包括对地理、地形的熟悉，对后金内部矛盾的洞察和利用。

就数量问题来说，也就是一定要保证对金作战的士兵达到足够的数量，而且是不掺任何水分。全局对阵金兵的军队数量至少要在二十万以上，局部的数量也应该在十万以上。而且这个军队不是用来守城的，而是用来野战的。

士气问题，就是士兵碰到后金军队有誓死血战的勇气，不能一打就逃就溃退。

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后金基本上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只剩下被宰割的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满文老档》的记载可以看出，后金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到了油尽灯枯，濒临崩溃的局面。说是全民皆兵，实际上，还是要有人为他们种粮食，要有人服劳役为他们修城，为他们制造各种器械，这些大部分是强迫汉人去干的。

但由于其统治的残酷性，导致汉人纷纷逃亡，其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挣扎。用屠刀威胁，最大程度去压榨汉人的劳动，可以维持一时，但后果就是加剧辽人的仇恨和反抗心理。不仅是其统治区内的百姓极端惨苦，就是其军队的士兵本身也是处在一种神经绷紧、极度高压的状态，唯恐冷不丁就有汉人给他们下毒，冷不丁就被打闷棍，晚上睡觉都不能安心，常年过的是提心吊胆、苦不堪言的生活。

后金的统治完全建立在暴力威慑，屠刀压迫之下，而其对军队的驾驭，也完全依赖在军事行动取胜后分赃的诱惑。一旦它在军事上出现颓势，对它的统治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不仅平民的反抗会进一步激烈化，就是军队本身在短期内都会分崩离析。连守都是不可能守住的。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明军和后金作战，只要情报掌握充分，对其动向虚实了如指掌，派一支对地形非常熟悉，十万以上的军队主动进攻，这个战略主动权就会掌握在明军手中。

如此，明军既不会重演当初在两眼抹黑的萨尔浒战役中被各个击破的悲剧，也不可能如后来每次去救援被围困的孤城被后金牵着鼻子走，最后被全歼，而是倒过来，让后金被明军牵着鼻子，在指定的战场作战。

这十万人设伏奇袭也可，正面对战也可，足以拖住后金主力。而从实际战斗来看，毛文龙由于能洞察后金虚实，熟悉地形，往往只用两万人的部队，就能深入敌境，声东击西，设伏歼敌，来去自如。如果他有十万器械精良的军队，那作用就远远不是牵制了。

这时只要再有另一支十万左右的军队，直接作战，或到后金力量空虚之地，策反汉人将领，策动平民起义也可，则后金的统治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即便其在某些据点负隅顽抗，只要切断金兵后勤供应，基本上两三个月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明方只要情报问题、军队数量问题、士气问题解决得好，后金就是秋后蚂蚱。

而这三个问题，毛文龙恰恰已经解决了两个半了。

情报问题，他是彻底解决了，光从前面部分对《满文老档》的摘引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派一两个间谍，或者几十个间谍，而是派出成百上千的间谍到后金统治区去，搞得后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更不用说他还设法策反了许多在后金担任将领职务的汉人为他提供消息。

士气问题，他也解决了。在他那里的士兵，本身就是拼死从后金魔爪下逃出来的辽民。他们的作战勇气和决心，前面就分析过了。实际上，毛文龙率领这些人在军饷极度缺少的条件下，都和后金进行了无数次拼死血战，还基本都是野战，这在关宁方面的明军是根本难以想象的。

这不是说谁的训练更好，谁的单兵素质更强，而是说其他方面的

明军就算训练再精良,但如果一打就发怵,就觉得要败了,还是先逃吧,那士兵个人的格斗能力再强都没有用。

而东江的军队本身就是亡命之徒,而且他们清楚知道金兵不是什么刀枪不入的怪物,同样脆弱的很,只要以多击少,金兵同样会害怕,会恐惧,甚至连木棍都会畏惧,这种对敌人弱点的了解,是其他明军不具备的。

剩下就是数量问题,而数量问题,毛文龙其实也解决了一半,也就是他本身就从逃到东江的辽民中选拔、聚拢了二十多万人,加以训练组织,所缺的就是给这二十万人提供足够的兵器、盔甲,还有能让这二十万人都完全吃饱肚子的粮饷。

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文龙反复陈述,只要朝廷肯向他提供足够多的军饷,要消灭后金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他在天启三年十月十五日奏疏中说现在的人一提到平奴,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这是不了解奴贼的情形,心生疑惑所致。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现在就是了解金方的情况,知道镇江可以攻克,率领二百多人去就拿了下來;知道辽民可以鼓动,就把他们招集、收纳起来而不怀疑;知道朝鲜的地方可以利用,就不避猜嫌留在那里;知道一年多没有应援也可以支撑,就安稳地驻扎下来设法牵制;知道金人可以用计取胜,所以多次设疑获胜;又知道明年一定可以扫平奴隶,所以恳请朝廷能发给足够的军饷。最近获得的几次大捷,本来可以把占领的险要长久占据守卫,来拖垮敌人的军队,但因为粮食不够,只能撤回来,所以粮饷的关系非常大。

在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具奏中,毛文龙又说:我涉历辽左三十多年,山川情形,地利险易,全都熟悉。扼奇制胜,都心中有数。所以逡巡到现在而不敢长驱直入,就是因为粮饷不够,士兵都满脸菜色,马匹、盔甲、器械全都没有。驱使赤手空拳、饿着肚子的众人去和强虏作战,这实在是办不到。

别人都认为他是吹嘘浮夸,而在毛文龙不过是对局势深入洞察之后的大实话。

当时的后金，在表面的强大包裹下，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油尽灯枯，苦苦撑持的局面。明朝只要咬紧牙关，拿出狠劲，下大血本，供养一支能吃苦、不怕死、打硬仗、又知己知彼、人数二十万左右的军队，击穿这看似金玉的薄壳，后金在一两年内就必死无疑。

但可惜的就是由于明朝财政大权把握在那些始终把减赋，减轻百姓负担作为己任的官员手里，也由于他们被后金表面的强大迷惑，舍不得拿出能支撑这一战略设想的军饷来，并把毛文龙的大实话当成是漫天要价的吹牛，讥笑讽刺，不屑一顾，甚至厌恶反感，从而把军饷的重头都放在了关宁方面修城上去，最后还上演了杀毛文龙、东江力量内江瓦解的悲剧。后金解除了后顾之忧，马上攻进关内，靠抢掠来的物资缓解内部矛盾，最终明朝自己反被拖垮。

3. 对上级得谄媚才行？

毛文龙一片忠心，难免直言无忌，显得刺眼，这就是所谓骄恣的由来。

他的一些言论，在许多人看来也真算得上桀骜不驯，骄横恣睢。作为一个武官，本来见到文官就应该点头哈腰，阿谀奉承。而毛文龙呢，却偏偏不，甚至对于皇帝，他也直抒胸臆，略无顾忌。

在天启七年和崇祯元年，他接连对皇帝发出“不平者五事”和三个“知之否”的质问，语气之凌厉，情绪之愤激，溢于纸上。

“不平者五事”的奏疏是天启七年七月发出，结果八月份天启皇帝死了，崇祯皇帝九月收到。

第一个不平：我招抚辽民，每天都成千上万，挑选精壮的人入伍，老弱的屯田种地，千辛万苦组织起来一支军队，和强敌相抗。现在朝廷却不肯发足够的军饷，让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空拳赤脚，随时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作战，和内地那些逍遥自在，靡费军饷的人相比，究竟谁在吃苦，谁在享乐？

第二个不平：宁远每个月每个士兵的军饷是一两五钱，军官家丁的军饷二两四钱，再加上食用的米每月每人五斗，还有皇帝不时垂恩赏赐。而海外的军官，七年以来总计拿不到半年的俸禄，数百万的士

兵百姓，都靠从天津、登莱运来的二十万石米供应，这当中还包括因为海上风浪损失掉的粮食。山东二十万两的银子，在送到东江之前，又有被侵占克扣的。海外七年总计拿到的军饷，可以抵得上宁远两三个月的粮饷吗？

第三个不平：旅顺、石城岛一带，是天津的门户，是敌我必争之地，设立将领严防还唯恐不及。而袁崇焕派来的都司徐敷奏用宁远可以领更多的军饷来煽惑鼓动旅顺参将李鐸、石城岛游击高万重等人烧粮夺船逃走，跑到宁远那边去。不依法严办，反而恢复这些人的官职，纪法何在？

第四个不平：我孤忠自许，一片赤诚之心，可以坦然面对君父，可以质之于鬼神，可就这样，还有人攻击我，说我是当今的安禄山、史思明。我想天下丧了良心的人固然多，但或许也有天良发现的时候，没有像这样良知丧失毁灭殆尽的人。虽然我可以承受这样的污蔑，但死的时候岂能瞑目？

第五个不平：今年春天金兵进攻铁山而到云从，我因为死守死战立功，结果又有人说我是退居云从，和金兵没有丝毫作战。自己血战搏杀，九死一生的经历，竟然埋在雌黄之口！

而在崇祯元年，他对崇祯皇帝接连用了三个“知之否”加以质问，态度则更显激烈。

我孤处在海外危地，稍有行动就要受到（粮饷不足）掣肘，功劳没有建立多少，（因为讨要军饷）招来的怨恨就已经无数，皇上你知道这一点吗？

朝廷内和地方上的官员，对兵法奇正，地理山川的形势，许多人都没有深切了解，所以各持己见，争论不已，终究不能给金人致命一击。而我在辽东呆了几十年，对形势有最透彻的了解，无奈相隔遥远，难以用笔代舌，把道理说痛快，皇上知道这一点吗？

朝鲜刚被金人侵掠，不能再指望它来解决军需，现在接济东江，就应该在夏、秋两季，每次供应足够的军饷，便于转运，这当中的增损、调节，可以灵活处理，皇上知道这点吗？

毛文龙敢于如此质问皇帝，正因为他赤胆忠心，坦荡无私，对国家忧心如焚，对朝廷官员以及关宁方面将领颀顽、无能，还一意猜忌、掣肘愤怒至极。看到国家危难，东江惨苦，而许多人麻木不仁，日以同室操戈为事，痛激于中，悲达于外，形诸于笔墨，才有这样不畏嫌疑，不避猜忌的秉实直书。正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崇祯皇帝气量宏大，不但不因此责怪，反而一再安慰毛文龙“远戍孤悬，备尝艰苦，屡建捷效，心迹自明”，“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

但对那些心胸狭窄的官员如袁崇焕来说，毛文龙的奏疏无异是打在他们脸上的一记耳光，他们对毛文龙自然更加恨之人骨了。

另外在歧视武官将领的文官看来，对皇帝进行质问，乃是他们的专利，而现在毛文龙居然敢越俎代庖，那不是骄恣又是什么呢？

八、人可恶了，啥罪名都扣

明代的官员们一直以来最希望实现的事情就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也就是又要军队能打仗，又要军队不消耗军饷。

毛文龙最初仅用二百人就攻袭镇江的作为让他们看见长久以来的理想似乎变为现实了，当然是很高兴的。

但是很快毛文龙就让他们失望了，而且越来越失望。毛文龙为了组建二十万人的军队，不但开始索要军饷，而且似乎在狮子大开口。

对于那些一直以为民请命自居，把压低军饷减小人民负担当成是自己神圣、伟大天职的明朝官员来说，这时候毛文龙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就逐渐褪色，甚至越来越显得可恶了。

而一旦一个人显得“可恶”了，那他的一切作为，一切言论都会被罩上一层阴暗的色彩，关于这人的各种信息传闻，坏的会被保留，好

的则被自动过滤。毛文龙很自然地就从奇袭敌酋的孤胆英雄，变成许多人心目中好色贪财、胡作非为的跋扈军阀，成天索饷骗钱在皮岛上吃喝玩乐的土皇帝。这是朝中的许多官员对毛文龙态度的演变原因。

而关宁方面的官员和将领对毛文龙的猜忌仇恨，原因就更复杂了。

首先有一点就直接促成了他们对毛文龙的厌恶、仇恨，那就是毛文龙的战功。毛文龙从天启初年到崇祯初年，几乎每年都要向朝廷报上战功，比如砍下多少后金士兵的首级，擒获多少后金的俘虏。

对这些战功，关宁方面的官员、将领，本能的态度就是不相信。在他们看来，我们有朝廷给的这么多军饷，在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其他物质供应都要相对充足，训练相对精良的情况下，都不敢和后金打野战，都只能守城，能守住城池就是大捷了。而你东江居然说连年和后金野战，还屡有斩获，这不是故意羞辱我们吗？

肯定是假的，肯定是毛文龙在吹牛，那些头颅肯定是毛文龙杀良冒功！

这样的念头，对关宁方面的人来说，几乎就是一种下意识的，连脑子都不需要过的条件反射。光是这个念头本身就足以让他们对毛文龙厌恶入骨了。

前面提到在天启六年八月的时候，袁崇焕有一份奏疏是承认毛文龙功绩的：“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掣之功，此为最烈。”

但不要认为袁崇焕这里是承认了毛文龙的巨大作用，在袁崇焕看来：

第一，毛文龙只有每次都像这样硬拼才能算牵制，也就是把毛文龙其他时候用更巧妙的战术对后金的杀伤都看成是假冒；

第二，在他看来，毛文龙硬拼血战损失巨大说明东江的战斗力的不行，更衬托了他自己的英明神武。

所以他在赞扬毛文龙牵制之功后紧接着就说“况损于我，而偿于

西虏与毛帅，奴气又复振，能一刻忘臣哉？”。

也就是后金在我这里受到损失（他把觉华岛的明军惨重损失当作不存在了！），但在蒙古人和毛文龙那里，打了胜仗，找回了场子，士气又振作起来，能有一刻忘记我吗？

毛文龙的血战又成为了他吹嘘自己的借口了！袁崇焕的心态是，我这么厉害，面对后金军队都只敢守城。你毛文龙居然敢于和后金打野战，不仅打野战，而且还能屡次奏捷，那就肯定是假的。只有你受到惨重损失的时候，我才承认你是真的。

另外毛文龙的奏疏里屡次向皇帝提醒应该注意后金绕道的可能，而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这种可能性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关宁方面这批人提出的部署最大的威胁。这又是对他们的一个刺激，加深了他们对毛文龙的敌视、憎恨。

还有毛文龙要求增加给东江的军饷，这事实上就形成了和关宁方面获得军饷的一种竞争关系了，这也是要招来忌恨的。

登莱等地的官员、将领也存在相近的问题，这同样让他们对毛文龙厌恶、仇恨。

当朝廷的官员，关宁、登莱等地的官员对毛文龙的丑化、攻击合流在一起，攻讦不断，谤书盈筐，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五六年不断。如果一个人看了这么多攻击、丑化毛文龙的材料，那他对毛文龙还会有什么公正的印象？

明朝的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算得上是极为睿智了，他们在这片对毛文龙的攻讦声中，自己汇集各种信息分析判断，不为谗言所动，坚持对毛文龙的信任，确实难能可贵。

但是能像天启和崇祯这样具备清醒头脑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听风就是雨，看见一点只鳞片爪的信息，就自以为得之矣。于是，即便在当时，毛文龙就已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变成了小丑恶棍了。毕竟中国的成语“积毁销骨”、“三人成虎”不是白来的！

有些人可能难以相信一个人仅仅因为别人对他的不满、厌恶就

被丑化、歪曲成一个和他本来面目截然相反的人？

那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作为毛文龙所受诽谤的参照，这就是熊廷弼。

熊廷弼算来条件比毛文龙优越得多：他本身就是文官，进士及第，而且乡试是解元，就算在文官内部，都是极为荣耀体面的出身，不存在毛文龙作为武官被文官歧视的问题。而且他在辽东对后金的正面战场任职，所作所为，容易被朝廷知道，不像毛文龙孤悬海岛，深入敌后，纵然拼死杀敌，屡次建功，也被朝廷内的人半信半疑，当成捏造、吹嘘。

可即便如此，因为他实心任事，整顿局面，索兵索饷，就招致朝廷内官员厌恶，再加上脾气不好，人缘坏，三来二去，短短一年内就被黑得不成样子。

《明史·熊廷弼传》里摘录了一些攻击熊廷弼的奏疏内容：“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总之几乎就是把熊廷弼描绘成光吃饭不干事，空耗军饷的无能之徒了。

熊廷弼同样是赤胆忠心，同样是才能出类拔萃，卓越超群，他的方方面面条件都比毛文龙优越了这么多，可就是这样，他还是被攻击，被丑化。如果一个人只看到那些抹黑的奏疏，他又会如何评价熊廷弼呢？应该说只能得到完全失真的评价。

熊廷弼尚且如此，那毛文龙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也正因为熊廷弼比毛文龙有诸多优越条件，在他死后，赞扬的声音很快又成为了主流，入清之后，因为熊廷弼死于明朝官方的判决，维持熊廷弼的正面形象也有利于丑化明朝。所以我们现在能一开始就以公正的角度看待他，而不被那些当年丑化他的言辞所欺骗蛊惑。

而毛文龙，显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了。

他被袁崇焕杀害之后，很快就是己巳之变，他的作用是立竿见影

被明人体会到的。在明人那里,至少对于他的评价是毁誉参半:有根据事实热情歌颂、赞扬的,也有依旧执拗于偏见,加以贬低、丑化的;有全盘肯定的,也有承认功绩,但否定其人品的,同样有全盘否定的。

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所谓真理愈辩愈明,毛文龙的真实形象,假以时日,自然就能水落石出。

但到了清朝中叶之后,袁崇焕成为乾隆钦定吹捧的对象(讽刺的是乾隆此人在自己写的影响范围较小的一些文字里倒是说了真心话,他对袁崇焕评价并不高),以达到丑化崇禎的目的,而作为袁崇焕对立面的毛文龙就无可挽回地被定格成了小丑、恶棍,受人唾弃鄙视,所以当年攻击丑化毛文龙的明人奏疏言论都被当成事实来对待。

这样,今人先入为主的印象就是袁崇焕是无辜被杀的英雄,毛文龙则是死有余辜的军阀,对两个人的评价,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有公正可言了。

第六章

袁崇焕杀害毛文龙的昏聩

一、部长枪毙司令能不受惩？

在袁崇焕杀毛文龙的问题上，有些评论已经是不能用偏见来形容了！

比如金庸的《袁崇焕评传》里说“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地侵犯了君权”。

还有一些文章里说“袁崇焕在他对毛文龙先斩后奏时就已为他的惨死埋下了伏笔。因为这是侵犯皇权。你把皇帝当老几了”？“偏偏崇祯帝猜忌心极强，专权欲极盛”，“而杀袁的动因，乃是为维护专制皇权”。

这类评论唯一的价值，大概就是展示了一种完全非理性的条件反射式的思维格式。

杀毛文龙是触犯君权，所以引发崇祯的猜忌、不满和恐惧，所以导致崇祯最后要杀袁崇焕，你还可以听到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么？

莫非在废除皇帝的今天，在君权荡然无存的今天，在西方的所谓

民主国家里,国防部长就是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审判的情况下,把一个军区司令直接枪毙的?枪毙之后,还应该逍遥法外,如果受到法律制裁,就是专制皇权?

而实际上在明代,要杀掉一个军区司令,不经过审判,不经过官员的会审,核实罪行,这是皇帝都不可能做到的。这不是挑战皇权的问题,而是挑战整个国家基本的法律制度。

有些现代人,口口声声把民主、自由挂在嘴边,唾沫横飞地批判所谓明朝的君主专制,而实则,他们骨子里信奉的恰恰是不折不扣的专制者和暴君的逻辑。

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比如袁崇焕这样的人,随便给人定罪,随便杀人都是理所当然,不但不是罪行,还是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吹嘘、赞美的英雄壮举。就算勉强承认确实是杀错了,但也是轻描淡写,似乎杀了就杀了,也没啥大不了。

只要是他们厌恶的人,被私刑滥杀,那也是死了活该,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未经核实的罪名当成事实扣在其头上,没有任何审判就直接处死,死了之后,在当事人无法自我辩护的情况下,再搞缺席审判。一条人命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草芥。

当他们喜欢的人,在法律程序下,经过八个月的审判,罪状确凿,再被处死,就成了所谓皇帝“猜忌心极强,专权欲极盛”导致“专制悲剧”,就是“令人扼腕叹息”了。

就这类人,还煞有介事、居高临下地来批判明代的君权?随便找明朝的皇帝出来,十个里倒有八个比这些所谓的现代人,思想更开通和民主,更懂得什么是依法治国。

袁崇焕杀毛文龙不是什么侵犯君权,而是侵犯任何一个还有法律的现代国家的容忍底线!如果是现代社会,在战争状态下,出现类似袁崇焕这样的人,造成如此严重恶劣的后果,他被送上军事法庭,也足够枪毙两三次了!

有些人把自己阴暗的心理塞到崇祯皇帝的肚子里去,口口声声说崇祯皇帝多疑,猜忌,唯恐别人威胁自己的皇权。

真是可以让人仰天大笑,事实证明,多疑的不是崇祯,猜忌的也不是崇祯,唯恐别人威胁自己的更不是崇祯,而恰恰是那个被他们粉饰涂抹得光鲜亮丽的袁崇焕!

就以对毛文龙的态度而言,无论天启和崇祯都不猜忌,都能信任,而正是袁崇焕这些人在病态的多疑、疯狂的猜忌下,必欲杀之后快。天启皇帝就不必多说,对毛文龙嘉奖备至,史不绝书。到了崇祯皇帝那里,尽管攻击、诽谤毛文龙的奏疏不断,但他对毛文龙总体态度还是信任的。不妨把他几次对毛文龙的批列列举一下。

在天启七年(1627年)九月,毛文龙上疏抱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请求辞职,崇祯批示安慰他说你远驻海外,孤悬敌后,备尝艰苦,屡次建立功勋,忠诚不二的心迹不言自明了。我正殷切期盼,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要求让别人来接替呢?

你的辛苦我都知道,你的忠诚我也理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退休呢?还希望能更加奋发努力,来让我宽慰。

在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毛文龙上疏说粮饷器械都不足时,崇祯皇帝又安慰他说:

总兵在海外劳苦,我非常想念。现在内地的粮饷,都已经陆续发送解运,况且海天寥阔,怎么能送一次就够了。但应当严禁解运官员侵占贪污,一定要让饥饿的军队填饱肚子,至于兵额多少,月饷多少,总兵应该把数字都开报上来。

在崇祯元年五月,毛文龙再次上疏陈述自己处境之艰难时,崇祯再次安慰他,毛文龙本就是激于大义,挺身而出,开辟东江的抗金基地数年,这其中的苦心,我是深切了解的,别人的诽谤议论,何足置辩。

在崇祯元年七月,毛文龙就军队数量问题上疏辩白,崇祯又表示对他的理解:辽民为了避难,屯聚在海岛之上,扛上锄头就是百姓,接受盔甲、器械就是士兵,不能和内地招募军队规定军饷当成是一回事,文龙应该乘机奋勇,等有了显著的功劳,谁能用糜饷作为借口来攻击?我寄予深切期望。

还有崇祯元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上疏说被诽谤的冤枉；崇祯依旧下旨勉励他尽力去建功，人言自然平息，不必太理会那些诽谤。

纵观以上这些记录，尽管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对一些情况还不是完全了解，崇祯皇帝并没有给予毛文龙最大程度的支持，但他总体的态度，还是信任毛文龙，理解毛文龙，希望毛文龙能够克服困难，尽力把东江维持下去，期望他能建立更大的功勋。他对毛文龙因为受谤太多激愤之下主动提出的辞职，都是好言安慰，一口回绝的。

就这样，皇帝对手握军权的毛文龙，能够宽容、理解、信任，寄予殷切希望，但袁崇焕这样的人，却视毛文龙为眼中钉，肉中刺，成天疑神疑鬼，直至不惜一切代价要除掉他。可见，真正心胸狭隘，多疑猜忌的不是明朝的皇帝，而恰恰是被人吹捧的袁崇焕。

而程本直的《漩声记》中说要除掉毛文龙的不是一个人，他们想除掉毛文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光是弹劾他的奏疏就数以百计了。因此是左右官员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之所以不杀，不是不应该杀，而是没有能力杀。所以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举国称快，皇上也高兴，杀毛后表示许可的圣谕就是彰明昭著的证据。

确实，自从毛文龙开镇东江以来，对其诽谤、攻击者不断，然而这就是可以杀毛文龙的理由么？就是所谓“国人皆曰可杀”么？

若按照这种逻辑，当万历末期、天启初年熊廷弼担任辽东经略的时候，就已经被攻讦不断，那是不是当时熊廷弼就可以不受审判，直接处死了？

若按照这种逻辑，在万历初年担任首辅的张居正因为夺情被众多文官攻击得狗血喷头之时，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把张居正杀了，还大义凛然摆出“国人皆曰可杀”的架势？

更不必说当时的情形，攻击毛文龙者固然极多，但为毛文龙辩护，热烈赞扬其作用的也大有人在。前有亲自视察过皮岛的姜曰广、王梦尹这两位以廉洁忠贞著称的官员对毛文龙的高度评价，后有徐尔一的千言奏疏，力辩泼于毛文龙身上脏水之无稽，力荐毛文龙为扶危定倾之英雄。还有如多次担任兵部尚书的王在晋，丰城侯李承祚

等人,都是推许毛文龙的。甚至就是作为袁崇焕前辈的孙承宗都是承认甚至赞扬毛文龙之功绩的。这就是程本直所谓的“国人皆曰可杀”?

程本直把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之后,用即成事实要挟逼迫,皇帝迫于无奈不得不追加的认可,当成杀毛文龙合法性的证据,只能说是把天下人都当成是可以愚弄的傻瓜了。

二、杀了毛文龙,后金笑开花

1. 东江将士,谁其用之?

毛文龙活着时,后金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始终未能踏入关内一步,就是对宁远、锦州之攻击,都只能是浅尝辄止,而无法长期围困。毛文龙一死,仅仅三个月后,后金就迅速出动,绕道进关,攻到北京城下。而以后清军对大凌河城的围困,对锦州的围困,再不像以前那样打个两天或一个月不到就回去,而是成年累月,直至守城官兵粮食耗尽投降为止。这铁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

从短期也就是崇祯二年(1629年)这段时间看,袁崇焕杀毛文龙当下就导致岛上兵民人心散乱,原先对后金的间谍侦探自然完全停止,对后金的牵掣、袭击更谈不上。

从长期看,原先毛文龙聚集的可以组织成军队的几十万力量散失殆尽,只剩下几万军队,和百姓总计不过十几万,分布在众多岛上,力量已经极度削弱,再无法形成毛文龙时期的那种巨大牵掣作用。

而更恶劣的是,袁崇焕的举措,使得毛文龙费尽心血挑选、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才干出众的辽东将领,或陷于内讧屠杀,或陆续倒向后金,导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胜负天平开始完全倒向后金一方。

袁崇焕在杀害毛文龙后先是把东江军队一分为四,让毛文龙族子毛承祿管一支,他自己的亲信徐敷奏管一支,刘兴祚管一支,陈继

盛管一支。（《崇祯长编》中毛承祿作毛承祚，似误。）

他的用意无非就是让东江的力量分化瓦解，互相挟制，这样才能让他多疑、猜忌的心放下来，他自己在奏疏里就声称，如果再填补一个总兵来接替毛文龙的位置，那说不定就会有第二个毛文龙。

他所谓的“文龙之后，宁无文龙树敌酿忧”，联系这个时候他正收留后金使者，双方联络处于火热的状态，似乎确实是怕毛文龙袭击后金破他的好事，所以才下杀手，为了避免再出一个毛文龙“树敌酿忧”，才坚持不在东江设帅。

后续的奏疏里，更明确，袁不设总兵的意图就是要让东江军队无法统一号令，陷于互相争夺利益，互相牵掣猜忌的处境中。

他的奏疏大意是辽东原本就一个军区，现在河东增加一个军区，但胜任总兵的人，难以找到。况且对武官来说，总兵的职位已经是极品了，一得之后就等于喂饱了的老鹰。不如空出这个位置，作为激励武将的悬赏。现在就把东江军队分为两支，谁有功劳谁就能得到总兵之职。

事态的发展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东江此后内斗不休，叛乱不止，几无宁日。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在刘兴祚和后金作战英勇战死后，刘氏兄弟在岛内就开始作乱，杀死副总兵陈继盛。

刘兴治杀死陈继盛前后，皇太极就与之联系上了，前面已经提到过《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记录的皇太极给占据岛上的刘氏兄弟的书信内容。

后面还附有刘兴治等来书：“大金国汗，汤武尧舜之君，实有所以收拾人心者也，臣等有先见，戮职官陈继盛等率众归服。”

这就是怀着要投降后金的心思了，先不论刘兴治等人降金之心是真还是假，其当时杀掠各岛，已为叛乱无疑。据《崇祯长编》记载：“刘兴治既杀陈继盛等，因与其兄弟放船至长山岛，纵兵杀掠。”

明朝局势本就险恶，此时更雪上加霜。以至当时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有“建州之外又生一建州矣”的感叹。

之后，明方勉强把刘兴治招抚、安定下来，但到了崇祯四年（1631

年)三月,岛上众将又开始互相仇杀。据登莱总兵黄龙的报告,刘氏兄弟在岛上杀戮沈世魁一家人,只有沈世魁一人逃脱,甚至兄弟之间互相残杀。最后是沈世魁杀死刘兴治,岛上乱局才算平定。

到了崇祯四年十一月,黄龙被任命为皮岛总兵,镇守东江。

就在同一个月,原属东江部队的孔有德在支援辽东途中叛乱;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耿仲明在登莱城内叛;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等人从海上逃奔后金,黄龙战死。

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的叛乱,对明朝造成的打击之巨大,是无法形容的。不但导致山东地区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陷于兵荒马乱,残破不堪,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之大难以估量。更是让当时明军在登莱地区聚集训练的最先进的火器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反归后金所有。

在孔有德等人逃奔金国后,崇祯六年(1633年)九月沈世魁任东江总兵,六年十二月,东江石城都司尚可喜投降后金。

此后东江皮岛又在沈世魁的率领下,勉强坚持了三年半的时间。而到了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在原东江部队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带领下,金兵彻底攻陷皮岛。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中说:以前毛文龙守云从岛的时候,建州兵屡次攻打不下来,文龙既然被杀死,刘兴治又因为愤激作乱,人心更加摇动。到了这个时候,建州兵,用辽将作为前驱,熟谙水战,习惯地利,所向立下,而陈洪范观望不协力,沈世魁孤军覆没。

可以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明金战争之间一个最根本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明方无论打了多少败仗,都是处于战略上主动有利的位置,而后金是日暮途穷的困兽。毛文龙一死,态势则完全颠倒过来。

这不仅是后金可以摆脱东江后顾之忧,长驱绕道,直入关内抢掠,更是导致决定胜负天平的辽人将官士兵的向背趋势彻底扭转。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我提到过孙承宗的一句话:“夫贼抚辽以为用,与贼杀辽人以驱之为我用,斯天下安危之大机也”。

也应该记得毛文龙说的话:“夫招练辽兵,既免安家行粮,又省日

月之稽迟，兼习敌情，而我得一人，敌即失一人，策之得也。”

以前是毛文龙抚辽人以为明用，尚可喜、耿仲明就是代表。而现在在是袁崇焕杀毛文龙而驱辽人为贼用。

在毛文龙时期，无论条件多艰苦，可总体上还是辽人将士，心向汉营，不断设法起义来归，更不必说上百万的百姓由毛文龙接应逃出金人魔爪。

而到了毛文龙一死，情形就完全颠倒过来了，成了毛文龙苦心收集选拔训练出来的那些极为精明能干、出类拔萃的辽人将士，纷纷叛乱投降后金。天下安危之大机已经完全倒向了不利于明朝的一面。而袁崇焕杀害毛文龙是造成这一恶果最根本、最决定性的因素。

实际上，在袁崇焕杀毛文龙之时，岛上将士已经因为极度悲愤，有了叛乱之心。据毛奇龄所写的《毛总戎墓志铭》记述，毛文龙被杀当天，东江将士悲愤痛哭，要追杀袁崇焕为毛文龙报仇，被毛文龙的儿子（是过继的族子非亲子）毛承祿阻止。

这条记载可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以及“文龙之诛，岛中危惧，几于生变”的记载对照。

而从崇祯三年十二月黄道周的一份奏疏来看，刘兴治的叛乱都可能是以毛文龙无辜被杀为借口。

当时原任首辅钱龙锡（袁崇焕的后台，杀害毛文龙的同谋）被下狱，黄道周为钱龙锡求情，写了一份奏疏，说是如今街谈巷议都认为杀钱龙锡是给毛文龙报仇。舆论既然是这样，边将（指皮岛官兵）必定因此更加骄横，代表政府的内阁大臣就会显得矮一头了。

杀阁臣给毛文龙报仇是可以的，但因此让刘兴治叛乱行为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借口（为毛文龙被杀出气）就糟糕了。如今东江正在作乱，歌颂毛文龙就会助长刘兴治的气焰，是绝对不行的。

从黄道周奏疏可以判断，当时刘兴治作乱，其煽动岛兵的借口多半还是毛文龙无辜被害，所以黄道周才说：“杀一阁臣为毛文龙报仇犹可，为刘兴治树帜则不可。”

当然从这个奏疏看，黄道周之类人也是极度昏聩的，他们的做法

恰恰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如果当时能够迅速为毛文龙平反,或许还能挽回不少人心,结果由于他们对此坚决抵制的态度,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黄道周上奏疏之前的崇祯三年五月,毛文龙的族子毛承祿就为父伸冤,备述毛文龙以往预警后金绕道,接应辽民,牵制后金之大功,言辞哀切,泣血拭泪。但结果是“揭上,朝臣不之省”。

这导致东江将士的悲愤情绪没有得到足够抚慰,反而不断郁积。

据《崇祯长编》里的记载,毛承祿在崇祯四年末五年初孔有德、耿仲明的叛乱中,也从广鹿岛入登莱跟随孔、耿二人一起反叛。如果这个记载属实的话,那显然就是因为父冤不得伸,愤懑不平所致。

但又据《东江遗事》所记,毛承祿并未和孔有德等人一起反叛,事情真相是毛承祿被孙元化派去劝说孔有德等人重新归明,孔有德让他同流合污,他都拒绝了,只是回来后,因为谗言陷害而被杀。他本身一直是忠贞不改。

若此,则两下对照,长编中记载毛承祿与孔有德合流之事应该是谗言未得澄清的结果。以情理来判断,按照毛承祿在东江的身份和影响力,如果是他参与了叛乱,那在叛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必然在孔有德等人之上,叛军应该是拥戴他作为领袖,而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默无声息,仅作为一个协从参与者被提到。

但无论如何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叛乱的根本原因就是毛文龙被冤杀造成的愤懑心理以及对继续留在明军内前途的悲观、失望,这是没有疑问的。

《东江遗事》中的《耿靖南传》说“仲明顾有德叹曰:‘大将军(即毛文龙)要合义旅,跋涉荒陬,出万死以复疆宇,而卒以冤死。我与尔直若几上肉耳,可郁郁久居此乎?’有德然之,遂率兵归本朝”。

《孔定南传》中说:“及文龙为袁崇焕所杀,调往山东孙元化麾下……兵饷不以时至,众军皆哗,有德叹曰‘大将军功名卓卓,犹且不免,我辈死固晚矣,时事如此,尚可为耶!’”

总之他们的意思就是,毛文龙这样舍生忘死,白手起家,立下功

劳无数的大将年尚且落得个无辜被杀的下场,那我们继续在明朝这边干下去,还有什么指望?还是投靠后金算了。

正如前面引用过的陆云龙的慨叹:“尝闻东江辽兵最耐苦,持炒一升,可支十许日,昼伏夜行,卧草餐霜,能出不意杀人擒人,皆一班可用之士。今其士固在也,谁其用之?谁其用之?!”

看了这些事实,不免让人慨叹袁崇焕究竟何以非杀毛文龙不可?为逞一己之欲,袁崇焕贻误国事如此。

2. 大家放手同室操戈吧!

前面都是论证毛文龙无罪而被袁崇焕冤杀,退一步说,无论毛文龙有没有罪,该不该杀,都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决定,而并非是他袁崇焕一个人来决定。这点是相当重要的!否则势必造成各个地方官员,各个边镇将帅,自行其是,在重大决策上擅自主张。结果是客观上形成割据分裂局面,上下一盘散沙,力量无法协调统一,甚至互相内讧窝里斗,后果不堪设想!

由中央来决定一些重大问题,表面上可能暂时带来效率的损失,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甚至是决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命运前途的问题。

宋朝、明朝好不容易解决了唐朝军阀割据,地方分裂的局面,明朝更在宋朝的基础上完善体制,严密化了制度。而袁崇焕却利用皇帝对他的信任,从根本上破坏国家制度,这样的行为恶劣程度是无以言表的。

一旦这个头一开,这个先例一开,既然袁崇焕可以这么做,那么以后类似级别,类似地位的官员、将领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事实上,后来南明政权确实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如果大家都来这么一套,看某个官员、某个将领不顺眼了,就自己罗织罪名,把他杀了,那么这个政府还怎么维持下去?

袁崇焕手中有尚方宝剑,但毛文龙手中也有尚方宝剑,如果袁崇焕认为自己有权力杀毛文龙,但毛文龙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认为自己可以杀袁崇焕?而且尚方宝剑是派什么用的?尚方宝剑的作用是

当军情紧急，需要马上处理，如果上报朝廷，上报皇帝，延误军机，这个时候才需用尚方宝剑。而不是在明明有充分的时间奏报朝廷的情况下，为了避开管理，而自己去滥杀一个看不顺眼的高级官员将领！然后再去逼着政府去认可这个既成事实！

袁崇焕对自己行为的恶劣程度，并非不知道，《袁崇焕资料集录》里收录的《今史》里有一份他的奏疏，里面说到即便最后自己真的能消灭后金，这个功绩也不足以抵消杀毛文龙的罪行，他愿意到时候“赎死而不受赏”。

这番话虽然是惺惺作态，伪善至极，但却足以表明其擅杀毛文龙行为的恶劣程度，连他自己都是清楚的。

不要说毛文龙无罪有功，无辜被害，即便毛文龙真是有罪过，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袁崇焕所杀，就足够定袁崇焕的死罪了。

不要说他因为渎职让后金从所未有地攻到北京城下，就是他实现了五年平辽的许诺，按律他都该死。

过去明朝的文官之间也内斗，但无论内斗激烈到什么样的程度，最后矛盾解决还是依靠中央朝廷的法令，杀谁贬谁都是通过政府来决定的。

可是袁崇焕倒好，自说自话就把一个于国家有功，镇守要害位置的将帅给杀掉了。他让那些不隶属于他的将领怎么想？让那些原本在毛文龙手下镇守皮岛的将领们怎么想？让底下的士兵怎么想？

如果明朝内部官员和将领之间相处，都要这么提心吊胆，都要随时提防以免一不小心就被自己同僚或上司给杀掉，那还怎么抵御外敌，还怎么齐心协力？

以后南明好几次功败垂成，实际上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在互相内讧。本来集中在中央层面的争斗直接向地方上，向军队扩散，造成各地方，各支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夺势力，争夺地盘，甚至自相残杀！大部分的力量都消耗在内斗中，反而让清朝渔翁得利。可以说袁崇焕开的这个极为恶劣的头，难辞其咎。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外敌上，反倒一上任就急着杀自己人毛文龙，此举是恶劣到无以复

加的做法。

明朝遗民李长祥在《天问阁文集》的《万时轺传》中就以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反面例子，其中提到某四川人王朝先原为毛文龙部下。毛文龙被杀后，回到关内，后为黄斌卿前军将军。当时某官（似为兵部侍郎头衔）奉命视师，袭杀总兵丁慧生。王朝先大怒，想要起兵攻杀该官报仇，被万时轺劝止，他替王朝先作了一份谴责书信，是这么说的：“毛帅屹然长城，虽以鲁莽无知识如朝先，亦窃喜疆场之有人，不意毛帅突被戮，万功灰烬，万事瓦解。在昔应侯杀白起，赵高杀蒙恬，张浚杀曲端，秦桧杀岳飞，皆落上将之头于飞矢之日。”

不过这封信送过去后，被此官先下手为强，袭杀了王朝先，万时轺也不知下落。

我们常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袁崇焕的做法则是反其道行之，把本来就是自己一边的力量也要打击瓦解，推向对立面！后来效仿者层出不穷，其恶劣影响绵延不绝。

三、漂亮话是给自己用的

有一点是很古怪的，程本直、袁崇焕这些人一边把杀毛文龙看成理所当然，另一边却还抬出一套又一套天花乱坠的道理，要皇帝支持边臣。

袁崇焕在见崇祯皇帝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说过这样的话：“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袁崇焕说这些话是要求崇祯信任自己，不要为流言所动，不要中

了敌人的反间计。然而他似乎没有想过，毛文龙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臣！他说的这些话也完全可以使用在毛文龙身上！

毛文龙孤处东江，收容大量辽东剃头难民，无日不处于危地、险地。他要设法聚集人心，要派间谍到后金并同时防范后金的奸细，要在饷银不足的情况下，用一切手段来筹措粮饷，要应对来自各方的攻击，正是典型的“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的局面。

毛文龙为了维持东江的明军，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可是发给的军饷少得可怜，对后金百般牵掣袭扰，还被朝廷官员说成是糜饷冒功。在这种极危难、极困苦又不受理解的情况下，毛难免因为激愤，言辞有所不敬。在与后金生死相搏的绝地险境下，生存为第一要务，行动举措又不可能严格按照内地优哉游哉的条件例行矩步，因此难免招来诟病。

这种情形，也正是适用袁崇焕所说的“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

毛文龙为养活东江军民，就必须向政府不断陈述困苦，索要更多的军饷，招来廷臣的怨恨；在军饷不足的情况下，又难免寻求朝鲜支援，也因此招致朝鲜怨恨；和后金作战，也必定招来其仇恨，致其散布流言，施展诡计，设法离间、破坏毛文龙与明政府、与朝鲜的关系。

这也正是袁崇焕所说的“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这些话似乎完完全全就是对毛文龙说的！

袁崇焕从一进京就认为毛文龙该杀，不知道他所认为的那些毛文龙当杀的罪状究竟是哪里来的？是他自己亲眼目睹的么？显然不可能！也不过是他道听途说，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已。仅仅凭借这些道听途说的流言，他就认定毛文龙当杀，可谓昏聩已极！

道理，袁崇焕是全知道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启和崇祯皇帝，他们无需多说，自己的行为就能实践这些道理。反而是袁崇焕，成天把这些道理挂在嘴边，但在他看来，这些道理仅仅是用来维护他自己，用来让别人无条件信任他用的！一旦需要他实践这些道理，来

对待别人的时候,他就如同得了健忘症一样,完全沉浸在残杀同僚的亢奋、快感中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袁崇焕刚愎自用,自我中心的人格。

而程本直在《漩声记》里的一段话就更有意思了,大意是做事的人如何如何艰难,杀了做事的人是容易的,但要找到一个接替做事的人,就很难办了云云。这些话本身是程本直用来给袁崇焕喊冤的。

但把这段话同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行径对照一下,真是极度讽刺!

毛文龙当然就是一个“任事之人”,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理由就是其“僨事”,也就是败坏辽事。那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杀之亦必其后之者果足以胜其所杀之者而后可也”,找到接替的人足以能胜过毛文龙呢?

他似乎不但没有考虑,相反还唯恐后来接替的人和毛文龙一样能干,所以不设总兵,千方百计分化、削弱、瓦解东江的力量。他自己承认“今用兵时,应添设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也就是根本没有准备好胜任的接替者,他也不打算去找胜任者。

他杀毛文龙就是为满足自己的快感,根本不考虑后果会如何。程本直说:“如不问其后之何若也,而但绝之以快一朝也,将杀者不可再生也,而人实其难得也。行见任事者一人不如一人也,僨事者一日甚于一日也。诛之不可胜诛,不诛何以服诛者之心也?何以服天下万世之心也?”

这道理说得多么好啊!杀毛文龙,袁崇焕是可以快意于一朝了,他就不管以后国家死活如何了!到了事实证明杀毛文龙错误的时候,再要找一个像毛文龙一样的人能找得出来吗?

袁崇焕这样的人,正是“僨事者一日甚于一日也,诛之不可胜诛”,但这个时候,不杀袁崇焕,对得起死去的毛文龙吗?借用程本直自己的话,“不诛何以服诛者之心也?何以服天下万世之心也”?

程本直还说“爰封疆者,自当爰及封疆之人也。是故严刑峻罚加于他焉者,犹可言也;严刑峻罚加于封疆之人焉,不可言也”。

又说得多么好啊，毛文龙自己就是一个封疆之人，袁崇焕同为封疆之人，何以就不能爱及毛文龙呢？何以非要杀之后快呢？

这甚至都不是严刑峻法！严刑峻法至少是有法可依，有刑可按，袁崇焕杀毛文龙完全是抛开了任何法律，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杀，其对毛文龙何以要如此仇恨呢？

大家可以看看，袁崇焕和他的粉丝，这道理说得真是太完美了，简直无懈可击，但问题就是在他们看来，这道理都是让别人、让皇帝来遵守服从的，让别人来对他们宽容、信任的，而他们自己却是完全可以超脱于这些道理之上的，完全不必付出任何信任宽容，要杀谁就杀谁，觉得谁可恶，就祭出“国人皆曰可杀”的法宝。

究竟说他们是卑鄙呢，还是说他们愚昧好？

在袁崇焕和他的后世的拥趸看来，整个世界都应该是围绕着他们转的，凡是和他同一派的，就是忠臣，就是正人君子，凡是和他们不同流的，那就是奸人，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对象。

所有冠冕堂皇的道理都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而不适合用于其他人。别人对他们宽容信任，是理所当然的，如若不然就是专制，残暴；而他们完全不必去宽容信任别人，把人随便杀了，都是“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阎崇年语）。

这种自我中心的双重标准在袁崇焕和崇祯皇帝的关系里也表现得很突出。

崇祯刚开始任命袁崇焕的时候，是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信任。几乎到了要什么就给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地步！

袁崇焕说五年可以平辽，那好，就相信五年可以平辽；袁崇焕说要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那好，就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说要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那就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此外要银子给银子，要粮饷给粮饷，要信任就给信任。公道地说一句，崇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给袁崇焕所要求的一切。

然而在袁崇焕方面呢？

他是连一个基本的信任都不肯给皇帝！他真要杀毛文龙，那也

可以。但既然皇帝这么信任你，你总应该把毛文龙为什么要杀，把非杀不可的理由开诚布公地告诉崇祯吧，如果说得合理，崇祯未必没有同意他的可能！

然而袁崇焕不，他似乎认为信任只是单方面的，只要皇帝信任他就可以了，他用不着去信任皇帝。他大概知道，如果他告诉崇祯，崇祯是不会让他去杀毛文龙的，于是一切都是瞒着崇祯进行的。等到把人都杀了，然后再来告诉皇帝，逼皇帝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

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齿冷！即便是平常普通的朋友之间，信任也从来不可能是单方面的，都必须是双向的，否则这种信任关系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的，纵然建立起来，也无法维持下去。

再看看袁崇焕言辞恳切地要崇祯对他如何如何信任的话，完全就是个笑话！愚弄人也不是这样的，你自己不信任崇祯，又让崇祯怎么来信任你？

而到了后世袁崇焕的拥趸那里，双重标准又一次展现了威力，黑白又被完全颠倒了。在他们嘴巴里，崇祯皇帝就应该无条件信任袁崇焕，否则就是昏君、暴君，就是心胸狭隘，而袁崇焕对皇帝则是可以欺骗，可以隐瞒，可以戏弄，可以先斩后奏，用既成事实来要挟。

就比如张三信任李四，把自己的钱，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李四，结果李四隐瞒着张三，用这个钱去买股票赔光了，隐瞒着张三把儿子卖给人口贩子了。张三报警，把李四抓起来受惩罚。结果到头来反说张三是心胸狭隘，多疑猜忌，这个世界的黑白就是可以这么颠倒的！

四、对袁崇焕贴切的评价

网络上曾经有人讥笑崇祯皇帝是“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忠奸不分，自毁长城，勤俭爱国，忧国忧民，见识浅薄，疑心过重，自以为是，愚蠢之至”。

这些形容词用来评价崇祯皇帝不太符合事实,但如果用来评价袁崇焕,却是可以一字不改的贴切无比。袁崇焕正是一个“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忠奸不分,自毁长城,勤俭爱国,忧国忧民,见识浅薄,疑心过重,自以为是,愚蠢之至”的人。

黄道周虽然昏庸、迂腐,但《崇祯长编》里记载的他奏疏里的一句话还是不错,就作为这一节内容的结尾吧:“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以五年不动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

第七章

抹黑毛文龙之集大成者

一、从苦力到历史学家的传奇

李光涛先生的《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影响可谓大矣，许多人对毛文龙的印象都是拜其所赐，因此绕过他是绝对不行的。这里不妨先对李光涛做一个简单介绍。关于李光涛先生的生平，可以看1995年的《江淮文史》里张爱斌所写的《历史学家李光涛轶事》一文。这里不妨简单概括叙述一下。

说来他也是一个奇人。1897年生于安徽安庆，五岁丧父，十岁丧母，和弟弟相依为命。卖了六年烧饼油条以糊口，其间靠自学认了一些字。后来管过账，解聘后，又去当码头苦力。因为得罪把头，被暴打一顿，不得不逃到九华山上，削发为僧。

因祸得福的是，主持和尚嗜好明清史，见李光涛记忆力出众，就让他专研之。两年多后，把他推荐到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很赏识他，让他整理当时从皇宫大内流出的明清内阁大库残留档案，扫去灰尘、铺平、分类、捆扎、上架等等，一开始还和其他人一起做，后来就由他一人负责管理。

陈寅恪、傅斯年、徐中舒等人把明清档案整理的结果陆续编成

《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己、庚、辛、壬、癸等编。李光涛从乙编开始，均参与撰写补例及编辑工作。因为有直接整理档案之便利，陆续撰成诸多明清史论文。

二、丑化毛文龙才是真

1. 后金记录是不了解情况

张爱斌说“李光涛利用明清档案，并参据朝鲜实录，以三方面的原始材料，互相比勘，所以研究成果极为丰硕”。

《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就是其成果之一了，但细观其文，主要倚赖的材料却并非是明清档案，反倒朝鲜方面的记载占据了大头，估计比例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李光涛对朝鲜方面的材料倚赖和盲信的程度，可以从他对一则史料的评论中窥见一斑。

在李光涛写的《〈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三辑〉述介》中有一则内容是介绍他在民国五十八年也就是1969年夏天，从清朝档案的烂纸堆里清理出一则天聪二年也即崇祯元年（1628年）一个汉奸官员祝世胤给皇太极上的奏本，奏本里提议用反间计，让宁远方面的袁崇焕猜疑毛文龙，除掉毛文龙，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其实从《满文老档》的记载，我们已经知道后金上上下下一直把毛文龙当作对其威胁最大的头号劲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则档案材料，更进一步能确证这一点。并且提供了毛文龙被朝鲜方面倾陷，被袁崇焕杀害原因的新线索。

后金作为明朝的敌人，是最直接的当事人，他们的档案材料，本身已经是说明毛文龙作用的铁证了！但是我们的李光涛先生却并不这么看，在他眼里，凡是肯定毛文龙作用的材料都是不对他胃口的。

他的评论是“毛文龙之酿乱海外，即在金国的汉人亦不知其底细，唯朝鲜知之甚审”，也即对不利于其观点的后金档案记录，否定其价值，就算了事。

这样的态度难以令人信服，和毛文龙正面对敌的就是后金，若后金不知道毛文龙对其威胁是大是小，那还有谁知道？

而且把毛文龙当作大敌要除掉的不仅是所谓金国的汉人，《满文老档》中记录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言论比比皆是。李光涛一概视而不见，反视朝鲜贬低、丑化毛文龙的记载为奇货，偏见作祟一至于此。

2. “唯朝鲜知之甚审”

那所谓的“唯朝鲜知之甚审”，其实如何呢？

应该说李光涛先生如果能穿越时空，事先和朝鲜人统一一下口径的话就好了。现在呢，不得不遗憾地说，朝鲜君臣不争气，不太给他面子。

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的时候，朝鲜国王哭丧着脸发表了一通议论，大意是我国在侦探金贼的情报方面无能也就罢了（我国不能探贼情），可气的是金贼的间谍深入到京城，都没有人缉查，实在是太令人痛心了。金贼都要把我们国家的人都当成是饭桶了！

天启二年九月，大概是因为毛文龙派人袭击后金地盘，努尔哈赤送书信谴责朝鲜，国王又吓得发抖，赶紧派了一个叫文希贤的使者回信，大喊冤枉：毛文龙率领手下军队，去袭击镇江、汤站等地，朝鲜沿边各镇都不知道，咱们腹地的君臣怎么能知道呢？你金国可不能错怪好人啊。

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旧的国王李珣已经被赶下台了，新的国王李倧刚上任不久。

一个叫申景镇的官员苦着脸说：“我国和大敌对峙也很长时间了，可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情形，实在是令人担心。”

国王李倧心有戚戚焉：“对垒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他们兵力的多少，也不知道他们驻扎的地方，就这样也能打仗吗？”

天启三年的闰十月辛亥，有一位朝鲜老兄，完成了一次足以让他成为所有偷渡者偶像的表演。

此人原本是当时已经投降后金的朝鲜将领姜弘立、金景瑞手下

的一个士兵。也不知道是真的思乡心切逃回来呢，还是被后金派过来，总而言之，他悄无声息地从后金那边溜达到朝鲜境内，而且一直跑到了京城。还到姜弘立家里去串门，这才被人发现。

朝鲜的一些京城大员自是极为恼怒，心中都在大骂边境官员是干什么吃的，就让人这么穿过边境，一直跑到京城，存心是要大变活人来吓唬俺们么？这人鬼鬼祟祟的，不是奸细才怪！

一个叫李廷龟的官员痛心疾首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心：“现在我国侦探敌情上是完全无能，和金贼对垒，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变故，还是这副德行，像话吗？”

要说朝鲜这帮大爷呢，可能真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呢，他们自己的事情，有时候还得毛文龙来通知他们。

在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的时候，毛文龙对朝鲜边官说：

“你们韩姓的人（指韩润）投降奴夷，把你们国家的情况都告诉给了金人头目，金人正在造很多攻城器具，看样子在今年冬天就会来侵掠了。”

朝鲜国王接到报告后，和官员一起讨论，其中的礼曹判书金尚容的意见是：“毛将善为侦探，而既云有东抢之计，不可诿为孟浪。”

要知道这帮朝鲜大爷一向是看不太起毛文龙的，但现在却说了实话：“毛将善为侦探。”和上面所引李廷龟说的“我国不能侦探”对照一下，也是颇为有趣的。

过了一年，也就是天启六年（1626年）十月的时候，毛文龙方面又一次提醒朝鲜要注意边防。毛文龙手下的徐孤臣告诉朝鲜边官，努尔哈赤死后，第四子皇太极（《李朝实录》里记为“黑还勃烈”）继位，“吩咐先抢东江，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

这次的情报应该说是极为准确的，皇太极在天启七年（1627年）初，正是先发兵征讨毛文龙和朝鲜，然后再去攻打宁远、锦州等地。

在十二月的时候，毛文龙又送秘密揭帖，提醒朝鲜国王，你们有一两个边境官员，暗地和后金勾结，要放金兵过来，你还不知道么？

朝鲜君臣对此的反应是，这个可恶的毛文龙，又在污蔑我朝鲜忠

良了,实在太坏了。

那毛文龙是不是在污蔑呢? 我们还是把不同史料的记载对照一下。

《满文老档》记载金兵在天启六年正月初八起行,十三日到明军哨兵驻扎警戒的地带,乘夜攻击,六个哨所无一得脱。在十四日晚上,偷袭义州城,用一百人就登上了城池。

对照毛文龙天启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的塘报:“不意丽人向恨辽民扰害,暗为奴贼奸细,引贼俱换丽帽丽服,将沿途拨夜尽行截杀。”

真相大白,金兵之所以能把毛文龙派驻边境侦查的哨兵(拨夜)一网打尽,导致“六哨无一脱者”,如果没有熟悉地形以及知道明军哨兵具体位置的朝鲜边官和后金勾结作为向导,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样也正因为边臣内应,导致义州城几如儿戏一样被后金一百人就攻取而下。后金为了彰显自己神武,不把朝鲜边官与其勾结的内情写明。但其记述经过,和毛文龙塘报一对照,大致情形,也八九不离十了。

在此之前,如果朝鲜君臣能稍微把毛文龙的警告当回事,提前预防,严阵以待,那后金想要如此轻松攻下义州,以及同时分兵进攻铁山,大概不会如此容易。

后金大军又在这之后,在朝鲜人的向导带领下,去攻打毛文龙驻守的云从岛,因为毛文龙战守有方,吃了不小的亏。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到,金兵攻打不下云从,十九日退回宜川,质问朝鲜人:“你说活拿毛都督不难,今我马多跑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为何死活哄我来,你定是奸细。”于是开刀屠杀。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朝鲜人之所以说“活拿毛都督不难”,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毛文龙就是一个成天靠蒙骗朝廷来升官发财的无能之辈,手下的士兵都是疲劣不堪,器械简陋,比他们朝鲜的军队都远不如。

所以他们是真心诚意地认为不难的,倒并非是有意蒙骗后金。

而和毛文龙打过仗的后金官兵,吃了苦头,当然就恼怒朝鲜人谎

报军情，认为是在故意欺骗他们，其实这反倒是冤枉朝鲜人了，实在是朝鲜大爷们的昏聩不明，再加自以为是，超出了后金的想象程度。

结果是毛文龙因为守御得力，损失不大，“奴虽犯抢一番，杀伤不满千人”，而勾结后金做向导来害毛文龙的朝鲜方面，反而损失惨重，“惟丽官丽人自己作孽，受祸亦不为小”。

朝鲜君臣的昏庸，在《李朝实录》记载的天启七年五月刘海（即刘兴祚）送来的一份密揭中暴露得更清楚了。毛文龙当初给朝鲜群臣发出的提醒，朝鲜人以为是故意和他们过不去，诬陷边臣，而实际上毛文龙的提醒，是来自当时身在后金心在汉的刘兴祚的情报。

《李朝实录》中的这段记载如下，刘海送来密信：“金兵没来之前，我为贵国着想，曾经发密贴，两次和毛帅联络，以通知贵国。又在正月发一密贴给宁远的袁崇焕都堂，让他送信给贵国，或防守，或连和，这片心事，也不知道究竟通知了你们没有？我之所以如此照顾贵国，实际上要尽忠于大明。”

从这份密揭来看，刘兴祚在后金发兵之前，曾经两次把情报设法传递给毛文龙，让毛文龙转达给朝鲜，并且还给宁远的袁崇焕也送过一份密贴，让其转达朝鲜。

毛文龙应该说不负所托，根据《李朝实录》，他在天启六年十月到十二月间曾经三次提醒朝鲜要注意后金进犯以及边臣和后金勾结的情况。

但朝鲜都把好心当作驴肝肺了，全不当一回事，反而因此对毛文龙衔恨不已。

而刘兴祚通过袁崇焕方面转达给朝鲜的情报，则似乎成了肉包子打狗，毫无踪迹，在《李朝实录》中找不到半点记载了。

从以上的这些事实来看，可知朝鲜方面对后金情况固然不能了解，即便对自己这方面的情况也稀里糊涂，本身是否做好防御都要依赖于毛文龙的情报，更不必说去了解毛文龙和后金作战之情况了。

到崇祯二年（1629年）毛文龙死后，金兵十月进攻入关，朝鲜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崇祯三年（1630年）的正月还摸不着头脑，不敢确定究竟

发生了什么,其昏聩一至于斯。

李光涛所谓的“唯朝鲜知之甚审”,实在近于笑话!

3. 朝鲜材料有时也捧地上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朝鲜方面的记载,李光涛也远不是那样尊重。其所引朝鲜的材料到处都充满了断章取义,歪曲解释,甚至直接粗暴否定。

挠敌之事毫无所闻?

比如李光涛宣称毛文龙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到天启二年十一月留朝鲜的这段时间内,与后金作战之事“毫无所闻,亦未见有挠敌之事”。唯一例外的宣川林畔之战,那也是金兵找毛文龙算账,而不是毛文龙主动出击去牵制后金。至于毛文龙屡次报告擒杀金兵,自然是假的,因为朝鲜国王说过“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可以充当反证。

应该说李光涛先生的说谎功力,确实已经修炼到了炉火纯青,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地步。

先不说《满文老档》里后金给朝鲜的文书里就明确提到:“毛文龙、陈良策、赵成功、李应龙、赵俊等,驻尔朝鲜之弥山,常犯河西。”

光是朝鲜《李朝实录》中提到的这段时间里毛文龙对后金打击的记载就是一大串,居然都被李先生无视了。被他拿来当成论据的“朝鲜国王所云(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根本就是在断章取义!

朝鲜国王这话应该是对当时在朝鲜的明朝官员、充当监军的梁之恒说的,本身就是假话。

就在说这话的同一个月内,《李朝实录》里就有许多记载能把谎言撕碎。

如四月己巳,朝鲜国王因为接到报告,获知剃头辽人(“假鞑”)从金占区逃亡出来的人很多,毛文龙也留在鸭绿江靠近金人的地方,不断袭击挑衅金人,所以让朝鲜官员赶快设法让毛文龙躲藏、退避到宣州、铁山一带,明方的侦察兵还有汉人也都设法让他们全部撤走

云云。

而紧接着第二天,又有这样的记录,朝鲜国王李珣对他派到毛文龙那边去的官员(接伴使)授意,毛文龙没有监军(指梁之恒)的命令,就招募剃头辽人,轻举妄动,挑衅惹怒金人,甚至派汉人到满浦等地部署军事行动,肯定有难以预料的事变,赶快以死周旋,一定要劝阻毛文龙和金人作战的行动。在鸭绿江边各处的明军侦察兵,还有汉人也都全部撤走云云。

下面还记录有毛文龙拿获朝鲜和后金勾结书信,让朝鲜国王惊恐万分的事情:先是说佟养性领金兵出来把截江口,让监军命令在鸭绿江的明方将领和汉人快撤走。还有接到报告明军有七只船只,必然是稽查我国派去后金联络的使者,又有书信被汉人夺走。近来伴随毛文龙的朝鲜官员,不善周旋,边境上情形更加危急。一定要想办法让明军不要再渡江去挑衅金人了,以前派去的明军也都快点撤回,拼死也要做到这点。

朝鲜国王之所以要对明方官员说假话“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用意无非是设法让明朝方面觉得毛文龙没有什么用了,赶快把他从朝鲜境内撤回了事。

光是同一个月内,《李朝实录》中就已经有大量直接揭穿这假话的记载了。而在其他时间里,此类记载也不少。就以天启二年八月为例。

辛未,备边司报告说:“文希贤还没有来得及到达目的地,毛将又斩杀了真鞑,贼人一定很愤怒,危机就要临近了。”

这里说的文希贤是朝鲜派往后金的使者,所谓“毛将又斩真鞑”当然就是指毛文龙袭击后金,斩杀后金军兵的事情了。

还是八月。丁巳,备边司报告说:“毛文龙不顾自己兵力弱小,面对实力强大的后金军队,坚持作战,屡次给后金打击,导致后金迁怒我国不是一次两次了。”

光是这些《李朝实录》上的记载,就白纸黑字,彰明昭著,结果都被李先生视而不见,反而言辞凿凿地说“此外,则毫无所闻,亦未见有

挠敌之事”。如此论史，真可以令人齿冷寒心。

如果李光涛当真没有看到这些记载，也还尚有可谅之处，问题是所有这些记载，他都看到了，甚至例如“毛将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都是被引用到文章里的。但似乎他是看到归看到，引用归引用，但完全不妨碍他抛开这些事实给毛文龙扣上不和后金作战的罪名。

诬陷朝鲜国王背明投金？

为了给毛文龙身上泼脏水，李光涛对朝鲜史料之歪曲，甚至粗暴否定，远不止于此。

比如他说毛文龙因为怨恨朝鲜国王李瑱，所以污蔑李瑱和后金勾结，背叛明朝，也就是毛文龙在污蔑光海君李瑱。而实际上呢，这个李瑱私通、勾结后金，是《李朝实录》中自己都承认的事实！

天启元年九月朝鲜国王李瑱派郑忠信通使后金，一开始想隐瞒不让毛文龙知道，后来看难以掩盖，又借口到后金去侦探。

《李朝实录》自己就有一段评论，大意是和邻居建立友好关系，那是指可以打交道的邻居而言。难道对待有父母大仇的人，还能用对一般邻居的态度去与之交往？国王李瑱既然派了郑忠信去出使金国，又不想让毛文龙知道，这何异于掩耳盗铃？

《李朝实录》天启二年四月又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国王软禁母后，杀害骨肉，秘密和金贼联络，甚至派遣了使者去。自己知道多行不义，害怕消息泄露给天朝知道。有华人到京城的，就必定严令兵士看住，如临大敌一样。

到了天启三年春三月甲辰，在以“王大妃下教书宣谕中外”名义颁布的文件中，朝鲜方面把光海君李瑱勾结后金谋害明朝的事实就说得更为详尽清楚了，这份文件的内容如下：

我国服事天朝有二百多年了，大义上说是君臣之间的关系，恩德上就如父子一样。万历壬辰（抗日援朝），天朝对我国的再造之恩，万世都不可忘记。先王任职四十年，用最大的诚意，事

奉天朝，平生从来没有背朝西边而坐。光海君忘恩背德，不畏惧天命，暗地怀有二心，和金贼勾结讲和，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役，密令出师助明的朝鲜将帅，看形势再决定帮哪一边，最后让整支军队都投降金虏，丑名流播四海。大明的人来到本国，羁縻看管，简直和关在监狱里一样。皇上的敕书屡次颁发，（李珣）还是毫无出兵的意图。使得我三韩礼仪之邦，不免和禽兽夷狄同流合污，令人痛心疾首，这样的罪恶又怎么说得完呢？

明明“前王李珣‘私通逆奴’”是朝鲜方面自己的结论，却说成是毛文龙的“污奏”。一边在宣扬朝鲜自己的记载如何可信，一边却对其记载本身任意歪曲割裂，不合于自己心意就直接无视、否认。李光涛先生因为厌恶毛文龙而混淆是非，到了如此地步。

在军饷问题上，朝鲜记录又成了“不甚求详也”

再比如说关于毛文龙的军饷，我们在前面部分，已经引用明方的记载以及毛文龙塘报对照，清楚知道“平均下来，毛文龙每年收到的军饷二十万两银子都不到，粮食也只有十五万石多一点，合起来甚至远远小于关宁军饷的十分之一”。

而李光涛为了给毛文龙泼脏水，又凭自己想当然，说：“又考东江粮饷，仅就饷银一项而言，前后平均计算，最少年亦四五十万两，九年共费当在数百万以上，岁饷之外，又有赏银无算。”

他这里强调所谓的“仅就饷银一项”，我们不知道他这笔账是如何算出来，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合理的推测是他把明朝方面官员奏疏里曾经提到的给毛文龙饷银最大的纸面数字都当成实发的军饷。而实际上毛文龙收到的饷银，最多的年份都达不到四十万两，至于所谓最少年亦四五十万两云云只能说是天方夜谭。

李先生又说：“按文龙自入崇祯朝，因廷臣群以冒饷为言，多有上本者，于是有汰兵覆饷之举，精兵数十万，定二万八千，岁饷百万，减为三十五万有奇，岁运米则十六万八千石。”

这更是把从来没有落实过的所谓百万岁饷当成实际的军饷来说

事,而所谓的三十五万有奇饷银,同样是没有落实的纸面数字。

朝鲜方面从明朝打听到的记录证实毛文龙的军饷每年平均不过十余万,李光涛自己引用的内容就提到朝鲜派去的使者姜善余等人亲眼看到明朝官员就东江军饷的议论:“文龙有军二万六千,一年之饷,殆十余万。”

这本身是说毛文龙冒饷,但数字至少还算真实,毛文龙每年领到的饷银平均来算确实不过十几万而已。

而李光涛对此又是如何评论的呢?这回他不谈“惟朝鲜知之甚审”了,而是说“又按,朝鲜实录言己中朝之事,往往只述大概,不甚求详,如记事内有军二万六千,及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考前文所记,则不无出入,此皆不甚求详也”。

也即只要朝鲜方面的记录不符合他丑诋毛文龙的夸张程度,马上就可以从“知之甚审”变成了“不甚求详”了。

4. 最高原则是丑化毛文龙

所以李先生并非对朝鲜记录情有独钟,他看重朝鲜的记载,也仅仅是因为朝鲜方面对毛文龙丑化、贬低的调子相对来说更符合他的胃口。如若稍有不合,仍旧粗暴歪曲之,割裂之,直至否定之。

对朝鲜记录尚且如此,对其他材料,自然更不会客气。比如前面提到的,他自己亲手发现的,从烂纸堆里捡出来的后金最原始的档案文件——祝世胤的奏本,里面提到后金希望通过使用反间计除掉毛文龙,此项事实因不符合他丑化毛文龙的调子就被毫无理由地否定了。

此外如上面提到的努尔哈赤向朝鲜索要毛文龙的书信,因为里面提到毛文龙部队“驻朝鲜之弥山,常犯河西”的事实,不合于李光涛心意,也被他粗暴否决了:“记事内所送之书,见[满洲老档],即太祖谕朝鲜擒献毛文龙书。似失本来真相,故不采。”

看来真相如何,只能是由李先生来钦定,否则再珍贵、再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如原始大内档案,如《满文老档》,都可以被他否定掉,都可以来一句“似失本来真相,故不采”。

而且李先生很滑头,你看他的用词“似失本来真相”,就是似乎失去“本来真相”。别人倘若指责他,要他拿出理由来,估计他就会回答,我说的是“似失”,又不是“一定失”,你管得着吗?

对史料无视、否定也就罢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直接对史料原文进行篡改、歪曲。

比如在谈及毛文龙派遣人员到后金统治区以掘参和贸易为掩护去充当间谍,后金因此不断捕杀所谓毛文龙奸细的时候,李光涛说:“遭金人屠杀者,有掘参之难民,有持货之难民,于是乎逃难之辽民,将因毛文龙之故,而无噍类矣。所以努尔哈赤尝致书于毛文龙曰‘由朕归尔之人,尔皆容留,并不养育,各处遭劫,尔之所杀者非理也’。努尔哈赤且为此‘杀者非理’之言,则毛文龙之仇杀难民,当比努尔哈赤为更惨。”

对前辈学者本来应当尊敬,但看到这段话,却实在难以置信。历史学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可以把史料篡改到这种地步。

努尔哈赤的话其实前面已经反复提到过,真正的原话是“尔收容后,不加豢养”后紧接着一句就是“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被杀者,乃尔所杀”。

努尔哈赤的意思,我之所以要杀那些人,是因为你收留难民,让他们从军,结果反而来和我作战,因此我在各处杀人,那些人是因为你的原因而被杀的。

到了李光涛那里,“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被杀者,乃尔所杀”这句努尔哈赤的话,完全被吞吃掉了,代之以“各处遭劫”,给人的印象就是从后金逃出来,逃到毛文龙那里的辽东难民,到处被毛文龙打劫杀害。这是连基本意思都不通了。

李光涛先生若是存在一定的标准,存在一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职业操守,那即使单方面倚赖朝鲜方面的材料,依旧可以得出一些相对客观的结论。

但遗憾的是在他那里,唯一原则就是看某个材料是否能用来达到丑化毛文龙的目的?

如果能,那无论多荒诞不经,都可以引用来作为论据;如果不能,随便什么材料,他都会做手脚,或者割裂文意、断章取义,或者直接粗暴否认。

三、触目惊心的自相矛盾

许多时候李光涛先生似乎陷入了为丑化而丑化的怪圈之中,基本的逻辑一致性可以抛在一边,明显的自相矛盾可以浑若无事。明明是截然对立的论断,他都可以一本正经地长篇大论展开阐述。似乎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如何对立、矛盾,只要是个屎盆子,扣在毛文龙头上,就能让他心里畅快了。这种心理,也是挺让人费解的。

这里不妨列举几个他文章中显著的矛盾。

1. 无关痛痒毛文龙

李光涛一方面是断然否认毛文龙对后金有任何打击、牵制作用,在他的笔下,毛文龙就是成天安坐岛中,奢靡享乐,空耗钱粮,对后金毫无影响,一个一文不值的废物而已。其文章用了整整一节的内容来论证毛文龙之无用,标题就是“牵制虚套”。

诸如“冒功冒饷,益肆欺罔”,“安坐岛中,独享富贵”,“岛兵既如此无用,于是牵奴之着,终归虚套”,“牵制之说,全付空谈,无数金钱,总归浪费”之类的语句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

他甚至引用朝鲜昏君贼臣的对话,说毛文龙之所以不投降后金是因为毛文龙的军队太没用了,就算是要投降给后金,后金都不怎么放在心上,都不会给毛文龙什么好待遇。

其论说之荒唐,从我们前面之论述中,已暴露无遗了。当然,如果他能保持逻辑的一致性,把这种荒唐观点贯彻到底,也算是一回事。但尤其可怪的是,一方面他坚持毛文龙对后金毫无牵制作用的观点,另一方面却又在长篇累牍地论述毛文龙如何嫁祸连累朝鲜,如何使得后金迁怒于朝鲜,把这也算作是毛文龙的一大罪恶。

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论证,后金之所以要去打朝鲜,全是因为毛文龙的缘故,朝鲜是受了毛文龙连累。

在其文章的“生衅朝鲜”一节中,引用大量材料,说“此朝鲜为毛文龙受兵也”,“文龙逗留朝鲜境内,朝鲜深以被祸为忧”,“(后金与朝鲜)然又一番结怨,则因毛文龙之故”,“日后朝鲜丁卯之祸,即因庇护毛文龙而起,不可不查也”。

在后面朝鲜“丁卯之祸”(即天启七年后金打朝鲜一事)一节中就更是不厌其烦引用后金方面的书信证明朝鲜是如何受毛文龙之连累。

一则曰“此次兴师,则以金汗深憾朝鲜容护毛文龙,于兹已七年,文龙之牵制,虽曰无关金人之成败,然其于朝鲜,则又‘以邻为壑’,是故往往遗祸于东国”。

二则曰“至于金人所送各城之书,其主要原因,大概不外以窝藏毛文龙为问罪理由”。

三则曰“书(指后金给朝鲜的国书)中之言,极为透彻,如曰:‘两国仇隙,皆因毛贼所致’,此可证明朝鲜丁卯之祸,实由文龙而起”。

四则曰“关于此类来书(指后金给朝鲜的系列书信),其时期无论前后,而所争执者,大抵皆为毛文龙”。

这样矛盾就来了,按李光涛所说后金统治者头脑纯粹是有点不太正常了,既然毛文龙无关成败,连后金的毫毛都伤不到,对明朝倒是害处多多,他们还要为消灭一个毛文龙兴师动众,这不是吃饱了自虐么?又何来朝鲜因为收留毛文龙而触怒后金之说?

如果他保持逻辑的一致,说毛文龙对后金没什么影响,后金打朝鲜纯粹是用毛文龙做借口,这就算不符合事实,但好歹勉强能自圆其说,可是他却偏偏不。他似乎唯一的意图就是给毛文龙搜罗更多的罪状。而完全不顾这些罪状彼此之间是否自相矛盾。

毛文龙对后金毫无打击,是一条罪状;说毛文龙连累朝鲜,又是一条罪状。既然是罪状,就死活不管,扣到毛文龙头上再说。论史能论到这种毫无逻辑的地步,也算是一种奇观了。

当然,要说李光涛先生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逻辑的矛盾,也是冤枉他了,他也含糊其辞做了一番解释,但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就越加显得离奇!这解释是什么呢?用白话转述一下就是:天启七年,朝鲜丁卯之祸,后金自称是为了毛文龙而来的。至于为毛文龙而来的原因,不是因为担心东江军队足以牵制后金,实在是因为金人了解毛文龙的确不是明朝的忠臣,有许多胡作非为的事情。毛文龙的胡作非为,看“交通金人”章节,就可以详细知道。毛文龙胡为的具体情形,他给金国的书信,既说“则大事成矣”,又说“我不分疆土,亦不属而管辖”,似乎也是学金人自立为王。胡为到如此地步,自然对明朝不利,但究竟来说,对于在当时的金国,也是同样不利的!于是金人才在天启七年起兵,东向朝鲜索要毛文龙。

这段话的意思曲里拐弯,很不好理解。前面的意思似乎是在说后金乃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因为了解到毛文龙不是明朝的忠臣,胡作非为,所以要来替天行道,除掉毛文龙。

而后面似乎又是在说毛文龙是明朝和金国共同的祸患,金国害怕毛文龙未来可能自立为王对其造成威胁,所以要出兵扫除。

李先生曲说怪论,离奇荒诞的程度实在是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力之外。按他本来的说法,毛文龙为天下第一无能之人,每天都安坐岛上贪财好色,在明朝提供大量军饷(李光涛的说法)和朝鲜供给物资的情况下,还不能对后金造成分毫损伤。

而按他这里的说法,毛文龙又成了天下第一牛人,光是在将来自立为王,同时与明朝和后金为敌的这种可能性,就让后金恐惧战栗,以至未雨绸缪,为防止未来可能的损害,先要出兵扫除现在对明朝有损无益,对后金有益无害的毛文龙。

一个人因为对几百年前历史上的古人的仇恨,能让自己的思维离奇到如此程度,也确实是让人叹为观止。

而实际上,他所谓毛文龙自立为王,正是后金求之不得的,在努尔哈赤给毛文龙写的书信里,甚至就是劝毛文龙自立去打朝鲜,以此相诱。我们只能说李先生自相矛盾,百般弥缝支吾,难以支撑!

2. 米多价廉饿死人

毛文龙在奏疏中希望为东江争取和广宁明军同等待遇的军饷时，曾经说东江群岛都在海上，风涛险恶，运送物资艰难，各种物品价格都昂贵，定每名士兵军饷“银七钱，米一斛”的标准是太低了。

李光涛为了反驳毛文龙，又不惜引用极为荒诞不经的史料，说崇祯元年的时候，皮岛上“米八石，值银一两。登州则米八斗需银三钱。以此观之，则岛中之富足可知矣。关于百物腾贵之言，又不可信”。

也就是岛上十分富足，米价仅仅是登州的三分之一，所以毛文龙所谓岛上物价腾贵的说法又是撒谎了。

李光涛这种说法是转引自日本人稻叶君山写的《清朝全史》，其文如下：“崇祯元年时，朝鲜使者访毛文龙，其记事有曰：‘岛中居民近万余户，市肆之间，物货充实，仓廩储积亦丰足。秋冬之间，米八石值银一两。臣所馆之守卒，月给米一斗，又有银两，逢佳节，外给青布二匹，棉花二斤，及帽靴。都督毛文龙，一日进食五六回，其三回食五六十品；有宠妾八九人，皆饰珠翠；侍女甚多，皆游手饱暖，崇奢如此’。”

这段内容，按分类来说，就是典型的无根史料！

观其内容，荒唐无稽至于极点，把一个皮岛简直说得和人间天堂一样，可以和江南苏、杭比肩了。这估计是某个朝鲜妄人未去皮岛，凭借自己想象胡编乱造的东西。甚至有可能是直接被金人收买后，用作反间计写出来的东西，设法进一步煽动朝鲜人对毛文龙的仇恨。

这和所有其他史料，包括《李朝实录》，包括袁崇焕到东江杀毛文龙的奏疏都截然相反。

这样的材料，居然被李光涛视为奇货，深信不疑地作为论据！

当然，如果他真的相信这类岛上富足无比的荒唐之言，能坚持到底，也算一回事。可是不然，李光涛一面把这种荒唐记载引为论据，来证明毛文龙在岛上如何安享富贵，明朝给毛文龙发军饷完全多余。

可与此同时，他又把完全相反的记载也引来作为论据。

如“草根树皮，淘洗净尽，荒山赤土，旌羸流离，种称颠连，偏臆无诉，以致降夷生变，强卒喧哗，奴孽浸凌，各岛告变”。

如“椴岛兵民，骈就饿死，其状之惨，可于下面记载见之……‘今年登州粮饷运到数少，许多人命将骈就饿死，至于相食，恳乞发粮，以赈垂死’”。

如“毛兵饥死，僵尸相枕”。

如“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等等。

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记载，都被他引来作为论据，以达到相同的目的：丑化毛文龙！

前者所谓岛上富足的荒唐记载是为了说明毛文龙如何贪得无厌，你看岛上这么物货充实，安居乐业的景象，居然还要求增发军饷？

后者关于岛上饥饿号哭，僵尸相枕的惨状则是为了说明毛文龙腐败无能，私吞军饷，残害辽民。

李光涛还是这样，只要能往毛文龙头上扣屎盆子，无论引用的记载多矛盾，多相反都可以被他拿来利用。

他对如此明显的矛盾，又给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解释。在引用了那段所谓朝鲜使者记载皮岛如何富足的文字后，李光涛说：“守馆之卒，厚给如此，据前文陈继盛之言，或即为冒姓毛人之类，其他军士，则僵尸相枕。”

他干脆说岛上所有人都是冒姓毛人好了！那段记录，明显说的不是个别士兵如何待遇优厚，而是整个岛上都货物充足，甚至粮食价格只有登州等地的三分之一。

而且所谓守馆之卒，守的是什麼重要人物？连朝鲜的正经使者都算不上，《李朝实录》中毫无相关记录的角色，居然要派一个待遇优厚的所谓亲信毛人去守馆？

这守馆之卒如果有的话，那也只能是岛上地位最低下的军士了。要成为僵尸，也只能是这类非战斗力量的类似门房一样的守馆之卒先成为僵尸。否则在其他军士都要饿死，“僵尸相枕”的情况下，一个看门的，还能享受如此待遇，他怕是早就被生吞活剥了。李先生之逻辑就是荒唐到如此地步！

3. 不战是罪，战也是罪

如果毛文龙不和后金作战，成天安坐岛上，悠闲度日，那当然就是其罪恶无能的表现了。这也是李光涛竭力试图在文章中灌输给读者的印象。

但是到了某些地方，他实在没有办法掩盖毛文龙抗金的事实，不得不引用一些毛文龙派兵与后金作战，派间谍去刺探、扰乱后金统治区的材料的时候，他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放心，他依旧会把这证明成是毛文龙的罪恶！

在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的时候，毛文龙得到情报在朝鲜咸镜一带边境地区有后金力量在活动，于是派游击王辅、时可达领五千兵马前去剿杀。当时朝鲜害怕得要死，认为去剿杀一两个部落，又不能真的消灭后金，只能开衅惹怒金人而已。唯恐这次打击导致后金迁怒于自己，想要阻止，但又知道毛文龙的决心不能动摇。君臣聚集在一起商量，对毛文龙恨得咬牙切齿。最后商量来商量去，就干脆授意边境官员在毛文龙军队要求向导的时候，用假言谎骗，虚言恫吓，总之是要阻止。

事实上在他们之前的对话里，判尹金盖国就说与其得罪后金，导致后金报复而让咸镜地区不保，还不如冒着不好的名声去阻止毛文龙。

而李光涛呢，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舍去，断章取义地截取了朝鲜君臣的几个对话片段，尤其是那段预先准备如何欺骗毛文龙军队以设法阻止进兵的对话。然后他评论说毛文龙去打后金等于是把辽民驱入虎口，毛文龙不过是利用他们来给自己立功而已：“又况五千之兵，辽民居多，兵非素炼，驱之以入虎口，必无幸免。文龙则利用之，以为自己立功之计，胜则虚张捷报，败则掩之不闻。”

如果不作战，那是安坐岛上，是毛文龙无能有罪的表现；如果作战了，那就是毛文龙把辽兵驱入虎口，以为自己立功之计。

总之左右都不是人！李光涛先生的逻辑，大概干脆都投降了，才是最保全辽民的好办法。还有一件事情就更说明问题了，在“交通金

国”一章中，李光涛引用了这样一则材料，是天聪二年十一月厢边红旗备御祝世胤的奏本。

其大意是毛文龙派来的奸细很多，这些奸细有些是用卖货物的方式做身份掩护，祝世胤自陈捕杀奸细如何卖力，担心毛文龙因此用反间计来除掉他，所以上书表示自己的忠心：“但臣执法审查奸细，唯恐走脱奸细，与毛文龙说知，恨臣，来投反间，臣担当不起，统望皇上贝勒鉴，查臣为主寸心，与臣做主，臣益得竭力图报矣。”

本来这则材料又是充分证明了毛文龙和后金斗智斗勇，对后金统治影响之巨大。但是李光涛又是如何评论的呢？

大家应该记得前面我引用过的那段李光涛篡改努尔哈赤言论的话。没错！那段话就是针对祝世胤捕杀毛文龙奸细的奏疏而发的，这里不妨再展示一下：“以上两奏本内奸细，即袁崇焕所云避难之辽民，如曰‘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米一升，令往夷地掘参，遭夷屠杀无算。’据此，则遭金人屠杀者，有掘参之难民，有持货之难民，于是乎逃难之辽民，将因毛文龙之故，而无噍类矣。”

也就是毛文龙派人到后金去侦探敌情，在李光涛眼里，又是毛文龙的罪恶。说是逃难之辽民，因为毛文龙的缘故，都要被杀光了。

那要保全辽民怎么办，不能当兵，不能打仗，也不能派人去侦探，只有投降一条路了！否则就是“驱之以入虎口，必无幸免”，“逃难之辽民，将因毛文龙之故，而无噍类矣”。

就这样不与后金作战是罪，与后金作战同样是罪，而且滑稽的是这两个完全矛盾的罪行，被李光涛同时扣在了毛文龙头上。

4. 私通与捕杀金人的恶行

李光涛为了给毛文龙扣上私通后金的罪名，也可谓不遗余力，极尽捕风捉影之能事。努尔哈赤、李永芳等人试图招降毛文龙的书信被他看成是毛文龙不忠的证据。

李朝实录中记载的朝鲜君臣听信倪汝听谗言，胡乱猜疑的内容也被他拿来当成是毛文龙背明的事实。

后来皇太极和毛文龙的书信往来自然更是被他大做文章。

本来一看便知是后金方面行的反间计,当时的明朝官员不上当,皇帝不上当,偏偏李光涛先生如获至宝,当成是污蔑毛文龙的理由。

事实是毛文龙始终忠于明朝,这一点是任凭李光涛唾沫横飞,肆意歪曲都无法改变的真相。所谓私通这顶帽子,对于把后金使者来往经过始终上报朝廷的毛文龙,纯属血口喷人,倒是扣在袁崇焕头上更恰当。

但这无法难倒李光涛,他依靠自己的凭空杜撰,胡乱揣测,一逞毒舌,硬要用莫须有的东西来栽赃。

一则说毛文龙投降后金之所以没有付诸行动,是因为后金不能满足其贪得无厌的要求。(看来,明朝倒是能满足了?!)

二则说因为有朝鲜的存在,迫使毛文龙不敢叛乱。(实则朝鲜君臣昏聩无能,连毛文龙打击后金,他们都要吓得发抖。就凭他们能让毛文龙不敢,真是笑话。更何况天启七年后朝鲜自己就和后金勾结了。)

三则说金人是担心毛文龙反复无常,不容易驾驭,而且辽东这一个角落,都还不太平,所以不相信毛文龙的话。(实则对后金来说,只要毛文龙有一线投降的可能,他们都会争取,看看后来他们怎么拼命招降孔有德、祖大寿等人的就知道了。毛文龙是根本不存在任何投降可能,他们才没办法。)

总之,李先生的意思就是毛文龙是要勾结投降后金,但是后金还看不太上毛文龙,不肯满足毛文龙的要求,所以他最后没有投降。

论史能够抛开史料,完全凭借自己的臆测,给历史人物任意泼脏水,这样的手段,李先生真可以说是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真不知道他前世今生究竟积累了多少对于毛文龙的仇恨,才能如此?

而尤其出奇的是,他一面竭力往毛文龙头上扣勾结后金的屎盆子,另一方面他对毛文龙把后金使者往来报告朝廷以及捕杀后金使者等光明磊落的行为,同样要百般丑诋,大加辱骂。

比如他有一段话,大意是后金派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人到毛文龙的皮岛上求和,毛文龙之所以要报告给朝廷,是因为想把和谈的事

情弄假成真。“试探明帝之意，如试探成功，则彼之所谓‘大富巨贵’，亦在其中。”

按他的意思，毛文龙如果不报告朝廷，那就是私通后金，如果报告了朝廷，那就成了“试探明帝之意”，覬觎“大富巨贵”。

无论事实如何，在他笔下，毛文龙脸上都注定只能被涂抹上罪犯、小丑的油彩。

而实际上他所谓的毛文龙“颇欲弄假成真”，又是置史料不顾的臆说，毛文龙早在天启七年的时候，给皇帝的奏疏里就明确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在崇祯初年向朝廷报告后金使者来往的情况时，更是不断提醒“更虑奴之求款于东，而正欲肆骋于西”。对他来说从来就不存在试探的问题，倒是袁崇焕的表现更符合李光涛的说法。

而对于毛文龙把后金使者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人抓的抓，杀的杀，李光涛之评论就更加离奇了：“此因毛文龙上欺朝廷，试探未能成功，故又以无辜金人，送之于死地，其与人不信又如此。”

毛文龙若善待金之使者，在李光涛嘴中自然是通敌，现在毛文龙捕杀使者，李光涛又大骂毛文龙把无辜金人，送入死地，为人不信？

他把后金之爪牙称无辜，那谁是有辜？兵不厌诈，本是常识，和后金讲信用的袁崇焕不过是被后金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已，毛文龙睿智之举居然也能成为李光涛笔下的罪状。

而李光涛对毛文龙捕杀后金派往朝鲜的使者，更是当作毛文龙的罪行大加声讨。天启七年后，朝鲜勾结后金已成事实。毛文龙为破坏其往来关系，不断设伏捕杀后金使者，这本来正是其矢志不渝，忠于大明的表现。

而李光涛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他为屈媚后金的朝鲜百般辩护，对毛文龙截杀后金使者的行为却说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即如通问往来之胡差，彼亦遣人伏路要杀”。

他所谓的坏事有余，无非就是坏了朝鲜与后金勾搭的好事而已！

请看以下朝鲜的记载。

如崇祯元年八月的记录：汉人一百多骑兵，拿着弓箭，暗地朝龙川义州方向去。又在林畔站的西边五里多，有十三个汉人，带着三眼铳，在路边埋伏窥望，肯定是要拦阻金人使者。

八月二十四日又有记录说：金人使者回去，将要抵达林畔的时候，百多个汉人，潜伏在草间，突然出现在路上，都佩戴弓箭，好像有对阵战斗的架势，绑住我国给金人使者做先导的军官数人，在后面的一行员役，都吓得仓皇惊散，这实在是出乎意料……鞑子二十多人，来到鸭绿江岸边，访问我方为什么不送还使者，义州官员不得不以实相告，日后的祸患，难以估量。

崇祯元年九月的记载则说朴兰英、郑文翼等朝鲜往后金的使者一行，在八月二十七日，到沈阳，询问金人国内的事情，打听到有毛文龙属下的人诈降，离间朝鲜和后金关系说“朝鲜与毛同心，图伐金国，金国知之乎”？

以上材料恰恰足以证明毛文龙为破坏后金与朝鲜关系，不遗余力，对明朝之忠贞始终不改，所谓私通后金之说，不攻自破。

而李光涛颠倒黑白，于袁崇焕和朝鲜则百般曲谅，认为与后金之勾结，理所应当，称袁崇焕与后金谈和，及朝鲜在天启七年和后金签订城下之盟，是所谓的“吾人细想当日历史，兵战之用，恐无以非之”。

对毛文龙，则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污之为私通后金！

而尤其可怪者，李先生一边污蔑毛文龙私通后金，另一边却责怪毛文龙与后金作对，从而贻祸朝鲜，说“故与朝鲜为难”，为“丧心之事”，“谋陷朝鲜”，“行间于金人之阴谋”，能左右互搏到如此境地，把老顽童周伯通请来，恐怕都要自叹不如，甘拜下风！

5. 否定数字转眼成论据

以上所举四个矛盾，不过是其荦荦大者，实则李光涛先生文章内的矛盾触目皆是，几乎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

比如前面他断定丰城侯李承祚说的“铁山民，共集七八十万”是

假的,是在与毛文龙狼狈为奸,咬牙切齿咒骂“此虚张铁山辽民七八十万,不外恐吓朝廷停止移镇之意”,认定提出这种说法的人都是无耻的逐利之徒,视朝鲜为奇货,打着毛文龙的借口,满足自己不可告人的私欲。

而一转眼,为了贬损毛文龙,他居然又把自己刚刚否定过的材料,当成是真的:“铁山的辽民,据李承祚所云‘共集七八十万’,这七八十万的人,原本是为了求生而来,现在都因为毛文龙这一逃,全部遭到屠戮。就是辽沈的陷落,广宁的丢失,合并计算,也没有如此惨重的损失。”

也就是同一件材料,他判断真假,全视丑诋毛文龙的需要而定。为了贬损毛文龙,需要它是假的时候就是假的;需要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

实则,东江前后接济辽民近百万,本无疑义。但这些辽民大部分都以群岛为中转,逐渐转移到明朝内地。朝鲜铁山等处,虽有军民驻守,但在天启五年之后,毛文龙已经把军民逐渐转移到云从岛一带。前面说过天启五年十二月的时候,武之望就已经奏报毛文龙把兵民商贾都迁移到云从岛上去了,“铁山之地空矣”。

天启七年后金进攻之时,不仅毛文龙主力并不在铁山,就是辽民为数也不多,损失并不大。

李承祚七八十万之说固然夸张,但此夸张也无损于毛文龙接济辽民之大功。而李光涛前后矛盾,先以为假而咒骂之;后又以为真而说“辽沈之陷,广宁之失,合而计之,亦无如此之惨也”,其议论荒诞离奇一至于此。

再如天启元年十二月,朝鲜做向导,后金军队突袭宣川林畔,毛文龙在猝不及防下,损失惨重。李光涛为丑化毛文龙,把《李朝实录》中两则互相矛盾的记载都当作事实引用。

引用的第一则记载说:后金用一万多的骑兵,渡过鸭绿江,到宣川林畔去抓毛文龙,毛文龙仅以身脱。

第二则记载引用所谓备边司的报告说,后金仅用了数百骑兵到

宣川冲杀，毛文龙军队被吓得毫无抵抗，束手被杀。

仅从文字上，这两者记载的矛盾就一目了然，第一则说“一万多的骑兵”，第二则变成了仅“数百骑兵”。

再去查对《李朝实录》的原文，就发现李光涛不仅对互相矛盾的记载不加辨析，甚至连原文都是被他篡改过了。

从次序上，他放在后面的第二则记载，恰恰《李朝实录》中是放在前面的。第一则记载是作为李朝实录编写者对整个事情经过的回顾来叙述的，放在第二则记载的后面。

这本身就表示，实录的编写者是在指出这个备边司报告并不真实，所以在引用其报告后，就紧接着指出事实真相是什么。被李光涛次序一颠倒，这种意味就荡然无存了。

从文字上说，第一则记载的原文是：“贼词知之，休我索文龙，且以万余骑，冰渡鸭绿江。”也就是后金知道毛文龙在朝鲜后，吓唬、威胁朝鲜交出毛文龙，并派了一万多骑兵，渡过鸭绿江。此句被李光涛改成了“贼怵我，索文龙”，变成了后金害怕朝鲜，意思都不通。

实际按照《李朝实录》，朝鲜方面承认，当时就是朝鲜的官员和后金勾结，导致万余骑兵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袭宣川和林畔的毛文龙部队。而报告中撒谎说“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的备边司本身就是与后金勾结的国王李瑄和边吏郑遵的党羽。

在《李朝实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毛文龙给朝鲜国王李瑄的书信里说“边吏和金人勾结，肯定不是你的意思吧”。

此处毛文龙并未指明是郑遵，结果李瑄自动联系到郑遵，在他给备边司的传喻中说：“此必毛将构陷郑遵。”显是做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不打自招。

而到李瑄被废之后，朝鲜方面就直接承认确实是郑遵等人给后金做向导突袭毛文龙了：“郑遵、郑造兄弟两都是光海君的宠臣，有给金贼做向导突袭林畔，还图谋废掉母后的罪行。”

李光涛不顾记载本身的矛盾，把朝鲜方面承认是虚假的报告当成事实引用，其用意仍旧不过是为竭力丑化毛文龙而已。

此外如一面说毛文龙无足轻重,所以后金对招降毛文龙也不放在心上,另一面却说甲申明朝灭亡,这都是毛文龙原先部下众人协力的功劳,毛文龙死后流毒还如此之大。

此类矛盾数不胜数,我亦无此心力不厌其烦,再一一详尽指出了。

其最为荒唐可笑的是把金人对毛文龙的仇恨、敌视态度,也拿来做贬低毛文龙之根据。他说清朝天聪元年(1627年)的实录,对袁崇焕都是说袁都堂、袁老大人,对赵率教也叫赵总兵,而对毛文龙就称呼为“毛贼”,或直接叫名字“毛文龙”。

总之是毛文龙太差劲了,连金人都看不起他云云。

又说袁崇焕要讲和的时候,皇太极态度积极,配合还来不及,而到毛文龙要私通勾结他们的时候,就又不相信毛的话,甚至斩杀使者,拒不收纳。所以也是毛文龙一文不值的证据云云。

李光涛说的这些东西,恰恰可以看出金人对袁崇焕等人感情还不错,而对毛文龙则是痛恨入骨。

这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袁崇焕被后金玩弄于股掌之间,后金自然颇有好感。而到了毛文龙这里就反过来,被毛文龙玩弄于股掌之间,自然就更为痛恨。

李光涛说的这些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实按照李先生的这种逻辑,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的文件里,对共产党的称呼一律是共匪(李光涛甚至在自己的文章里都称呼共产党为共匪),对毛泽东的称呼也是毛贼居多。如此看来,也必定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国民党毫无威胁,一文不值,所以国民党看不起,才一口一个共匪、毛贼。

李光涛先生的搞笑本领确实不一般!

四、李光涛先生的仇毛情结

大陆明史学者王春瑜在李光涛参与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残留档案

而成的《明清史料》(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影印本序言中说:“研究历史必须从搜集第一手原始史料入手,这是治史者的常识。”在《中国稀见史料》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中,又说:“秉持‘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从第一手史料入手,排比考证,钩沉抉微,探索前人未探索过或探索有误的领域及问题,苦下功夫,积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功夫,终于出现奇观,诞生重要学术成果……(下面是列举了如陈垣、谭其骧等老一辈史学家的例子)”

王春瑜先生的这些意见自然是金玉良言、真知灼见,是值得每一个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人所记取的。但我以为,还有一些常识的重要性是丝毫不亚于掌握第一手史料的。

那就是要加强史德教育:必须尊重史料原文,不断章取义,不任意篡改;在对史料的解读上,不能随心所欲,自相矛盾,不能先抱着一副恶狠狠批判封建腐朽统治者或者东方专制者丑恶面目的嘴脸去搜罗材料,去想方设法给古人扣帽子、打棍子;对史料的取舍,必须根据逻辑一致的原则,加以分析考辨,认可或否定必须说出足够的理由,而不能因为自己的立场,任意采纳或否定!

李光涛先生掌握的材料可谓多矣,甚至他人所赖以得见之第一手史料,也是其亲手整理而出,终身从事于此,论条件之优越,非他人能比。

而其所撰有关毛文龙之文章,材料堆砌固是极多,但是对各种材料,彼此之间关系,基本没有理解消化。截然相反的材料,可混为一谈,置自相矛盾于不顾,甚至到了极荒唐之程度。其间还充斥着对异见者(包括明代为毛文龙说话者)的谩骂。

李光涛曾于《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序言中说“研究历史,当以求真为目的”,然观其所撰论毛文龙之文,何尝有半分求真之意?不过一逞私臆,丑诋毛文龙为事而已。

因罗振玉表彰毛文龙之抗金功绩不可泯,李光涛引用傅斯年的话骂曰“老贼固见大库史料者,可知老贼心中本无伦类”。

罗振玉乃溥仪伪满洲国之汉奸,其人固不足论。然臧否人物,当就事论事,不以人废言。其对毛文龙之评论,摒弃陈见腐说,唯以事实为据,颇多可采,又焉能以其汉奸之身份而一并排斥之?由此观之,则李光涛、傅斯年骂人之语,反成自骂。

李光涛又曾针对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河南巡按宁承勋揭贴这一条史料发表评论说:“揭内骂贼而死的忠臣(当指明方忠臣)凡二十一员,此一文件可以纠正共匪书刊中谬误之用。比如一九五四年共匪印行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一书,写了许多歪曲的意见。”

此条评论内,以历史学术之文章而夹杂谩骂性质的“共匪”政治词汇,足见李光涛之情绪化,令人瞠目。但其提出的依据史料本身而纠正谬误的意见,也是可以让人称道的。

但何以李光涛先生不知自省其在毛文龙问题上践踏史料,任意歪曲真相,颠倒黑白之行径呢?李光涛对毛文龙的这一腔怨毒究竟从何而来?委实令人费解!

难道是因为对袁崇焕热爱到痴迷境地,所以非要把袁的对立面毛文龙,彻底搞臭,才算满意?又或者是因为李先生是民国的忠实臣民,当时的国民党恨毛入骨。李先生就把对和他同时代的毛的仇恨转移到历史上的毛头上去了?

第八章

朝鲜人对毛文龙的厌恶

上一章中说李光涛对朝鲜的材料进行歪曲乃至篡改,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朝鲜方面的记载本身确实充斥着对毛文龙的丑化和诋毁,这才投合了他的胃口,让他愿意大量引用。

那这些丑化性质的记载究竟是怎么回事,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一个分析。

一、尊明还反感抵抗后金？

按理说,朝鲜是站在明朝这一边的,不单是表面上,而且从内心感情来说,他们也倾向于明朝。只要看一下《李朝实录》,凡是提及明朝中国,必曰天朝,必曰父母之邦,虔诚忠顺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凡是提及后金的,必曰“贼”,曰“虏”,曰“奴”,曰“夷狄”,厌恶鄙视之意不加掩盖。

但感情是一回事,实际的眼前利益又是一回事!

打一个比方,如果街上有一伙地痞欺负人,许多旁观者从感情上当然会厌恶这些地痞、流氓,同情受害者,但如果要他们自己挺身而

出，站出来阻止，他们就多半要害怕惹祸上身了，宁愿旁观也绝不出头。

朝鲜也是这样，从感情上他们对明朝是一边倒的，但从实际利益决策上，他们采取的政策就是首鼠两端，骑墙观望，最好就是哪边都不得罪，不要惹祸上门。而毛文龙的存在，在朝鲜人看来，恰恰就是连累了他们，贻祸于他们。所以他们自然就要对毛文龙痛恨不已了。这一点，《李朝实录》中的记载比比皆是。

1. 国王李瑄的坐卧不安

毛文龙袭取镇江，为保存力量进入朝鲜之初，朝鲜官员看见毛文龙身边的正牌明兵不过几百人，其他都是逃亡出来的剃头汉人，就胆战心惊，唯恐被连累。

国王李瑄更是说“毛将之来住也，启我国不测之祸”。

到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份，君臣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李瑄传谕称：毛都司实在太轻率了，带领的军兵这么孤单，处事这么草率，等冬天结冰后，金兵打来，我国肯定会遭殃。

朝鲜官员回答称：确实如大王所说，我国要受连累，而且听说后金出一千两银子收购毛都司的头颅，而他身边成百上千都是已经归顺后金剃过头现在又投奔来的反复无常的辽人。如果被害，天朝说不定就要归罪朝鲜。而毛都司不死，又会导致金人迁怒朝鲜。还是赶快劝他离开朝鲜回广宁吧，在朝鲜可以免被连累受祸，对毛都司自己来说也可以更安全。

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吓唬毛文龙离开，说毛大人啊，你身边大部分人都剃了头，随时都可以加害于你，而且后金的铁骑又厉害，要过境搜索抓捕你，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

总之，为了安全考虑，还是尽快回到广宁去吧。

朝鲜人甚至还举出了一个叫邓复禹的人和后金勾结要加害毛文龙的证据，竭力劝说，要毛文龙还是到更为安全的地方去。

但让朝鲜人不解的是，毛文龙不但没有被威胁吓倒，反而表示：“你们说剃头的辽人不可靠，难道我会不知道吗？就是辽阳这些城池

的失陷，都是辽人将官叛变投敌的结果。但我既然以身许国，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要想消灭后金，就必须依靠这些已经剃头的辽人。如果成功了，那是天下苍生的幸运，如果不能成功，那就是天下的不幸。如果我只考虑自己的安全，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那还留滞在这里，还和这些剃头的辽人共事干什么？他们当中也成天有人倡言要把我绑送给后金，我只是装作不知道不说出来而已。”

朝鲜君臣对于毛文龙的坚决态度，无计可施，既不想公开得罪明朝，但又怕后金迁怒于自己。于是到了天启元年十二月，后金派人向朝鲜索要毛文龙的时候，干脆说我自己不敢捉拿明朝的将领，但可以暗暗派人领你们的军队去捉。

结果是后金万余铁骑突袭宣川林畔毫无防备的毛文龙军民，导致“汉人男女被杀五百七十八人”。

而此役，按李光涛说，《李朝实录》只记载汉人男女被杀，而丝毫不提及朝鲜方面之受害者，“则是金人平日所云，‘兵之去来，不敢害一草一木’又最可信”。

实则以金兵之嗜杀，对朝鲜人如此留情，只能是为了回报边官带领向导之功。朝鲜人为避祸计，对后金逐杀汉人采取勾结、放纵态度。

当时国王李珣示意臣下如果后金直接攻打朝鲜城池，那是要抵抗的；但如果是只针对汉人，那朝鲜人只需要严兵坚守，旁观就可以了。

到了天启二年（1622年），朝鲜君臣对毛文龙在其境内抗金的怨恨就更大了。李珣甚至将毛文龙称为“祸本”，对毛文龙袭击后金的担心、指责不绝于书。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外，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天启二年五月的记录，朝鲜国王传谕说，看近来大小汉人官员、汉人将领所做的事情，全没有长远考虑，就是一味贪功轻动，惹怒挑衅金人，以为能事。对此，我日夜忧虑。

本来是东江明军冒死与后金作战，牵掣其力量，袭扰其后方，置

生死于度外，而在朝鲜国王看来却成了“贪功轻动”，让其忧心忡忡。

2. 仁祖时期的口蜜腹剑

如果说李珣背明投金，朝鲜自己之史书都挞伐抨击，称其为“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

那到了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李珣被赶下台去，仁祖大王李倧上台后，情形又如何呢？

还是换汤不换药，表面上慷慨表态与明军协力合作，实则畏金如虎，每每以毛文龙率明军袭击后金连累自己为忧，甚至有些方面比李珣在位时更糟糕。李珣主政的时候，虽然畏惧金兵，密谋勾结，但他还至少明白告诉毛文龙和明方使者，我有许多顾虑，不能合作。这样明朝方面至少还心里有点数。

而到了李倧时期，当面对谈，书信交流，必定是甜言蜜语，信誓旦旦。虔诚忠顺之意，让人感动无比。甚至朝鲜君臣自己内部发言也总是一副慷慨激昂，信誓旦旦要不忘明朝恩德的姿态。

而一到需要实际行动时，君臣私下商量，则狭隘鄙陋，小肚鸡肠，足以令人寒心齿冷。其前后反差之巨大，让人有口蜜腹剑之感。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时期的朝鲜君臣，漂亮话始终挂满嘴边，但要动真格了，则抱怨、诋毁不已，和前王李珣并无区别。

就如李倧在刚上台（天启三年三月）会见毛文龙使者时表示要和明方同心协力一起剿灭逆虏。唯一担心的就是老百姓一直都在水深火热中，兵寡粮少。

四月辛酉朝鲜君臣又有这样的对话。

李倧在光明殿引见都元帅张晚，皱着眉头问：“如果金兵犯境，那用什么来抵御呢？”

张晚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外面听说圣上要亲征的宣言，士气百倍，士兵以气为主。我军士气既然高昂，那金兵就算来犯，又何难抵御。古人一饭之德，都尚且要报答，更何况天朝对我国有存亡续绝的恩情，怎么可以忘记呢？应当和天将协力讨伐，怎能退缩不战？”

李倬也被这种掷地有声的回答感染了，当然顺带也提出了自己的顾虑：“万历壬辰大明抗倭援朝赈济我国的恩义，确实不能忘记。就算没有这个恩情，既然已经定了君臣之分，我朝鲜作为臣下怎么能坐视不救呢？但就是怕我国徒步的士兵，不能抵挡后金铁骑的冲击。”

四月丁卯李倬接见明朝使者时又反复强调，他一定会和天朝一条心，剿灭金贼。又说他为天朝怎么敢有一毫懈怠，至于出师的日期，明方说了算，总之是和明军同心协力。

这些时候，朝鲜君臣简直说得动听无比，虽然也强调自己国家如何困难云云，但总的态度就是只要明朝方面需要，朝鲜就一定会鼎力协助。

但是实际上如何呢？不到两三个月，也不需要他出兵协助，仅仅是听到毛文龙自己带兵到后金境内血战厮杀，朝鲜君臣就换了一张面孔。

七月乙未，都元帅张晚紧急禀报称：接到义州报告，毛将已经渡江，派骑兵出没在凤凰城、汤站之间，天天放炮，大张声势。又听说易承惠等人，已经从上游渡江，毛军的单薄虚弱，我是亲眼看到的。这次出兵，毛文龙一定会声称是会合朝鲜的军队，乘虚来进攻辽地。金国的虎狼之怒一定迁移到我国头上，必然会分兵侵略我国以断绝其后顾之忧。

然后下面就是一大堆的叫苦连天，朝鲜这方面粮食如何不够，“器械未及修造，将领未得其人”等等，总之就是抱怨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使后金迁怒于己方，而他们则根本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云云。对毛文龙的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最可笑的是前面还信誓旦旦要和明军协力剿金，后面毛文龙不要朝鲜一兵一卒，而只是自己率领疲惫之军攻打后金，借用朝鲜声势，朝鲜君臣就已经忌恨不已。

实则这所谓借用朝鲜声势还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看毛文龙天启三年八月初六日塘报，设伏奇袭，调动后金力量疲于奔命，乘虚

歼敌，并未借用任何朝鲜名义。

毛文龙单弱之军，尚且忠勇奋发，敢于出击，而朝鲜孱弱至不发一兵，连借用其声势都哑舌恐惧，对毛文龙切齿痛恨。两相对比，真是天壤之别。

此后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而朝方恐惧、怨恨的记载还有许多，可以说年年不断，这里为节省篇幅，不一一列出。

天启五年（1625年）朝方的一则记载，和天启二年五月朝鲜君臣抱怨毛文龙军队贪功颇为类似。其大意还是指责毛文龙的军队、将士贪利乐功，潜入到金占区靠近边境的地方，出没侦探，策反招纳金人治下的剃头辽人，在这样的挑衅下，金人非常恼怒愤恨。边境官员很忧虑毛文龙这样挑衅金国，导致金人迁怒朝鲜，但却没有办法禁止。

所谓贪利乐功，自是忌恨、诋毁之词，实则当时毛文龙部队每年军饷极其匮乏，能吃饱肚皮就已经相当不易，甚至按照朝方记载仅仅天启五年就出现饿死无数，僵尸相枕的事情。在正常的军饷都根本发不出来的情况下，有何利可贪？就算有功，又能有什么赏赐？

朝鲜人说的“毛营将士，贪利乐功”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尽管条件极其困苦，处境极其艰难，但是毛文龙率领下的明军将士，仍旧在最大限度地对后金进行打击、袭扰、牵掣。他们这么做不是像朝鲜方面用小人之心度量的那样“贪利乐功”，而是时刻要冒着生命危险，浴血奋战。

正因为毛文龙的行动本身就对后金造成重大打击，所以才会有“挑怒于胡中”的效果。

3. “乌合之卒”带来的尴尬

朝鲜君臣每每提到毛文龙，就极尽贬损、诋毁之能事，比如说毛文龙军队是“皆乌合之卒”，说毛文龙“无功爵益高”，“虚张瞞之计”，“每上伪功”，“虚张捷报”等等。

可正如我们上面所引，他们自己的记录里就大量提到毛文龙率兵袭击后金的事实，而君臣还为此怨恨不已，唯恐后金之迁怒。

究竟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

这就要说一下，在朝鲜人看来，什么才算真正的功了！

如果能一举消灭后金，所谓的有“剿胡之势”，足以“举大事”，这在他们眼中算是真正的功，也是最乐意看见的。或者虽不能一下子消灭后金，但可以和其主力正面对抗，得一地，守一地，得一城，守一城，那在朝鲜人看来，也确实是在作战，是在立功。

但是像毛文龙军队这样神出鬼没，避实击虚，乘后金力量分散的时候，频繁袭击对方空虚之处，当后金主力集结起来攻打的时候，避其锋芒，以及诸如策反敌方人员，接应辽民起义逃亡等等，在朝鲜人看来，是不能算功的，而是在无事生非，是在生衅冒功，是在嫁祸他朝鲜。他们一听说毛文龙打后金，就战战兢兢，害怕无比，就在担心后金迁怒自己，引火烧身。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朝鲜君臣的这种态度。实际这在前面分析李光涛文章的时候提到过，这里可以更详细说一下。

根据《李朝实录》的记载，山东淮安有一个姓朱的商人，在辽东经商时被金兵抓住，发配在会宁越过边境三日路程的地方居住。天启三年七月的时候，此人逃到毛文龙处，说那里被掳掠居住的部落很多，还有汉人四十名，可以前往剿杀，解救众人。

毛文龙也觉得这是一个侵扰、打击敌方的好机会，前后几次派人前去侦探，并令游击王辅、时可达领五千兵马，于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的时候进军去袭击。在出发之前，先派人送给朝鲜五千两银子，让他们在咸镜各站准备军粮，以便接济，如果银子不足，待事后再补。

但是朝鲜怕得要死，唯恐毛文龙的这次打击导致后金迁怒于自己，想要阻止，但又知道毛文龙的决心不能动摇。君臣聚集在一起商量，对毛文龙真是恨得咬牙切齿，有的说是毛文龙贪功，有的说是毛文龙故意做给明朝官员看，装装样子。

当然如果毛文龙真只是装样子，他们高兴还来不及。但他们知道毛文龙是动真格要打的，这才让其恐惧战栗，担心后金被打疼了就迁怒自己，忧心忡忡。

朝鲜国王说：“毛都督的意思不是要深入奴穴，而只是进剿靠近边境的部落罢了。都督没有功劳而爵禄倒是越来越高，无非是故意以此来张扬欺瞒朝廷。”

在他看来，进剿越边部落是不算功的，是毛文龙虚张声势，瞒骗冒功。

他所谓的“深入奴穴”，其用意无非就是说你毛文龙如果能直捣后金老巢，把其消灭，那当然我也愿意看见。要不然你干脆就直接被后金包饺子，被彻底消灭，不再连累我朝鲜了拉倒。

但偏偏毛文龙只是在边境地带消灭后金的有生力量，这就让这帮朝鲜君臣难受了。朝鲜君臣下面的对话很有意思。

判尹金盖国说：“与其惹怒金国，最后丧失咸镜，还不如冒着不好听的名声去阻止毛文龙。”

刑曹判书李时发说：“这件事情不能公开阻止，应该用北边没有储粮，南方运粮难办作为借口。”

国王李倧说：“就不能把利害关系说清楚，来劝止毛文龙吗？”

也就是这一伙人聚在一起商量的事情就是如何要阻止毛文龙攻击后金，商量到最后也没有商量出个结果来。可笑的是他们一边在毛文龙头上扣了虚张声势、瞒骗冒功的罪名，一边却战战兢兢，唯恐所谓开衅，得罪后金。

到了毛文龙军队已经出发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动着如何才能阻止的脑筋。

户曹判书沈悦忧心忡忡地向国王报告：“毛都督的军队已经到达咸兴了，像这样疾驰而往，肯定是要急速剿杀越境的金人部落。不但粮饷难办，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在金虏的地盘里惹事，把金人惹火就麻烦了，赶快派能干的翻译去劝止，怎么样？”

国王说：“毛军已经去了，恐怕很难再阻止了。”

沈悦愁眉苦脸道：“最担心的就是两点，一是毛兵深入，肯定会吃败仗。另外一点就算是打了胜仗，占到了便宜，金人也会迁怒我国。”

打输了，他们要担心，打赢了呢，他们更要担心。总之，只有毛文

龙不打，才是好同志。

再看看郑经世的补充：“金人部落肯定会知道明军来剿杀的消息，他们只要提前逃走，那毛文龙肯定会怀疑我国先给金人通风报信，这也很让人忧虑。”

这就是自供朝鲜边境上的人还和后金私通，可能把毛文龙出兵的情报先泄漏给金人以便其逃走，他们害怕毛文龙发现这一点！

最后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让边境官员在毛文龙军队要求向导的时候，假言谎骗。

朝鲜君臣一方面畏敌如虎，一听说要和后金打仗了，就吓得两股战栗发抖，魂不附体，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给自己找一些优越感。

在他们眼中，毛文龙军队是乌合之众，而以这样的乌合之众，还敢于频繁出击，袭击后金，这是他们难以想象和无法理解的。

天启三年六月，也就是毛文龙率军“出没于凤凰，汤站之间”前的一个月不到的时候，朝鲜人柳公亮向国王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形：“从兵力来看，似乎没有剿胡的实力。张晚去巡视的时候，毛文龙军队结阵接受检阅，士兵都很疲劣，就算能对后金袭扰，占到点小便宜，恐怕难以完成彻底消灭金虏的大事。”

国王问：“军兵的器械，和我国相比如何？”

柳回答说：“兵器就是在杖头上插个铁件，不如我国的兵器精利，毛都督就是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己也知道打不过金贼，万无出战之理，不过是仰仗凭借我国的势力，为山海关殿后而已。”

论军容仪表，毛文龙的部队无法和那些吃饱喝足，衣着光鲜亮丽，成天训练队列步伐的军队相比，所以在朝鲜人眼中自然是疲劣；论武器装备，也极其简陋，不过是“杖头插铁”，甚至还远不如朝鲜军队。

朝鲜人断定“万无出战之理”，但是让他们难堪的是，话音未落，一个月不到，毛文龙就率军出击。

可以说毛文龙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坚持对后金的打击，本身就是一腔赤诚热血所致。但也正因为此，反而加剧了朝鲜人对他

的忌恨。

朝鲜官员、将领一直在说朝鲜的条件太差了，人力、物力都不够，所以不能和后金交战。而现在被他们嘲讽成“单弱之军”，“乌合之卒”，兵器“不比我国之精利”的毛文龙军队却频繁出击，而他们反而在说什么“器械未及修造，将领未得其人”的话。毛文龙的行动不啻是给了这些成天只知满嘴高调，其实无能之至的朝鲜将领、官员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朝鲜国王和大臣看来，毛文龙这位老兄简直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明明武器简陋，势单力薄，龟缩岛上还唯恐不及，却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他们畏如虎狼的后金，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因为不可理喻，所以他们就把自己臆测的一些阴暗心理硬塞到毛文龙的腔子里去，比如毛文龙都是在做戏，做给别人看的，比如毛文龙是在为自己捞取富贵等等。

而实际上呢，如果毛文龙真的是在做戏，真的是安坐岛中，享受富贵，他们反而不会这么讨厌、痛恨他。而正因为毛文龙是动真格的，所以他们才会成天忧虑“开衅”、“挑怒”于后金，恐惧不已，从恐惧变成怨恨，在言语中对毛文龙百般丑化。

4. 贻祸还是保全？

朝鲜君臣的逻辑，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觉得你毛文龙对后金的那些打击又不能真的消灭后金，那你去打了干什么？你这样平白无故地惹怒后金，又有什么好处，到最后还不是我们朝鲜倒霉？

那他们的这种忧虑对不对呢？

是不是毛文龙对后金的袭击真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见小利而动”，“贪功轻动”，无济于大局而徒生事端，贻祸朝鲜呢？

从表面上看，站在朝鲜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立场来看的话，这种忧虑似乎不无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文龙诚然为明朝之功臣，朝鲜之罪人。朝鲜人这样厌恶毛文龙也并非无理。

但回答是断然否定的！

毛文龙的作为不但是为明朝效忠尽了最大努力，而且对朝鲜的

好处也极为巨大,只不过由于朝鲜君臣在形势判断上的鼠目寸光,浅见短识,导致他们无法认清这一点。

有一个问题是很突出的,为什么从天启元年一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后金(清)始终没有试图去吞并朝鲜,甚至在两次进兵攻占朝鲜之后,仅仅是要求结盟,就退了回去,没有就此把朝鲜灭掉呢?如果说在顺治时期入关以后,清对朝鲜已经是不屑于占领了,那在这之前呢?

这个中原因,恰恰是和毛文龙从天启到崇祯的八年时间里的活动有莫大关系。

我们在以前的分析中,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毛文龙在东江的活动,对后金不断的袭击,对后金汉人将领的策反,对辽民起义逃亡的接应,其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恰恰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后金的统治,让其疲于奔命,难以为继。

看上去是零敲碎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但和对辽民反抗的接应结合起来,就导致后金无法把军队放在外面太久,这在努尔哈赤自己的通告中就说得很清楚。

这给后金统治者造成的印象就是,我对已有的地盘的治疗都是非常吃力,难以消化,军队的力量许多时候都必须镇守在各地,否则人民的反抗、逃亡几乎一波接一波。为了集中力量,甚至已经占领的地盘、重镇比如广宁都不得不放弃。

在这样的情形下,后金对于朝鲜的考虑是什么?如果占领了朝鲜,那究竟留多少的军队来镇守?

留的军队少了,考虑到辽东的经验,会镇不住,甚至可能会被各个击破,被全歼,那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留的军队多了,那辽东本土怎么办?

留多留少都不行!如果是后金把自己大本营搬到朝鲜去,那问题同样存在,甚至更糟糕。

那利用朝鲜投降的力量,也就是朝奸来统治呢?就如后来清朝入关以后,利用大批明朝投降的军队去镇守各地,镇压反抗。

问题就出在,当时后金的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对毛文龙的活动造成的效果印象太深了,他们的感觉就是我用了吃奶的劲,辽东这块地盘上的人力、物力资源都无法完全消化。辽东如此,那朝鲜也会是如此,别的地区应该也是如此。

所以在皇太极时期,不但是对朝鲜没有吞并,就是攻入了关内,对北京城也没有真正下力攻打。如果说一开始,明方力量还大,确实可能攻不下来,那到崇祯十五年到十六年(1642—1643年)清军入关抢掠的时候,明方其实已经无力了,要是直接攻打北京,完全是能打下来的。

但皇太极却没有这么做,真正的原因可能就是他对毛文龙时期的辽东人民反抗此起彼伏,汉人将领被毛文龙纷纷策反的情形印象太深了。尽管后来毛文龙是死了,但总归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还是让他没有信心去控制明朝本土这么大的地域。

朝鲜的君臣认为毛文龙的活动是连累了他们,而实则恰恰相反,是毛文龙的活动导致后金在对辽东本土都无法消化的情况下,更不敢去吞并朝鲜。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文龙是朝鲜当时最大的恩人都不为过!

二、朝鲜也穷,还索粮!

前面说过明朝方面发给毛文龙的军饷是严重不足的,根据汪汝淳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所说,在天启三年左右,东江军民数量已经达到五六十万左右。就算这个数字是夸大的,以历年东江人口平均三十万计算,光是需要的粮食每年也至少应该在六十万石以上。而明朝方面所发军饷每年平均折色十余万两银子,本色十余万石粮食,可以说离满足东江军民填饱肚子的需要都差很远,更不必说其他物资比如衣服、军械、火药等等的供给了!

毛文龙在崇祯二年(1629年)给皇帝的报告中说:八年以来,一

共收到本色粮食一百二十万八千多石，折色的饷银一百四十万一千三百多两。军民都是靠吃粥勉强维持性命，一切米、豆、布帛之类的物资，都不得不向四方商贩转借，等军饷到了再偿还，军饷却又没有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毛文龙殚精竭虑，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筹措粮饷，弥补空缺。他在给朝鲜的书信里说：招募军队消灭虏贼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筹集到充足的粮饷来养活众人，我焦心劳思，想尽一切办法，现在权宜之计只能是立市通商，挣钱接济军民。

通商是一个办法，靠贩卖人参、貂皮赚一些钱来贴补军饷，此外还有在岛上开田屯种，向各处商人借等办法，但这些还是不够。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文龙就不得不依靠朝鲜来解决一部分的粮食供应，可问题是朝鲜自己确实也很困难，当时又天灾连绵，丰收的时候少，饥荒的时候多。毛文龙这种情况下还要向朝鲜索要，结果必然就是导致朝鲜官民极大的怨恨和厌恶。

这样毛文龙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他要忠于明朝，保留东江这一支战略意义重大的力量，在明方军饷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向朝鲜索要，而结果就是让他自己被朝鲜人怨恨、厌恶；而如果他要去讨朝鲜君臣的欢心，那怎么办？似乎只有解散队伍，任由朝鲜彻底倒向后金这一条道路了。

毛文龙不可能选择后者，只有选择前者。于是毛文龙注定成为朝鲜君臣乃至百姓心目中的恶人。

更糟糕的是由于朝鲜方面供给的粮食实际上也还是不可能满足需要，为了免于饿死，就必然有许多士兵和百姓到朝鲜去抢劫；再加上从后金统治区源源不断逃亡出来的辽民，为了生存也要在朝鲜抢劫。这样的记载，在《李朝实录》中很多。

军队、士兵抢劫、扰害民间的情况如天启四年六月庚寅，毛文龙属下时可达和王辅等将领带兵从北道回铁山，到永兴的时候，因为缺少粮草，就有一些士兵抢劫朝鲜人。

还有如天启五年十二月丁亥，毛文龙派韩福等人拿着令牌向朝

鲜方面催促运送粮食的时候说“今年登州运来的粮饷数量少，岛上许多人都要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形，恳切乞求朝鲜方面能发送一些粮食，以赈济垂死之人”。又说“属下二十名将官各领着三千人，散布在宣川、郭山、定州、嘉山等地民间，向朝鲜老百姓讨要食物，我们看见这种情形，也感觉气闷”。

从后金统治区逃出来的辽民在朝鲜抢劫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天启四年三月甲戌的记载说从后金地盘逃出来的辽民散入朝鲜地方，掠夺居民财产。清川以北的地方，尤其深受其害，不得安宁。隔了七天之后的记载又说归顺的剃头辽民，万千成群，抢掠老百姓，甚至田地已经埋下去作为种子的谷粒，都被挖出来吃掉，百姓流离失所，各处望去一片萧条景象。还有报告称，辽人每天都成批渡江过来，有的五十多人一批，有的一百多人一批，成群结对，遍布野外，春天耕种刚发芽的小麦，都被采光。道路上遇到饿死的尸体，都争相屠割来吃掉。

天启五年六月的记载则说，从辽东陷没以后，毛文龙在朝鲜境内，招集辽人。所以辽人来投奔归附者无数，遍布西土，扰害村间。而毛督府接待辽民的办法，都依靠我朝鲜。几年里面，主人和客人都处境艰难。

到了同年十二月，又有边境官员报告说越境过来的剃头汉人数量极多，饥寒交迫，有冻死的、饿死的，有许多人扰害、抢劫朝鲜百姓，甚至有杀人越货的。

刚逃出的辽民，还未受约束，他们的行为不能完全怪毛文龙，但由于是毛文龙派兵策动接应逃亡人员，所以这些账最后也都被朝鲜人算在他的头上。

在朝鲜人看来，毛文龙几乎成了万恶之源。一旦一个人成了可恶的代表，那所有的脏水就都会毫不犹豫地泼在他头上。

《李朝实录》天启五年正月的记载说，当时毛都督以收复辽东为名义，召集辽左饥饿的人民，安置人员遍及清川以北的地方，而天朝赏赐的银两，都占据为私用，安坐岛中，独自享用富贵，军民都心怀怨

愤。到这个时候，都督送亲笔书信给尹毅立说：“手下军兵四千多人，全到衙门，击鼓索粮，如果再过数天，一定会饿死，到时只能分散遣派到你们朝鲜各地，任意讨要食物了。”

尹毅立报告上来，于是命令平安道监司李尚吉、管饷使南以雄等人催运粮船。

在朝鲜人的头脑里，似乎明朝给毛文龙的军饷、银两很多，本来完全够用了，因为被毛文龙占为私用，独享富贵，所以才导致军队、士兵饿死，不得不向朝鲜索要！

这当然是荒唐到极点的污蔑，核查各方史料，明朝给毛文龙的那点军饷，再翻一倍，都还不够，毛文龙是拼命从别的地方去贴补亏空。朝鲜造此谎言，纯粹就是为了发泄他们对毛文龙的厌恶之情。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在士兵都要饿死的情况下，毛文龙还把军饷占为私用、独享富贵，那就不是什么手下军兵聚集在一起“击鼓索粮”的问题，而是这些士兵直接就把毛文龙碎尸万段的问题了。

但朝鲜人如此污蔑诋毁，也并非不可以理解。既然在他们眼中，毛文龙就是一个他们带来无穷祸患，无穷麻烦，可厌至极的人物。对他们来说，这样一个恶人，能有什么好品德，往他身上多泼点脏水又算什么？

毛文龙对这种局面，不是不知道，对朝鲜人提供的粮食支援，他是非常感激的，在给皇帝的奏疏里是说尽好话（而朝鲜君臣还以为毛文龙说他们坏话），说朝鲜人如何救济自己，帮助自己。希望朝廷能增加军饷，减轻朝鲜的负担。

即便到了天启七年，朝鲜边臣再次勾结后金来害他的时候，他还在给明朝皇帝的奏疏中说：我一向因为朝廷接济不及，不得不从朝鲜取得补给。现在朝鲜官员和金兵勾结来害我，我没有面目再向朝鲜人开口索要粮饷了。

为了补偿朝鲜人的损失，减少对朝鲜的扰害，毛文龙其实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想了许多办法。

比如朝鲜方面提供给他的粮食，他也不是白拿的，许多情况下都

是尽量拿银子来买，或用贸易得来的货物补偿，甚至所发货物的价值高出粮食的价值之上。

比如《李朝实录》记载，天启二年十一月辛酉，平安监司报告称，毛将送银子一万两来换米，地方上无法筹集足够粮食，请朝廷想办法处理。

天启四年三月癸未，备边司报告说毛将和许中书要巡视边境，而随带的许多军兵，粮饷要靠我国供应，提供价值一万多银子的货物来交换。毛将所请求的粮饷，实在难以一一应付。

这种用银子和货物换米的记载，在《李朝实录》中比比皆是，为了省力，这里就不再一一摘录了。而朝方则每每以朝鲜商业不发达，银子用处不是太大，抱怨不已。

关于用货物换米，《李朝实录》记载了朝鲜君臣对此的态度：

毛督府率领的辽民，粮食供应依赖于我方，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所食用的公私米粮不知道有几十万石，因为用货物交换作为借口，就宣称没有一粒粮食是白白侵占、掠夺的。

他提供给我们的货物，对我们国家又没有什么用，而一国民夫的一半都在为辽民服务。今年或许还能支撑，到明年肯定难以为继了。这以后督府如果要再发货物给我方，就干脆对他说“我国连年歉收，前日所发的丝缎，我国尚没有完全偿还其价值，对此非常不安。小邦和老爷本来就义同一家，何必一定要接受同等价值的货物再来援助粮食，计较多少呢”？

总之宁可使我国提供的粮食价值多于毛文龙所发给的货物，也不要让他给的货物价值多于本国输粮的数字，弄得好像我国是负债一样，还每每被责怪。

也就是毛文龙给朝鲜的货物太多了，甚至让朝鲜有负债的感觉。虽说朝方以“所发之货，非关于我国之用”抱怨，但至少说明毛文龙并不是白拿朝鲜的粮食，而是尽最大努力给朝方补偿，不能完全符合朝鲜的需求，实在是限于条件不得已之故。

至于士兵和辽民对朝鲜百姓抢劫的问题，毛文龙和手下将领也是竭力设法约束、制止的，但当士兵和辽民都在饿死的边缘挣扎时，

这种约束也没有办法起到太大作用。

《李朝实录》中这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少。天启二年五月,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珣接见毛文龙派来的差官时说:“每天都听说避乱的辽民扰害农民,掠夺牛马,使百姓不能耕作。”

差官回答称毛文龙也担心有扰害之患,所以下令凡是侵掠朝鲜农民的,都处以割耳、重棍的刑罚,一定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可见当时毛文龙就已经严令禁止士兵扰害朝鲜百姓了。

天启三年三月乙未的时候,朝鲜官员朴弘道在报告里称许多市民控告明方将领(唐将)在朝鲜发买货物,抢了朝鲜本地商人的生意,只有毛文龙虽然脾气急躁,但久住在我国,并没有派人发卖货物的事情。把此事通报给毛文龙,让他下令禁止,一定会乐意听从,而明方的使者、差人也会有所顾忌。

这里所说的唐将显然不是毛文龙部下,因为朝鲜官员明确说“惟彼毛将虽极轻躁,久住我国,曾无送差发卖之事”,则所指唐将或当系登莱明军渡海而来者。

毛文龙在天启四年二月十六日塘报中就提到“西来兵将,扬帆至鲜,鬼混一番,或杀顺民,拐带子女”。

到了天启五年则明确说去年提到的西来兵将是指登莱沈有容方面的军队。

这也说明在天启三年到四年初的时候,毛文龙军队的纪律还是不错的,甚至来买卖货物之类都尚能尊重朝方的要求。

但随着投奔东江毛文龙处的辽民越来越多,而明朝发给的兵饷严重不足,兵民都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尽管毛文龙一再发禁牌,禁止军民扰害朝鲜百姓,但这样的命令也很难被执行了,甚至派去阻止的官兵本身都要被抢劫士兵攻击。

如天启四年十一月的时候,毛文龙手下的张游击领兵驻扎在朝鲜朔州,结果许多士兵散处民间抢掠(这也实在是因为军饷不足、饥寒交迫所致),张游击派人去阻止没有用,就亲自率兵追击这些扰害朝鲜人的士兵。按《李朝实录》记载,张游击一直追到獐项岭,而千总

黄金库旗下的军兵二千五十多名,用枪刺伤游击派送的差人,逃到八岭一带,不知所往。

天启七年四月朝鲜官员金启宗报告称汉人杀掠现象越来越厉害,他们百般思量,对此也没有好办法。前天毛文龙特地送来禁止抢掠的令牌,但靠朝鲜人去用令牌禁止也没什么用。正好有二十多个菜色满面的汉人饥民到他这里,他就对这些汉人说:“毛督府的禁令不是不严,但如果没有汉人的差人去禁止,那些抢掠的辽人肯定不会听从。你们带着这个禁牌前往熙、云一带禁止各种扰害行为,我就会给你们粮食。”

这些汉人饥民同意后,他选择其中样子稍微体面点,看上去像差官的五个人,又派了一百多个朝鲜兵,护送到清川以北,用禁牌的意思开陈利害,阻止辽民抢掠杀戮的行为。

朝鲜官员自己都承认“督府禁令非不至严”,但是当时的情况,对辽民来说,不抢劫,几乎就是只能活活饿死,所谓的“汉人杀掠日甚”,也是迫于生存不得已的结果。连来朝鲜官府求助的汉人,都是“菜色满面”。

要解决东江军民对朝鲜扰害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明朝方面发足军饷,充分接济,凭那点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军饷,是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的。

毛文龙苦心竭力维持住东江力量,在明朝军饷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撑住这一块地盘,不让这些军民散失,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到了把个人毁誉得失、生死存亡都抛在脑后的地步。可是朝鲜方面当然不会设身处地为毛文龙想一下,他们看到的只是毛文龙在东江,给他们带来了祸患和麻烦,于是对他厌恶至极。

三、一切为了维护形象

1. 君臣的浑噩表现

从上面所说的两点来看,似乎朝鲜君臣对毛文龙的厌恶、诋毁也

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也还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朝鲜君臣能明大义,知时势,勤于侦探,知己知彼的话,纵然对毛文龙有偏见有反感,但对他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可以有一个清醒、公正的认识的,问题就出在朝鲜君臣本身的昏庸、浑噩之上。

就以对后金的态度而言,他们似乎始终认为只要不去挑衅,不去惹怒后金,那后金就不会来侵占朝鲜,始终不明白后金之所以不来吞并朝鲜,真正顾忌的是什么!

一方面满嘴的大义高调,另一方面文恬武嬉,得过且过,把自己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后金的善心上。

有人会说,以后金军力之强,明朝这样的大国尚且难以对付,朝鲜小国又何足怪?却不知道,小国自有小国的优势。地盘少,信息传递处理效率也更快。人事关系、地方关系相对简单,注意力更集中,人力、物力资源调动起来更容易。

以朝鲜之疆域,百姓吃苦耐劳,境内山地繁多,丛林茂密,兵器、军械也不算差,各地又有城池。只要坚定决心,对付后金,纵使不能战也至少应该能守。毕竟当时后金重心在和明交战,不敢主力耽搁朝鲜太久,只要能守御两个月以上,就完全可以无惧于后金。

这并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设想,后来的南明政权瓦解时,江阴凭借一城之力都能守八十天。关键只是在于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决心!

天启二年出使东国的梁之恒曾经这样评论朝鲜:“贵国军兵不是不精壮,但士气却不振作;士兵人数不是不多,而军心不奋发。先不说三江天堑可以限制金虏骑兵,就是山势险要也可以遏制奴虏的战马,火器也足以洞穿奴虏的盔甲,弓箭射程也够远,步兵也能轻装快速行军,如果能够人心奋发,士气振作,足够称得上雄兵大国了,又何必畏惧奴虏?”

但无奈,朝鲜君臣昏庸,战固不能战,连守都成奢望。甚至在后金还没有攻进来的天启三年,君臣讨论到后金进攻的可能性时,就已经毫无信心了,有一个官员郑经世就有这么一句话:“圣意虽欲守都城,见诸臣所为,顿无守城之策。”

而到了后金真打过来的天启七年，后金正月十四攻打边境的义州城，二十六日就打到了平壤城下。朝鲜君臣在此期间，乱成一团，毫无像样应对，其官员甚至于有为推脱责任自承为僵尸的。

朝鲜国王李倧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弃其所居京城，携其妻子，遁往江华岛”，然后就是派人与后金谈和，其前后经过，如同儿戏一般。

二月初八日，后金派刘兴祚乘船到海岛上去见李倧，结果李倧就如木偶，以至刘兴祚发怒说：“你在干什么？怎么像土庙里的泥塑雕像一样？如果还是人，就应该动一下！”

李倧脸上现出羞惭之色，难以回答，良久才说：“因我母丧未终故耳。”

刘兴祚再指责朝鲜，李倧就全推托到手下大臣身上，“朝鲜王无言以对，但曰：‘我不知，是我属下大臣所言’”。

其昏聩怯弱情状，真是栩栩如生，如在目前。

朝鲜如此一触即溃，真是无可可用之兵，无可可用之将，人民毫无抵抗意愿么？恰恰相反，就在三月朝鲜国王和后金签订盟约之后，还有军队在坚持袭击后金！

《满文老档》中就记载，当时朝鲜在外的官员，还不知道他们的国王已经议和了，两次截杀往来的后金使者五六人，平壤地方上，还有步兵和骑兵五千人，来围杀库尔禅。

可以说，如果朝鲜君臣不那么昏庸，稍微有点血性，抵抗决心稍微坚定一点，完全用不着签订城下之盟。

当时后金之所以已经深入朝鲜腹地，不但不吞并朝鲜，反而对朝鲜国王颇为客气，也不要求他彻底投降，恰恰就是其东征主力和毛文龙苦战并未讨得便宜。害怕要求过苛，导致朝鲜上下坚决抵抗，那就让其陷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无奈朝鲜君臣，不知己又不知彼，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只知道害怕、屈服，蒙混苟安。后金一撤，就依然一副太平景象。身在金营心在汉的刘兴祚后来送来了一份密揭批评他们：“昨来一路见贵国人民散而复聚，与处太平无异，毫无卧薪尝胆之意，真所谓燕雀处堂之故

事也。”

2. 幽默侦探和评价扭曲

朝鲜君臣既然如此昏暗不明，他们对毛文龙的评论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常常是一厢情愿胡乱臆测，用自己的阴暗心理来度量，当被事实戳穿之后，就用新的臆断来达到贬损毛文龙的目的。

你要说这帮大爷在故意撒谎，那也谈不上，因为他们的侦探能力确实非常低下，所以只能用真伪不明的消息再加上自己的胡乱臆断来判断情况。

最典型的莫如天启六年四月到五月，毛文龙率大军深入后金腹地血战前后，朝鲜君臣的表现。

在毛文龙大兵刚刚出动时，义州府尹李莞要刺探毛军的行动，结果想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办法，他派遣了一个所谓“伶俐小译”带着猪和酒，以犒劳军队的名义要渡过鸭绿江去探视。结果被毛文龙设在江上看防的士兵拦住了，只得悻悻而归。

李莞就此写了一份搞笑的报告，大意是毛军行动如此隐秘，肯定是因为明朝使者要来视察了，装作出兵的样子，虚张声势而已，这才能掩人耳目，不让人探视具体情况如何云云。

这里朝鲜官员的痴愚毕现无遗，军事行动最重要的就是保密性、突然性，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搞成杀猪宰羊，喝酒欢送，大张旗鼓，路人皆知，乃至行军动向路线，一目了然，那还打什么仗？

真的要去侦探，派一小队人马，穿过边境，隐秘而行，追踪足迹，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可是他偏偏想出携带猪酒渡江，大摇大摆去款待军队，然后再来探听消息这种蠢不可及的办法，大概是把打仗当成旅游度假了，视军机大事全如儿戏！这要是不被毛文龙部下阻止，就真是大笑话了。

本来探听不到情报，直接承认无能也就行了，反正朝鲜人一直就宣称“我国不能侦探”，可是这位叫李莞的边官偏偏不是承认自己的无能，反而对正常的军事保密大惊小怪，胡乱揣测，信口污蔑说毛文龙不是真的去打仗，而是装装样子，做给别人看的，这真是硬把自己

的阴暗心理塞到毛文龙的腔子里去了。

而到毛文龙率军回来，消息汇总，事实呈现在面前之后，朝鲜方面的记录又不得不自打耳光。

朝方的报告里说毛文龙的军队渡过鸭绿江，分八路进兵，在逐一介绍了各路进兵的将领后，又叙述了王辅率领的一路明军中金兵埋伏之事。

具体经过是当月初五日，王辅被诈降的假鞑（剃头汉人）引诱，过辽阳到鞍山，城中只有金兵和假鞑若干，于是攻下城池，获取许多俘虏和牲口出来。王辅沾沾自喜于小胜，再进入城中，没有想到中了埋伏，真鞑围上攻杀，王辅、李良梅、崔天泰、李尚忠、张文登、毛有男等六将战死，其余十四将不知去处，所领军兵一万八千，尽数覆没云云。

这里在事实面前，总算不再污蔑说毛文龙是率军做做样子了，不得不承认毛军确实深入后金腹地血战，并有不少将士壮烈殉国。但这时候却又换了一种贬损手法，任意捏造、夸大毛军的损失，说是“军兵一万八千，尽数覆没”，李光涛曾对这个数据如获至宝，用来作为贬低毛文龙的根据。

实际上按照毛文龙军队的后勤和武器供应情况，一次出兵能动用的兵力数量也就在两万多一点，朝鲜人自己探听来的消息也是毛文龙这次出兵分成多路，王辅所率仅仅是其中的一路，怎么可能一路中了埋伏，就导致一万八千人覆没？稍微动点脑筋，就能看出这个数据的荒诞和自相矛盾。

再查对一下毛文龙天启六年五月十九日的塘报，就更清楚了，毛文龙此次出兵，王辅所在的部队攻打鞍山是一路，六千人左右；进攻海州的林茂春是一路，五千人左右；进攻辽阳的毛有忠是一路，也是六千人；进攻沈阳附近的曲承恩是一路，四千人左右；潜进三岔河相机夹攻的毛有荣是一路，未写明多少人，但应不多。

王辅所在一路，因为遇到后金事先安排的埋伏而损失惨重，但也并没有全军覆没，而是战死两千多，逃回三千多。其他各路灵活机动，偷营奇袭都有斩获。

从这次事件来看,朝鲜君臣的昏庸无能导致他们对毛文龙评价的失真、扭曲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

一开始是军事上的无知、侦探上的低能导致他们把自己的主观臆断当成事实来对毛文龙进行贬低,用一种极为阴暗的心理去胡乱揣测。而到事后,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先前的揣测根本错误的时候,他们又因为仇恨、厌恶毛文龙的心理,对事实本身进行扭曲,夸大毛文龙的损失,似乎以此来证实毛文龙的无能和他们的英明,置前后矛盾于不顾。

总之深入骨髓的偏见和军事上昏庸无能的结合,导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对毛文龙做出客观的评价。如果毛文龙避实击虚,用尽可能小的损失消耗后金有生力量,那在朝鲜人看来就是毛文龙根本没有认真打仗,只是在装装样子,瞒骗明朝,冒功领赏。如果毛文龙深入敌后,拼死血战以达到牵掣敌方力量的目的,朝鲜又会对毛军损失大惊小怪,甚至夸大其辞用以证明毛文龙无能。

3. 知有毛镇,而不知有朝廷

朝鲜抗金民族英雄郑凤寿

天启七年初,后金进攻朝鲜,各地基本上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唯独在一地受到坚决抵抗,那就是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由郑凤寿率领据守的龙骨城。

在金兵入犯之时,龙川一带,有一个叫张士俊的朝鲜地方官员,主动削发,卖身投靠,掠夺民财以犒劳金兵,强迫百姓剃头,不从者加以杀戮,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当时朝鲜人郑凤寿在龙骨山城聚集各地义民,二月二十八日张士俊引金兵数百来到龙骨城外七里,自己入城招降。郑凤寿杀张士俊和其同谋,“城中男女莫不欢欣,或斩游骑,或夺马匹”。三月十七日,金兵聚集义州、昌城、郭山留守之兵大举来攻。在郑凤寿组织之下,城中男女都被发动起来,上城守御,“矢、炮、石三物一时俱下,先锋数百余骑,一时立死”,而守城朝鲜人死伤仅十余人。

朝方在四月份接到郑凤寿报告后,也颇感振奋,下令表彰:

“郑凤寿召集义兵扼守孤城，先斩张士俊以壮士气，及大贼来攻之日，竭力死战，催恤贼锋，使一城得全，求之古人，亦不多得。”

于是授郑凤寿为龙川府使兼助防将，并下令给予龙骨城必要物资援助。到四月己酉，金兵再攻龙骨城，仍旧不克，死伤甚众，解围而去。朝鲜官员报告说“贼兵再犯龙骨，郑凤寿独守孤城，忠勇益著。朝廷未得接济之策。”

到了五月己卯，龙骨城中粮食吃光，死者相继，情势危急，这时候是毛文龙伸出了援手。郑凤寿的报告里说他们原本打算用毛文龙给的三百两银子，在皮岛买米三百石渡过难关，但城中军民染病，难以调集人手，要搜出牛马七十多头去运粮，结果也无法做到。

一个叫元铎的朝鲜官员把城中危迫情况，告诉给毛文龙，毛文龙同意派人支援二百石米，另一个朝鲜官员张大秋也周旋张罗，于是毛文龙再增加了一百石米的援助。

到五月乙未，郑凤寿再次报告，城中粮食断绝，老弱死者一千多名，逃走的也有一千多，毛文龙再一次伸出援手救济，“唐差毛永璠告急于毛营，幸赖督府垂怜，给米七百包”。

实际上，毛文龙不单是对龙骨城接济援助，对其他朝鲜地方自发组织起来抗金又靠近东江群岛的义军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支援。

比如六月乙卯，在少为浦地区的义兵将领李立，向朝鲜政府报告说毛文龙派人来“问贼势，即给军粮，且助兵势”，而这时驻扎义州的后金部队前来袭击，“真鞑两千，蒙古万余，不意围抱，都督以火手三千，一时俱放，内外相应，贼兵解去”。可能是为了更好保障义军家属的安全，毛文龙把义军老弱安置到自己控制的大鸡岛上。

鼠肚鸡肠的朝鲜君臣

本来这是毛文龙救济友军的一片好心，但是在鼠肚鸡肠，昏庸无能，一直以仇恨、诋毁毛文龙为能事的朝鲜君臣那里，却又引起了极大的猜忌。他们认为毛文龙之所以要救济朝鲜义军，是为了吞并他们：“其意欲将少为浦义兵占为己有也。若此不已，龙骨兵马亦将有渐次兼并之患，为李立者当以死拒之。”

不但不领情，还要李立等义军将领以死抗拒。

而就在这之后不多久，六月己未传来龙骨城军民溃散消息，朝鲜官员甚至连郑风寿的下落都不知道了，于是下令把溃散的龙骨城军民调到安州去。

随后也就是六月辛酉，金启宗、郑忠信报告说龙骨城内溃散出来的士兵饥馁，他们送粮食去赈济，但这些士兵百姓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不肯听从他们的招徕，让这些朝鲜官员哀叹“目前收拾，诚无善策，尤极闷虑”。

到了七月乙丑，总算传来了郑风寿的下落了，金启宗、郑忠信报告称龙骨城中溃散，防御使郑风寿在六月十四日跑到了大鸡岛（毛文龙地盘）上，三百多个汉人到龙骨城里搬取弃置的军粮，正好有四十多个金人骑兵到山下，汉人望见金贼来到，就放炮迎敌，金兵马上就逃走了。

也就是郑风寿跑到了毛文龙那里去了！

龙骨城溃散的真相是什么？

那龙骨城溃散究竟怎么回事呢？

按照一贯仇视毛文龙的朝鲜官员平安监司金启宗等人的说法是郑风寿无能再加上毛文龙的破坏所致。

他们报告称因为郑风寿分配粮食不公，只给守城的正军，而不给老弱，导致众人怨恨。而毛文龙手下又把出城收集补给物资的人杀了送到岛上，再加上城内百姓看见少为浦义军的老弱数百人，被移置到毛文龙控制的大楮岛，人心惶惶，都非常害怕自己也被驱赶到岛上，于是就溃散出城了。

那事实果真是如此么？如果属实的话，那看来又是毛文龙的一大罪状了！

然而对照《李朝实录》前后的记录，就可以发现，这不过是金启宗等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昏聩，推脱自己的罪责而编造出来的无耻调言，试图通对郑风寿、毛文龙进行栽赃来洗白他们自己的恶行！

龙骨城守军溃散的真相，可以从随后元铎给朝鲜政府的报告里

窥见：“前不久金启宗给我的书信里，提到龙骨城移兵的事情，我回答说‘国家纲常之所以没有断绝，是因为有这座坚守的城池。金贼对我方还有一分顾忌是因为这座城池，毛文龙之所以不全然怀疑我方是因为这座城池，我朝鲜有辞于天下后世者也是在于这座城池。郑凤寿守卫这座城，并非是因为有健儿精卒，精兵强将，而是因为人人都知道必死，然后同心死守。包括老太婆和弱小的妇女，全都登城杀贼，这是已经见到的效果。如果把他们移入内地，那不过是残余疲惫的流民百姓而已，就如同离开水的鱼一样，不是太令人痛惜了吗’？龙骨城的军民自从听说要把他们调离的提议，群情骚动，主将也没有办法禁止。军民最后抛弃城池，不顾主将而溃散，我实在对此很痛心。”

看了元铎的这段话，我们才恍然大悟。龙骨城守军溃散真正的原因，不是什么郑凤寿分配粮食不公，什么城内人民害怕给驱赶入毛文龙岛上之类不着边际，胡编乱造出来的理由。而恰恰是金启宗等人一手策划，试图把龙骨城守军移入朝鲜内地，也即他们给元铎的书信里提到的“龙骨移兵之事”。

这个消息，让城内的军兵得知了，才导致群情骚动，最后弃城溃散而逃，而郑凤寿自己也跑到毛文龙的岛上去了。

金启宗等人之所以要把龙骨城义军移入内地，从前面他们说的“龙骨兵马亦将有渐次兼并之患”，就可以窥见一二，大抵就是看见毛文龙对龙骨城义军的接济就多疑，害怕毛文龙要兼并这一支力量，所以要把龙骨城军民移入内地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而龙骨城内的军兵在得知移兵的消息后发生恐慌，弃城溃散而逃的原因更简单了！

当时朝鲜国王早就屈服于压力，和后金签订城下之盟，称兄道弟。龙骨城的军民恰恰是在朝鲜国王屈服之后，仍旧坚持抵抗，那一旦移兵，他们当然要担心政府把他们当作礼物送给后金。

不遵从移兵的命令，困守城内，那就相当于公然对抗政府，被彻底切断补给就是死路一条；遵从移兵的命令，那可能也是一死，所以

他们最后就只能是弃城溃散，自谋生路。

而郑凤寿当然同样有这个担心，所以他在溃散之后，不是跑到朝鲜控制的安州，而是主动跑到毛文龙的岛上去。

以上所说即便从上面金启宗等人前去招徕龙骨城溃散士兵的时候，“听其言，多有疑阻之意”，也可以得到证实。

对毛文龙的厌恶迁怒到了郑凤寿头上

朝鲜君臣庸人自扰，猜忌昏瞽，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龙骨城溃散，事后不加反省，承认错误，反倒打一耙说：“郑凤寿死守孤城，终始拒贼，足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但可惜不能临机应变，善加处理，导致军队溃散，移入大楮岛（毛文龙地盘），此岛是监军驻兵的处所，进去之后，郑凤寿的进退恐怕就不得自由了。我们派人到郑凤寿那里，告诫他不能舍我从毛。”

就这样，因为毛文龙的关系，本来守城有功的郑凤寿在朝鲜君臣眼里反而成了有罪了：“郑凤寿用李马骨作为守门的将领，惊吓惑乱军心，等军民溃散后，不奔赴我国军门，反而逃入到海岛中，受制于毛营，他的罪状，确实不轻。如果这个不追究罪责的话，谁还肯服从朝廷的号令？”

但因为朝鲜实在无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能守城的郑凤寿，真要治罪，也说过不去。于是有朝鲜官员提出还是赦免其罪，仍旧让他守龙骨城吧。

但国王李倬还不依不饶，回答说“郑凤寿处事失宜，不无罪过，仍受重任，殊未妥当矣”。

官员就劝解道：“郑凤寿不能临机善处，竟然至于溃散，而且不能直接到安州，反而转投毛文龙的大鸡岛，臣等也是想要治他的罪。但是想到举国崩溃的时候，唯独他能纠合聚集义军，入守孤城，抵抗金贼的锋芒。当时中外听闻的人莫不耸动，这之后虽然有见事不明的过失，但不可以因为这个掩盖他前面的功劳。按臣等的意思，不妨姑且令他仍旧任职，以观后效。”

这时候朝鲜国王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郑凤寿知有毛镇，而

不知有朝廷。厥罪非细。然启辞亦不无所见，姑依此施行。”

作为朝鲜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坚决抗击后金的民族英雄郑凤寿，在朝鲜国王眼里却是“知有毛镇，而不知有朝廷”，这本身就太讽刺了！

要知道毛文龙一直是被朝鲜丑化、污蔑到极度不堪，被说成只知道贪财享乐，冒功领赏的无能之辈，或者是成天观望形势，随时都会通敌投降后金的人物。

但是现在事实证明极度厌恶毛文龙的朝鲜国王和大臣才是软弱无能，昏庸糊涂，一打就逃，一逼就降；反而有血性，有能力，敢于站出来坚决抵抗后金的郑凤寿和毛文龙意气相投。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看出竭力丑化毛文龙的朝鲜君臣，他们一贯试图扣到毛文龙头上的那些帽子扣到他们自己头上更合适。

郑凤寿之所以“知有毛镇，而不知有朝廷”，恰恰就是因为事实上毛文龙才是抗击后金的中流砥柱，而满嘴高调漂亮话的朝鲜国王、大臣则昏庸软弱，不足以让人信任。

在八月癸亥，郑凤寿答应重新出守龙骨城时说：“现在许多人都认为毛将杀掠我方的人员有罪，而我曾经在龙骨城领受毛将的恩惠，每次都想要直接呈报说明毛将的意思。而朝廷正把我入岛作为罪状，所以不敢渎扰。现在如果要我去守龙骨，那朝廷不能不对毛将有所安慰开解。”

他说“每次都想要直接呈报说明毛将的意思”，也就是向朝鲜君臣解释辽民杀掠抢劫不能全怪到毛文龙头上，毛文龙本身是一片赤胆忠心，希望能消除对毛文龙的误解，但由于他自己都因入岛而被看成有罪，所以也不敢多说了。

事实上毛文龙让郑凤寿来去自由，本就说明先前朝鲜君臣猜疑他要吞并郑凤寿的队伍根本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时候金启宗也不得不假惺惺地承认毛文龙接济郑凤寿是出于诚心而并非覬觎他朝鲜什么：“向来毛兵之杀害我民，罔有纪极，而至

于接济郑凤寿及诸义兵，则虽谓之尽诚，亦可也。拯救垂死之命不啻累千，毛将每以此为己功。”

四、丑化毛文龙的心路历程

1. 心态类似部分明朝官员

现实生活中的入往往是两个方面的结合体！

一方面是把自身眼前一些利益放在第一位，谁触犯了这些利益，谁就可恶至极。

另一方面，有强烈的道德观念，是非观念，有强烈的荣誉感、耻辱感，读小说，听评书，看电影，每到忠奸善恶处，都会为其中故事义愤填膺，甚至连罪犯、汉奸之类也未必例外。

这两个方面结合造成的效应就是，许多人在潜意识里总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正义善良的一方，而把自己的对立面放在丑恶卑鄙的一方。

当某人触犯了自己眼前利益的时候，就引发对这个人的仇恨情绪，觉得这个人可恶。但在向别人转述对其人的厌恶情绪时，多半不会直接说是因为他触犯了我的利益，所以才觉得他是个坏蛋云云；而是非要给自己对某人的厌恶蒙上一层公理、正义的面纱，会千方百计罗织种种理由来让别人相信，也让自己相信，之所以厌恶某人是因为此人格格如何糟糕，道德如何低下，对社会，对他人如何有害，总之是个小人、恶棍等等。

现实的人是如此，朝鲜君臣也是如此！从感情上，从基本的是非观念、道德观念上，他们是完完全全站在明朝这一边的，发自内心，真诚无比，所以诸如君臣大义、华夷之辨之类言辞几乎不离嘴边。

但是他们真正放在第一位的始终是他们眼前鼠目寸光的那点利益，如何保住自己的王位、权势啊，如何能够在后金鼻子下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啊。

而毛文龙的存在恰恰破坏了他们千方百计要苟且偷安的企图，由于基本的条件反射，毛文龙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恐惧、痛苦、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来描绘毛文龙呢？

他们会说毛文龙是明朝的忠臣，侠骨丹心，忠肝义胆，因为忠于明朝的利益，所以触犯了我朝鲜君臣的眼前利益，让我们觉得他可厌、可恶云云吗？

当然不会！

朝鲜君臣的短视自私和强烈的道德感、荣誉感结合起来所形成的那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让他们只能扭曲事实，以便在顺应肤浅、自私的心理的同时又兼顾道德虚荣心的要求。

因此他们会竭力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尚的受害者，一个不忘君臣大义、华夷之辨、恪守儒家观念的理想主义者位置；而把自己的对立面千方百计丑化成卑劣无耻之徒，有害于他们的利益，更有害于明朝中国本身。

这种心理保护机制，让他们心灵获得安宁，让他们在窘迫的局势中获得足够的精神安慰。

于是，作为朝鲜君臣眼前利益损害者的毛文龙，无论他的行为本身是如何效忠于明朝，如何披肝沥胆，竭尽心力，舍生忘死，但在朝鲜君臣眼中就注定只能是一个坏蛋，一个自私的、卑劣的、一切都为了自己享受、伪造功劳的恶人，一个小丑！不仅是朝鲜的罪人，更被想象成是明朝的罪人！

因为如果毛文龙不是坏蛋，那朝鲜君臣就只能面对自己是猥琐、怯弱的无能之辈的残酷真相了，而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

既然他们把毛文龙定了性，于是毛文龙的一切作为，在他们戴的有色眼镜作用下，都可以蒙上一层阴暗、邪恶、丑陋的色彩，都是出于某种自私的、不可告人的动机。

其实朝鲜君臣对毛文龙的丑化，和明朝官员对异己的丑化是如出一辙的，从此意义上说他们对毛文龙的丑化和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忠于明朝之间完全是并行不悖、绝无矛盾的。

就比如明朝的官员丑化、攻击张居正的时候，其出发点首先是张居正的考核吏治让他们拘束、难受，张居正在他们眼中变得面目可憎，在这之后，才是援引各种纲常大义、伦理道德，来罗织声讨张居正丑恶卑鄙的罪行。

这些官员在这么做的时候，也同样是真诚的啊，他们确实坚信自己才是忠于朝廷，忠于国家，而张居正则则是奸臣，是小人，自私虚伪，好色贪淫，专横跋扈等等，所以他们才要奋袂而起，不畏强权，大义凛然地来口诛笔伐。

这些明朝官员攻击、丑化张居正的心态和朝鲜君臣攻击、丑化毛文龙的心态其实完全是一样的。

再比如明朝官员对熊廷弼的丑化、攻击，对温体仁的丑化、攻击，对杨嗣昌的丑化、攻击，都是一样的道理。你说这些官员，不忠于明朝么？他们当然忠！你说他们不希望消灭后金吗？他们当然希望。

正因为他们忠于明朝，他们希望平定叛乱，再加上熊廷弼、温体仁、杨嗣昌触犯了他们，所以才要把熊廷弼、温体仁、杨嗣昌丑化、塑造成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消灭叛乱这个目的的奸臣或无能之辈的形象。

朝鲜君臣和一部分明朝官员毫无区别，都是满嘴高调，都是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一大堆，都是动辄用阴暗心理去度量那些真正做实事的人。

既然朝鲜君臣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们自己是站在正义、高尚这一边，是明朝的忠臣；那作为他们厌恶对象的毛文龙在他们心目中当然就是对明朝心怀二心的奸臣。

朝鲜人对毛文龙的厌恶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因为毛文龙袭击后金，怕连累自己的厌恶。然后是看见毛文龙军队装备简陋，条件艰苦，因此就产生鄙视心理，看不起毛文龙游击战的厌恶。最后是迫于压力，长期要在粮饷上资助，负担沉重而产生的厌恶。这三种厌恶，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一层层叠加上去的。

2. 迫切期待毛文龙降金

毛文龙处境之艰苦，军饷之匮乏，武器装备之陋劣，是朝鲜君臣自己就看见的。按他们的想象，毛文龙这样唯利是图的小人早就应该叛明投金，怎么死活就是不投降呢？这让他们奇怪啊。

总算在天启六年六月，他们似乎迎来了一个能满足期望的机会。

当时后金用反间计，收买倪汝听送密揭于朝鲜龟城府使赵时俊处。声称毛文龙要叛明，先攻朝鲜再攻山东。让其把密揭转达给当时来视察毛文龙军队的姜曰广、王梦尹两位明朝官员。朝鲜君臣接到报告之后，真是如获至宝，深信不疑。幸亏当时姜曰广、王梦尹识破诡计，对毛文龙充分信任，才未让后金奸计得逞。

本来事情过后，朝方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不然。他们反而沉溺在自己的想象中不能自拔，如饥似渴地等待毛文龙叛变明朝的消息。在天启六年八月就有一连串这样的关于毛文龙是否要叛明的对话。

八月丁未，朝鲜国王李倧说：“都督投贼，也不知道是早还是晚，但他手下将官生变，似乎已经不远了。”

尚荣说：“都督就算不反叛，他手下数万辽兵没有吃的，难道会坐在那里等着饿死，不去作乱吗？这已经是势所必至了。”

癸丑，备边司又报告说毛文龙在明朝那里不得志，肯定要投降后金，“此必然之势也”。

也就是按照他们的小人之心，既然明朝给毛文龙军队待遇这么差，要啥没啥，毛文龙肯定要叛乱了。

到了丙辰，朝鲜国王再次问他的那些官员，毛文龙情况如何啊？

右议政申钦赶忙回答毛文龙肯定要造反了。

朝鲜国王对这种投合他心意的回答很满意，于是说：“大概他的情形已经全部暴露了，但就是不知道这叛乱之祸到来的快慢如何了？”

申钦说具体快慢不太清楚，按他的估计好像应该很快了。

于是君臣上下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讨论，如何起兵讨伐毛文龙，简

直是被幻想毒害得病人膏肓。

到了八月戊午，朝鲜国王又急不可耐地问张晚：“毛将情形败露已经很久了，而最近西边来的情况报告，人情尤其疑惧，不知道按卿所见，叛乱发动的快慢如何？”

他这里的口气完全是把毛文龙造反当成前提，当成事实了，本来是君臣上下因为短视、自私编造出来的谎言，结果这谎言把他们自己整个都忽悠晕了。

这个张晚估计觉得谎言实在撑不下去了，但看见国王一副迫不及待等毛文龙造反消息的狂热样，也不好直接戳破，只能小心翼翼地泼点冷水：“臣的意思，觉得毛文龙应该没有急着就发动叛乱的道理，金虏虽然强烈要求，但毛不会着急的。毛将在这里，享受的是公侯的快乐，投降奴虏那不过是一个俘虏而已，必定不如李永芳。奴贼也必定知道毛文龙的军队不可用，又岂会一定要毛文龙投降呢？”

这其实就是无耻地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原想说毛文龙要投降后金的谎言在事实面前维持不下去了，就只能说毛文龙就算投降后金，后金也不在意，所以不投降云云。

所谓毛文龙投降了地位还会不如李永芳，更是搞笑，李永芳是不折不扣战败之后被抓的俘虏，而毛文龙带兵投降，后金给他待遇再差，也绝对不可能把他放在李永芳之下。

尽管如此，这个朝鲜国王大抵是被先前他的那些臣下炮制的毛文龙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心怀异志的迷魂汤彻底灌晕了，在他的官员眼看谎话编不圆，要往回收的时候，他还在一根筋似地对毛文龙投金之说执着不放。

在天启六年十月，朝鲜官员想给他们以前编的毛文龙要投金的谎言找个台阶下，就说努尔哈赤死了，形势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都督似无投虏之举矣”！国王李倧听了还不干，说努尔哈赤死了，还有儿子呢，要投降不照样可以投降？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之态。

从上面这一大串朝鲜君臣在心焦地等待怎么毛文龙还不投降后金啊，怎么毛文龙还不投降啊的场景，就可以看出他们这种自私、短

视的同时还要给自己立忠于明朝的牌坊的心态,导致他们拼命地想把自己厌恶的对象放到对明朝不忠的位置上。

这使得他们对毛文龙的认识和评价,完全是扭曲和颠倒的。当这种扭曲的认识在事实面前被撞碎的时候,就产生了颇为滑稽的情形。

急切地等待毛文龙叛乱,结果死活等不来,于是就拼命寻找理由来给自己找台阶下,而对于昏庸又一根筋的朝鲜国王来说,甚至台阶都不愿意找,就宁可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等不来就继续等,似乎希望总有一天,毛文龙投金了,能满足他的期望。

可惜很快,事实彻底把朝鲜君臣编造的谎言最后一点的遮羞布都扯下去了。天启七年,后金进攻朝鲜,目的就是要抓住毛文龙,这回朝鲜人无法再继续自欺欺人下去了。

正月辛卯,一个官员李植明确告诉国王说“毛将存没虽未闻知,其不与奴通明矣”。

这场朝鲜君臣为了丑化自己的厌恶对象,而不惜整体陷入幻想中的闹剧到这里才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第九章

毛文龙究竟是啥样人

对毛文龙的评价无非三种：

第一种，一个混混，侥幸占据皮岛，横行不法，早晚投降后金，袁崇焕把他杀了是为国除害。

第二种，有一定能力，对后金有牵制，但私心重，野心大。利用好可以成为明朝帮手；利用不好，可能倒向后金。袁崇焕擅自杀了他确实不对，因此伏诛也是袁罪有应得。但是不能因此不切实际抬高毛文龙，他最多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郑芝龙。

第三种评价，毛文龙是一个赤胆忠心，舍生忘死，为国事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不幸被冤杀的英雄，杀毛文龙的袁崇焕虽万死也不足以赎其罪！

这三种评价，哪一种更接近真相？

我曾经认为这最后一种是最荒唐的，但看了足够多的资料后，却发现这看似最荒唐的评价反倒是最接近历史本来面目。

一、引用原始资料的另类小说《辽海丹忠录》

记述毛文龙生平经历的史料，大致上有如下几种：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辽海丹忠录》,《毛总戎墓志铭》,《毛太保公传》,《明季北略》,《石匱书·石匱书后集》等等。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是毛文龙自己写的,《辽海丹忠录》是崇祯时期陆云龙撰写的,《毛总戎墓志铭》、《毛太保公传》、《石匱书·石匱书后集》中的毛文龙列传等都是入清以后的人编写,《明季北略》关于毛文龙生平的描述据说主要来自于明人写的《镇海春秋》。

这里有必要对《辽海丹忠录》特别说一下,这本书一方面对毛文龙热烈歌颂,另一方面批着一层章回体小说的外衣。因此被许多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但如果你真的看过关于毛文龙的大量史料,并认真看过《辽海丹忠录》这本书,你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比起大部分自命为史书的著作,对历史事件的忠实程度更高,写作态度也更为严肃,议论也更为客观。

《辽海丹忠录》的特点是其记述的事件,都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甚至直接原文摘录许多明朝官员、将领的奏疏、塘报,凡是《明实录》和后来的《崇祯长编》里有的奏疏,都经得起对照。尤其可贵的是它还保存了许多被实录、长编省略不载的档案,不得不说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其原始资料所占比例之高,远远大于其他以史书自命的著作。大部分情况下,一个章节就是围绕着一份奏疏、塘报中的内容来展开的。

而且作者议论平实,态度严谨,基本是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比如对袁崇焕的评价,虽然作者立场是赞扬毛文龙,但却并没有因此刻意去丑化袁崇焕,也没有采纳袁崇焕与后金勾结杀毛一说(主要是作者毕竟无法见到《满文老档》中袁崇焕和后金的书信往来,更不必说分析其中的蹊跷、暧昧了),相反承认袁崇焕的功绩,指出他的错误,但也有宽谅之辞。

如果《辽海丹忠录》是小说的话,那估计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都是比小说还小说了。毕竟许多史书里所谓的列传,往往是不提

供任何出处,说什么就是什么,并且同样掺杂了大量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这和《辽海丹忠录》一切叙事和议论都建立在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相比,反而要差一个档次。

有些人拿一些章节里提到的温元帅显灵、海神显灵帮助毛文龙捉拿内奸以及脱困的例子,以此嘲笑、贬低这本书的史料价值。这是不能成立的,此类记载本身来自于毛文龙自己写给皇帝的奏疏,而且这些不过是在古代很常见的鼓舞人心的手段。

如果因此否定其价值,那正史里描绘帝皇降生时的神异景象,神仙托梦,“红光满室”岂非更荒诞不经了?

甚至《辽海丹忠录》的作者陆云龙自己就明确指出了“温帅之事,有无未可知。但形诸奏章,或亦田单拜小卒为神师之意,军中不厌诞也”。

也即温元帅显灵之类的事情,作者并不认为一定是真的。但他指出毛文龙之所以要把这宣传为事实,并且记录在奏章里,呈报给政府,用政府的权威来宣扬、认可这些神迹,实际上是类似古代“田单拜小卒为神师”,就是一种鼓舞、团结军心的策略。

作为现代人来说,我们当然可以不屑一顾,但是古代大量的下层人民和士兵,是相当迷信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事,陈胜、吴广用鱼肚子里塞字、狐狸叫人声煽动人心之类手段,史不绝书。就是一直到近代太平天国起义,领导者仍旧大量使用装神弄鬼的手段。

毛文龙在敌后开辟根据地,招徕、聚集大批辽东难民,本身就势处孤危,时刻在危险中搏击,如何聚拢人心,就成了最迫切的问题,稍有差池就可能是类似以前明军在辽东一样的情况,人心涣散,内奸作祟,导致全盘崩溃。

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可以用来鼓舞人心、笼络士兵的手段,被毛文龙拿来应用都是无可非议的。

而陆云龙不过是在《辽海丹忠录》里如实记述,并且指出这是“军中不厌诞”,这是许多所谓正经史书都没有做到的,恰恰反映了他

对事实的高度忠实性。

我前面就引用过孙承宗的话：“文吏不达时势，好用小见解，沾沾将吏之上，能令将吏羁弄而不得展。凡将吏所以御士卒，而得其死力者，讲说或足为笑，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统武，自是弊法。”

毛的部分属下改姓是这个道理，毛文龙宣称温元帅、天妃娘娘显灵之类，也同样是属于这种情况。

某些人以此来嘲笑毛文龙。嘲笑《辽海丹忠录》的人，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迂腐无知。

二、从杭州子弟到边疆军人

毛文龙的祖籍是山西大平，万历四年（1570年）出生于浙江钱塘（就是现在杭州境内），祖父是盐商。九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和母亲投靠舅舅。他的舅舅沈光祚是万历乙未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做过兵部主事，后来又担任过山东的官员以及顺天府尹。

毛文龙青少年时代在浙江度过，读过一段时间书，但厌倦科举，对兵法、军事更感兴趣。在三十岁的时候主动到辽东参军，据他自己在给崇祯的上奏中说，他的伯父毛得春“实授海州卫百户世袭”，伯父没有儿子，所谓“推昭及穆”，他就继承了这个职位。

明代晚期卫所制度已经废弛不堪，世袭之类不过流于空文，愿意继承那就继承，不愿意继承的话，也没人来管你。以此来看，毛文龙投身军旅，而且是到艰苦的东北，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

因为沈光祚的不断推荐，再加上毛文龙表现出色，他先是在李成梁手下“补内丁千总”，后考武举名列前茅，又升辽阳千总，升守备，天启初年，因制火药得力，又加游击衔。到王化贞主管辽事时，为练兵游击。不久王化贞派遣毛文龙带领一百九十多人，深入敌后。

接下来就是《明史》中关于毛文龙的记载了：“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将。”受到明政府

嘉奖，任总兵，镇守皮岛，形成对后金的牵制局面。

但是张岱的《石匱书后集·毛文龙列传》中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毛文龙“少无赖，有口才”，靠给人看相算命在杭州谋生。然后张岱也不写原因，说毛文龙从杭州跑到了京城，也没有什么好运气（“碌碌无所遇”），又“走边塞，潦倒行伍者二十余年”。

张岱的记叙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没有提到毛文龙的舅父是中进士的沈光祚，第二也没有解释毛文龙到北方参军的原因。似乎就是描绘了一副毛文龙在杭州落魄潦倒，混不下去了，又到北京去，还是混不下去，于是再到边塞当兵但依旧是潦倒二十年。

但张的说法经不住考辨。记叙毛文龙舅父为沈光祚的史料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出现，而且不止一个。崇祯时期，各相关人员都还在人世，类似这类记叙既无虚构的必要，也无虚构的可能。

在《两朝从信录》里有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辽东经略王在晋的旌苦节疏，它直接引用了毛文龙关于自己身世的奏疏，其中明确提到毛文龙母舅是当时的顺天府尹沈光祚。

王在晋在评论里也说道：“看得毛文龙之母沈氏，青年守节，臣宦浙多年，业闻其概。”

所以毛文龙的身世背景，并非道听途说而来，而是有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官方档案文件作为根据。

而且毛文龙舅父为沈光祚还有旁证，那就是毛奇龄本身就认识沈家后人，他对毛文龙身世的记载并非是辗转抄袭自其他书籍。根据罗振玉给毛奇龄《毛总戎墓志铭》写的后记，毛奇龄写过一篇名为“志圆尼师抄化斋粮序”的文章，其中提到“志圆俗姓沈氏，予尝为家太保题墓门之碑，疏所自出，叹其舅氏京兆公为明熹宗朝名臣，当时称杭州甲族以沈为最”。

反观张岱在明亡后写的《毛文龙列传》中却完全不提毛文龙的家族关系，却又不对其他记载做出反驳澄清，显然其记述既无档案材料做支撑，甚至同时期的相关史书都未必过目，纯粹是道听途说，再加以自己胡乱臆测而来。

其所谓毛文龙在杭州混不下去,在北京也混不下去,然后才到边塞当兵,总之是一个穷困潦倒,到处碰壁混不下去的人,显得更为虚假。

要知道当时南方经济富裕、繁荣远胜北方,如果毛文龙是个木讷、迟钝、不善交际的人,所说倒还有可能,可偏偏张岱承认毛文龙“有口才”!

这样一个机灵人,偏偏离开遍地都是财富,遍地都是机会,生活舒适得多的南方,反而要跑到贫瘠、穷困得多的北方去。以至最后要到条件极端艰苦随时都要冒着掉脑袋风险的边塞去当兵!这是根本难以自圆其说的。

张岱原系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虽明亡后痛改前非,颇见气节,但其见识议论,终究隘滞、迂腐,对史事之考据也粗陋不经。

以上所论由其所撰之《毛文龙列传》就可见一斑。纵观全文,他完全没有看过《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等原始资料,许多记叙、议论都是停留在转引其他记载或者道听途说以及想当然的层面上。从这点看,其史料价值比号称小说的《辽海丹忠录》还远不如。

甚至文末以听说毛在皮岛急切搜寻邸报为理由,得出结论说毛文龙因距后金太远,靠编造消息蒙骗朝廷,为怕与邸报矛盾所以才要搜寻邸报。其议论之荒诞一至于此!也不想想文件往来时间,如果要靠获取邸报再来编造,那黄花菜都凉了!本来是毛文龙勤于国事,知己知彼的表现,居然能被他如此曲解!

以上是对毛文龙身世背景的一点澄清辨析。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关于毛文龙的文化水平。

在大部分人印象中,毛文龙应该是个不通文墨的军阀武人。但看一下《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毛文龙写的奏疏,可以说他的文化修养相当高,描物叙事、抒情议论,引经据典,都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说比现在大部分的中文系教授高得多也不夸张。

或有人认为是代写,但从这些奏本、塘报内容来看,其文生气勃勃,感情充沛,完全不是那种代写公文所具有的死板套路。有许多议

论感慨，甚至直接对皇帝的质问，是只有毛文龙本人才可能发出的。

《表忠录》中说毛文龙“为文敏而明白”，有时候幕僚替他起草奏疏，涉及高官的地方往往粉饰、支离以免得罪，毛文龙看了不满意，说大丈夫以死报国，何必怕这些人，就自己动手改成直抒胸臆的文字。

从其他一些史料来看，毛文龙也确实完全具备亲自写塘报、奏疏的素质、条件。毛奇龄写的《毛总戎墓志铭》中说毛文龙小时候受过一般儒生的教育，只不过后来厌弃为应试的读书，才放弃科举。

《辽海丹忠录》中说他“年少也有志功名，博习百家，只是运蹇，这两句文字，屡试有司，不得进取。一日喟然叹道：‘丈夫当取功名如拾芥，怎年纪三十，困于名场！’便抛却书卷，习骑射，也百发百中，又系书生，心极灵巧，理极透彻，所以武经将略，一览无遗，便有志边防”。

考虑到明代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普及、发达程度，这些记述是完全可信的。

张岱在《夜航船》序中曾经提到南方一些地区，“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到了二十岁读书无成，才从事其他行业。按他的说法，连从事手工业的工匠，都能烂熟《性理》、《纲鉴》，随便问到什么事情，人名、官爵、年号、地方都能如数家珍，很少有错误，“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

虽然他记叙的只是部分地区的情况，但也可以想见明代南方地区文化教育普及、发达的程度。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毛文龙虽然没有走科举仕途，但依旧可以达到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是不成问题的。

在朝鲜人李肯翊编集的《燃藜室记述》中还收录了毛文龙作的一首诗：

孤臣白发映寒旌，一上秋风海上城。
霜拂铁衣银浪动，电开金匣玉龙惊。
三更月冷将军幕，万灶烟沉壮士营。

塞曲数声人尽泪，萧萧边马皆悲鸣。

朝鲜人对毛文龙的厌恶之情，前文已经备述，《燃藜室记述》提到毛文龙处也是极尽丑诋、贬损之能事，当然不会移花接木，把别人诗作放到毛文龙名下给他贴金，所以这首诗为毛文龙所作当无疑问。

我们虽不懂诗，但一读之下，其意境之苍凉豪迈，扑面而来。没有足够高的文化修养，是写不出这样的诗作的。

三、奇特的选择

从毛文龙的身世经历，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出生成长于浙江杭州，也就是江南最繁华的地区，又有官员背景的亲戚，但却偏偏请缨从军，到最艰苦的东北边疆，从低级军官开始做起。

明代中晚期的江南苏杭一带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其奢糜的程度即便在现在的人看来也是叹为观止的。王锜在成化年间所见苏州之繁华就已经让人目不暇接。

其中提到的景象“閭閻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叠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让现在的人想见明代苏、杭等地的繁华盛况，都心驰神往。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描绘的崇祯年间西湖香市的盛况也让人眼花缭乱：“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泽芹，不胜其合香茝萸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欲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

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在这个地区生活的人几乎都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生活舒适、奢靡的程度比之现在的大都市北京、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一般情理，大部分人总是希望能从贫穷艰苦的地方到富裕、繁荣的地方生活，就如现在而言，外地学生到北京、上海之类大城市读书，总希望毕业后能留在这些大城市里，除非没有办法，才回到相对艰苦、落后的小城市或边远地区。现代是如此，在古代也必然是如此。

但毛文龙，却和大部分人反其道而行。别人是巴不得在杭州之类繁华之地生活，而他却主动从杭州到辽东等边疆苦寒之地去当下级军官。

是他在杭州或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呆不下去么？显然不成立！

他本身有官员的亲戚做靠山，论关系、论门路已经和一般平民不同。论头脑的机灵聪明，更是远胜庸常之人，否则也不会有后来在辽东的表现。像他这样的人又不缺乏闯荡、冒险的精神，口才又好。以这样的素质，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无论做什么，就算随便经商，都不愁发达。

但毛文龙偏偏没有选择留在南方，这用通常的追逐利益的逻辑是解释不通的，用所谓野心、权力欲更解释不通。

明代武官的地位相当低下，要靠做军官出人头地，这个概率比中彩票还要低，更不必说还是提着脑袋的营生。要真想靠投机、冒险来搏一下，选择在南方做海盗，都比北上辽东去做低级军官把握大得多。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志趣！也就是为国效力的志向，以及从事军事的兴趣，才决定了毛文龙的选择。舍此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能自圆其说的解释。

四、赤胆忠心毛文龙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到人间，被宙斯锁在高山之上，派大鹰来啄食他的内脏，这是广为人知的故事。

不过鲁迅说在非洲某部落，同样有一个从天上窃火的神话，但对这个窃火者的处罚却不是公开地锁在高山之巅了，而是“秘密将他锁在暗黑的地窖子里，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而是蚊子、跳蚤、臭虫，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的皮肤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角色，嗡嗡的叫，拼命的吸吮，一面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毛文龙的境遇就类似于此！

作为《满文老档》里提及名字次数最多，最让后金统治者头疼的明方将领，到了清朝修的《明史》里，却连一个独立的传都没有，仅仅是附在《袁崇焕传》里提一下。

他生前死后，被扣上一连串的罪名，说他“糜饷冒功，牵制虚套”，说他“贪财好色，浮夸骄恣”，说他“侵盗军粮，残害岛民，劫掠商人”，说他“拜魏忠贤为父”，直至说他“通敌叛国”。

在毛文龙身上，我们能生动地见识到诸如“三人成虎”，“积毁销骨”，“众口铄金”这些成语真切到什么程度，可以看到黑白颠倒到什么程度，是非可以混淆到什么程度。

毛文龙生前备尝艰辛，苦心竭力为国效忠，死后还要遭受铺天盖地的污蔑，精神上凌迟毁灭的酷刑。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在无数人须眉开动、唇齿奋扬、唾沫横飞中，毛文龙终于成了只配受到鄙夷、唾弃的“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对于横加在毛文龙头上的污蔑、诋毁，前文已经做了尽情驳斥。现在该是还毛文龙真豪杰、伟丈夫的本来面目之时了！

也许大部分人无法做到宁愿自己肝脑涂地，死于非命，甚至饱受

误解谩骂，却依旧不改其志，忠诚不二地为国效力，但这样的人却是真实存在的。而毛文龙就是这样的人！

张居正说过一句话：“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毛文龙却是个反例！

他生长于富贵之乡，却奔赴苦寒之地。在一溃千里，人皆逃亡之时，他反逆流而上，以二百人之孤军，袭镇江，擒敌酋。为人之所不能为，不敢为！

别人都要躲到安全的地方去，而他却主动要跑到险地，死地去。蹈大海，涉风波，开辟东江抗金基地。

别人对剃头辽民，厌惧之，怀疑之，他却收容、整编成军队。

别人对后金畏之如虎，只敢修城守城，他却年年主动袭扰，让金兵疲于应付。

别人或者裁兵以取媚文官，或者除了依赖朝廷军饷外一筹莫展，而他能招徕商贾，解决部分军费问题。

别人只能成天担心后金的奸细，而对后金的行动完全两眼抹黑，侦探敌情只能靠送喇嘛、送公开的使者过去，而他能让后金成天恐惧害怕毛文龙奸细，能对后金行动了如指掌。

别人眼睛只盯着自己这块地盘，而他除了操心东江，还在不断反复提醒朝廷要注意蓟镇防线，甚至帮他们出主意、动脑筋！

没有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没有为国效忠的慷慨气节，没有襟怀坦荡的大智大勇，那就不可能有毛文龙的作为！

东江初期，朝鲜人的记载说毛文龙“所率兵士不满数百，其余皆剃头归附之人”。

毛文龙所率的这支队伍，从一开始的时候，连军队都算不上，他却要老虎头上拔毛，去打后金。正规明军都不敢做的事情，他敢做，难怪朝鲜要吓得觳觫发抖，哀叹“毛将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

换了任何一个稍有私心，稍微把自己性命当一回事情的人，在这种处境之下，早就吓得尿裤子了！

袁崇焕所谓的“以辽人守辽土”不过是依靠那些还没有被后金统治,没有剃过头的辽人而已。而毛文龙则是真正依靠敌占区逃亡出来剃过头的辽人,在有些人看来这或许不算什么,在当时,这实际上等于把半条性命送进阎王殿里了。

已经剃头的辽人能信任吗?后金数次攻城略地,几乎都是靠辽人将官内应献城,接替熊廷弼的袁应泰就是死在这上面,王化贞也是败在这上面。

傻瓜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毛文龙会不知道?

当时朝鲜人就反复提醒他,剃头辽民,反复无常,收容他们,太危险了,而且已经有情报说一个叫邓复禹的要谋害他了,毛文龙是怎么说的?

“俺既以身许国,死生存亡,付之于天。事成则天下之幸也;不成,则天下之不幸也。辽民之不信,俺亦已知。俺若为身谋,只欲保身,则岂能留滞至今,与此辈同事?此辈亦日倡绑送之言?俺亦不言,一点丹心有如皎日。”

一句“俺若为身谋,只欲保身,则岂能留滞至今”把毛文龙膏斧锷而不悔,为国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侠骨如铁的品格尽显无疑!

确实,换了一个保命第一的人,在这样的处境下,估计成天就在担心害怕这些剃头辽民什么时候绑了自己送给后金,别的事情都不必做了,还是赶紧逃回明朝本土去算了。

是的,辽民反复,不可信,毛文龙知道。但明知道危险,他还是去这么做,只因为唯有这样,才是消灭后金的捷径。成功了,是天下的幸运;不成功,就是天下的不幸。而自己的生死毁誉,毛文龙早就没考虑了!

到了皮岛开镇之后,安顿几十万人的生活,选拔训练军队,组织对后金的侦探策反,派兵前去袭击,设法通商,挟制、监督朝鲜等等,按现在的话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情报工作等,毛文龙全都挑在身上,千头万绪,极尽艰辛。

东江群岛不是什么天堂、福地,而是气候严寒、风波险恶、物资奇

缺的地方，军民始终处于极惨、极苦之境地，没有顽强的毅力，坚定的决心，不要说八年，就是一年都不可能坚持下去。在毛文龙被害之后，岛上接连出现内讧，将领相互残杀乃至叛变、投敌也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岛上物质的缺乏，粮饷的缺乏，毛文龙给朝廷的奏疏屡屡提到。岛上诸如牛皮、油、麻、钉、铁筋、鳔、箭杆、翎毛、盔甲、器械、三眼枪、大炮、黑矾、硝磺等等物资都要靠内地供应。朝廷给发的粮饷又常常拖延不至，也只能向商人去借。将士擒斩有功，要犒赏，如果按照边镇惯例，又至少要几十万的金钱，毛文龙给朝廷省下无数银两，却还被冤枉说是冒滥。而解送到皮岛的军火器械，大部分都是在仓库了放了很长时间，生锈不中用的，还有一试用就爆炸的，需要用两三件合并改造成一件的等等。

然而在有些人看来，毛文龙在东江是做海外天子，是在享福。我们应该客气地问一下他们，福是这么享的吗？让他们去享享毛文龙的福如何？

毛文龙管理的东江军民，人数常年在几十万左右，现在一个公司、企业经理，在太平世界里，衣食无忧，管个几百人就要焦头烂额了。

而毛文龙在强敌窥伺，饥寒交迫，毁谤纷至的环境下，要管理几十万人，而且这几十万人还不是普通人，是历经鬼门关，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亡命之徒！

不仅是简单的管理维持，还要不断训练、组织队伍，要派遣间谍去敌占区侦探，要不时出兵和后金血战，要随时策应收容后金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要不断把敌方情况、朝方情况、岛上军民情况、作战建议方略写成塘报、奏疏呈报给朝廷，要对各种信息，军饷数字，地理形势，属下将士功绩、过错都了如指掌。

别的不说，光是源源不断派遣间谍去刺探情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孙子兵法》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

也”。

派人潜入到后金去刺探情报，去离间后金将领、官员，这本身就是把人送到敌方的嘴巴里去。

那首先所派的人要有赴死的决心，还要求你能信任他，你要有知人之明，你要能让对方心甘情愿为你所驱使。否则你不信任他，你敢派他到后金地盘去吗？你没有知人之明，所派的人，结果反成了为敌人去送情报。你如果不能让对方为你赴死，那让他去执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任务，不是等于让他去叛变么？

更何况，到后金去当间谍，还要加一条，就是要剃头，这对把头发视为荣辱相关，视为身体发肤不可轻易毁损的明方和朝鲜人员来说，就相当于在身体上打下耻辱的烙印，谁能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还要蒙受耻辱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袁崇焕在派遣间谍去后金刺探情报上，是完全的无能，他最主要的刺探对方情报的方式就是派遣喇嘛，派遣使者过去，然后让后金给他看想让他看到的东西，还得意洋洋，不以为耻地认为这是自己刺探情报的高招。

朝鲜人探听后金的情况，也是如出一辙，同样是派使者过去，然后了解到一些后金愿意给他们了解的东西，就欢喜地回来给国王报告，还认为收获不小。

而毛文龙和他们相比，真如巨人和侏儒之比。毛文龙派遣到后金的间谍不是一个两个，甚至不是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个，从后金的《满文老档》以及内阁大库残留档案后金方的记载来看，简直遍地都是毛文龙的奸细，以至让后金的统治者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心惊胆战，疑神疑鬼的地步。

毛文龙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并非是他有什么高官厚禄，黄金白银来赏赐给那些前往后金刺探情报的义士，而只能是他能用自己的忠肝义胆去带动别人，用自己的鞠躬尽瘁感染别人，用自己的磊落心胸让别人甘愿性命相托，他能和千万惨苦至极的剃头辽人肝胆相照，同甘共苦，所以能让他们不惮生死，前仆后继去后金统治区刺探情报，

传送策反书信。

而策划组织人员到敌占区刺探情报，还仅仅是毛文龙工作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则毛文龙坐镇东江时，其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有些人还以为毛文龙在皮岛上享乐，只能说这些人是毫无心肝可言。

毛文龙率领的东江军队处境之恶劣，已经不能用困难、艰苦这些词来形容，说成是炼狱，是绝境都难以形容一二。无论是朝鲜的《李朝实录》，后金的《满文老档》，都随处可见毛兵饿死，僵尸相枕，白骨遍地，甚至吃死人等惨不忍睹的记载。

毛文龙在自己的塘报里也对东江的处境描绘过，天启七年（1927年）的时候说：“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内地尚作观望，恬不忧愁。”

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的时候又说：“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止，臣亦何苦恋此绝岛，而招人污蔑之毁也。”

换了任何其他人来领导这样一支队伍，早就彻底崩溃了，完蛋了。对比一下被重点照顾的宁远明军，在崇祯初年，粮饷是充足的，也就是肚子能够吃饱，但仅仅是饷银拖欠，结果就发生了兵变，逼得辽东巡抚毕自肃上吊自杀。

而毛文龙呢，在如地狱一样恐怖的条件，还是千方百计设法维持了下去。袁崇焕和朝鲜人污蔑毛文龙，说什么他侵盗军饷，军民怨恨。如果按照常理来说，岛上军民确实有一万个理由来怨恨毛文龙，你作为军队主帅，让我们处在饿死边缘，能不怨恨吗？

可实际上又如何？岛上大部分人非但不怨恨毛文龙，反而真心实意地追随他，拥戴他。当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之后，岛上军民是一个什么反应呢？是不是祸害被除，苦难得脱，重见天日，欢喜雀跃，喜笑颜开呢？

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道，崇祯二年六月

癸未，金时让驰启曰“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椴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

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流泪了，朝鲜人是厌恶毛文龙的，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这个事实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一两个人哭，按他们的心态，甚至提都不会提一下，更不可能记进实录，可见当时岛上的景象是军民哭成一片。

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啊，要知道他们在毛文龙的率领下，不像在袁崇焕那里可以领到充足的军饷，可以衣食无忧，他们过的是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吃草根，吃树皮都是家常便饭，饿着肚皮还要不断出去打仗的苦日子。

这里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毛文龙让这些辽东军民感动的不是他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物质利益，而正是他精忠报国的人格，他的侠肝义胆。

毛文龙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曾经说过：“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

“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这就是“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的原因。

“大义”和“良心”在许多人那里是贬值了的字眼，是一文不值的东西，是毫无用处的空头支票，而在毛文龙那里，却成了真真实实，让无数辽民死心塌地追随他、在近于绝境的条件下去杀敌的动力。毛文龙不能给这些辽东军民金钱，不能给他们荣华富贵，甚至连让他们吃饱肚子都做不到，能给他们的只有“大义”和“良心”。

而他之所以能用大义和良心来感召这些将卒、士兵，恰恰是他自己以身作则，和士兵同甘共苦的结果。

为了维持东江这一支力量，他宵衣旰食，焦心劳思，苦心殚力，像讨饭一样地为了军饷到处索要，朝鲜厌恶他，明朝那些一听要军饷就头疼的官员也厌恶他。再加上后金仇恨他，关宁的明方将领、官员忌

恨他。

难道毛文龙不知道自己这么苦心操持，是在蒙嫌树怨，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吗？

不，他知道得很清楚！

他在自己被袁崇焕杀害前的一个月不到的时候，有一份奏疏，内容大意是：诸位大臣官员成天想的就是要如何除掉我，就是不考虑如何收复江山。为发泄私愤，不惜同室操戈，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屡次上疏直言，不是不知道得罪在朝官员，只会让自己更快丢掉性命。但我一心想的是国家边防比自己这条性命更重要，所以不得不频频上疏呼吁。昨天看到王廷试的书信，得知粮饷又没有着落，难道十多万的生灵，就因为我一个人就全部断送掉吗？我又怎么能忍心坐视？

毛文龙的这些话，从里到外透着一股寒气和悲凉。

屡次上疏，得罪袁崇焕等人，无异是在加速自己走向死亡的命运，毛文龙心里对这点是很清楚的。

《表忠录》中记载他在被袁崇焕杀害前曾经写给回杭州的妻子一封书信诀别，其中说“外有强敌而内有公卿，必死不久”。

既然知道这一点，那他为什么非要呆在东江呢，为什么还要去袁崇焕那里送死呢？

其原因无非就是“岂舍十余万生灵，因职一人而并毙之”？无非就是他念念不忘要恢复辽地，无非是他清楚地知道一旦东江这支力量溃散，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无非是他还抱着一丝侥幸，认为袁崇焕尚不至于卑劣到自相残杀的地步。

天启七年的时候，他说：我只知道精忠报国，绝不肯偷生自免。又恐关门指日动胡笳之咽，而登、津、淮、扬等地不久后就成饮马之窟矣。请求速发粮饷，救济孤单，社稷幸甚！

在崇祯元年五月的奏疏中，他说：辽人向来没有定性，奴隶一旦用计谋来引诱，臣解衣推食，费尽心力招抚来的众人，难道忍心让他们兽奔鸟散吗？等到了溃散的时候，料想那些言官必定又要把这当

成是一条罪状加在我的头上了！

在崇祯二年四月的塘报中，他又说“职之死战死守，必尽厥职，唯恐东江破，属国口（叛），而逆虏长驱，封疆岂忍言哉”。

这都是沥血拄泪之语，然而在当时的一些明朝官员，尤其是袁崇焕之类昏聩已极的人看来，毛文龙无非是在危言耸听，夸大自己的作用。

不幸的是，毛文龙被害后，他说的这些话，一言中。在他死后仅仅四个月不到，“关门动胡笳之咽”就成为了事实，而后来登、津、淮、扬成饮马之窟也终于一语成谶。至于“东江破，属国口（叛），而逆虏长驱”，当然就更是他死后的现实了。

而毛文龙花费无数心血招抚来的辽东士兵、将领，在他死后不到几年时间里，叛乱的叛乱，逃亡的逃亡，内江的内江，类似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这些原东江将领叛变被金国封王，更成了一些论者嘴里毛文龙的罪状了。

毛文龙这一片苦心，在当时除了天启皇帝、崇祯皇帝以及类似徐尔一等少数官员能够理解之外，其他人都当成儿戏了。

我们不知道当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之时，究竟是什么感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一定心寒如冰。

袁崇焕加于他头上的那些罪名，没有一个不是他在奏疏里详尽驳斥过的。袁崇焕所谓的十二大罪基本上就是杨国栋奏疏里十大罪的翻版，而对杨国栋的污蔑，毛文龙已经是将之驳斥得体无完肤了。

《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荃，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

朱溶说：“余行海内自少壮至老，感毛将军文龙事，作传一篇，轶事状一；其犹未尽者，书于左方，又赋诗一篇，统名曰《表忠录》。或曰子作《忠义录》，述明末诸公，卒不及将军，而别为一书曰表忠，何谓？曰：将军之心，本与诸君子同，然今世人言及诸君子皆知敬慕之，将军

之忠精，鉴之者惟独皇天耳！不可不表而出之也，故越表忠也。”

陆云龙说的“以忠遭疑，以忠得忌”，朱溶说的“将军之忠精，鉴之者惟独皇天耳！”，其中包含了几多愤懑，几多不平？

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

在崇祯二年的时候又说：“一命危于朝露，每自譬于林畔一日七战，今又多活数年，即死亦瞑目矣。”

毛文龙自己是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毁誉置之度外。可是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来说，却实在心有未甘！

难道毛文龙的耿耿丹忠，只能落得一个晦昧不见白于后世的下场？难道英雄被践踏、诋毁，烈士被唾弃、侮辱，小人被歌颂、赞扬，屠夫被尊崇、膜拜，就是注定的宿命？

或许可以告慰毛文龙在天之灵一二的是，在明朝的时候，虽然议论纷纷，但是非黑白大致已定。前有徐尔一为毛文龙申辩疏一千二百言痛驳攻击毛文龙的谰言，后有陆云龙《辽海丹忠录》依据第一手史料，详尽述评毛文龙忠烈事迹。即便到了清初，则计六奇之《明季北略》，谈迁之《国榷》，虽辗转引用他书，并依旧对毛文龙有诸多误解，但亦可见当时之人心舆论所向。至如毛奇龄之《毛总戎墓志铭》，朱溶之《表忠录》更于原始史料之基础上，采访毛文龙之亲属，“求访长老及难死者子孙与故吏退卒”，此时诸人虽不能见《满文老档》，但也足以澄清事实真相，表彰毛文龙之侠肝义胆，忠烈慷慨。

但是到了清修《明史》完毕，再到乾隆把袁崇焕树立为供人膜拜之偶像后，事情发生了彻底的转折。

作为袁崇焕对立面的毛文龙被一批一批的御用文人和奴才前仆后继地加以丑化。原先在明朝就已经被澄清、被驳斥的一些问题，又被当成罪名扣在毛文龙头上。到现在，成了是非全颠倒，黑白更混淆，出现了以鸱枭笑凤凰，执螳螂嘲龟龙的荒诞局面。

罪有应得、误国害民的袁崇焕被吹捧成了英雄，成了抹黑崇祯皇帝的工具！而毛文龙则被践踏、侮辱、丑化得不成样子。朱溶当年为

澄清真相，还毛文龙清白的《表忠录》都成了难以一见的奇货了。

此种情形真可以令英灵诉天，怨气结地！

当年陆云龙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公论日久自明，故有一时沉埋，后来渐雪；一时快意，日后反误国误身。虽曰报复循环，天理必然，还也见人谋不臧，害人自害，把自己的失着，越显得他人的有功，使人见他的起手，不见他收场。正如陈眉公说的，神龙见首不见尾，英雄不见结局，令人想他，慕他，悼他，惜他。”却不知道如果起他于地下，看看现在的舆论，又会做何感想？

结 语

毛文龙的悲剧和明朝灭亡的原因

过去读明末历史的时候,总是会想如果有岳飞、戚继光这样的人来,就会如何如何。可是随着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就逐渐明白,就算岳飞、戚继光真的到明末,他们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第二个毛文龙、第三个毛文龙,更大的可能是连毛文龙都不如。

我们读到历史上岳家军、戚家军的事迹的时候,总是感佩于其军纪如何严明,战斗力如何强悍,可是往往忘记了这一切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他们至少要有足够的军饷,让士兵不至于被饿死,有足够精良的器械让士兵来与敌人厮杀。

可是这样的条件,在毛文龙那里,却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军饷不足,让军队维持生存不发生变乱都成了极其困难的事情。

当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艰苦的绝境下,毛文龙居然还能殚精竭虑,用各种办法来维持住东江的力量,并且对后金起到了重大牵制作用,这不仅需要军事上的天才,同样需要经济和人事管理上的天才。

但是常年索要军饷让他成了众多文官厌恶的对象,不断向朝鲜索要粮食供给让他成了朝鲜官民的眼中钉,用通商等自力更生的办法解决部分军饷又招来袁崇焕等人的猜忌心理。这最终把他推上了

死亡之路。

明末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一个字:钱!

如果明朝政府有钱,那毛文龙或许真的是无关紧要的,有他可以,没他可以,甚至无论怎么打都是赢。

杨镐可以赢,如果不是朝廷众多官员为省钱不断催促,导致仓促出兵,那努尔哈赤不过是瓮中之鳖。或者有足够的军饷,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征剿,每路都保证足够的压倒性数量优势,那努尔哈赤再蹦跶,照样是死路一条。

袁应泰和王化贞可以赢,辽东明军之所以不断有内奸叛乱,投敌献城,其根源就在于长年军饷不足,官兵待遇低下,生活苦不堪言。有足够的军饷,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守城也好,进攻也好都不是问题,努尔哈赤仍旧是死路一条。

甚至连袁崇焕这样毫无军事头脑,只知道修城守城的人也可以赢。就用最笨的办法,一个城一个城地修过去,每个城都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和粮食,长城防线也有足够的军饷支撑重兵把守。那后金也确实就是笼中困兽,只能慢慢被困死。

至于孙承宗和熊廷弼当然就更可以赢了。

但问题是明朝政府没钱,动不动就发不出军饷,朝廷中的文官成天喊的就是要裁兵、裁兵。财政支出经常就是顾得了东,顾不了西,割肉补疮,拆东墙补西墙。

这时候毛文龙的存在就提供了一种在军饷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用最省钱的办法战胜后金的可能性。确实东江军队处于极端艰苦的条件之下,确实毛文龙自己也不断上疏叫苦连天,但只要有毛文龙在,他以自己的品格和才能,仍旧能把东江维持下去。

明朝政府方面确实是苦,而后金这方面其实更苦,辽民反抗几无休日,要以区区一个辽东,灾害连年不断之时,常年维持十万有战斗力的军队,谈何容易。即便在充满遮掩和粉饰的《满文老档》里,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时候,都有后金统治区饥寒交加,为了免于饿死,人吃人的记录。

《满文老档》说当时后金统治区内一斗粮食要八两银子，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银两虽多，但没地方进行贸易，物价腾贵。一匹良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壮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缎，值银一百五十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甚至到了国中大乱的地步。

其实早在天启五年（1625年）的时候，后金方面因为毛文龙的存在就已经感觉难以支撑了。在努尔哈赤给毛文龙写招降信的同时，他还让手下的汉人给毛文龙写了一封信，备极哀楚乞求之辞：

如今金国汗想要放弃辽东回到其本土。但我们怎么能丢下生身之地和父祖的骸骨而背井离乡呢？所以我等众官员商量，写信给老爷，乞求一条生路。老爷如果看在我等是不得已而投降金人的份上，就可怜可怜我们，给我们寄来作为凭证的亲笔书信或者札书。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夺取一个城池，如果不能，就跑到山上去。乞求老爷务必把书信训示，快点让来人带回，时间久了恐怕就要被发觉。

这封信的动机当然是出于诈伪，但欲行诈伪，也必须先设法用真实情况来取信于人，否则其伪无从售矣。则这封信里描绘的后金窘迫情状，甚至打算放弃辽东回到老巢本土的打算，应该是反映了部分真实情形的。

从崇祯元年（1628年）算起，再撑个两三年，后金不能攻到关内抢劫，也只有彻底崩溃一条道路。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袁崇焕站了出来，帮后金大忙，把毛文龙杀了。袁崇焕在崇祯皇帝面前说，他可以五年复辽，他自己事后说这是一时失言，别人也认为他是夸海口。实际上，按当时的局势，如果他不能五年复辽，那他十年、一百年也都复不了。

包括袁崇焕在内的大部分明朝官员都是浑浑噩噩，对后金当时已经接近于油尽灯枯的形势没有半点概念。

只有毛文龙心里很清楚，后金从天启二年（1622年）以后，基本

上没有像样的抢劫了,天启七年在朝鲜抢劫了点东西也只能支撑一时,如果再无法攻入关内,它已经是穷途末路。袁崇焕就算什么都不做,直接放弃宁远、锦州,把所有的粮食、人员都撤入关内,守住薊镇和山海关,那后金在三年之内也必亡无疑。或者单纯地守好宁远,在有毛文龙牵掣的情况下,后金也还是死路一条。

这个时候毛文龙死了,后金可以放心地绕道攻关了,于是一切就彻底被改变。

毛文龙的死,直接原因固然是袁崇焕的刚愎、昏聩,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个钱字。因为钱的问题,毛文龙在舆论中,已经被丑化得极度不堪(就如万历皇帝因为钱被官员丑化得极度不堪),正因为此,袁崇焕奸计才有得以一逞的可能,否则再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杀毛文龙。

但是明末中国真的缺钱么?

政府是真的缺钱,但民间并不缺钱。别的不说,我们光说涉及辽东明金战争的史事好了,我们可以频繁地看见一个现象,那就是军队发不出军饷的时候,往往就向商人借钱。

崇祯元年宁远缺饷兵变,官员不得已之下就向商人借了三万两银子。

《崇祯长编》对此的记录是辽东宁远军队哗变,乱兵抓住辽东巡抚、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毕自肃。当时宁远军队缺饷四个月,毕自肃向户部请求发饷。户部没有发,骄悍的兵卒因此大哗。拿着兵器来威逼,把毕自肃和总兵官朱梅、推官苏涵淳、州同知张世荣都绑了起来,放在谯楼上,捶击殴打。

毕自肃被打得很厉害,满脸流血。兵备道郭广新用自己的身体挡在毕自肃身上,为其求情。官员们拼命搜寻了两万两银子,还是不能满足士兵的要求,于是就向商人借银子,一共凑足了五万两才释放了众官员,毕自肃上疏请罪,然后跑到中左所,在八月丙申这一天上吊自杀而死。

至于毛文龙那边,向商人借钱更是家常便饭,我们不妨把东江塘

报里提到的向商人借钱支付军饷的地方，列举一下。

天启元年(1621年)的一则奏疏里说广宁出发跟随毛文龙从征的家丁还有训练召集的义兵，戍防了半年，粮饷不够。卑职捐资二百余两，另外向商人赊借银子、布匹以及各种物资价值二(万)^①多两。

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十五日奏报说三年以来，朝廷仅仅发给银子十一万两，运米二十万石，够养官兵吗？够养马匹吗？朝鲜也在饥荒中，向商人借的钱还欠着，实在没有地方去挪借了。

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则奏报称边报紧急，粮饷又不来，只得厚着脸皮向商人赊借米麦。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三日报告说各岛兵丁，正月早已断粮，所幸还能向商人赊借粮食，寻挑野菜来度日。毛文龙哀叹说，他历年来欠下商人的债，虽然百计支撑，陆续偿还，但还是没有还清。

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的奏疏里则算了一笔账：八年以来，一共收到本色粮饷一百二十万八千多石，折色的饷银一百四十万一千三百余两，名实不相符。每天兵民都是靠喝粥来苟全性命，一切米、豆、布帛等物资，不得不向四方的商贩转借，等军饷到了再偿还，但岁饷竟然毫无音信。

而根据毛文龙在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给皇帝的一份东江历年军饷的财务报告所说，仅仅天启时期的六年当中，向商人借过的粮食货物就总计高达二百多万两银子的价值，还有二十九万一千七百多两的银子没有还清。

而毛文龙自己本身就是在皮岛上通过经商赚钱来贴补军饷的。明代的商人远比政府有钱，到了后来灭亡之后，江阴守城八十日，还是徽商程壁出钱提供守城经费。更不必说海商出身的郑芝龙、郑成功“富可超国”了。

一般盐商、海商有钱是不必说了，就是做小食品买卖的，资产都可达千万以上。万历年间于慎行在《谷山笔尘》里记录说当时北京如

① 原文“二”后缺字为□，但以情理推断，当为“万”。

卖酱的、卖肉、卖酒的这些做餐饮、食品生意的商人都有上千万的资产，名号也和古代的相同（指史记、汉书中记载的秦汉时期的大资本家）。他由此慨叹说可见古今风俗相差也不远。

明代的商人有钱，明朝的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重商抑农，对商业提供种种优惠轻税乃至免税政策，赋税的大头都压在农业之上，这导致商人的财富无法转化为国家的实力。而到了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之后，更加剧了这种情况。

这一点在《谷山笔尘》中也有一段议论，大意是唐代的陆贽批评两税法的弊端是只根据资产、土地的多少来收税，而不根据人丁来收税。但那些便于携带转移和藏匿的资产，即便价值贵重，也很难被国家统计进去；反倒是堆放在场地粮仓里的财产，虽然不值多少钱，但别人却认为是富裕；还有些资产是要依靠流通才能变现的，利润如何还要看市场行情，而两税法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统一来收税，导致那些财富形式容易转移且流动性极强的商人，可以逃税，还摆脱了徭役的负担，而那些从事农业、定居的人却负担极重。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国家动员能力越来越差，财政越来越紧张。

于慎行借此慨叹说现在实行的一条鞭法，弊端就类似于两税法。两税法好歹还根据资产来收税，而一条鞭法则连资产都不考虑了，就根据土地多少来收税。使得农民困苦，而商人宽裕。

于慎行对一条鞭法的性质、后果的议论还是相当正确的。

明代社会现实本来就是商人的负担太轻，农民的负担相对更重，国家财政过度依赖于农业。工商业过度繁荣，农业的相对萎缩是明代晚期最严重、最致命的问题，而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而明代的官员作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又常常无所不用其极地为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奔走呼号。最有名的就是万历时期。万历征收矿税，文官群体就鬼哭狼嚎，在奏疏里描绘出种种可怕情形，简直把万历时期描绘得暗无天日，山崩地裂。而实则是在摆脱了当时的利益纷争导致的恶意丑化、攻击，哗众取宠的描黑污蔑之后，

在众人后来的回忆里，万历时期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时代。

明末清初的《樵史通俗演义》开头就有一段话：“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皞，真个是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夔。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熏熏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絮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即便到了辽事大起的万历末期和天启时期，日子还相当舒服。广东的陈舜在《乱离见闻录》中回忆说他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戊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都是二十三岁。当时一片升平景象，四方的百姓都幸福，又家住在海边，是鱼米之乡。一斗米不到二十钱，一斤鱼才一二钱，槟榔十颗只要两文钱，一斤肉、一只鸭子只要六七文钱，一斗盐三文钱，百般平易。就是穷人也能幸运地借此平安生活，徭役和赋税的负担都很轻。一年两熟，种地的人肚皮都吃得饱饱的，读书人喜好词章，工商人士、三教九流都舒适自在，这是何等的快乐啊。

南方人是这样描绘的，那北方人又如何呢？在某些人看来，明代南方富裕，南方的情况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北方生活肯定是穷困得多了。实际上，这也是错误的看法。

山东诸城人丁耀亢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出生，死于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明亡后写过一些诗回忆万历时期的情形，《丁耀亢全集》里有一首《古井白歌》是这样写的：

道旁废墟存古井，石上绳痕吊水影。犹有石臼无人舂，倾侧墙隅如覆鼎。

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妇汲声欢哗。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江山鼎革成新故，物化民移不知处。空村古鬼起寒磷，荒原野火烧枯树。

井中白骨成青苔，春碓之人安在哉？此物曾经太平日，如何过之心不衰？

其中这句“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就是描绘万历时期，一片安居乐业景象的。

还有一首《长安秋月夜》也是回忆万历时期盛世景象的：

长安秋月夜犹明，六街九陌吹角声。角声断处歌钟起，禁城远树寒烟生。

烟连树绕接夜色，宫阙参差分南北。北廓黄云绕建章，南郊白气连沙磧。

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

辕门大袖酣歌舞，海内文人耻言武。马政屯田久废弛，禁兵糜粟空充伍。

物力太厚天时丰，十钱斗粟羞为农。健牛肥马村巷满，鸣鸡吠狗桑麻通。

这些基本是大白话，很容易理解，不必再多解释了。此外他还有如《精轩有神宗题额》等诗也是抒发对神宗万历皇帝的怀念之情的，此处就不一一摘录了。

而同样在北方的河南，甚至一直到崇祯初期，都还是百姓富足、安乐的太平盛世景象。

郑廉的《豫变纪略》里记载说崇祯改元的时候，河南这个地方太平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乡村田间一片宁谧景象，没有鸡鸣犬吠的惊扰。粮食丰收，一亩收获数钟，只要输送税银三分。

那时候当官的人，崇尚廉洁，尚不知道收受贿赂。吏员还没有过村落来索要饭食的。到岁末，老农穿着上好的丝绸衣服，骑着母马，去参加宴饮聚会，送上一百文的钱，就俨然是上客了。

在家居住的士大夫，都建造楼台、园囿、池沼作为娱乐。近水的地方则修建河亭、游舫，蓄养歌伎，演奏丝竹乐器。花晨月夕，酣燕不绝。风流吟啸，如同晋人一样。其间如果有朴实憨厚，不跟着时髦一起享乐放达的人，大家就群起嘲笑他太土老冒了。

根据以上提到的各种史料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明末形成了这样奇特的景象，在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景象；在没有自然灾害的地区，百姓生活富足安康，熙熙攘攘盛世景象；驻扎边境的军队、士兵食不果腹，衣不裹体，饥寒交迫，极惨极苦；而在无灾地区，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即便是地位低下的普通平民，都生活奢侈享乐，穿最时髦的衣服，用最时兴的器具，喝酒听戏，快活无比。

关于明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奢靡享乐风气，在明人笔记的记载中比比皆是。

老百姓的舒服日子过得太久了，而大部分明朝官员又是平民的利益代表，尤其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在明朝的官员看来，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皇帝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支撑国家运行的赋税能低就低，稍微高一点就违背了他们的理想主义原则，只有开支压低到最小限度的国家才是符合他们理想的国家。对官员们来说，如何保证国家不从人民那里收取更多的财富，如何保证财富尽可能留在地方，留在民间，是他们最大的职责。谁在这方面做得越出色，谁就更受人尊敬、仰视。

于慎行说了一个故事，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任户部尚书的宋纁改任吏部尚书，石星接任户部尚书一职。新官上任，自然要大干一场。于是石星非常卖力地要清查各种弊端，增加国库收入。有一天，他和宋纁在等待上朝的时候坐在一起，很高兴地说：“最近又有一件快事，我查出某个省份有闲置的银子若干，可以供国家使用，怎么以前没有人料理呢？”

宋纁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朝廷的钱粮宁可放在地方上不用，也不要都清查出来收到中央。如果让皇上知道各个地方闲置的资金数量，或许就要生出奢侈之心。还是放在那里，最后还不是一样给国家用的。”

石星听了这个回答，就默不作声了。

还有一件事是国家仓库里粮食烂掉了许多，有人提议明年部分漕粮可以改折成银子交上来，避免浪费。结果这个宋纁对此的回答是没必要，理由是将来粮食不够了，再改回来麻烦。

然后于慎行大赞这个宋纁如何深谋远虑，如何老成练达，有古大臣之风云云。

也就是明明可以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而官员却宁愿将其留于无用之地，而此种做法，还被人颂为美谈。

如果看看黄仁宇的《晚明财政史》，还有许多更为荒唐的事情，如官员收税，可以让商人自己定税额，愿意交多少就写多少。有的官员在某税关，一年只收三个月的税，其他时间自由放行。而这些人当时还都是被作为道德标兵、官员楷模来颂扬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明代官员普遍信奉的是这样的原则：“宁缓公家之需，而不忍夺民之有。宁稽在己之政，而不忍伤民之心。”（王廷相语）

明代不仅商业税之轻近于儿戏，就是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农业税，逃税都屡见不鲜，而官员们则把纵容逃税，当成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标志，当成是品德高尚受人尊敬的作风。这不是明末如此，而是明朝中期就已经蔓延成风。

《王廷相文集》里就有王廷相对当时情况的感叹：“呜呼，四川储粮的制度，废弛已经很久了。老百姓把拖欠赋税作为家常便饭，而官员则以姑息放纵作为仁德的表现。”“川民拖欠赋税的风气习惯由来已久，最厉害的莫过于泸州、毫顺、铜梁这些地方，如果算一年应该缴纳的正额赋税，不下十多万石，但国家能实际收到的，只有百分之二三十而已。”

四川是如此，在王廷相自己的家乡（河南仪封，在现在的河南兰考县），甚至都不是百姓偷税、逃税，而是大量的耕地，国家根本就不收税：“我家乡的田地，不收取赋税的，大概占了百分之四五十，永乐以来，都奉有明旨，永远不征收赋税。这是先王浩荡的恩德，有意要把利益都让给老百姓吗？”

而许多不动脑筋，只看一些官样文章就自以为了解历史的人，说明末赋税少是因为王室占田，而实则按黄仁宇考证，明朝的王室只能从地方上获取代表田地的一笔数量极少（多的不过是几万两，这还比不上明代中小商人的收入）的银子，根本无权直接占有大片田地。明末财富最多的人也是大商人，大资产阶级，而不是拥有大批田地的地主。

正因为作为人民、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明朝官员始终想方设法压低赋税，纵容逃税，明朝的财富因此都在民间流通。所以即便明朝中晚期的皇帝才能再出众，官员再精干，但却始终逃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命运。

明代中晚期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在以前的那些朝代，皇帝、政府和官员动辄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是哪里来的，当然也无法想象以前那些朝代动辄使用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军队，这军费是怎么来的？

于慎行就对此大发感慨：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国力已经衰败的情况下，郭子仪回京，皇帝光是摆酒席接风，耗费的钱就相当于明代的十万两银子。唐穆宗时期的两个地方军阀，光是一次性地犒赏将士就各自花费了一百万两。宋代的时候，遇到庆祝活动，就要大赏六军，费用浩烦。这些在明代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还有汉武帝、唐高宗

征伐外敌,发兵动不动就是几十万。而在明代万历时期,碰到边境有变乱,派一个大将带几千人去,还要为军费发愁。万历抗日援朝,征调天下的兵力不过四万,怎么古代和现在的物力相差悬殊大到如此地步呢?

问题根本不在于“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要论经济发达、富裕的程度,明代中晚期远远超过了汉、唐、宋。问题在于以前的朝代,即便是所谓大施仁政,轻赋薄税,那也是对民间财富进行敲骨剥髓式的压榨,所以大量财富能够集中在国家政权手里,集中在皇帝手里。

而在明代中晚期,财富都集中在民间,所以国家稍微遇到点自然灾害,遇到外敌入侵,财政就捉襟见肘。

明代的官员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苛政猛于虎,得民心者得天下,又加上他们本身的经济地位出身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属性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所以成天给皇帝鼓动灌输的就是赋税不能再重了,再重了人民就要造反了。

难得有温体仁和杨嗣昌这样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人,把赋税加上,就被千夫所指,骂成是奸臣,是禽兽。而最后东林党和复社在幕后操纵,让周延儒上台推行他们的减税政策,直接让明朝政府自杀而死。

可以说东林党和复社是明朝灭亡的第一罪人,张溥、刘宗周、黄道周这类东林、复社的知识分子领袖对明朝灭亡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

明朝百姓造反、士兵造反,原因不是赋税太重,恰恰是赋税太轻,导致国家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无力救济灾民,于是灾民只能靠抢劫、叛乱来活命;在抵御外侵时,无力发出军饷,军队、士兵只能靠抢劫、叛乱来活命。

在史料当中,关于明军缺饷的记载比比皆是,而且都是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袁崇焕就在崇祯二年的一份奏疏里说九边各处兵饷无一不缺,士兵没有一天能吃饱肚子的。这在我们前边的章节里已经提到

过了。

就在这一年的己巳之变里，都有忠心耿耿从外地赶来北京勤王的军队，因为缺饷，士兵为免于饿死，不得不抢掠民间，结果带兵的官员、将领被下狱定罪。军队溃散回去，成为乱兵、叛兵。

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明朝档案里，还有这么一则记载：“兵部为台兵缺饷乏食万难，杀子充饥死守事，职方清吏司案呈……”也就是有的地方负责守卫的明军因为缺饷、缺食，甚至有杀了自己儿子来充饥，来死守城池，为国杀敌的。

就在明朝灭亡前夕的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就要打过来的时候，担任防守重任的大同总兵姜瓖还在泣血上疏呈报军队缺饷五个月之久的窘迫情状：“兵素称雄，无奈缺饷五月，值此三冬，岁已云暮，枵腹难堪。”“兵皆徒步，前已具疏，至今无济。”

明朝其实是被自己的士兵推翻的！李自成军队的核心骨干是明朝发不起军饷而叛乱的边军，清军进关后攻城掠地的主力也依旧是原先明朝那些因为领不到军饷还备受百姓、官员辱骂、歧视的军队。

明朝的官员不明白，当国家遇到大规模自然灾害，遇到外来侵略，这个时候就应该转入紧急状态，国家经济也应该进入战时运行轨道，而不能再按照和平时期的那一套，死守着法律来。

在文官看来，军队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为国家服务是应该的。既然是国家机器，所以就应该用最大的警惕心来对待，防止其力量超过必要的限度，而对人民利益造成损害。

所以他们成天都是用多疑的态度，用防贼的眼光来看待武官和皇帝。

一到军官索饷的时候，就认为军饷都是被军官贪污了，是在冒领，索要军饷都是来骗钱的。

一到皇帝要求调拨军饷的时候，就认为皇帝内库里有的是钱，只不过皇帝是守财奴，吝啬不肯拿出来用。

明朝的皇帝反正是被文官的口水喷惯了，受点污蔑也就算了。可对军队的官兵来说，文官政府不肯给足够的物质待遇，也就罢了，

反正饿死是死，战死也是死，左右都是一死。可问题是在精神上都是饱受屈辱，动不动就被怀疑是贪污军饷，军饷没有，为了生存去抢一点东西，就被骂得狗血喷头，这事情确实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明末有一些文人参加了军队抗击李自成等叛军，这个时候他们自己才领略到当明朝的士兵究竟苦到了什么一种程度。

张永祺在《偶然遂记》中记述他和士兵们好几天都吃不上饭，甚至想要有一勺水来润口都不可得，草料也都空了，军营中的马都饿得长声嘶叫。他哀叹说：呜呼，身在事外的时候，痛恨兵丁骚扰。等自己加入行伍，才切身了解到其中的艰难苦楚，真是可以让人痛哭浩叹。

崇祯皇帝在殉国之前说“文官皆可杀”，并不是一时气话，而是伤心悟道之言，如果他在上一上台时就明白这一点，也就不会是后来的结局了。只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

后金为什么能以区区辽东对抗明朝举国之力，并不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有多大本事，而仅仅是因为在后金，一切经济活动都无条件服从于军事需要，他们使用的就是最残暴、最野蛮、最落后、最原始的手段，但却有效的手段。能把一切人力、物力资源都调用起来，让军队至少能吃饱肚子，能有足够的装备。

明朝政府当时如果能暂时抛开一切顾虑，以军队为依靠力量，一切都无条件服从军事需要，用这种方法调集全国力量，去打后金，后金只能化为齑粉，连渣都剩不下。

崇祯皇帝上任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除掉魏忠贤，而是发动一场针对文官系统的政变，以军队为依靠力量，用军队暴力去无条件征集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财富。

再用这些社会财富笼络住军队，让他这个皇帝成为军队利益集团的代表，建立起铁腕军事专制，然后用征调来的财富赈济灾区，抵御外侵。明朝完全是可能渡过这一场难关的。

等到渡过这场难关之后，再重新设法建立起文官政治，延续明末社会进步的势头，也为时不晚。

但无奈,明朝中晚期,政治制度已经过于超前了,政治决策过度受民间眼前利益的影响。

万历皇帝是明代晚期头脑最清醒的人物,他收了一点矿税,加了一点商业税,结果官员、文人就一片哭爹喊娘之声。到了崇祯时期,迫于形势,不得不加重农业税,那些清流官员就也是如丧考妣,到明亡之后,还在把责任归咎到赋税太重头上。而实则即便是赋税最沉重的崇祯时期和清初相比,也是不成比例的。

清初的叶梦珠在《阅世编》里曾经对比过明清赋税的情况,他说:“我家乡的赋税,是天下最重的。苏州一府缴纳的赋税,要比浙江全省的赋税都多;松江府的地方,只有苏州府的十分之三,而赋额却是苏州的一半,也就是江南的赋税,没有比苏州和松江更重的,而松江尤其是重中之重。”

“我曾经和故老谈论过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的事情,都说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幸福,当官的不会因为征收不到足够赋税而被惩罚,老百姓也没有被催逼缴税的侵扰。而现在(指叶梦珠生活的清朝——引者注)的税粮,虽然比明朝时候要加重,但也有限。关键是官员都竭力催逼征收,稍有拖欠,各种惩罚接踵而至,民脂民膏全部被勒索一空,拖欠的赋税都被记在账上,累积得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当年(明代)对官员征税的考察非常宽松,所以郡县催促百姓缴税也很和缓,时间长了就更加好商量,拖欠的税粮全都豁免,虽然有重税之名,但没有重税之实。”

“就算是崇祯的时候,因为频频打仗,军饷缺乏,户部屡屡告急,朝廷特地派遣官员,清查各地拖欠的赋税,执法算是变严了。正粮之外,还有炼饷,有加派,赋税的征收也算得上繁重了。然而本年的税银,一定要等到来年二月份开征,如果在本年秋、冬就征收,就称为预征银,因为朝廷向老百姓征税,是在粮食都收获之后,先征收本色粮食以供漕运,然后再征收折色的银子以供给军饷,留白银到第二年春天再开始征收,也是用一缓二的意思。”

“所以一直到明朝结束,官员只要能完成百分之八十的税收任务

就算合格，而民间只要能缴纳百分之八十的赋税，就可以称得上表现良好，能缴纳百分之六七十的也就算得上不错了。”

“何况几百年的太平生活累积下，规定的制度也都非常详尽完备，存留在地方上的赋税既然多了，那输送到中央的数额就相应地少了……（省略号处是详尽列举地方上各类可以节省的花费）所以往往征收到百分之六七十的税额，运送到中央的钱粮就能达到定额的百分之八十了。而存留在地方上的那部分税额，可以根据情况缓急，再慢慢征收。所以官员不会因为没有履行职责而被惩罚，老百姓也没有竭泽之忧。”

而到了清朝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呢，叶梦珠是这样描绘的：

“额定的赋税，往往都是直接被拨用作军饷，而军饷不能少一分一厘，所以征粮也就不能有丝毫亏缺。凡是征收赋税的官员，都只有征收到百分之百的数额才算合格。稍微少一丁半点，就要受严厉惩罚。对地方官员来说，头等大事就是征粮，其他一切安抚百姓之类的，都根本谈不上。”

“在奏销案（奏销案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对江南拖欠赋税的绅民的大范围镇压，清初和哭庙案、科场案等并列为三大案之一）之后，官员乘着江南士民刚受到严厉打击，十年并征，人们风声鹤唳，心惊肉跳之下，唯恐缴税落在后面，靠变卖家产来应付官吏催逼，就这样还不够。押吏如同虎狼一样，即便原本尊贵的读书人此时也和俘虏、囚犯没有区别。”

“当时只有向营兵借高利贷一条道路（可能是清兵因为各处抢劫杀人，所以反而有钱），每个月利息加二加三，稍微迟一天，就利滚利，而借来的银子，用来应付衙门使用，就要费去过半。等一个月之后，营兵来追索，百亩的田产，连带家中的日用器皿，房屋，人口全都籍没，还不足以清还，被捆绑起来用鞭子拷打。尽管明知有这些危害，但急忙之中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所以有许多人干脆抛弃田地而逃跑，赋税造成的悲惨情形，在当时可谓达到了顶峰。”

松江上海地区因为富裕，情形还算好的，广东地区，在清朝统治

下的情形就更为可怕。

按陈舜的记录,清朝知县到任后,名义上的钱粮和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差不多,比崇祯年间稍轻。但实际上有种种花样繁多的盘剥、勒索,以供给清兵和清朝官吏享乐。富人家产罄尽,穷人卖妻卖子,流亡逃窜,其惨无比。

还有一则记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在康熙三年(1664年),清朝知县高鸿飞用杖刑打死时年七十六岁的乡官陈彝典,前后在监狱里一共打死了六百人,原因就是地方上没有交纳税粮。

以上对比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实际上清朝军队疯狂抢劫民间财产更是肆无忌惮。所过之地,往往掠为白地。而这种抢劫不是军队自发的行为,而是清统治者有意鼓励和纵容的,是官方指定的政策。

康熙二年(1663年),清朝实行的沿海迁界,陈舜记载的广东吴川当地的情况是“巡海华、鄂二大人到吴,不入城”,进行第二次迁界,两次合计迁移五百八十六个村庄,“男妇数万口,哭声载道”。不但强迫当地数万沿海居民抛弃房屋、田地,而且清兵肆意抢劫。

两个满洲大员自己也疯狂搜刮民财,光是为了搬运他们搜刮来的东西,就累死无数民工。

清朝统治者对百姓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却稳固住了自己的统治。而明朝的君臣处处把百姓疾苦放在第一位,却最终遭受亡国厄运。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平寇志》里记载的李自成军队里刘宗敏对牛金星等人说的一句话:“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

刘宗敏的意思是如果不让军队抢劫,民心是有了,但军队没有军饷就要叛乱,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反之如果让军队抢劫,或许会丧失民心,激发民变,但民变至少还有军队可以镇压。

明朝政府当然不可能像后金,像李自成、张献忠一样去放纵军队抢劫,但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确保军饷供应是必须无条件放在第一位的,而通过加大对私人经济的管制力度,加大商业税收、农业税收征收力

度，完全可以做到对一百万有战斗力军队的军饷供应。

百姓若是苦一点，但这个苦是必须吃的，如果这点心肠硬不下来，那战国时代的百姓，秦末的百姓，汉末的百姓，三国魏、蜀、吴的百姓，隋末的百姓就不必活了。就是西方到现代，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交战双方的经济都要转入战时轨道，居民都要按照配给制来领取生活用品，甚至无条件征用民间物品（对照明代的崇祯，他筹集军饷要靠募捐）。

明朝官员成天担心赋税再加重，连南方富庶地区都要起来造反，他们不知道如果南方百姓多交点税那点辛苦程度就要造反，那所有的明军造反一百次都绰绰有余了。

古语云：小仁，大仁之贼也。在明末应该体现得非常生动。

在国家危难之时，不采取严厉手段，就可能让文明大倒退。需要吃苦就必须吃苦，否则最后遭受的厄运，付出的代价，死亡的人数就是百倍千倍于此。明末的教训就是最深刻的教训。

就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家、西方民主思想的象征人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都有这样一段话：“法律的僵硬性会妨碍法律得以因时制宜，所以在某些的情况下，就能使法律成为有害的。并且在危机关头还能因此致使国家灭亡。因此绝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坚硬化到竟至于取消了那种使法律生效的权力的地步。”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至法律的尊严竟成了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

而可惜的是，崇祯当政时毕竟是一个天真的满怀纯洁理想和高尚抱负的十七岁青年，他相信法律，相信制度，相信那些被称为正人君子的知识分子，他倾尽信任，最后却得来的是国事每况愈下。

他毕竟是个聪明人，及时任用了杨嗣昌、温体仁，国家还是可以支撑下去的，继续杨嗣昌的政策，再熬个二十年（清朝入关后推行的是比杨嗣昌疯狂十倍的掠夺政策，足足苦熬了四十年还多！），也能顶过难关。但这两个人又被群狼一样的正人君子，身为人民代表的文

官疯狂咬噬、围攻，说政策是错误的，否则为什么形势没有立即好转。等到温体仁被排挤下去了，杨嗣昌死了，东林、复社扶持的周延儒上台了，加税的政策终止了，政府彻底没钱了。明朝等于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勒紧了催命索，国家只能彻底崩溃。

毛文龙的悲剧不过是明末悲剧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任何事情无论再美好、再动人，如果超前发展，过度发展，也会带来悲剧性的结果。明朝的政治平民化是好事，思想活跃是好事，官员成为人民利益代言人是好事。但当好事不能根据形势而调整，也就变成坏事。该后退的时候不后退，该迂回的时候不迂回，直线前进就可能坠入深渊。

说到这里，有些信服于上面分析的人，大概又会悲愤填膺地大叫明朝官员太蠢了！明朝不亡没有天理！

但应该质问一下，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有资格来指责明朝官员的昏聩糊涂么？真的有资格来指责明朝舆论的黑白颠倒么？

答案是没有资格！

看看现在主流的舆论，主流对历史的评价，在事情已经过去近四百年的时候，在大量当时人无法看见的历史资料，前因后果都已经清晰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大部分所谓的历史学家，精英知识分子，其议论之陈腐，观点之混乱，还远在明人之上，意识形态的偏见还能让他们迷糊成这个样子！

那又有什么资格去嘲笑明朝的人？

本书的正文部分就到这里结束吧！

附录一

对天启皇帝的评价以及对丑化 明代皇帝现象的分析

一、天启皇帝的好学勤奋和对军事边防的强烈兴趣

主流历史舆论一直给我们灌输的印象是，天启大概是一个只会做木匠的白痴皇帝，还是个文盲，喜好的除了做木匠，就是吃喝玩乐。

但看《明熹宗实录》，发现不是这样，实录中记载天启皇帝御文华殿讲读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军国大事亲自发表议论更是史不绝书。从真正严肃的史料来判断，天启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头脑也是灵敏的，他对军事、对用人的许多意见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

我这样说，自然又成了许多人嗤之以鼻的翻案，是哗众取宠。说句实话，对这样的反应是只能报以苦笑。说到翻案，我们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或者抓住某些小道消息，不经之谈，就大做文章。

可是在明史领域的情形，却恰恰相反。许多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深信不疑的东西，才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乃至胡编乱造的结果。考察其史料的源头，都是些私人笔记里道听途说，辗转传闻，或者在一些事实的基础上添油加醋的臆测。

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说法得自于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

《酌中志》的原文是：“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渐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客氏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白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熹宗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说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所谓“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自己的揣测。

天启时期，东林党的处境惨了一点，也就难怪天启被丑化成极度无能不堪。刘若愚在写《酌中志》的时候，正值他在崇祯时期被关入狱中，本身为了急于脱罪，撇清和魏忠贤等的关系，也就难免顺着当时的主流舆论说天启喜欢做木匠，而让魏忠贤窃权了。

但从更严肃一点的历史资料来看，天启绝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聩无能只会做木匠的皇帝。

就以清修《明史》说好了,尽管在本纪里对天启极尽丑诋能事,所谓“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点真实情形。比如在《明史·孙承宗传》里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给皇帝讲课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内容都是有规定的。不像现在说书先生一样,光捡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开心的故事讲就行了,其基本内容还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上。孙承宗课讲得好,固然是一方面。但天启皇帝能听这种课程,听得很开心,那也绝对是一有灵性的,头脑聪敏的好学生。

同样是《孙承宗传》里还有一处记载,也表明天启皇帝除了对做木匠感兴趣之外,还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看看下面的记载:“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

一般来说,皇帝对于边情,听官员的奏报也就可以了。但天启皇帝显然对军事边防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例行公事的听奏报,而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所以才会另外专门派遣东厂人员去探听边防情报。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情报意识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备的,看看后来袁崇焕、王治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的麻木无能就可见一斑了。那时候的天启皇帝也不过十六岁而已,换现在也就是一个高中生差不多,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当然《明史》的记载毕竟是只鳞片爪的,要想对天启有更全面的了解,还是要看《明熹宗实录》。这里聊且摘录几则内容说一下。

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的时候,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经给天启皇帝上疏说:“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但今之尝朝,既是套数具文,无关于政事。而日讲开陈,时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义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

也就是承认天启很勤奋,经常上朝,也经常听讲。接下来他又担心皇帝退处深宫,会荒废时间。但看见天启批阅奏疏的时候,会经常

传谕,说明天启即便在宫内都是非常留神关心国事政务:“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

但就是传谕内容过于琐细,要一一回复,对大臣来说也过于繁琐了,感觉有些吃不消:“臣等欲一言之,则不胜其烦,欲默而不言,则又失辅弼之职。”

对此叶向高提出批评,希望皇帝以后注意改进。另外还提醒皇帝,在平时休闲的时候也要注意学习,不要浪费时间:“皇上尤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苍生之大幸也。”

天启皇帝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复是:“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兼时事忧劳,何有多暇?卿为辅弼元老,正赖责难陈善,匡朕不逮。览奏具悉忠悃。”

也就是皇帝在宫里,每天都在批阅文件,都在阅读经史著作,再加上操心时事,并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但尽管如此,还是很感谢叶向高能够提出批评建议。

二、在军事问题上,天启皇帝的见识比袁崇焕和孙承宗要高明

而看天启皇帝对许多问题的批示和处理,也可以看出他的见识、能力,有时候还在他的那些臣下甚至老师之上。

我们在正文里提过,在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的时候,袁崇焕曾经上奏疏,宣称依靠在关外修城屯田,就能够让后金投降。还对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

那时候我们主要重点是放在袁崇焕给魏忠贤拍马屁的行径上,所以没有详细引用天启皇帝的批复。而这里不妨把天启皇帝对袁崇焕这份奏疏的批复详细摘录如下:“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

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里天启皇帝对袁崇焕的大话以及给魏忠贤拍马的言辞没有丝毫顺应，相反针对他的大话吹牛，接连发出了六个排比质问。

这一连串极为具体的质问，把袁崇焕的牛皮戳得体无完肤。而且最后更是明确告诫袁说：“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要他还是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再说，少来这些大言不惭的把戏。

这份批复只能是出自于天启皇帝自己的手笔，那些阁臣谁敢在一份对魏忠贤谄谀献媚，歌功颂德，报告形势大好的奏疏的批复中，对魏忠贤只字不提，反而大泼冷水？而魏忠贤对一份边臣大帅、领兵官员给自己拍马、奉承、示好的奏疏，只会趁热打铁，笼络唯恐不及，又怎么会如此不解风情地浇冷水，言辞训斥？

只有天启皇帝自己，才会给出这样的批复！而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天启也不过才二十一岁而已，嘴巴上的毛都还没有长齐。而他的思维周密程度，头脑清醒冷静却已经远在中年人的袁崇焕之上了。

还有我们正文里也提到过的一件事情更说明问题。天启四年（1624年）的时候，毛文龙的一份塘报里提醒政府，自己接到情报后金和蒙古人勾结，有绕道蓟镇攻入关内的图谋，需要严加提防。

《明熹宗宝训》卷四一段天启皇帝给内阁的训示，恰好就是天启皇帝对毛文龙塘报的反应，显示出他对毛文龙情报的高度重视：“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购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

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而当时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的反应却是很麻木迟钝：“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虜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举世要省兵、省饷，而皇上特敕接济文龙，此恢复之大机也。”

两相对照之下，显然天启皇帝的见识比起他的老师孙承宗来还要高明一些。从天启二年（1622年）以后，后金不但不能再前进半步，反而不断退缩，并非偶然，更不是什么天启皇帝运气好。

三、天启皇帝重用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原因

至于从天启四年之后，熹宗重用魏忠贤对东林党人进行严厉打击，这个恐怕不能完全说成是受魏忠贤操纵愚弄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天启皇帝面临和他的爷爷万历皇帝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吵架，这样下去的话，国家的行政效率，以及人事牵掣造成的内耗确实太大了，天启确实也头疼得很。

天启二年二月的时候，《明熹宗实录》里有这样的记录：“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惊忧，昨张鹤鸣慷慨自请视师，具见忠义为国。江秉谦妄言乱政，已从轻薄罚，今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不

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涵淆是非的，决不姑息。”

当时辽东刚刚溃败，全辽丧失，而那些言官们还在不停地争吵，十六岁的天启皇帝实在是不堪其扰，只能训斥他们别再吵了，现在国事都危急到如此关头，你们还要这样争吵不休，究竟是在干什么？

过了两个月，事情还是没有好转，那些官员还是成天说空话，喷口水，扣帽子，乱吵架。天启皇帝只能再次训斥：“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混，自奴酋发难以来，征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概。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也就是我上任当皇帝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操劳国事，而你们这些官员在干什么？叫你们不要再互相攻击、争吵了，你们还要争吵？再这样下去，我绝不姑息了。

可实际上，我们看熹宗实录，后面这类官员争吵的记载还是依然如旧，常常是长篇累牍的奏疏，我攻击你，你攻击我。我给你扣帽子，你给我打棍子。就像网络论坛上，你骂我粪青，我骂你精蝇一样。天启皇帝忙着劝架当和事佬都来不及。但对相关官员的责罚仍旧是非常轻微的，往往就是扣除几个月俸禄了事。

应该说在和平时期，这样吵一下，也无伤大雅，反而是政治宽容、民主的表现。看看现在中国台湾地区，还有日本的议会里，都经常有议员在那里吵架对骂，甚至互相厮打的新闻出现。

但明朝当时已经是战争时期了，还这样吵来吵去，骂来骂去的，确实要坏事。天启皇帝头疼万分，但他也狠不下心来辣手整治。

到天启四年，东林党杨涟等人上疏攻击魏忠贤，非要置魏忠贤于死地，恰好让事情发生了转折。

说起来这又是东林党吃饱了没事情干，本来那个时候魏忠贤还不算太嚣张，而杨涟等人却已如打了鸡血一样，将之看成似乎比努尔哈赤还要可恶的对象，咬牙切齿地罗织罪行，非要灭之而后快。天启皇帝当然不愿意魏忠贤被处死或流放，而魏忠贤为了保命也要自卫。这样一来，天启就加大了魏忠贤的权力，让他去对付东林党了。

原先他狠不下心来做的事情，魏忠贤全给做了，天启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去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无数骂名去把东林党的清流压制下去。但可以说东林党被打下去，绝不是天启因为怠政让魏忠贤操纵的结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贤被天启皇帝和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利用的结果。

天启皇帝既然不能像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用太极推手，用部分罢工的方式以柔克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只能用这种辣手了，这并不是他情愿的结果，而是处在他的位置上，为社稷安危考虑下所能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

四、天启皇帝重感情、重亲情的性格特点

就本身的为人来说，天启可以说在所有的皇帝里也算得上极为仁慈、宽厚的一个，他几乎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

他对自己的老师好，对自己的弟弟好，对自己的老婆好，对自己身边的仆人好，对自己的奶妈好，他对身边所有的人都几乎非常有感情。

对自己的老师好，这是《明史·孙承宗传》里就说得很清楚的，“眷注特殷”，“帝不欲承宗离讲筵”，“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詹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

天启五年(1625年),熹宗同意孙承宗辞职,其实也是出于保全自己老师的考虑。毕竟边事凶险,而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刚刚吃了败仗,朝廷内官员纷纷弹劾,万一再有个闪失,按照明朝的国法,就算天启想要袒护自己的老师都是不行的。所以索性同意孙承宗辞职,赐予各种头衔、荣耀,荣归故里,也算是对自己老师的一片报答之情了。

至于天启皇帝对自己老婆和弟弟感情非常好,可以看《明季北略》里的这条记载:“顺天府丞刘志选,劾后父张国纪,上下旨切责。后贤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宫,顾几上书一卷,问何书?后曰:赵高传也。上默然。忠贤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厂卫。忠贤诬后父谋立信王,欲兴大狱。王体乾曰:‘上凡事愤愤,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忠贤惧,乃杀甲士以灭口。”

这里王体乾说“上凡事愤愤,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其中的“凡事愤愤”不能理解成天启昏聩无能,而是说天启在许多事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闹去。但对于自己的兄弟信王朱由检和自己的妻子张皇后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王体乾是告诉魏忠贤,就算用谋反这样的事情也是搬不动信王和张皇后的,一旦天启皇帝生气追查谁在诬陷自己的弟弟,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种记载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当然是天启皇帝对自己亲人感情深厚,不为谗言所动的态度。第二从天启皇帝和张皇后的对话也可以看出所谓熹宗不读书说法的荒谬。第三从王体乾说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可以看出天启皇帝绝对不是某些人想象的昏庸、糊涂、无能,相反他的才智、能力都是非常卓越的,尽管魏忠贤大权在握,但是只要天启一发威,即便仅仅是可能性,仍旧足以让魏忠贤等人感到害怕。

最后对仆人好,对奶妈好。天启对魏忠贤的态度,对客氏的态度是众所皆知的了,也就无需我多说了。

天启皇帝对所有这些人都很好,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因为迎合

自己癖好，拍自己马屁，所以他才喜欢他们云云。至少从他对自己老师孙承宗，以及对自己弟弟朱由检的态度来看，确实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是秉性仁厚所致。

甚至一开始他对朝廷官员的态度也是很好，这些官员互相争吵，互相攻击，以及对他本人的批评、指责，他也都是用很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回应。后来可能是实在痛心于国事在这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官员争吵中愈趋愈坏，也不满于东林党动辄盛气凌人，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的，所以才放纵了魏忠贤施加辣手打压东林党人。

关于天启皇帝，如果要全面论述，也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以说的，但限于本人的精力，这里就暂且说到这里。

五、南明弘光皇帝被丑化的情况

当然明末被丑化的不仅是天启皇帝一个人，后来的崇祯皇帝以及南明的弘光皇帝也没有幸免。

崇祯处置大臣都是按照法律来严格执行的，并没有把个人意志凌驾在法律之上，结果被诬蔑成了滥杀大臣。至于崇祯内帑空空如洗，结果却被造谣说有七千万两白银在内帑里舍不得用，说崇祯是守财奴云云，更是颠倒黑白到了极致。

而另一位南明的弘光皇帝被丑化的程度就更厉害，一提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昏庸、荒淫。

这种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些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这是明末的史料记载弘光昏庸无能，麻木不仁，放纵酒色，甚至奸淫童女，致死多人，还大量捕捉蛤蟆制作春药。

所以弘光是“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痴如刘禅，淫过隋炀”，“质性暗弱，有蜀后主、晋惠帝之风，而荒淫过之”。

而实际上朱由崧是这样的人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历史当事人李清的《南渡录》是怎么说的！

我们先根据黄倣成写的点校说明对李清和他的《南渡录》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李清，弘光时官至大理寺左丞。他写有多种反映明末历史的著作，除了《南渡录》之外，最著名的还有《三垣笔记》。

《南渡录》点校说明中说“清修四库，首禁李清之书”，“李清治学谨严，持论平允，史家甚重其书，惜不易得睹”。“李清服官南都，事多参决，故记述多为亲睹亲闻，较他书为详，且无明季门户之见，是南明史籍中较重要的一种史料。”

“民国初年，倣成（应当就是指点校者黄倣成——引者注）母亲在李详（李清后人）府中任家庭教师，尝闻这部拼着身家性命保存下来的著作失而复得。1938年，中央大学朱希祖教授在浙江省平湖县葛小严家得阅李清《南渡录》原稿，并有李详之跋，惊喜不已，叹为南明史料中之至宝（后原稿在土改中毁灭）。”

《南渡录》一共有十二种抄本，黄倣成点校本就在多种抄本基础上参校而成。

根据李清的记载，所谓弘光帝奸淫童女，捉蛤蟆是为了制作春药云云，纯属胡扯：“如端阳捕虾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变童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辨也。及国亡，宫女皆奔人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

也就是端午节捉蛤蟆，这是宫中的旧例，而不是什么弘光皇帝搞出来的名堂，却被一些人借题发挥成泼在弘光上的脏水。

至于“变童季女”，也就是奸淫童女，甚至致死多人，谣言造得很厉害，许多人也信以为真，等到了南京沦陷，宫女都逃散到老百姓家里的，把宫里的真相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才真相大白，这些泼在弘光皇帝头上的脏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不但没有什么奸淫童女的事情，弘光皇帝甚至并不是什么好色的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弘光帝：“燕居深宫。每徘徊论叹，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于吴姬亦罕近也。”

也就是连宫里的江南美女都很少亲近！

而且弘光皇帝本身是相当宽厚、仁慈的一个人，本来在崇祯殉国之后，崇祯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他接位按顺序是理所当然的。

但由于万历时期，东林党和老福王的恩怨，东林一系的官员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编造出了朱由崧所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状。他们当然和朱由崧没有亲自接触过，这纯粹是由于政治动机编造的谣言。

而朱由崧即位后是个什么态度呢？李清记载是：“上宽仁，即位后从不追究，一日，阁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员，曾任大理寺左丞，对许多事情都是亲历亲见，他的记载的史料价值远比那些道听途说、辗转抄袭的要高得多。

事实上也不单是李清，同样在弘光一朝为官，和弘光皇帝亲自接触之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也有诗句表达对泼在弘光皇帝身上谣言的愤恨：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
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
吹唇沸地狐群力，婪面呼风羯鬼灵。
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时间内覆灭，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党一系的官员难辞其咎！他们因为万历时期和福王的宿怨，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编造了大量关于朱由崧的谣言（所谓的“七大不可立”罪状），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极度不堪，使得弘光帝从继位一开始就丧失了臣民中的威信，导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内斗不止。

而清军能毫不费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明军大将左良玉，听信东林党编造谣言而对弘光帝极度不满，打着肃清朝政的借口发动内乱，置防清重任于不顾，把兵力指向南京。而马士英为了抵御，

也把军队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内犯上了。

要说南明覆灭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无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聩、糊涂也就罢了，但大量官员包括东林系官员，在和弘光帝有亲身接触之后，扭转了自己的偏见，在自己的记录里澄清了真相，还了朱由崧的清白。倒是许多局外人，没有亲睹其闻，依旧把凭借道听途说的流言、诽谤当成事实传播。

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历史学者似乎宁愿采信那些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传闻流言，而把最为可靠的李清等当事人的记载当作完全不存在一样，置之不理。

说弘光才能平庸、软弱，也就罢了。非要造谣说他荒淫、奸杀童女，还把这种谣言当成确凿无疑的事实来对待。

当然如果真要这么认为也可以，那就正视《南渡录》中的记载，正视钱谦益的记载，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进行驳斥，也算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是怎么做的呢？已经明确有当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况下，就全当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还把那种谣传作为真实到处散播。

六、明朝皇帝被丑化的原因分析

关于明代的皇帝，在明人当时的记载里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记载，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平实的记载，有夸张的记载；有亲自接触和认真考证后写下的记载，也有道听途说的流言、传闻。

但奇怪的是，到了现代，越是那些夸张的、离奇的、荒诞的、古怪的记载，越是被主流历史舆论当成是事实。似乎许多历史学家都是用一种小报记者窥伺明星隐私、桃色新闻，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来对待明代历史，唯恐记录不够夸张、不够离奇，不能吸引人眼球。

而那些显得平淡客观的记载被弃若敝屣，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以这种方式，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开始，一直到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丑化了个遍。

如果有人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还会振振有词地反驳说，我们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记载和议论，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

当然也许这也不能全怪现代的历史学家，这种做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在梁颂成编辑校订的《杨嗣昌集》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四库全书答问》谈到乾隆帝编纂全书的私意时说：‘对于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搜集明代种种失德之记载，使之随古人名著，共传于后世，以永播其恶于人间。’显然如果刊刻杨嗣昌的著作，那就等于宣扬了朱明大臣之长。于是《杨文弱集》被奏缴并列入禁毁书目是在情理之中，新编定的《杨文弱先生集》也便没有了付梓的机会。”

岂止是《杨文弱先生集》，凡是能澄清明代历史真相，洗清那些泼在明代皇帝、大臣身上污蔑之词的书籍比如李清清的《南渡录》，钱谦益的著作、诗集都在清代属于禁毁之列。

看看乾隆皇帝提到李清时的咬牙切齿：“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章宪典。今其身幸逃显戮，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

而那些荒诞不经的毁谤、污蔑明代君臣的记载倒是通行无阻，广为流传。

我们先不说丑化明代历史的记载中有相当大部分都是虚假、经不住考证的，就说光以这种手法来对待一个历史时期，本身就是极度卑劣的行径。倘若用这种手法来对待当今中国的历史又会如何呢？

如果有一个人把这二十年来，每年报纸上、杂志上记载的那些社会上丑陋、肮脏、凶残的事件报道都收集起来，编成一部书，再把那些反政府势力编造的荒诞不经的谣言也都当成真实编进去，这样一本书，我可以担保其长度足以可以和整个《明实录》相提并论，达到几万页的厚度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三百年以后的人或者历史学家看了这样一本书,然后得出结论说当今这个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丑陋、最肮脏的时代。有人质问他,他可以振振有词地回答,我凭借的是当时人的记载啊,都是第一手史料啊,如何如何。

但显然这样的看法是严重违背历史真实,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而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历史学家就是用这样一种手法来对待明代历史的。而且许多明清史从业人员甚至还不如我上面假设的这种情况,许多人依据的材料连第一手史料都算不上,大量都是当时人或隔了一些年代的人道听途说再加自己胡乱揣测想象而来的无根史料。

附录二

袁崇焕大炮守城策略和中国 火器发展的认识误区

一、大炮守城策略的错误和明朝时期中外 火器发展的不同需要

袁崇焕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凭坚城，用大炮”，宁远之战尝到甜头后，他对此更是乐而不疲。其战略之错误，正文中已经分析透彻，这里单说纯技术的问题，就守城本身而言，用红夷大炮真的是有必要么？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守城成功的战例数不胜数，明朝开国时期就有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面对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守洪都城三个月。如果面对努尔哈赤以冷兵器为主的军队一定要用红衣大炮才能守住的话，那只能说守城者本身的能力是有问题的（更何况守宁远才两天）。

明朝把当时威力最大的红衣大炮用于和后金作战，许多人津津乐道，说是如何明智的举措。但事实多半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红衣大炮对攻城的作用远远大于守城。对守城来说，在对方没有重型火炮的情况下，只要布置得当，不用大炮也完全是能够守住的。而对攻城来说，一旦有了威力惊人的大炮，原先看来无法攻克的

城池，现在却能攻克了。

这一点金人也很清楚，《天聪朝臣工奏议》里记载了天聪七年（1633年）祝世昌给皇太极的一份奏疏，其中提到：“自古攻守，全用火器，如鸟枪、三眼枪、百子铳、佛郎机、二将军、三将军、发炮之类，用之城上防守极好。若攻打城池，必须红衣大炮。”

明末有江阴民众守城八十日，最后清军还是依靠大炮的威力才攻入城内，若非如此，江阴守的绝不仅仅是八十日。

更扩而大之地说，没有大炮，整个南方清军都未必能打下来。清军下南方，第一道重要关口扬州城之所以被轻易攻破，固然和史可法的无能、昏聩有关，但和红夷大炮的使用也密不可分。李清의《南渡录》中说：“扬州城颇坚，督辅可法在焉。北兵从西北隅以大炮击破，遂入城。死者甚众，肇基当破处抗敌，力杀数人，无继者，遂见杀。”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火器是应战争的需要而产生，也是因为战争的刺激而发展。明代中国和欧洲不一样，战争环境不一样，面临的对手也不一样。

明朝面对的主要敌人是文明程度远比自己落后的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作战的需要也主要是野战和守城，而不是攻城和海战。而且在对方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情况下，自己不使用某种火器，对方也根本没有渠道来知晓运用这个火器。

而西方当时的战争是处于同一文明等级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家都是农耕定居民族，都要攻克堡垒，攻打坚城，也都需要海上炮战，不同国家你追我赶。

这种情况导致明朝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和西方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完全是不同类型的。

明朝需要的是那种轻便灵活，容易运输，便于制造，适合防守，利于野战，不过度追求精确度和对坚固目标的摧毁能力，而是杀伤面积大，震慑效果强，对人畜影响大的火器，这样能抵消北方骑兵和弓箭的优势。而西方由于攻城和海战的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是对坚固物体摧毁力巨大，射程远，准确度高的大炮。

所以明朝中国在引入红衣大炮之前,火器发展的重点主要是炸弹,地雷,水雷,大面积发射的火箭,火枪,小型火炮,多管火枪,毒气弹,烟雾弹等等。尤其明代在炸弹、地雷、火箭、多管火枪等方面的设计制造,技术之精密复杂,想象力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完全可以笑傲当时的西方,有些方面甚至是遥遥领先。

《世界火器史》一书中说:“从14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军事变革中心:一个是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方军事变革中心;另一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军事变革中心。”

虽然其后文又重弹中国军事变革是巩固封建统治,西方就是推翻封建统治的滥调,但就技术上而论,中国明朝本身是在以火器为核心的军事变革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代中国在火器研发上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整个社会对此的空前高涨的热情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另外《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说:“(到了明代)已经创始的各类火器在战争中不断改进,品种增多,质量提高,尤其是金属管形设计火器,获得突出发展,各种形制的枪、炮进步扩大生产和装备部队,形成了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高潮。”

明朝时期,中西方的火器面临不同的战争环境,它们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各擅胜场。

本来历史的轨道就应该是,在双方火器满足了各自的需要之后,中西方再碰撞在一起,逐渐合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最后殊途同归。

但合流的同时,也需要理性、审慎的选择,否则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果说在嘉靖时期,对佛郎机的引入、仿制,产生了积极有益的结果。那么在明末,对红夷大炮的引入和改进、研制,就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了。

明人在技术上开放自由的心态虽然令人称赞,但在政府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在并不是最贴合自己需要的火器上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忽略了本土火器传统优势的发挥,此举只能是帮敌人的忙,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了。

二、明代中国火器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有必要对明代火器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一下。

对火器发展的最大刺激就是战争,明代开国之后到嘉靖以前,除了少数时间,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和平状态,这使得火器发展相对缓慢。

而在欧洲,从14世纪到17世纪,战争没有间断过,宗教战争,玫瑰战争,英法百年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英国、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等等,最能刺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且西方当时的战争是同等级文明形态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破坏小而对军事技术发展的刺激大。

这种军事技术的进步并不是建立在社会本身发展程度比明朝先进的基础上,更不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明朝领先的基础上。所以只要一和明朝接触,明朝就能立刻吸收、引进其技术,并独立研制开发,直至反超。

明代不像清朝一样保守自大、封闭僵化,始终抱着开放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战争对武器发展的刺激小,并不意味着明代的君臣就放松了这方面的警惕心理和前瞻意识。

当时中国和西方殖民强盗多有小规模交锋,中国屡屡击败对手,但没有因此对之不屑一顾、麻痹大意。这才有了嘉靖时期汪鋐缴获葡萄牙人使用的佛郎机,上疏建议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装备部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英国人主动把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当成礼物送来,结果仅仅被其当成自己的个人玩物,封锁在深宫之内。

有些人因为明代积极引进西方火器,就说看呀,明代的科技发展也停滞落后,否则为什么要引进呢?

这些人其实和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心态如出一辙,以狭隘、封闭、自大为荣,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最好,一旦要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事物,那就是落后的标志,就是一种耻辱、不光彩的行径。幸好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君臣没有这种愚昧、狭隘的心态。

有些人则是嗤之以鼻地说,明代引进西方火器有什么了不起,清末不是照样有洋务运动?

可惜这些人忘了,清末的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者被洋人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被洋人骑在头上拉屎撒尿、任意欺凌,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后才进行的。明代引进西方技术则是在国势强盛,自己打败对方之后,还要去主动积极地学习引进。区别就在这里!

随着明朝中晚期战争开始频繁化,战争对火器的发展刺激也随之加大,火器发展已经明显呈现出有自己特色的一条道路,也是更适合自己的需要的一条道路,和西方相比只能说各有所长,而不能说谁更先进。但不幸的是这条道路却被过于盲目的追求类似西洋大炮威力的潮流打断了。

下面对明代中晚期中国火器发展的介绍,主要是根据王兆春著的《中国火器史》(其中水雷部分,引用了其他一些杂志上的文章介绍)简略缩写而成。

1. 炸弹类火器世界领先

地雷

采用机械自动发火装置真正意义上的地雷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早期的原始地雷或可追溯到宋代中国),并且地雷的种类和发达程度领先西方不少。

毛文龙在对后金作战中,就非常强调地雷的巨大作用。他的塘报中屡屡可见用地雷对后金军队造成重大杀伤的记载,而且他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也反复建议一定要重视地雷的应用。

《中国火器史》介绍,地雷是明代嘉靖时期的著名官员曾铣发明的(有些地方包括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在明代初期1413年焦玉的《火龙经》里有机头发火装置的地雷,但实则《火龙经》

当系嘉靖以后的明人之伪作,假托明初而成):“地雷是埋在地下爆炸的火器,创制于嘉靖年间。据《兵略纂闻》记载:‘曾铤在边,又制地雷。穴地丈许,间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沙,令于地平,伏于地下,可以经月。系其发机于地面,过者蹴机,则火坠药发,石飞坠杀人’。”

地雷被曾铤发明后,迅速被其他人不断改进,延伸出许多新品种。“据《筹海图编·经略三》记载,丹阳的邵守德用生铁铸成一种地雷,内装火药一斗多,并用檀木砧砧至雷底,砧内空心,安火线一根,通出壳外。地雷制成后,选择敌必经的要路,‘掘地成坑,连连数十,将地雷埋在坑内,用小竹筒引出火线,土掩如旧。’雷中安有发火装置,敌军经过时将其踩爆,群雷震地而起,火炮冲天,雷壳破片如飞蝗四出飞击,人马纷纷毙命。”

到了万历时期,明代地雷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武备志》卷一百三十就记载了十多种”,有踏发式地雷,有拉发式地雷,有点发式地雷,还有绊发式地雷。

踏发式地雷的代表是“炸炮”：“雷壳用生铁铸造,大小如碗,壳面留有一指大小的装药孔,以便向雷内装填火药,用木杵将火药杵实,并在火药中插入一个小竹筒,从筒内向外通出一根火线。使用时选定敌必经之路,将几个炸炮的火线相互串联,并接在钢轮发火的‘火槽’内,再从钢轮发火装置内通出一根长线,经过一根竹筒通到地面,扣在地物上。尔后挖坑将地雷和钢轮发火机埋好,用土掩盖。敌人若踩踉长线,牵动钢轮发火装置,即发火爆炸。与炸炮构造和引爆方式相同的地雷还有自犯炮。”

拉发式地雷的代表是“伏地冲天雷”：“伏地冲天雷是一种采用埋藏火种方法引爆的地雷。火种装于一个盆内,放于雷上,火线总连于盆上,靠近火种。其盘连于枪刀杆上,尔后用土覆平,不露痕迹,枪刀杆露在地面上引诱敌人。当敌军前来摇拔枪刀时,火种倒在火线上,引爆地雷,声如霹雳,给敌军以重大杀伤。”

点发式地雷的代表是“无敌地雷炮”：“无敌地雷跑的雷壳用生

铁铸造,形如圆球,有大有小,大者可装火药1斗,小者3—5升。装填火药后,用坚木将雷口塞住,同时由雷中引出3根火线,从竹杆中通出。作战前,先将雷体埋设于敌必经之通路,竹杆口露向自己一方,待敌进入雷区时,即令士兵点着火线,将地雷引爆。”

绊发式地雷的代表是“万弹地雷炮”：“万弹地雷炮的雷壳如坛，内装火药，口用土填紧。留有一个小孔，从中通出火线。使用前，将雷体埋设于敌军必经之路，同时埋设钢轮发火机一个，与坛口引出的火线相连，上用泥土和鹅卵石盖平，地面上安设一根同钢轮发火机相连的绊索。当敌军人马触动绊索时，牵动钢轮发火机，引爆地雷，杀伤敌军人马。”

西方使用地雷应该相当晚，真正意义上自动击发的地雷可能要晚于明代两百年左右。在王兆春著的《世界火器史》中，对西方早期地雷的记载几乎找不到，只有如下寥寥几行字：“欧洲国家使用地雷的年代较晚，俄军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于旅顺防御战中使用了跳雷和可操纵的应用地雷。”

另外还有一处说到：“欧洲在16世纪以前，火器的制造以枪炮为重点，爆炸性火器地雷、水雷，以及火箭等火器则没有多少建树。”

一些文章说到欧洲在15世纪要塞防御战里用到过地雷，或是类似宋朝时期中国那种原始意义上的地雷。

水雷

水雷也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比西方人提前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李崇洲在《中国明代的水雷——世界水雷的鼻祖》一文中对此有论述：“一般认为，水雷是18世纪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由美国人发明的，1956年10月，苏联的《军事知识》在‘漂雷’（水雷的一种）的发明和使用问题上，曾把1769年（土俄战争时期）俄军以‘漂雷’炸毁了土耳其通向杜那依的浮桥，说成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漂雷’作战。但实际上远在我国明代嘉靖年间，便有了有关水雷的记载。明代名将唐顺之（1507—1560年）在其《武编》一书中，有一则文字扼要介绍了水雷的构造和性能：‘水底雷’以‘大将军’为之。用大木作箱，油灰

粘缝,内宿火,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埋伏于各港口。遭贼船相近,则动其机,铤发于水底,使贼莫测,舟揖破而贼无所逃矣。”

水底雷实际上是最早的用机械击发的锚雷,属于击穿性水雷。《中国火器史》中说“水底雷实际上是一支密封于木箱中,借助机械式击发装置点火发射的火铤”。

世界上最早的漂雷同样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锦泉在《水雷小史》中说:“到了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我国又发明了一种‘水底龙王炮’,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以香作引信的定时爆漂锚雷。又过了十年,有个叫王鸣鹤的人,利用碰线引信原理制成‘水底鸣雷’。到明天启元年(1621年),又把‘水底龙王炮’和‘水底鸣雷’改进成碰线引信的触发漂雷。这就是当今有的国家还在使用的触发式水雷的前身。它是在水雷上安装一根或几根绳索,任其横浮于水面,当敌船在航行中碰上这些绳子就会自动击火引信,引起水雷爆炸、击毁敌船。”

水底龙王炮这种世界上最早的漂雷,用复杂的精心设计的慢燃烧信香为定时引信。“熟铁为壳,定时爆炸”,“设计了巧妙的通气管道,考虑了河水的流速,是明代中期火器研制者聪明才智的结晶”。

明代还有一种击穿性水雷,叫做“既济雷”:“雷体长1.5尺,直径4寸,内装发射火药二斤和两斤重的铅弹一枚”,“一般击穿一船需用8个水雷,使用时把他们平均钉在敌船底上,钉雷时一并药信点着,引燃发射火药,射出大铅弹,直接击穿敌船船底,使之沉毁”。

定时炸弹、手榴弹、烟雾弹、毒气弹、燃烧弹

嘉靖时期的曾铣不仅发明了地雷还发明了定时炸弹,其在明代的称谓是“慢炮”:“慢炮是嘉靖中期曾铣在镇守陕西三边时创造的一种定时炸弹。据《兵略纂闻》记载:‘曾铣在边,置慢炮法。炮圆如斗,中藏机巧。火线至一二时辰才发,外以五彩饰之。敌拾得者骇为异物。聚观玩玩者墙拥,须臾药发,死伤甚众。’”

手榴弹在当时的名称是“击贼神机石榴炮”:“(击贼神机石榴炮)是用生铁铸造的炸弹,其形似石榴,如碗大小,其作用类似现代的手榴弹,弹壳上留有一孔,以便向壳内装填致毒性火药和发烟剂。”

“使用时或抛至敌阵爆炸；或放置路旁，敌军人马踩踏后，炮内火种受震起火，引起爆炸；或使敌中毒后封喉，瞎眼。”

显然“击贼神机石榴炮”不仅有手榴弹的作用，也有现代的毒气弹、烟雾弹的作用。还有一种兼有毒气弹和燃烧弹作用的炸弹，明代叫做“万人敌”：“万人敌先用干泥制成空心球壳，壳面开有一个小孔，以便灌入致毒与燃烧性火药，并通火线在外，尔后将其装入木框或木桶中，以防其碎。作战时，守城士兵点燃火线，将其掷向城下爆炸，毒杀和焚烧敌军攻城士兵。”

自动发火装置的发明

明代中期的爆炸性火器，已经有三种类型的自动发火装置：“其一是采用燃烧有时限的香火，定时点燃火器中的火药，引起爆炸；其二是在爆炸性火器中预藏火种，待敌人触动火种，使其落入火药中点火引爆；其三是钢轮发火装置，其基本原理是用钢片敲击或急剧摩擦火石取火，引爆地雷。使用这种发火装置的地雷有炸炮、石炸炮、自犯炮、万弹地雷炮等。”

钢轮发火装置在嘉靖后期已经创制，但最准确记载有制作年代的是戚国祚等编纂的《戚少保年谱》：“该书卷十二记载，万历八年（1580年）四月，戚继光在组织人员研究修筑石门寨城时，制造了自犯钢轮发火装置。其布设和引爆方法是：在长城沿线的通路上挖掘深坑，将地雷埋在坑中，并在雷旁放置一个木匣，将地雷的药信通入匣中，匣底放有火药与一个钢轮发火装置，轮旁安有火石。从匣中经过竹筒通出一根引信，线的一段控制钢轮转动，另一段由守雷士兵控制，或横过通路拴在地物上，当敌军人马经过通路踩牵引线时（或由守雷士兵拉动），使钢轮转动，摩擦火石，点着匣底火药，引燃地雷引信。”

2. 枪炮类火器的革新

佛郎机的仿制和改造

佛郎机引入中国后，明朝人又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了许多改进和变型，下面列举一些《中国火器史》中提到的佛郎机种类。

(1) 戚继光制造的五种型号的佛郎机,其中“一二三号大型佛郎机用作舰炮和城堡的防御,四号中型佛郎机随军机动作战,五号小型佛郎机装备单兵使用”。根据茅元仪《武备志》中的记述,则当时“原则上已具有以火炮口径的尺寸为基数,确定弹重与装药量变化的关系,是明代中期火炮设计制造水平提高的一个表现”。

(2) 大样佛郎机,嘉靖二年(1523年)铸造大样佛郎机32门,“从长度与重量关系看,当是一种短粗型火炮”。

(3) 中样佛郎机,“出土实物中,发现刻有‘兵仗局造’‘中样佛郎机’字样的五件制品”,“铭文的编号表明,至万历二年(1574年),已经制成中样佛郎机17114件之多,远远超过《大明会典》记载的数字”。

(4) 小样佛郎机,出土实物较多,“由前膛、装弹室和尾部构成,尾部中空,可安插木柄,銃身附有钢环,可用背、扛、提等方式携带。子銃各重0.8公斤,口径16毫米,长155毫米,由前膛、药室和尾部构成,可嵌入母銃的装弹室中,进行轮流发射”。从铭文判断,实际制造的小样佛郎机要远远超过了文献记载的数量。

(5) 马上佛郎机,根据出土实物编号,制造数量比《大明会典》记载的至少多出八千六百六十一件以上。此佛郎机“銃身小而轻,便于骑兵使用”。

(6) 佛郎机式流星炮。“《大明会典·火器》记载,兵仗局在嘉靖七年用黄铜铸造160副流星炮,发各边试验。”出土实物六件,最大编号一千零二十一,超过会典记载的制造数量。

(7) 百出佛郎机。这是翁万达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研制的佛郎机式军用枪。“枪身长3—4尺,配子炮10个,预先装填好弹药。作战时,将子炮从枪口装入管中,涉毕后将子炮倒出,尔后再装第二个子炮,连射连装,循环不断,提高了射速。”枪口可安装长六寸的戈形叉锋,在子炮射毕后,可用以刺敌,步骑兵都可以使用。

(8) 万胜佛郎机,“从枪口装填子炮,子炮内装填3钱火药及3钱重的弹丸一枚,连装连射,射程可达200步”。

(9) 连珠佛郎机,“明廷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批准山西三关自制的一种双管枪,管用熟铁制造,合用一柄,每管装小炮一个,可连续发射”。

(10) 无敌大将军炮,旧式将军炮体重千斤,难以移动,因此改制成便于机动的车载式重型佛郎机,每门配子炮三个。“一发五百子,击宽二十余丈,可以洞众。”这种车载重型佛郎机,需要一辆大车进行机动。

(11) 铜发贡。构造与佛郎机不同,也是嘉靖时期传来的外来火器。“不但能以其发射的大弹丸产生击杀和摧毁作用,而且还能产生强烈的炮风和巨大的声响,‘其风能煽乎杀人,其声能震乎杀人’。”

各种新型火铳的研发

(1) 掣电铳,由赵士桢研制,“兼采欧式火绳枪和小佛郎机之长而制成的新式火绳枪”,“其形似火绳枪,单兵可举而发射;其有子铳似小型佛郎机,可轮流发射”,“由于掣电铳使用子铳,所以是射速较快的单兵铳”。

(2) 鹰扬铳,也是赵士桢研制,“既有小型佛郎机之轻便,又有大鸟铳命中精度之高,是兼有二者之长的新型火绳枪”。“作战时,敌人若用火绳枪发一弹,鹰扬铳则可发 3—4 弹,可见射速之快。若将此铳安置于轻车之上,则多车齐进,连续射击,万弹齐发,其势之猛烈,不亚于小型大将军炮,而其纵横进退,俯仰旋转,则较大将军轻便,是一种机动性好,杀伤力大的轻型火铳。”

(3) 旋机翼虎铳,是赵士桢对北方骑兵用的三眼铳做出革新、改良的火器,“使之便于左手持铳对敌,右手悬刀燃火发射,射后即以刀迎敌”。

(4) 三长铳,是赵士桢结合欧洲火绳枪的轻便,鲁密铳的快捷,日本鸟铳机床的便利,再加强威力、灵巧和稳定性而研制出来的一种单兵铳。

(5) 迅雷铳,是赵士桢研制的多管火绳枪。迅雷铳铳身有五支铳管,共重十斤。“射毕一管后,将圆盘旋转 72 度,使第二支铳管对

准目标,继续发射,其余三管依次射毕后,射手立起,用火点燃木柄中火球,使其喷焰灼敌,当士兵冲近敌兵时,将铳身倒转,以铁制枪头刺敌。这是一铳三用的兵器。”

(6) 震叠铳,是赵士桢研制的双管铳,“一经点火后,先将上铳中的弹丸射出。当倭寇起而冲突时,下铳弹丸正好射出,倭寇不知此铳特点,仍按常法作战,结果被下铳弹丸射中”。

(7) 赛贡铳。贡是对“gun”的音译,“赛贡”意思是比引进的火器更为先进的火铳。其特点是既可以像鸟铳一样便于机动,同时又具有佛郎机一样较大的杀伤力。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里有介绍。

(8) 连子铳,“前部管壁开有一个圆孔,通过圆孔可垂直插入一个能自动落弹的小铁筒,筒中事先装填若干鱼贯排列的弹丸,能依次落入铳管中”,另外在铳管中火药也按照顺序分节分段,用厚纸隔离,药线相连。每节火药筒对应发射一颗子弹,是一种能自动连续发射子弹的枪械,“由于省去了装填弹药的时间,所以连子铳的射速比单发铳要高得多”。

(9) 一窝蜂,“一次能射百弹,散布面大,命中的机会多,而且轻巧灵便,士兵可用皮带将其挂在腰间携带”。

(10) 剑枪,是一种三用兵器,集火枪、棍棒、长枪三位于一身,有准星照门,命中精度比快枪高。

(11) 双管枪,有两种构造,一种是两铳夹一长杆冷兵器,另一种安于长杆的两头。前者的代表有夹把铁手枪和飞天神火毒龙枪,飞天神火毒龙枪还能作为火焰喷射器,一枪三用。

(12) 三管枪,主要代表是三眼铳。

(13) 四管枪,《大明会典》记载名为“四眼铁枪”。

(14) 五管枪,五支枪管以手柄为中轴对称平行排列,点火后可连射或齐射,提高射速和杀伤效率。

(15) 七管枪,只有七星铳一种,制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杀伤力较大。

(16) 八管枪,只有八斗铳一种,“作战时,士兵转动铳柄,依次轮

流点火发射,装填一次,可射八弹,大大提高射速”。

(17) 十管枪,有两种构造方式,一种是单管分十段,另一种是十管绕柄平行排列的子母百弹銃和连珠銃。子母百弹銃作战时由身体强壮的士兵发射,一次可射百弹,具有较大杀伤力

(18) 三十六管銃。构造方法是先制作一个车轮式圆盘,安十八根辐条,辐条两侧各安一个火銃,全轮共安三十六个。轮、銃全重约二百余斤,行军时,一骡驼两轮,并带发射架一个。发射时,射手转动车轮,依次轮流发射,射完一轮再换一轮,可连续发射七十二枚弹丸,大大提高射速。

(19) 燧发枪。崇祯八年(1635年),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阐述了自生火銃即燧发枪的形制构造,“这种枪是将鸟枪用火绳点火的装置,改进为用燧石发火装置,从而克服了用火绳点火怕风雨的弱点”。并且这种枪“不用像鸟枪那样事先点燃火绳,只要在使用时连续扣动扳机,摩击燧石,便可连续发射,因而简化了发射手续,提高了射速”。

轻型火炮

(1) 虎蹲炮,一发能射上百枚小弹丸或五十枚较大弹丸,散布面大,比鸟銃更有效杀伤密集进攻。戚继光又将此炮装备骑兵使用,是一种较好的骑兵炮。口端备有大铁爪、铁绊,可以固定在地面,消减后坐力。

(2) 旋风炮,便于机动。

(3) 飞蒙炮,炮弹内装毒药和铁渣,炮弹射出,人马中之,瞬息立毙。

(4) 发射爆炸弹的火炮,主要制品有嘉靖年间兵仗局制造的毒火飞炮、铁棒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轰天霹雳猛火炮、飞云霹雳炮、毒雾神烟炮、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炮内装有数量较多的发射火药与一枚铁壳爆炸弹。弹内装有致毒火强燃烧性火药。

大型火炮

(1) 大将军炮,主要由明初小型神机炮演变而来,现存实物大将

军炮,口径在一百毫米左右,外口径两百毫米左右,全长一米四左右。从现存大将军炮编号来看,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五月到十月至少制造了一百一十门大将军炮,可见当时军工厂造炮能力之大。重的大将军炮,重一千斤,用车载运,称为大神铕滚车,增加了机动性、灵活性,见者胆寒。还有叶公神铕车炮,炮重两百多斤。

(2) 威远炮,主要由大将军炮去箍减重,更提高了机动性,小的重一百斤,大的重两百斤,可用于野战,也可用于进攻险要,是多用途大型火炮。

(3) 攻戎炮,安装在双轮炮车上,随军攻城略地,进行机动作战。

(4) 千子雷炮,用铁箍扣于四轮车上,抵近敌军发射时,去掉隔板,给敌重大杀伤。

(5) 百字连珠炮,管壁开孔可安一个装弹咀,从装弹咀一次能向管内装填上百弹丸,尔后进行连续发射。

(6) 灭虏炮,重九十五斤,和灭虏车配套使用。

明代的大型火炮如叶公神铕、攻戎炮、千子雷炮、灭虏炮都是车载炮,实际上是车炮合一的重型火炮。它们便于机动,提高了火炮参战速度,火炮用车运至战场,既可在车上发射,还可转换方向射击敌军人马。此外兼有挡敌和击敌之用,炮车可以建立车营,阻挡骑兵。

3. 火箭类武器的高度成就和喷筒类火器的蓬勃发展

二级火箭

中国火器史中说“二级火箭是明代火箭技术发展的一大成就,堪称现代火箭先声。其代表性作品有火龙出水和飞空沙筒两种”。

火龙出水是运载火箭加战斗火箭的二级火箭,也可以算得上最早的舰对舰导弹。

龙身下前后共装四个火箭筒。前后两组火箭引线各将其引线扭结在一起。前面火箭药筒底部和龙头引出的纽结线相连。发射时,先点燃龙身下部的四个火药筒,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火龙出水飞行,可远至二到三里。

当四支起飞火箭火药燃尽后,恰巧点燃龙腹内火箭火线,射向敌

人。这种火箭已经应用了火箭并联(四个火药筒)、串联(两级火箭接力)原理。这种火箭多用于水战。

飞空沙筒是一种返回式火箭,供起飞和返回用的两个火药筒,颠倒绑附于箭身前端的两侧。第一级火箭点燃,射向敌人,当火焰和毒砂喷完后,返回火箭的火线被点燃,火箭返回。

《中国火器史》说“二级火箭的创制,是我国明代火箭技术发展的一大成就,它既是单级火箭的必然发展,又是现代多级火箭的先导,反映我们祖先对火箭发射原理最初的运用,在火箭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单级多发火箭

明代的单级火箭技术也相当发达,尤其是单级多发火箭,在战场上杀伤面积巨大。

群豹横奔箭,一筒四十支,点火后四十支齐发,射面横宽十丈以上。若在野战中横列十几筒,杀伤正面可宽达一里左右。

还有群鹰逐兔箭,六十支齐发。

百矢弧箭和白虎齐奔箭,一百支齐发。

喷筒类火器

“喷筒是以喷射火焰焚烧和毒杀敌军人马,烧毁敌军粮草积聚的管形喷射火器。”就相当于现代兵器里的“火焰喷射器”。

到了明代中期,新品种创制甚多,形成了发展高潮,主要制品有飞天喷筒、漫天喷筒、毒龙神火喷筒。

4. 明代火器发展和西方相比各有所长

从上面对明代火器基本情况的介绍可以看出,明代火器发展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炸弹类火器和火箭类火器上领先于西方;在火枪和小型火炮上,在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战争的刺激,逐渐赶上西方,甚至从研发的活跃,改进革新的层出不穷,以及品种的丰富来看,有反超西方的势头;在重型火炮上,因为面临的战争对象不同,战争需求不同,确实落后于同期的西方,但随着积极引进,这种落后情形也迅速扭转。

当然这种火器发展的特点,除了和战争环境刺激的不同以外,也和东西方科技发展的特点有关,中国试验科技一直比西方发达,所以从火药到最初的火枪、火箭、火炮都是中国人发明,而西方是引进了中国的技术后,才开始了自己火器发展的道路。

但西方古希腊有一套理论化程度比较高的几何三角数学知识体系,这对火炮进一步发展,提高性能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对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西方来说,一些重要的科技知识,基本都是从外引进的,造纸、印刷、火药这些基础科技是中国传去的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古希腊的《几何原本》,还有许多代数知识,化学知识,他们也都是从阿拉伯世界,还有拜占庭那里获得的。

就整个科技水平而言,他们和明代的中国相比,并不占据真正的优势。一旦《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古典科技知识体系传入明代中国以后,整个科技发展的势头,仍旧是明代领先于西方。这在火器上也是如此。

因此,并不像许多人一直认为的那样,明代火器发展落后于西方,所以只能引进西方。真实的情况是,中西方当时各有所长,而明代中国由于开放的心态,对科学开明的态度,发展的势头在逐渐超越西方。

三、用大炮策略把明代火器的发展带上了歧路

本来明中期以后,中国火器的发展根据自己的需要,沿着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向前大步迈进,主要体现在炸弹类火器,火枪,轻型火炮类火器,火箭类火器的蓬勃发展上。但在明末尤其是天启以后,由于引入红夷大炮的那种炫目的强大威力给君臣上下的深刻印象,导致政府和官员、将领将火器研发的重心开始朝重型火炮的方向过度倾

斜。尤其是在袁崇焕鼓吹“凭坚城，用大炮”之后，明政府更是把大部分资金和人力、物力投入到了重型火炮的研发和制造中。

在政府财力充足的情况下，这本来是没有什么的，毕竟重型火炮的发展是迟早的事情，早一点动手也不是什么坏事。但要命的就是当时明政府的财力是极度紧张的，一旦在火炮上投入的力量过大，那对于其他火器的发展显然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所以在天启到崇祯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其他轻型火器发展基本陷入了停滞中。就如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已经阐述了燧发枪的制造方法，如果能像嘉靖时期制造佛郎机一样，大批量制造燧发枪并装备部队，再不断改进，本是迅速提升明军战斗力的一个良机。

但问题是当时明政府在军器制造上已经把主要的资金都投入在造炮上了，还哪来其他钱呢？

红夷大炮这样的重型火炮，威力确实巨大，但在明金战争中，对明方的作用有限。用于野战，则笨重不堪，运输不便，而且杀伤集中在一个小区域，面对灵活机动的骑兵无法起到太大作用；用于守城，没有这个炮，实际上同样能守住，如果后金采取长期围困策略，那有红夷大炮也没用。

祖大寿守大凌河，守锦州，两次围城最后投降，只不过是把大批制作精良的大炮白白送给了后金而已。《中国火器史》中说：“被围困在大凌河近百天的重兵祖大寿部明军，因城内粮尽援绝，于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开城投降，祖大寿败走锦州（应该是被后金放回来的——引者注）。据当年闰十一月十九日明军兵部的报告中称，城中红夷炮、灭虏炮、将军炮等各式火炮 3500 门，以及各种军用枪、杂型火器、大量火药与弹丸，尽为后金军所有。”

三千五百门各式火炮，就是对现代战争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结果因为袁崇焕、孙承宗等人推行的困守孤城，“凭坚城，用大炮”的愚蠢自杀战略，白白就送给了后金！

这些炮对守城来说，没有太大意义。而落到了后金手里，就成了攻破坚城最有力的帮手。明朝等于是用大把的钱给后金方制造攻破

自己城池最锋利的武器。

崇祯时期的松锦之战，锦州被围困，明朝不得不让洪承畴带着全部家当即十三万的军队去援助锦州，被后金围城打援，锦州的围没有解，这十多万的援军自己就被围困在了松山。

“在松锦之战的最后阶段进攻塔山时，清和硕郑亲王济尔哈郎、多罗贝勒多铎，下令清军在塔山城西列红夷炮。四月初八日，用红夷炮猛轰城垣，次日城墙被轰开20余丈，清军步骑兵一拥而入，全歼城内三营明军7000余人。四月二十一日黎明，清军又以红夷炮轰击杏山城，毁城墙25丈，明军开城降。”

明朝和北方的骑兵作战，最需要的武器不是笨重不堪、运输困难的红夷大炮，而是地雷、手榴弹、射速快、杀伤面积大的各种类型的步兵用火枪，还有单级多发火箭，以及各种灵活机动的轻型火炮。

这些火器本来一直是明朝中国火器的长项，有一些甚至遥遥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如果明朝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利用好这些中国本土火器的威力，不断改进革新，那对后金来说，才是最大的威胁。

别的不说，光是把地雷、手榴弹（“击贼神机石榴炮”）、各种火焰喷筒进一步改良，加大威力和使用的方便程度，大规模装备部队，加强边境防御，加强单兵作战能力，就足够让后金骑兵吃不了兜着走，这比重型火炮要实用得多了。毛文龙在条件艰苦，器械简陋的情况下，善于利用地雷，就已经给后金造成重大杀伤，让其叫苦连天了。

客观地讲，明人把研发力量投入到重型火炮中，也确实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创造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黄一农教授在2004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的《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中对此有一大段论述：

虽然明人在嘉靖年间即已能铸出数千门铁心铜体的佛郎机子铳（重约8—10斤），但类似“神威大将军”重达数千斤的铜铁炮管，实在极其罕见。它巧妙地利用铜之熔点（1083℃）远低于

铁(1538℃)的物理性质,于铁胎冷却后再以泥型铸造法或失蜡法制模,并浇铸铜壁,如此即可透过外铜凝固时的收敛效用而增加炮体的抗压强度。即不再需要以昂贵的铜来铸造整门炮,就可拥有铜炮耐用的优点。也因为如此,“神威大将军”在炮口的管厚与内径之比(0.54:1至0.75:1)就小于当时一般的铁炮(约为1:1),该炮可以铸的较轻,运载时也因此较易。

该先进的铸炮技术应早已为明人掌握,北京八达岭中国长城博物馆藏有崇祯元年(1628年)所造的前装滑膛红夷型火炮一门,从炮口可见其管壁为铁心铜体,有准星、照门和炮耳,火门原设计有盖(现已失落),并以铁环替代常见之尾珠。该炮之铭文有云:“崇祯戊辰年兵仗局铸造,捷胜飞空灭虏安边发烦神炮。头号,铁裹铜发烦炮一位,用药二斤,宜少勿多,打五、六木榔头不等,木马子一个,二斤重铅子一筒,或再添一斤铅子亦可”,使用时主要是以霰弹的方式杀伤敌方人马。由于此炮之内径为7.8厘米,而当时西方火炮通常采取0.6厘米的游隙值(windage,指炮管内径与弹径的差值),故若发射实心铁弹的话,弹重约合2斤,再依“以一摧二”的原则推估,应用药1斤。惟该炮在使用总重2—3斤的小铅子时,却用药2斤,虽铭文上提醒应“宜少勿多”,但火药用量明显较平常红夷炮多50%至100%,铁心铜体的高质量应即是其炮管得以承受较高膛压的主因。此故,虽然天启年间已有红夷型的发烦炮出现,但崇祯元年以此一新法铸成的第一门(所谓的“头号”),或因此获赐“捷胜飞空灭虏安边”之徽号,并以“发烦神炮”之名与一般的发烦炮区隔开来。

明人所独创的铁心铜体铸炮技术,在崇祯后期仍持续发展,并铸成较“发烦神炮”更大的红夷炮。1996年,笔者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见到一门铁心铜体炮,炮身長366厘米,炮口内径10厘米,外径35厘米,底径约44厘米,阴刻之铭文为“钦差提督军务镇守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捐资铸造,定辽大将军,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吉旦,督造掌印都司孙如激、总委参将王邦

文、打造千总石君显”。查李约瑟在 1952 年访问辽博前身的东北博物馆时,不仅见到此炮,还详细描述了另一门更大的“定辽大将军”,称其炮身長 12 英尺、内径 5 英寸,知当时仍存在至少两门由辽东总兵吴三桂于宁远捐资铸造的“定辽大将军”。

根据目前一般冶铸史的教科书,均称 1860 年代美国军官 Thomas J. Rodman 在南北战争时曾“发明”一种铸炮新法,该法采用中空的模芯,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此法即可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所铸之炮可以更大(内径可达 51 厘米),且其耐用程度更可达到先前的五至数十倍。铁心铜体的铸法虽使用两种金属,但其原理应很接近 Rodman 法的雏形,只不过明朝的“发愤神炮”、“定辽大将军”及清朝的“神威大将军”较 Rodman 炮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

但遗憾的就是这种投入在大炮研发上的创造力,显然是用错了方向的,反而帮了后金的忙。

附录三

提醒后金绕道攻关是否为 先见之明问题的辨析

有一些人提出后金在天启年间还未能和相关蒙古部落勾结,因此提醒绕道攻关的可能性不但不是先见之明,而且是别有用心。甚至一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乃至崇祯二年(1629年)初的时候,喀喇沁部和明朝的感情还是很好的,或至少是中立的,袁崇焕接济的措施也是完全正确的,崇祯皇帝的训斥、提醒才导致坏事。

那究竟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呢?

我这里不妨对这种观点做一下辨析。

天启年间的分析稍微复杂,我们放在第二部分说,先说崇祯初年的事情。

一、崇祯初年的情况

在我的文章里提到毛文龙提醒过十四次后金绕道入关的可能,而仅仅在崇祯元年就高达六次之多。

其中毛文龙的提醒中最为明确的一次出现在崇祯元年九月的塘

报中,这份塘报如下:“又据来乡张大头等禀称:听得西夷两大营,一营名克尔趁,在喜峰口一带讨赏,一营名入哈嘛,在宣府,大同讨赏。今克尔趁等带领部落鞑五百余名,到奴酋地方做买卖,与憨攢刀起誓,情愿齐心共攻南朝。于八月十一日,引领奴贼从沈阳往西,相度那处关口地利好进兵。职一面挑选精兵相机截杀外,一面飞报。”

东海鹤放道人眉批:侦探煞甚分明。

那个情报准确不准确呢,商羊舞在其《袁崇焕“崇米资敌”辨》曾先后列举“清代官私史书一致记载”,以及《满文老档》记载喀喇沁部在崇祯元年归附后金的事实,尤其是满文老档的记载:“八月初三日,与喀喇沁部议和,誓告天地书曰:‘满洲、喀喇沁部两国,同心修好。’”

但由于这些记载不符合商舞羊粉饰袁崇焕的意图,一概被其否定。

这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商舞羊自己提供的史料,也就是《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一书,其中有一则档案是《满文老档》八月初三日后金与喀喇沁盟书的原文,摘引如下:“满洲、喀喇沁我们两国为结盟和好,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置一碗酒,一碗肉,一碗血,一碗枯骨,许下诺言,对天地起誓。如不履行此誓言,喀喇沁与满洲不友好,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如有私下密约,或堕入察哈尔之奸计背叛。喀喇沁遭天谴责,执政之拉式奇布、布颜、莽苏尔、苏布地、庚格勒为首几个大小塔布爱等遭殃,不得长寿,如同这碗血,流血而死,被按埋于地下。如同这碗枯骨,其骨散败。如果履行其对天盟誓之言,天地保佑,获得长寿,子孙万代永享太平之福。”

这份盟书最被商羊舞强调的和《满文老档》的不同之处在于加上了“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的字样然后他据此得出结论说,这是代表喀喇沁中立。

显然商羊舞为了寻找给袁崇焕粉饰的论据,已经到了不惜令人啼笑皆非地歪曲史料本身意思的地步,他需要的是到辞典里去找一

下“中立”的名词解释。

这份文件已经是彰明昭著的喀喇沁与后金结盟和好,所谓“与明朝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就是把明朝当成冤大头,一面和明朝的敌人后金结盟,一边要继续从明朝那里骗取经济好处。就这样一种状态,居然被商羊舞解读成保持中立?对于这种曲解史料之勇气和精神,我们是不得不表示佩服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毛文龙的塘报,后金和喀喇沁对天盟誓是在八月十三日,毛文龙的东江塘报则是九月初五日发给朝廷,说的也是八月份的事情。

这是偶然的巧合么?当然不是,毛文龙得到的情报是“听得西夷两大营,一营名克尔趁,在喜峰口一带讨赏,一营名入哈嘛,在宣府,大同讨赏。今克尔趁等带领部落鞑子五百余名,到奴酋地方做买卖,与憨攒刀起誓,情愿齐心共攻南朝”。

显然这里说的在喜峰口一带边境活动的克尔趁就是喀喇沁,只不过由于读音上口口相传造成的差异,因此造成叫法的不同。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毛文龙的情报已经是极其准确的了。

既然喀喇沁和后金在崇祯元年八月结盟已经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那么崇祯二年,袁崇焕策米资敌也就是不争的事实,而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昏聩行径所做的训斥,即“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卖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果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寡,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及禁物。路将等官,倍加侦查,如有疏违,以通夷论罪”,其正确性是一目了然的。

而商羊舞的如下议论,“实际上正是崇祯错误的干涉了袁崇焕的对喀喇沁的安抚政策,把一个尚可可在明清战争中维持中立的喀喇沁直接推到后金的怀抱。与其说袁崇焕资‘敌’,倒是不如说崇祯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敌人罢了”,这种论调离奇程度确实很惊人。

《蒙古史研究》第五辑的《明末清初的哈喇慎与蒙古八旗》一文交代得很清楚:“朵颜苏布地与后金结盟后,仍驻牧蓟辽塞外,部落近

万人，多次参加了后金对外战争。《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对他的活动记载较详，说：‘（天聪）三年（也即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敕所部遵国宪。六月，苏布地及图鲁巴图尔孙色棱等率所属来归，诏还旧牧。十月，上征明，以塔布囊布尔哈图（即布尔噶都，他是黄金家族后裔，不可能是塔布囊）为导，入遵化，驻兵罗文峪。’”

商羊舞的逻辑其实就是明朝对蒙古部落只能保持最大程度的信任，坚信只要供给蒙古部落物资，他们就一定站在帮明朝这边，绝对不会倒向后金，而对自己的军队毛文龙部应该保持最大程度的怀疑，所以必须掐断经济供应，直至不经任何审讯直接杀死。

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固有偏见能够到这种程度，已经是让人佩服之情如滔滔黄河之水一样了。

二、天启年间的情况

在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中，一共有五次提醒是在天启年间发出的，另外九次提醒集中在崇祯元年和崇祯二年。

虽然提醒密度是相对比崇祯年间低了许多，但是否意味着毛文龙的提醒是空穴来风，是无中生有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明朝官员提醒后金绕道进攻可能性的情况。

熊廷弼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就提出“如敌以数十万金饵虎墩诸部入犯昌、蓟、宣、大”，这就不必说了。

按茅元仪的《督师纪略》，三屯营的王威也曾经提出后金绕道蓟镇进攻的可能性，由于内容不够具体也就不必说了。

提醒内容比较具体的有天启三年（1623年）的潘云翼。他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潘云翼上言：‘近据塘报，东夷假道谋犯，已有情形。而西虏（）乘机讲赏，或阴与奴合，亦未可知。然而提防之在我，修守要必先时。以臣料逆奴狡计：非装作西虏以窥喜峰之路；必倡言

假道，以缓山海之防。则关门兵马所当（）为整顿。至于喜峰诸口，言之殊可寒心。夫喜峰一口，可通万骑。夏秋时河水作金汤，冬来冻结即无所恃。且青山口、（潘）家口、董家谷、铁门关，处处皆冲。本路主兵合马步应援官军仅六百有奇，秋防分布合主客南北官军仅六千有奇。若不亟议搜调，严为设防，误事机，噬脐何及。’”

还有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的阎鸣泰，上疏说得到情报，后金有可能绕开宁远，而从蓟镇入关：“说者咸谓榆关为前茅，蓟门为后劲，固矣。近见抄化营中有什喇嘛寄一禀云：‘奴酋心大，兄关内城守当坚而又坚，精而又精，巧而又巧，不可弛懈’。味此数语，奴贼积怨深怒，设谋定计，结连西虏，又不知欲如何出我不意，而冀一释憾之为快者。况榆关一区，芳饵从积，则一转而蓟门为前茅，亦不可知，此职之大惧也。”

还有天启六年八月的时候，南京御史蒋守藩说：“督师疏云：‘朵颜诸虏，阳顺阴逆’；总兵左辅塘报云‘奴酋与西夷结婚’，果尔。则款虏可长恃耶？”

是不是这些人和毛文龙一样无病呻吟，杞人忧天呢？

按照商羊舞的回答是当然的，那就让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事实吧。

按照商羊舞的说法，“喀尔喀五部和后金屡有交战。宁远大战后，喀尔喀更是多次截杀后金使者”。这里显然又是商羊舞故意误导他人，以偏概全了。

薄音湖写的《明清时期内蒙古各部的名称》中有这样的介绍：“喀尔喀万户为左翼三万户之一。因最初牧地在哈喇哈河（今中蒙边界哈拉哈河）流域，故以河为万户名称。喀尔喀万户由达延汗之子纳力不剌台吉、格列山只台吉分掌，格列山只台吉统领的部分后来西迁，被称作外喀尔喀（即清代的外蒙古），纳力不剌台吉统领的部分后来南迁，因此被称作内喀尔喀。纳力不剌台吉之子虎喇哈赤的五个儿子兀把赛、速把亥、兀班、炒花、答补，分掌扎鲁特、巴林、叭要、我着、弘吉剌五部，形成内喀尔喀五部落，又因五部一度在炒花控制之下，被称作‘炒花五大营’。17世纪初，驻地在今内蒙古通辽市东南

辽河流域。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内喀尔喀与后金订立对明攻守同盟。不久关系破裂,1623年至1626年遭后金征讨,部众溃散,多降附后金。”

1623年是天启三年,1626年是天启六年,也就是从天启三年一直到天启六年正是喀尔喀不断逐渐被后金征服,降附后金的过程,而在商羊舞所用的一些断章取义的记载中,比如《三朝辽事实录》中记载的小规模战斗,就变成了喀尔喀全体始终和后金对抗了,这不能不说有意在误导他人。

而他引用的这段记载“奴酋哨马探至歹安儿营,被歹安儿精兵杀死奴部五十余名,捉获活夷二名,马五十匹。奴问是谁家兵马敢与我厮杀,复带兵退到黄河沿。至二十五日早将歹安儿兵马围住,有歹安儿并妻跑出,其余部落尽被杀掳,炒花也跑过黄河北躲避”。恰恰是从侧面证实了内喀尔喀各部“1623年至1626年遭后金征讨,部众溃散,多降附后金”的事实。

《蒙古史研究》第七辑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写的《四子部落迁徙考》一文也写到“分布于辽河流域的巴林、扎鲁特、弘吉剌特、巴约特和乌济耶特等内喀尔喀五部,也在爱新国(即后金)的拉拢和打击下,纷纷进入爱新国的统治之下,只有一部分被察哈尔吞并”。

这段话所指的时间是在1626年努尔哈赤授奥巴以土谢图汗名号和1627年林丹汗被迫西迁之间,显然其时间段同样是在天启年间。

而《满文老档》的记载也能证明在天启三年的时候,后金就和喀尔喀部落有勾结联系。

《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七月记载道:“初四日,蒙古兀鲁特诸贝勒誓词曰:‘闻英明汗之名,见恶于察哈尔汗,为仰赖英明汗而来,来之即蒙汗怜悯如子,倘不思汗之眷养,我等蒙古诸贝勒,怀有邪恶之心,则其怀邪恶之心之贝勒,必为上天鉴查,以至祸患及身。’”

又“汗曰:‘喀尔喀之诸贝勒上再无主。彼得各自随意而生,为求生活更加安逸,前来归附,兀鲁特诸贝勒,恶其蒙古汗,故慕我来归,

凡此来归之诸贝勒若有罪，则于我八贝勒同等视之，死罪则免其死，遣还故地……凡娶我之女人，勿以吾女为畏……至于尔等蒙古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以女妻幕友（看不清）大臣等，每凌其夫扰害其国者，我亦有所闻，倘我女有如此凌其夫者，尔等当告诉我’”。

仅仅是随便翻阅老档就能摘录到如上资料。

这不过是为简单说明商羊舞之文不尽不实而稍微写一下，有趣的是商羊舞一提到明方情报中的“奴酋与西夷结婚”，他就能扯到林丹汗上去，并讥讽明方相关情报是穿越云云，而实际上在《满文老档》里，关于后金和西夷也就是众多蒙古部落建议结成姻亲关系的数不胜数，仅仅我上面摘引的内容就提供了证据。

最后再回到天启四年（1624年）的时候，毛文龙塘报中提供的情报。

毛文龙的第一次提醒出现在天启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塘报中：

“据来乡徐孤臣报称，奴贼自上年以来，与最亲信的李伯龙，今更名李茂隆，并李永芳、黄建极、刘勉之、石国柱等终日商量说，东江人马最多，粮草不继，军民相食，人都饿死，可速令沿边老寨、东山、并南卫一带人民收进辽阳，只此压边。又见多驼礼物，买米西达子借路进兵。憨酋受奴之物，回说‘你们两家自去厮咬，输赢尽你，我不管你’……‘待城造完，决于今年冬底，要从潘家口进攻丰润等县，从冷口进攻台头，建昌无备之处，一鼓攻进边墙，得了中国，管他关上雄兵，江东这敌尽有多少人马都是我的。又喜今西达憨酋是我买到，招养各家西穷达子万余，且得喜峰进攻，夹带奸细消息，肯如前番痴误！不乘此时西去，更待何时？’”

“今奴贼决意出边修筑辽阳旧城，跨据福余、泰宁之间，收养新附乌合之众，东恃代子河二道，得安耕凿。往西有诸子河、大凌河、小凌河、兴水县河、滦河五道，夏秋水险，料其难涉，决不能渡。必待隆冬冰冻，相距潘家、董家口等五百余里，早晚可逾朵颜，直逼京师。所建之策，志为不小，乘时窃发，急宜提防。”

“卑职夙疑此着，今果萌举，是以汲汲整肃人马，相机捣掣，阻其

西向，攻其必救。”

“山海兵多备久之说，固不足信，而潘家口、冷口诸隘之攻，断不可玩。如或弛防疎守，贼薄城下，将何以待之？比邻相睦，实其内猜，犬羊之性，焉能持久？速谕在在当关将士，毋令惊惶，安心修守。早为接济前项粮饷硝磺器械船只，弗误事机，俾卑职得蹶奴后，扑其祸萌，破彼木牌攻城之法，严防喜峰进贡之奸，曲抚西夷于关外，毋令窃窥内地。东虏平，而西虏自然静矣。”

首先这里的“憨酋”是否一定是指林丹汗呢，我们注意到在毛文龙的塘报里“憨”并不是特指林丹汗，因为就在前面引用过的毛文龙崇祯元年的塘报中说“今克尔趁等带领部落鞑子五百余名，到奴酋地方做买卖，与憨攒刀起誓”，显然这里的“憨”不是指林丹汗，而是后金的皇太极，所以所谓的憨，是在毛文龙那里的一个通称，相当于头目、首脑之意。

当然，在天启四年的这份塘报中指林丹汗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正如于多殊、赵艳玲在论文《明末四方势力的角逐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所说的：“林丹汗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趁火打劫，在明与后金的矛盾中巧妙周旋，求得生存、发展、强盛。”

这就如同魏、蜀、吴三国，刚才是孙、刘联手对抗曹操，转眼就可能吴、魏勾结来算计关羽了。

毛文龙这里的情报极其具体，如果他要靠虚假情报来达到其他目的，是根本不必费这份心思的。

那么《满文老档》在天启四年也就是天命九年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记录呢？

诡异蹊跷的情况出现了！

查《满文老档》天命九年正月从元旦到正月二十九日的记录，几乎是逐日记载，内容极详细。

到在正月二十九日的记载结束后，突然直接跳到了四月二十二日，然后记载了四月二十二日的事件后，又直接跳到了六月二十日，其他月份的记录也没有了。

也就是恰恰在毛文龙二月二十七日塘报报告后金这一年的绕道计划时,这一年大部分的记录都没有了(甚至其中连【原档残缺】的字样都没有)。

当然我们不能一定断言这就是后金和清的统治者故意删除、掩盖,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段时间的档案记录已经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就不能再以后金档案无记载来武断否定毛文龙情报的真实性了。

三、总 结

按商羊舞的逻辑,明朝大概只有在搞到后金和蒙古各部族来往的所有文件档案,明白无误,百分之百地确定后金和这些蒙古部落勾结了,然后才能防备绕道蓟镇入关的可能性。

但显然,这是典型的愚人思维方式。

在实际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是不可能这样的,明朝应该是捕捉一切可能的蛛丝马迹,不是麻木不仁,而是把警觉程度提到最高,对一切相关情报都要及时重视,然后才能占据主动,否则下场就是己巳之变的结果。

正如潘云翼所说:“然而提防之在我,修守要必先时。”

正是因为袁崇焕抱着商羊舞一样的思维方式,总觉得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后金不会冒险云云,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蒙古部落勾结后金云云,所以才导致潘云翼所说的“不亟议搜调,严为设防僥误事机,噬脐何及”在崇祯二年变成了现实。

有人会说,如果一开始就要警惕后不绕道可能性,严守蓟镇,那在明朝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岂非难以兼顾。

但实际上如果考虑明朝财政上的问题,在不改变财政制度的情况下,那修筑关外宁远、锦州等城,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从一开始就应该把精兵强将放到山海关和蓟镇一带的防线上。

阎崇年也把天启年间提出警报当成是先见之明,为了给袁崇焕脸上贴金,不惜篡改史料。但客观而论,虽然阎先生的史德确实不敢恭维,但是至少在见识水平上,还是比他的追随者如商羊舞要高明一些,对这一点只能作如是观。

附录四

《度支奏议》和东江塘报天启 七年东江军饷摘录对照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十九日具奏,为查核历年收过钱粮等事:

天启七年(1627年)收过山东布政司差官李一公解登天启六年(1626年)分冬季饷银五万两;登莱抚院差官叶茂勋解到勘追前任巡抚陶朗先委官李先春等赃罚银入官还官银六千八百八十三两零六毫六丝二忽;山东布政司差官吴汝淮同都司李应麟解到天启七年分春季饷银四万两;登莱抚院差官邹标、叶茂勋解到本年分京库饷银三万五千两,辽官俸银一万六千两,六年五月起至七年四月止南官俸银一万四千五百九十八两;山东布政司差官赖忠礼等解到本年分补春季饷银一万两,又本年分夏季饷银五万两;又差官李一公等解到本年分秋季饷银五万两;又总督海外内臣胡良辅等带付饷银五千两;委官文士铭领解五年分(1625年)山东布政司汰兵饷银止到五万四千四百一十两五钱三分五厘;津登委官俞明等解运到漕米杂粮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石六斗七升六合,布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三匹,以上历年各官

解运到饷银米豆布匹，臣历有印信实收，交付各官，凿凿有据。内止有天启四年（1624年）五年分，东省额饷共四十万两，并截留京饷银四万两，缘于是委官毛应时、吴宗武、韩文翼在登收放，昧心灭法，商票则加二加三扣除，兵粮与营官私相授受，迄今绝无开销之商票缴还，复无给兵之底册呈报。臣业已具疏奏明，见奉明旨追究，未经结案。

注： $5 + 0.68830662 + 4 + 3.5 + 1.6 + 1.4598 + 1 + 5 + 5 + 0.5 + 5.4410535 = 33.18916012$ 万两，毛文龙这里的塘报是何人解送、何笔饷银都开列得清清楚楚，毫无作假可能。这里的数字可和下面所引塘报中的记录对照。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为谨遵明旨回话销算历年粮饷事，九月内接户部札付：

……本年（指天启七年）收过京登饷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一两有余，半买商米，半偿商价，津登杂粮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石有余，分给南北官兵一十一万余员名。

《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二《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额饷额数疏》：

饷额增损之数，人人知之，而饷中虚实之故则惟臣部独知之。案查天启七年六月，以内监胡良辅请增东江粮饷，臣部覆准本折百万之数，除山东之加派等项六十三万一千余两，并漕粮十万石外，再补本色二十七万，此二十七万之价只坐以复征青登莱海运免银一十一万七千六十一两，又复征邹滕妖乱银二万八千六百八十七两，共银一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八两，夫一十四万有奇之银，岂能运二十七万之本色，不过还其本色二十七万之名，权凑足百万之数，塞其无厌之求耳。且山东加派等银六十三万

一千余两，又非确确专为东江用者也，登兵月饷二十万亦在其中。缘内监将登营之兵四千余员名，随带出海，故原疏云东江兵等营兵饷成为一体，而登兵月饷俱在本折百万之内矣，且山东杂项等银又非确确如部额者也，据该省申文，又有虚悬无抵银四万有奇矣，督师所议计口而授之食，此外有天津运价之四万七千五百两焉，有浙直营兵辽官南官之四万三千余两焉，昨岁皇赏之十万与沙号船水手工食之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一两钱，皆取足于中，昔日所派之数原虚，今日所省之数愈少矣，臣固不敢过为裁剪，以掣督师应援之肘，亦不能不为裁剪，以示朝廷撙节之意。

《度支奏议》的记载是如果要给东江军饷百万，要从何处加派，哪些来源凑，根本不是指实际发给东江的军饷，有些人显然是原文不看，辗转抄袭，似乎列举一个《度支奏议》就脸上体面有光，所以我帮他们把原文找了出来。

天启皇帝一死后，这所谓百万军饷当然就泡汤了，更何况光是纸面上的数字都是充满水分，打的算盘是六十三万两饷银加上三十七万石粮食，六十三万饷银扣掉登兵饷银二十万，就只有四十三万，四十三万还要扣掉虚悬无抵银四万有奇，天津运价四万七千五百两显然也是到不了东江官兵手中的，皇赏之十万与沙号船水手工食之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一两，皇赏不是经常性的，也扣掉，水手工食费用也扣掉，那就只剩下二十多万了。

附录五

夏允彝对孙承宗评价的断句问题

夏允彝《幸存录》对孙承宗评价的完整原文是：“承宗练而才凡。军中利弊每发言洞中能令诸帅心服，且部曲器用亦精娴，诸帅咸服之。但谓其不能无欲，其所推毂大帅马世龙，貌甚伟而无将略也。承宗以为韩白复出，人亦讶之。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归居里中，城陷，合家被难，伤哉。”

有些人认为，这里的断句应该是：“承宗练而才，凡军中利弊每发言洞中能令诸帅心服。”并且有一些点校版的《幸存录》就是如此断句的。

但我认为这种断句法是没有完整理解全段话意思的结果。古人作文讲究起转承合，即便是在短短一段对人物评价的文章上也不会例外，作为开头第一句话，应该是统摄全段，至少首尾呼应，而不能顾头不顾尾。

所以这里如何断句，最关键的还是要理解整段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最大焦点其实集中在“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这一句话究竟是指谁的问题上。

如果这句话是指孙承宗，那夏允彝对孙承宗的评价，先扬后贬的

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对孙承宗的能力有部分肯定,但确实有保留。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断句成为“承宗练而才”就显得相当奇怪,“练”本身就有能干的意思了,再重复一下“而才”,那是什么意思?“才”本身就是极为笼统并不能进一步具体说明能干类型的评价。就等于说他能干而且能干,这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评论者对被评论的对象的能力才华,极为推崇,而且是毫无保留的推崇,所以才不惜这样重复地强调。

但在这里的情况是如此么?显然不是。

有些人提出“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是指马世龙而非孙承宗,这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一可以从语法,也就是句子主语指代的是谁的角度来分析;二可以从内容本身的意思来进行分析。

从语法的角度是一清二楚了,前一句的主语是孙承宗,后两句都是省略主语,最后一句的事迹描写毫无争议仍旧是讲孙承宗,所以这就不必多说了。

关键现在要从内容来分析,又可以分解成两个方面,就是“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这两点究竟是谁更符合?

1. 明人对“镇关门”一词用法的辨析

先说“两镇关门”,究竟谁更符合两镇关门,有人提出的说法是,如果两镇关门是指孙承宗,那就是给孙降职,所以只能是指总兵。这显然是对史料记载毫无了解造成的误会。

我们直接从《明熹宗实录》中找依据,实录提到“镇关门”的说法,一共只有三处,没有一处是总兵级别的。第一次是《明熹宗实录》卷十八天启二年正月的时候署兵部事侍郎王在晋疏言:“况山海地窄,枢臣、督臣、经臣并驻于此,事柄参差,必致掣肘。臣计枢臣视师者也,本关及各边隘口一应调度皆其责任。其经督二臣或一臣专镇关门,一臣分管各隘,分拨责成,各关口庶无他失。”

这经督二臣,在实录中经臣是指经略,督是总督,都是在总兵之上的文官统帅。

第二次是天启七年(1627年),“兵部尚书王之臣覆镇守辽东太

监纪用及巡抚辽东袁崇焕疏言……奴报紧急，着满桂移驻前屯，孙祖寿移驻山海，黑云龙移驻一片石，阎鸣泰移镇关门，其分布兵马，关内四万，关外八万，俱如内镇臣议”。

阎鸣泰当时的职务是蓟辽总督，仍旧是总兵之上的文官统帅。

第三次还是天启七年，“镇守山海太监刘应坤题恭报出关应援事，得旨览奏宁锦之间奴报紧急，朕与厂臣深切軫念，该镇坐镇关门”。

此处的镇守山海太监是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派出去等于钦差一样的角色，地位重要，仍旧不是总兵。

所以所谓的镇关门是指给孙承宗降职的说法在《明熹宗实录》的史料面前，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有人举出的一些例子，比如“明史满桂传中有‘命桂挂印移镇关门，兼统关外四路及燕河’，镇关门的指的是总兵满桂，乾隆御批纲鉴中则有‘以前屯总兵赵率教代麟，镇关门’，镇关门的指的是总兵赵率教”，它们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这两个例子列举出来的全是清人的材料，所谓《明史》本身是清廷组织编写的，代表的只能是在清人那里的用法。

而实际上就是《明史》当中，就有直接与所谓孙承宗镇关门就是降职相矛盾的用法。《明史·孙承宗传》有这么一句话：“帝优诏报之，命承宗移镇关门。”

按一些人的说法，这就是《明史》编修者在给孙承宗降职了！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了。

2. 对“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的分析

对这一点的分析，就更容易了。关于孙承宗，他第一次镇关门，最后退休的情况是这样的：“而言官论世龙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败，死者四百余人，语详《世龙传》。于是台省劾世龙并及承宗，章疏数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请。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庵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

也就是马世龙兵败柳河，结果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由此连累到了孙承宗。孙承宗因此请求辞职，但他的辞职是相当体面的：“加特进光禄大夫，詹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

而从《明史》编修者表达的意思来看，显然是说孙承宗被马世龙兵败柳河连累，是很无辜的，甚至暗示孙承宗是因为得罪了魏忠贤，所以才被允许辞职的等等。认为孙承宗自己其实是无事的，主要是马世龙连累了他，再加上他得罪魏忠贤。

孙承宗第二次镇关门，《明史》中更是把责任归到吴襄等人头上：“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宋伟往救。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并不认为是孙承宗自己率兵和清军作战而失败，还为他再次被允许辞职抱不平。

而且孙承宗毕竟没有像先后已任督师、经略如杨镐、熊廷弼、袁崇焕那样落得个直接因为重大失败被抓、被处死的下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夏允彝才说孙承宗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意思就是他并没有真正受到类似杨镐、熊廷弼等人直接在后金攻击下承担主要责任的重大考验。

那我们再看马世龙。马世龙当时兵败柳河，闹得沸反盈天，甚至直接连累皇帝老师孙承宗。他是柳河兵败的最直接责任人，当时皇帝圣旨直接下谕训斥：“上以马世龙轻进丧师，罪莫可道，喻安性同事封疆何得倖于不知。姑著策励供职悉心防御候勘明处分后。”

后来是叫马世龙戴罪立功，但事情闹得那么大。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这个马世龙都是不可能和“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扯上半点关系的。

3. 进一步对“而”与“凡”的分析

鉴于有些人认为“练而才凡”是不可接受的，那就再说一下。

首先，如我们不断章取义地理解夏允彝的话，则夏允彝对孙承宗的才能肯定是有保留的，甚至可以说是先扬后抑。断句成了“练而才”，就变成了纯粹的重复强调，毫无保留地肯定，这 and 全段评论的意思是不符合的。

在这样一个短语结构下，“而”作为一个连接词，排除那些明显不可能适合这里的用法，一共有四种可能：

其一，表示并列关系，如白而嫩，黑质而白章之类；

其二，表示递进关系，如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其三，表示承接关系，如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

其四，表示转折关系，如勇而疏，大而无当之类。

我们注意到在并列关系、递进关系、承接关系中，连接的两个词或短语，都是要表达出明确具体的不同含义的，或者并列的不同含义，或者是更进一步更具体的举动或含义，或者是时间上的顺序关系。

而在“练而才”这种说法里，显然是讲不通了，因为练，理解为干练，能干，还相对具体，但“才”的话，就是相当宽泛笼统甚至可以说模糊了，文才是才，口才是才，甚至卖艺的都可以说有才。它用在这里丝毫不能表达出更多、更明确的意思来。

那用最大的善意来理解，此处只能是纯粹地重复，纯粹地强调，但这显然又和全段话先扬后抑的语境不符合。

如果是“练而才凡”，顺理成章地转折，而且全段话前后呼应，首尾照顾，这对于精通八股文的夏允彝等来说，是很自然的写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评论孙承宗的段落下，就有夏允彝评价另外两位武将杜松、刘綎的话，其中提到杜松时说“杜勇而疏”，这当然是对“而”转折用法的一个现成例子了。

再看凡是否可以这么用呢？

凡的释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平常、普通：平凡（平常，不稀奇）；凡材（普通材料）；凡常（普通，一般）；凡费（平常的费用）；凡等（普通人）；凡浅（平凡浅陋）等。

平庸：凡固（平庸鄙陋）；凡品（平庸的人）；凡曹（平庸之辈）；凡恶（平庸低劣）；凡短（才能平庸，见识短浅）等。

这样断句意思完全通。

当然，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但却是在充分的分析之后才如此判断的。

附录六

对后金军队人数的考证

我们先来看各种史料记载。

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也就是萨尔浒之战的一年之前,后金攻打抚顺时动用的兵力在《满文老档》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就是十万。

“四月十三日,寅日巳时,发八旗十万兵征明……”

是不是这个数字写错了呢,回答是不可能。下面在攻取抚顺东州、玛哈丹等地之后,还有记载前后呼应。

“二十日,分遣六万兵携俘虏前行……汗亲率兵四万,移营前进,至边界附近驻营。”

也就是六万人带着俘虏回去了,而努尔哈赤亲自带领四万人到边境驻营。(清朝的《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对应的这段内容是“遂令兵六万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归国。帝与诸王臣领四万移营,复临大明边安营”。)

那有没有可能十万这个数字夸大了呢?

回答同样是不可能,《满文老档》的记录当时是给后金统治者自己看的,汉人要看也看不懂,不存在为了虚张声势故意夸大兵力的可能。而作为事后历史记录的话,那更只有缩小己方兵力,来彰显以少

胜多之神武形象，绝没有夸大的道理。

我们再来看明方关于后金兵力的记录。

在一年之后，杨镐在萨尔浒之战后的报告中说：“盖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岂能相敌？”

而熊廷弼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任辽东经略后写的《敬陈战守大略疏》中说：“今贼改元僭号，已并有两关、灰扒、鱼皮、鸟喇、恶古里、亏知介、何伊难一带，海东诸国兵众。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已近十万。”

杨镐根据对阵官兵的报告，说后金兵力在十万左右。熊廷弼则是根据自己的估算，结论也是近十万。

《满文老档》一年前就已经记载后金光是出征抚顺兵力就已经有十万，那次后金光俘获就有三十多万人畜，这其中就算只有一小部分人口被编练成军队，到萨尔浒之战的时候，也就不止十万了，所以熊廷弼的估算还是低估了的。

另外有一个在萨尔浒之战中被俘一年之久的朝鲜人，他写了一本《建州闻见录》，其中提到的后金兵力，通共三百六十牛录，每牛录三百人，多寡不一，按一牛录三百人计算，其军队人数在十万开外。

另一处则说“长甲军八万余骑，步卒六万余名；今则长甲军十余骑，短甲军亦不下其数云”，则是兵力至少也在十四万以上。

纵观当时各种记载，后金自己的，明方的，朝鲜的，关于后金兵力的记载，一般都是在十万左右。就如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守宁远时，就声称后金十三万人来攻打宁远。

但是在现代有许多人却宣称，后金从万历末年，一直到崇祯初年，兵力最多不可能超过六万，至于能抽调出征、动用的兵力就更少了。

就如著名的网络作者 capo1234，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一文中，大致上就是这一个观点。按他的说法，后金在设立八旗之初，最多也只有四万丁（十六至六十岁可以服兵役的男子），而这四

万丁还不可能是兵力本身,实际打仗的时候是三丁抽一,最多不过二丁抽一,算一下最多只有两万人可以用来出征。

后金在初期是二百个牛录,到了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年)是二百三十一一个牛录,崇祯二年(1619年)是二百五十个牛录左右(capo1234根据前后数字猜测的)。

按照一牛录两百人的编制,后金八旗在崇祯二年也总共只有五万壮丁,然后按照“每牛录60披甲人,共有作战士兵1万5千人”,而出征的时候,不能全部调用,只能调三分之一,于是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后金绕道入关动用的实际兵力就只有五千人,把不打仗的后勤民工算上是一万六千人,再算上从征的蒙军八千以及后勤之类, capo1234估计的后金在崇祯二年出征军力不超过两万五千(实际能打仗的只有一万多人)。

如果 capo1234的这种推算成立,崇祯二年,后金能动用的兵力尚且如此之少,那在万历末,天启年间就更不必说了。

应该说 capo1234是我极为尊敬和佩服的一位作者,甚至关于毛文龙和袁崇焕问题,本身我都是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深受启发才开始涉足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他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了。

他论证的漏洞就出在,数字的推算完全建立在对牛录数字的一些假定上,而完全把各种史料中关于后金兵力的直接记载抛在一边,不管不顾。

但问题恰恰在于后金的牛录制度本身就是前后混乱,各种记载互相矛盾的,用这些数字作为推算基础,结果势必把大量想当然的东西当成论证前提,当成事实本身。

就如 capo1234的这段话:“现在的问题,就是考察一下满洲八旗的制度和人数。按通常的说法,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将四旗扩展为八旗时,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每五牛录立一甲喇额真,每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一固山就是一旗,共有八旗(见于基本史料如《满洲实录》,《八旗通志》等)。这样计算的话,每旗共有25

个牛录,也就是五五制。每牛录 300 人,则每旗 7 500 人,八旗共 6 万人。当然,这个数字略微有些疑问。因为《八旗通志》接下去就写道:‘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有 400 牛录。如果按五五制,那么八旗应该只有 $25 \times 8 = 200$ 个牛录,《通志》记载牛录的数量一下子就多了一倍。但史料有时候互相矛盾,比如《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 年)闰二月做过一次统计,八旗加起来共有 231 个牛录,与《八旗通志》不符。我们暂时不理睬争论,以《老档》为准,毕竟后者更符合五五制的描述,大约接近于真实情况。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便持这一观点。”

这里 capo1234 采信所谓八旗之初有二百牛录的理由,就是二百牛录更符合五五制,也即:一共设立八旗,每一旗有五个甲喇,每个甲喇有五个牛录,每个牛录有三百人。五五二十五,二十五乘八就是二百,所以八旗总共就有二百牛录,按照每牛录三百人计算就是六万人。而按 capo1234 后面的说法,当时的每个牛录还不满员,所以应该平均每个牛录两百人,只能有四万,当然这个平均两百也是他猜测的数字。

但实际上所谓的八旗五五制,大概只有八旗的“八”这个数字才是对的,其他的和实际基本不沾边。就按照 capo1234 自己承认的《满文老档》天命六年记载的八旗二百三十一牛录来说,我们可以直接引用《清史研究通讯》1987 年第 1 期上郭成康《清初牛录的数目》一文的内容:“各旗所辖的牛录数目悬殊,最多为六十一牛录,最少的为十五牛录,每旗平均为三十牛录。”

如果认为五五制的描述成立,那能直接用来证明后金初期八旗有二百牛录左右但各期牛录相差悬殊的《老档》记载本身就可以否定了。

如果承认五五制的描述跟实际相差甚远,那否定《八旗通志》记载的 400 牛录的理由,显然就不能成立。

再有就算按照 200 多牛录来计算,是否每牛录真的只有 300 人或 200 人呢?

这里的论证也是掺杂了太多想当然的因素, capo1234 举了一些牛录不满员的记载,但实际上同样有许多牛录超员一倍以上的记载。

在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写的《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一文中说:“还有,一个牛录三百这一数字是一个准则,但在‘召集的部众’的条件下会有所不同。现据《八旗氏族通谱》举例说明,马察地方的佟氏之中,有十札鲁忽赤(检察官)之一的巴笃札鲁忽赤,他率领五百户来归,从属于正白旗,编成牛录。同族的雅西塔,率领满洲二百余人、汉人二百三十余人来归,亦编为一牛录。这一牛录共四百三十余人,并且半数以上是汉人。又绥芬地方那木都鲁的明安图巴颜,率领满洲一千余来归,变成二牛录,一牛录有五百人。再有,额宜湖地方的富察氏阿尔都山,招抚三百余人,编成一牛录,这是标准的数目。然而,纳殷地方的富察氏孟古慎,以子弟及同里壮丁五百名来归,亦编成一牛录。从这些例子来看,可知是以三百到五百个壮丁编为一牛录。《建州闻见录》说‘一柳累所属三百名,或云多寡不均。’这个说法大概是合乎实际的。”

也就是有五百户编成一个牛录的(按照 capo1234 说的每户出两到三个丁,那这一牛录就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人了),有四百三十人编成一个牛录的,有五百人编成一个牛录的,当然也有三百人编成一个牛录的。

先不说 capo1234 列举的那些五十多人一牛录的记载是否可信(按朝鲜人《建州闻见录》的说法,当时一牛录三百人以上应该才是普遍情况),就算姑且认为是真的,又怎么能想当然就得出平均是两百人一牛录?

再回到后金初期有多少牛录的问题上来,《八旗通志初集》没有记载建旗时的牛录总数,真正明确提出八旗初设时有四百牛录的是乾隆时期修订的《大清会典则例》和《钦定八旗通志》。

那么《大清会典则例》和《钦定八旗通志》的四百牛录说是否是胡编乱造呢?我们就以《钦定八旗通志》来说,实际上它是在乾隆时期整理和掌握了更多八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修纂的。

《满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上赵德贵所写的《两部〈八旗通志〉比较研究》说:“《八旗通志·初集》虽然在保存资料方面有所贡献,难能可贵,但其征引之资料往往勘核欠佳,讹误不当者时有发现。《钦定》本则不然,在成书过程中,不仅对各类史事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而且对旧志资料一一核检,并将其正误得失记于案语、注文或序言之中。以‘谨案’考镜史事源流《钦定》本之案语分两类:一为文中加案;二为一事开篇,提行另起加案。前者多用以注释清语人名、官名与地名;后者多为史事方面的补缺拾遗,攻讹纠谬。今据《旗分志》案语举例如下。

(一) 补记各佐领之根源、来地、编立年代,以及分编、合并、裁汰等事项。《旗分志》二十七《镶红旗汉军佐领》,第一参领第二佐领条下,‘谨案旗册:此佐领系天聪五年编立’。《旗分志》二十九《镶蓝旗汉军佐领》,第五参领第六佐领条下,‘谨案:此佐领原由内务府拨出,因所属人等俱系另记档案之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将此佐领裁汰’。

(二) 补记各佐领、管领、分管之初任、承袭、兼管、改旗、拨旗、抬旗情况……”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5期上刘爱君《〈钦定八旗通志〉述略》中说:“《钦定八旗通志》则是在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的背景下,以《八旗通志初集》为基础,由纪昀等人奉敕撰修,集中了四库馆和翰林院等多位学者,并在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之下,以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历时二十多年才修撰成功,因此该书主修班底的学术条件和实力要超过《初集》本的编修人员。这也是《钦定八旗通志》无论在体例、内容、资料等方面都优于《八旗通志初集》的原因。”

也就是《钦定八旗通志》本身是比《八旗通志》在资料收集更完备,掌握材料更准确,核定更严格的基础上进行修纂的。

从这一点来看《八旗通志初集》没有提出国初四百牛录的说法,而到了乾隆中后期修撰的《大清会典则例》和《钦定八旗通志》却明

确了这一说法,显然不是疏忽或者臆造的结果。

那么具体到八旗牛录的问题上,在乾隆中后期,究竟比起雍正时期开始修的《八旗通志初集》来,掌握哪些更多的材料呢?

从陈佳华、刘世哲翻译的细谷良夫《〈八旗通志·旗分志〉的编纂及其背景》一文中可以得知详细地记载了牛录分类、牛录来源等情况的旗册是在《八旗通志初集》的《旗分志》编纂之后才完成的。另外作为雍正时期修纂的《旗分志》基础的佐领家谱册虽然已经开始逐渐向国家档案转变,但“尚未进行充分整理”,从而导致“关于牛录本身情况记载不详备”。到乾隆时期这些原始资料才真正得到充分整理。

由此可以断定,乾隆中后期《大清会典则例》以及《钦定八旗通志》之所以要把以前老档以及实录中关于后金初期二百多牛录说法修改为四百牛录,正是在大量新整理完备的档案材料如《旗册》、《佐领家谱册》的基础上进行的。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蒙八旗、汉八旗成立的时间相当晚,但许多证据表明,在蒙八旗、汉八旗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以蒙人为主,或汉人为主的牛录,这些牛录在蒙八旗和汉八旗成立之后,再从原来的满洲八旗里分离出去,在《旗分志》里也是放在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中计算的,但追溯起源的设立时间,是完全可以追溯到蒙八旗、汉八旗成立时的。

所以尽管这些牛录成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蒙古和汉军的名号和区分,但《钦定八旗通志》在提到他们的时候,仍旧有可能按照他们后来的划分而叫成是蒙古牛录,和汉军牛录。如果不动脑筋,因为这种叫法,而认为《钦定八旗通志》的记载是胡乱编造的,显然是没有考察事情本末原委,想当然的判断。

后金八旗牛录数目本身就在其官修史书中前后记载矛盾,混乱不堪。就算我们不完全采信《钦定八旗通志》中的后金初期就有四百牛录的说法,那客观的态度也是对这个问题存疑,留待有更多原始资料挖掘出来才能解决。

实际上后金一开始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文化水平低下,各种记载矛盾混乱,或者残缺不全,是必然的事情。用一系列规则的制度假定作为前提,假设后金记录是完整的,确切的,并且实际操作中完全按照纸面规定来执行,然后只要像做小学数学应用题一样,用几个简单的乘法就推导出后金兵力多少。这是高估了后金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了。

即便我们再退一步说,就按照后金初期二百牛录的说法,那也是不能得出后金兵力只有四万或六万的结论的。实际上根据《满族研究》2007年第1期上滕绍箴的《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一文论述,许多人当作论证前提的后金兵民全都被安置在八旗系统下管理,只要根据八旗牛录数目就能计算出其人口、兵力多少,这大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八旗系统之外,还另有一个汉人社会组织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汉官管理系统:

“由于建立汉人、汉兵管理系统,就形成以总兵官佟养性和李永芳为首的汉官统治系列,如设都堂、总兵官、参将、游击、备御、守堡或管屯等官。分辖各地的汉官有金州游击刘爱塔,盖州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蕊忠,沈阳游击刘有宽,镇江游击佟养真,爱河备御高明和等。据天聪二年(1628年)十二月,皇太极‘颁发汉官敕书’的记载,有总兵官佟养性。副将爱塔。参将佟延、刘岱仲、顾守通。游击有赵一鹤、马汝霖、严庚、李绍武、李大成、杨达有、吴殷、祝世昌、佟成蛟、李英杰、李国臣、张孟兆。都司李继学。备御有爱塔、佟延、李英杰、张兴国、杨铭石、赵世兴、殷廷辂、王义伟、吴裕、王远觉、佟成年、郭绍吉、宋世尧、马远功、马远龙、曹思扬、徐文、宁殷、刘远清、杨万邦、王玉吉、朱登科、崔大忠、高永富、李士新、王世平、王佳岩、朱守义、臧国祚、陈万寨、宋文远、佟正、高提明、于成功、马戍龙、韩田禾、王子登。总计是总兵官一名,副将一名,参将三名,游击十二名,备御三十五名。

“从这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名单是奖励功勋名单,

各给世袭职务，他们肯定都是汉官，不是旗官。二是清朝前期对于早期牛录，统称‘国初’牛录。所谓‘国初’是指天命，主要是天聪朝而言。查证相关资料，汉军‘国初’牛录，只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五佐领，首任佐领是明朝山海关归降副将许定国。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时期普遍设立汉备御、千总、百长是管理汉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以牛录进行编制。”

另一部分是所谓诸申官管理系统，也就是女真官员管理汉人的系统。

“被诸申官员管理的汉人是附属于牛录或五牛录之下，并没有单独组成牛录。”

此外还有所谓随旗问题，用滕绍箴的话说“随旗和入旗有根本区别”，他区分了四种情况：“汉官随旗、汉官受世职随旗、入旗汉官未编牛录和入旗已编牛录等情况。”

他举孔有德等人的例子，说明汉兵随旗但不入旗。

“汉兵随旗。天聪八年（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等三部归服后金，所部官兵被编成‘天佑兵、天助兵’，其原有的军事组织没有变更，即所谓‘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但他们行军打仗，却‘随旗行走’。”

还有如李永芳。“最引人注目的是额驸李永芳，史称：‘抚顺所擒唐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衣，以为先锋’、‘李永芳领辽兵三万俱住辽阳北城，各将近日新编许多乡兵，战车、枪炮、火药具备停当等’……从这些资料看，李永芳应是一旗首领。其‘以为先锋’之句，并在李朝与贝勒阿敏发生争执，一般人会认为他已经加入蓝旗，而实际他却是个随旗汉官。”

滕绍箴论述甚详，此处限于篇幅就不再详尽摘录。

后金统治下汉人的数目远多于女真人的数目，这些汉人除了一部分是被编入八旗牛录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八旗系统。汉人兵员数目合计起来，就算不多于女真兵，也至少是相差不多。如果只按照八旗牛录数字来推算后金兵力，显然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是

和事实相差甚远。

总之,用牛录数字来推断后金兵力的做法,从一开始就依赖于一连串充满疑问的假定,是不科学的做法。

相对而言,根据当时各种史料记载后金兵力的直接数字互相参照,是更为合理的做法。如果只有一处记载后金兵力十万以上,这可以认为是夸大,但大量来自不同渠道的记载都是如此,那其为虚假的概率只能是无限接近于零了。

附录七

对史料的一些必要说明

一、不同史料之间价值高低的辨析

在大部分现代历史学家或历史爱好者的笔下，明末天启到崇祯初期，明朝方面抗击后金的舞台上的主角大概不外乎如下三位：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相形之下，毛文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他的唯一价值就是作为袁崇焕的附属物而存在。

膜拜袁崇焕的人拼命丑化毛文龙，以此来说明袁崇焕全方位的英明伟大，衬托崇祯皇帝的昏聩无能。

而对袁崇焕有所质疑的人，则“公正”而谨慎地施舍给毛文龙一点肯定，以此说明袁崇焕也是犯过错误（还不是“罪行”）的，他最后被处死，有点咎由自取。

就这样，对毛文龙的评价完全从属于对袁崇焕的评价，毛文龙似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独立存在的生命，沦为了袁崇焕的一个影子。

当然这种从属，也不是赤裸裸的，也需要一些史料来点缀。什么史料呢？丑化毛文龙的人，引用明朝当时的文官攻击毛文龙的奏疏，当然还引用朝鲜《李朝实录》大量攻击、丑化性质的记载（最著名的如民国历史学家李光涛先生的《毛文龙酿乱江东始末》）；而肯定毛

文龙的人，则引用明朝文官中赞扬毛文龙的奏疏以及民间的一些史书评价。

双方成了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基本上是你引你的材料，我引我的材料，都认为自己引用的材料才是真实客观的，别人的材料是虚假的。

要解决这种状况，就必须对不同史料的价值高低和彼此关系先做一个分析！

我们现在赖以了解毛文龙的第一手史料究竟有多少呢？不外乎如下四个来源：

第一是明朝方面的材料，也就是参与辽事的官员的回忆记述、官员的奏疏、皇帝的批示，这方面主要有茅元仪的《督师纪略》，周文郁的《边事小纪》，明政府编的《明熹宗实录》。清人整理的《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因为保留了许多官员奏疏和皇帝批示也勉强可算。

第二是毛文龙自己写的奏疏、塘报，以及当时对毛文龙抗金活动有过深入了解的人写的介绍，这主要就是《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以及收录在其他史书内的毛文龙的奏疏言论。

第三是后金方面记录当时情况以及来往文件档案的《满文老档》，还包括整理内阁大库残留档案而成的《明清史料》甲、乙、丙、丁诸编，以及《天聪朝臣工奏议》之类。

第四是朝鲜方面的《李朝实录》，涉及毛文龙在东江活动时期的主要有《光海君日记》和《仁祖大王实录》。

这四方面的史料在判断毛文龙功罪中，哪一个作用最大？

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当然是以《满文老档》为代表的后金档案记录和以《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为代表的毛文龙自己的记述最为重要，这其中又尤以后金档案文献为最关键，最核心。

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对立的两方当事人就是毛文龙和后金，通过毛文龙的奏疏，我们可以最直接地知道毛文龙有过哪些活动，这些活动在他自己看来产生过什么样的效果；而通过后金档案我们可以最直接地知道，毛文龙的活动对后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

响,这些影响是无足轻重还是生死攸关?

毛文龙方面的材料会存在自我吹嘘的嫌疑,而后金的记载却不存在故意去夸大毛文龙功劳的可能,相反为了遮丑,为了掩盖曾经的疮疤,会故意删除贬低毛文龙的功绩。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加以对照,可以得到相对来说最接近于真相的认识。

无论如何作为直接当事人,他们的记载最具备接近事实真相的客观条件。按照史料类别区分,在具体涉及毛文龙的问题上,后金档案和毛文龙的奏疏、塘报是第一手史料,而《明实录》和《李朝实录》等史料中记载的其他人员的奏疏、评论涉及毛文龙事迹的,有相当部分已经属于道听途说、互相转引甚至妄加揣测的第二手史料了。

可以说,以后金档案的记载为核心,以毛文龙方面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的记载为参照,再以此为基础对《督师纪略》、《明实录》、《李朝实录》等等的记载进行辨析,则足以彻底澄清围绕在毛文龙这一历史人物身上的谜团。所谓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抓住主要矛盾,直击根本要害,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以往的论者之所以纷争不休,恰恰是没有辨析不同史料的价值高低,一锅煮,想引用什么就引用什么,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倾向、需要就行,也不判断这些材料彼此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结果一团乱麻。

当然对于《满文老档》这类资料,以往的关于毛文龙的讨论中,也有许多人引用过,但主要就是围绕着后金方面和毛文龙的几封通信,以此来试图论证毛文龙勾结后金、投敌之类。而对大量关于毛文龙活动的其他记载似乎完全视而不见。这或许只能解释为,讨论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翻阅目录,只看和通信有关的部分,其他部分根本就连看都没去看,或者仅仅是阅读了相关资料集录中摘引的《满文老档》中的信件部分。而且就是对这些信件,也不和《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毛文龙给皇帝的奏疏中的说明进行对照。这样的讨论自然只能是用一厢情愿的臆断来代替历史实际。这样来利用《满文老档》只能是白白糟蹋了史料的价值。

二、史料利用的反方向原则

在利用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些地方,我们会指出某个史书的记载不可信,而在另一些地方,我们又会把同样一本史书中的内容引用来作为根据。那其中取舍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林国华教授在《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一文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反方向原则”,他说“有很多史料的作者和写作态度上都有明显的倾向性,使史料的真实性受到很大影响。但即使是主观倾向性很强的史料,其中也往往包含一些真实性较高的内容。对这类史料,可以根据作者的倾向性,从反方向挑出其中真实可信的部分”。

根据这个原则,本身倾向是标榜某一人物如何英明神武的史料,那其中提到其失败狼狈的记载,当然接近真实的概率更高;而对于吹嘘其正面形象的记载,则需要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经过和其他史料的对照分析,才能决定是否采信。

反之,立场是厌恶某一人物的集团所记载的史料中能说明这一人物功绩和优点的材料,真实的概率是很高的,而对其贬低、丑化的记载,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如何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对与毛文龙相关史料的分析中去呢,不妨以《满文老档》为例。

《满文老档》虽说是第一手史料,其实也是要打一些折扣的,在利用之前,需要做一些说明。记载后金时期史事的这一批原始档案在乾隆六年(1741年)经过修复整理装裱(经过装裱整理的老档原本在后来被称为“老满文原档”,在中国台湾影印出版时称“旧满洲档”,后来的抄本称为“满文老档”,以示区别),这一批档案原本四十册,在清亡以后在内阁大库被发现,被称为“老满文原档”,后被运至台

湾,影印出版时称为“旧满洲档”。

而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对《老满文原档》重新抄写编排,形成了一批抄本,其中在沈阳的抄本,清亡以后被日本人发现,命名为“满文老档”。

按照我们对乾隆时期疯狂销毁书籍,篡改历史书籍的了解,凡是经过他治下整理的东西,都势必要对其完整性和忠实性打上一个问号。乾隆四十年的抄本就不必说了,就是乾隆六年的原档经过裱糊整理,也同样不能排除被动过手脚的可能性。

早在民国时期,明清历史学大师孟森就考证过,《满文老档》中,也确实有一些史料是经过后金和清廷统治者加工的。如后金对明宣战的所谓七大恨,孟森根据留存至今的天聪四年(1630年)木刻揭榜之七大恨,对照《满文老档》的记载,指出《满文老档》中的七大恨记载都是经过后来统治者篡改的,而并非是当时原文(见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而到了现代,随着对《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对比研究的深入,《满文老档》甚至《旧满洲档》本身都经过清统治者大量删改乃至篡改成为不争的事实。

1991年第4期《清史研究》上,刘厚生在《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中的伪和误》一文中说:“无怪乎台湾学者们对《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提出异议,指出:‘原档与老档中许多重大的史事,由于乾隆帝自卑心理之作祟,竟任意加以删改。此举殆最不可恕……因为乾隆朝重抄老档时,所有被其重抄的纪录,多为清太祖最光荣的一面,而被其删弃者,大多是清太祖最恶劣的一面。’”

甚至是被视为原始资料的《旧满洲档》本身同样也是经过大量删改涂抹的:“《旧满洲档》中之史料被勾圈涂抹之处,有整段整句被删削,有数行或整页被圈掉,笔者大致作个统计,被勾圈涂乙的页数约计908页之多,几乎占《旧满洲档》总页数5378页的1/5,一部原始史料遭到如此严重的涂改删削,令人惊愕。”

“在文字狱的淫威之下,史学遭受到从来未有过的践踏,伪造史

实,消灭史实之举,有清一代屡见不鲜。《旧满洲档》虽是用清人称之为‘国语’的满文写成的史料,但也同样不逃脱若等厄运。从天聪末年始修太祖实录起,至乾隆四十年《满文老档》重抄止,在这将近一百四十几年间,历朝修史时曾广泛使用删改过这部分重要的原始资料。”

可见,即便是《满文老档》乃至《旧满洲档》这样看似原始的资料,其中记载的内容也依旧是被后金和清统治者为了自身需要,掩盖其曾经的丑态,或达到其他目的而经过篡改的,对这一点,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但也正因为此,根据反方向原则,我们可以更放心地引用《满文老档》对毛文龙活动及影响的记载,而不必担心这些记载是过度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从反映后金和清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敌人毛文龙的态度而言,以及毛文龙活动对后金造成的重大影响而言,《满文老档》仍旧不失其作为第一手史料的重大价值。

清统治者一贯的立场就是对毛文龙持贬低、丑化态度,在《明史》中甚至不肯为毛文龙独立作传。其整理的档案中记载的毛文龙对后金所造成的损害,毛文龙对于明朝的功绩,只存在缩小的可能,而不存在夸大的可能,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满文老档》和《旧满洲档》本身经过统治者大量删改,为维护后金统治者光辉形象,对某些涉及毛文龙的事件,难免就会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或者对某个事件的记述显得突兀,没有来龙去脉,这时我们就必须参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其他相关史料才能对真相如何有更清楚的认识。

反过来,如果是毛文龙自己写的塘报、奏疏,则对其中提到的毛文龙的功绩,就不能无条件采信,而必须和其他史料参考对照,分析其可信度究竟如何了。

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史料,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三、一些名词解释

涉及毛文龙史事，有一些名词是经常被提到的，如不了解其含义，难免发生疑惑误解，所以这里不妨集中列举若干，加以解释。

1. 东江和皮岛（椴岛）

许多论及袁毛历史的人，对东江和皮岛常有误解，往往混为一谈，提及毛文龙的东江，便以为仅指一个皮岛。有无知者，还质疑说区区一个皮岛如何容纳几十万人者。

当然造成这种误解，也并非没有来由，其根源在于《明史》之记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1621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犄角计。”

实则东江和皮岛是两回事。东江是分布范围达千里的群岛总称，如考虑其指毛文龙军队管辖之范围，则还应包括陆地上朝鲜境内的铁山。其名称之得来，据说是因为在鸭绿江之东。

东江群岛包括哪些岛呢，这里不妨把毛文龙奏疏、塘报以及《李朝实录》中提及到的列举如下：三山岛、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小松岛、鹿岛、给店岛、色利岛、獐子岛、海洋岛、五家岛、菊花岛、莽麦岛、大鸡岛、加次岛、须弥岛、皮岛（椴岛）等等。

其中地方达到百余里甚至数百里的大岛有石城岛、长山岛、广鹿岛，皮岛反不如这些岛大，其余诸岛也多有数十里范围。

东江群岛的分布范围，如以离开旅顺的距离算起，按毛文龙奏疏呈报：三山岛在旅顺东面二百里；广鹿岛又在三山岛东面二百里；长山岛离广鹿岛五十里；石城岛离长山岛二百里；小松岛和石城岛相近；鹿岛在石城岛东面二百里。

如以离朝鲜距离而论，皮岛向朝鲜义州方向五十里的海上有鸡

岛,西北五十里有獐子岛,向铁山方向三十里有加次岛,加次岛东南有身弥岛(明方称须弥岛),须弥岛和朝鲜陆地只隔二十里海路。

由以上可见,东江群岛的分布范围是极广的。《毛太保公传》里引用的崇祯时工部主事徐尔一奏疏里说“关宁极望不过四百里,乃拥兵至一十八万,皮岛所属岛屿二十余处,浩淼一千余里,非得多兵何以守?何以战?何以联络相为策应乎?今文龙用兵十五万,乃谓其实兵止二万八千,而余皆虚冒钱粮,此其不可解者二”。

钱曾在《也是园杂记》中说“皮岛在登莱海中,绵亘八十里。朝鲜居其东北,凡獐子岛、石城岛、松山、长山诸岛,皆皮岛之重门也”。

皮岛仅仅是东江群岛之一,因为是毛文龙的驻地,所以常常被用来代指东江。但并非只有皮岛重要,其他岛无足轻重。毛文龙的东江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其由一连串分布广泛的群岛组成,彼此可以互相声援联络,其靠近陆地的海岛中有接近明朝的,有接近后金地盘的,有接近朝鲜的。居于海中的岛,后金又鞭长莫及,可进可退,可攻可守。而能容纳的人口数量又可以达到相当庞大的规模。毛文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开镇东江,将其开辟为袭击后金的根据地。

皮岛名称的由来,按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说“横于铁山西南海中,原称椴岛,椴者,朝鲜训 pi,遂以省字称为皮岛”,本文大量提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记载,凡是提到“椴岛”者,就是指皮岛。但吴晗辑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凡是椴岛一律作椴岛,当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

另《李朝实录》中有一处说:“是后辽民,皆卷入海岛,接屋甚盛。作一都会,东南商船,来往如织,近海草木,尽于樵苏。椴岛或称皮岛、椴岛,至是文龙改以云从,以叶己名。”

此处朝方记载有误,被毛文龙改称“云从岛”的并非是椴岛(皮岛),而是身弥岛(须弥岛),后面正文中对云从岛(须弥岛)还多有提及,需注意。

至于金庸,他在《碧血剑》附录的《袁崇焕评传》里说:“皮岛在鸭绿江口,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

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当时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喧宾夺主,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皮岛横约八十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渐盛。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

他这里把皮岛、云从岛、东江这些全都混在一起了。所谓的“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能符合的只有云从岛。但说“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还是夸张了,若按毛文龙塘报中的记载,云从岛或许只有退潮的时候,才能勉强符合上面的叙述。

更有趣的是金庸还在其文注释里说,有人把皮岛混同海洋岛,所以是“地理弄错了”,实则他自己错得连基本方向都没有了。

2. 假靺、诸申、丽人

“假靺”一词见于《李朝实录》的记载。因为后金统治区内有大量剃头的汉人逃亡出来投奔毛文龙。大抵朝鲜人看来后金女真人是靺子,为真靺,而汉人剃头后样子差不多,但又不是真的女真人,所以叫做假靺。

“诸申”一词见于《满文老档》,与“汉人”相对。大概是努尔哈赤同一族人的意思。为简单起见,就理解为建州女真人。

“丽人”一词多见于明朝官员的奏疏里,是“高丽人”的简称,代指朝鲜人。

3. 刘爱塔 = 刘兴祚 = 刘海

这三个名字多见于朝鲜的《李朝实录》和明方一些史书中,实则三个名字代表的是同一个人。此人在毛文龙史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经常被提到,而在不同处的记载用的是不同名字,为避免引用相关史料时疑惑,此处专门说一下。

另外说一下后来被清朝封王的皮岛三个将领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在毛文龙时期,耿仲明的名字是毛有杰,尚可喜的名字是毛永喜,孔有德的名字是毛永诗(见《东江遗事》卷下:《耿靖南传》、《尚平

南传》、《孔定南传》)。

其中孔有德是毛文龙率领的一百九十七名袭取镇江的亲兵之一,是毛文龙的老班底、老部下;而尚可喜和耿仲明应该是毛文龙开镇皮岛之后,从后金统治区下逃亡出来投奔毛文龙的辽东人,被选为将领。

有意思的是,金庸在《袁崇焕评传》里说“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他是直接把三个人的后来的名字加了一个“毛”,大概是一拍脑袋想当然的结果。而其中耿精忠是耿仲明孙子的名字,而金庸又不知何故,祖孙不辨,竟至于混为一谈。

参考书目

一、古代著作

《崇祯长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7 年校印本。

《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明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校勘本。

《明熹宗宝训》，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校印本。

《明熹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校勘本。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1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天聪朝臣工奏议》，辽宁大学历史系 1980 年《清初史料丛刊》本。

《王廷相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杨嗣昌集》，岳麓书社 2005 年版。

毕自严：《度支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陈舜：《乱离见闻录》，《明史资料丛刊》第 3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程本直：《矾声记》，《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程本直：《漩声记》，《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皇太极：《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之《史料丛刊初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李长祥:《天问阁文集》,达川市地方志办公室 1998 年版。
- 李肯翊:《燃藜室记述》,《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1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李民突:《建州闻见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3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 李清:《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荆驼逸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 年版。
- 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 陆应畅:《樵史通俗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陆云龙:《辽海丹忠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毛承斗、吴国华、吴寿:《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毛奇龄:《毛总戎墓志铭》,《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毛先舒:《毛太保公传》,《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茅元仪:《督师纪略》,《明史资料丛刊》第 4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甲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影印本。
- (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乙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影印本。
- 彭孙贻:《平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 钱曾:《也是园杂记》,《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2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 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清史研究通讯》1990 年第 2 期。
- 王士禛:《池北偶谈(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影印本。
- 王鎬:《寓圃杂记》,《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 夏允彝:《幸存录》,《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之《明季稗史汇编》卷 1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
- 熊廷弼:《敬陈战守大略疏》,《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 叶梦珠:《阅世编》,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 佚名:《今史》,《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余大成:《剖肝录》,《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于慎行:《谷山笔尘》,《明史资料丛刊》第 3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张岱:《石匱书·石匱书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影印本。
- 张岱:《夜航船》,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张廷玉等编:《明史》,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 张永祺:《偶然遂纪略》,《甲申史籍三种校本》,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 郑廉:《豫变纪略》,《甲申史籍三种校本》,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译:《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周文郁:《边事小纪》,国立中央图书馆 1947 年版。
- 朱溶:《表忠录》,道光十三年(1833 年)世美堂重刊十卷本《杨忠烈公文集》附。

二、现代中文著作、译作

《鲁迅全集》第5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卢梭文集》之二《社会契约论》,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李亚平:《前清秘史——人主中原之路》,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梁颂成:《杨嗣昌集》,岳麓书社2005年版。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

王兆春:《世界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王春瑜:《中国稀见史料》第1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阎崇年:《袁崇焕研究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2008年版。

钟少异编:《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三、论文

薄音湖:《明清时期内蒙古各部的名称》,《寻根》2007年第3期。

郭成康:《清初牛录的数目》,《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贾乃谦:《朱溶及其〈忠义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

锦泉:《水雷小史》,《航海》1988年第5期。

李斌:《火龙经考辨》,《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

李崇洲:《中国明代的水雷——世界水雷的鼻祖》,《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2期。

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李光涛:《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

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

李光涛:《清人关前之真相》,《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2 册,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林国华:《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刘爱君:《〈钦定八旗通志〉述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 年第 5 期。

刘厚生:《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的伪与误》,《清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

刘厚生、陈思玲:《本世纪中日学者〈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研究述评》,《民族研究》1999 年第 1 期。

任树民:《满文蒙文旧档删改前后的清政权历史定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6 卷(明清),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齐木德道尔吉:《四子部落迁徙考》,《蒙古史研究》第 7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滕绍箴:《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满族研究》2007 年第 1 期。

细谷良夫:《〈八旗通志·旗分志〉的编纂及其背景》,《民族译丛》1989 年第 2 期。

徐新照:《焦玉〈火攻书〉是元末明初的火器著作吗?》,《文献》2000 年第 4 期。

于多珠、赵艳玲:《明末四方势力的角逐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河北学刊》1998 年第 3 期。

张爱斌:《历史学家李光涛轶事》,《江淮文史》1995 年第 3 期。

张旋如:《满学研究中的一株奇葩——〈旧满洲档〉研究》一书评介》,《清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赵德贵:《两部〈八旗通志〉比较研究》,《满族研究》2005 年第 3 期。

赵琦:《明末清初的哈喇慎与蒙古八旗》,《蒙古史研究》第5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朱诚如:《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后 记

袁崇焕、毛文龙这对历史人物之间的纠缠,是大部分涉及明朝历史的通俗读物热衷的一个话题。从金庸武侠小说《碧血剑》的附录《袁崇焕评传》,到阎崇年百家讲坛演讲《明亡清兴六十年》,再到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中的相关章节,还有如李亚平的《前清秘史》,应该都是广为人知,读者群体极其广泛了。

凡是对中国历史稍感兴趣的人对袁崇焕、毛文龙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都会略知一二,而本书正是给那些在此基础上希望更深入、更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准备的。

本书之写作缘起于作者在对以前写的文章(有关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修改时,对袁崇焕、毛文龙问题的重新思考。

过去一直以为袁、毛公案有太多人讨论过,应该没有太多新东西可说,因此,无需花费太多时间、精力去重新论述。但在阅读《满文老档》、东江塘报、《李朝实录》等原始资料之后,我却发现有太多东西是以往讨论没有涉及的,太多的材料没有被充分利用,这才决心大幅度改写原来的稿子。而在改写过程中,阅读的史料越多,需要写的内容也就越多,以至最后只能独立出来,使之成为单独的一本书了。

写完后,我在2010年8月把其中部分内容贴到本人的博客上,一个月之后,又以“毛文龙及明朝灭亡原因等问题”作为标题,节选了部分文字贴在“天涯社区”网站的“煮酒论史”上,前后次序则有所打乱。

这期间,从博客到论坛,经历了一连串极为激烈的辩论,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三个多月之久。本书的附录三、附录四、附录五、附录六就是当时辩论中针对一些人提出的质疑所给出的回答。

本书的最初形态,包括网络上贴出来的部分,涉及史料一概引用古籍原文,并在注释中给出相关的版本、页码信息。而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应相关方面提出的要求,也为了顺应大众的阅读习惯,本人陆续对这些史料乃至全书做了通俗化处理,去掉了绝大部分注释。虽则如此,本书几乎所有的内容和论断都是建立在对众多史料记载的严格辨析基础上的。

此次本书交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人谨向出版社的相关人员表示感谢,并期待读者们能慧眼识“错”,有以教我。古语有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至理也!

杜车别
2013年4月